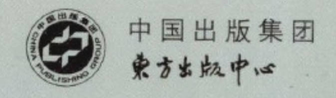
下册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毕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定价：80.00元（上下册）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下册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毕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中国出版集团

第十三章　现代性的文化

罗伯特·巴芬顿(Robert M. Bufington)

威廉·弗伦奇(William E. French)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发动的政变,即图斯特佩克革命,使他登上了墨西哥总统宝座,把国家似乎无止境的现代化追求推到了一个高潮。从墨西哥最后一个长期稳定阶段的末期即18世纪后期,开明的波旁王朝统治者进行改革起,在一个多世纪中,墨西哥的改革努力屡受挫折,而现在许多墨西哥人都热切地向新政权宣誓效忠;尽管小心翼翼,但还是期望与后者共度一个漫长的蜜月。新娘可能有点衣衫褴褛,但依然可爱;虽说新郎的血统并不完全是蓝色的(据有些人说,这是因为其祖母是个米斯特克族印第安人),但他确实很活跃也足够奉行自由主义。婚姻几乎是完美的,或者说看上去如此。宣传者抓住时机,鼓吹一个"秩序和进步"的新纪元开始了,它将最终结束数十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衰退和社会恶化。一位评论家曾如此评述道:"国家满目疮痍,但却拥有有史以来最团结一致、最迫切也最坚定地渴望和平的民众。"实际上,墨西哥人对现代化的崇拜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35年和平期里得到了最纯粹的表现。 397

19世纪时诸多前往墨西哥的访问者中最受尊重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曾称墨西哥为"不平等的国度"。令人惊讶的是,在

这样一个国家里，各阶层的墨西哥人都怀有现代化的梦想(尽管有不同的表现)。1886年，在墨西哥城著名的国立预备学校，迪亚斯政府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长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e)发表了一首典型颂扬现代技术的华丽颂歌，他在讲话中鼓励学生"要以深切的热情学习电学，获取其秘密，将其转化为可更新我们的财富的机械力展示给我们，把它们输送到世界各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与此同时，在北方边境，398 民谣歌手带着一点夸耀和些许渴望地歌唱着传说中的豪哈城：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不穿凉鞋，不戴草帽，因为那里所有东西都物美价廉。"对于一个依然支离破碎、忙于跨过门槛的民族国家来说，现代性所经常包含的矛盾并一直含混的概念，却散发出一股无法抵抗的诱人力量。



图中坐在一辆豪华敞篷马车中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在其漫长的统治期中，成了现代墨西哥的化身。除了1880—1884年这四年外，迪亚斯从1876—1911年一直担任总统。

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概念的矛盾性和含混性能很快被看到，或被公众知晓。相反，在欧洲实证主义大师孔德和斯宾塞的"科学"社会学的启发下，通常被认作是迪亚斯专家治国顾问的胡斯托·谢拉以及他

的同仁“科学家派”(científicos)之类的理论家,并不把这种潜在的不调和看作是种族和阶级的长期不平等。相反,他们精巧地制作出了民族救赎论,称这将使墨西哥免受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落败的极大侮辱。谢拉在一篇名为《墨西哥:其社会进化》的文章中发出警告说:

> 科学……已百倍地加快了某些民族的进化。其他人群或者变为从属者,并失去自我意识和人格;或者在理想和道德力中发现力量……并往往在完成自己人格的过程中吸取每一种外国元素,从而加快其进化的步伐。

面对“强大的美国火车头”再一次摧折幼嫩的民族精神这种可能性,就像其在不久前的1848年所做的那样,谢拉这些墨西哥实证主义者欢迎迪亚斯将军的坚强铁腕和“意志来统一我们的道德力量,并把它们变成正常进步的运动。”

399

科学家派的论据是合乎逻辑的、民族主义的并带有世界主义的,而且是达尔文主义的,充分显示出其“科学性”——完美地适应其有自觉意识的现代听众。他们认为,政治稳定在墨西哥社会进化中是关键的第一阶段。通过强调人权等“形而上学”概念和利用诸如“联邦主义”之类的“外国”体制结构,共和国早期和革新运动的宪政派自由主义者曾经过分激进地企图与过去决裂。由此而发生的政治斗争毁坏了经济,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因此,迪亚斯将军救赎性的规划是对一个半世纪多的政治放任和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必然的历史矫正。这一时期的动荡是三个世纪的殖民地时代衰退的继续,一位评论家说道:“其破坏性的呼吸已将人们的生命倾倒至血河之中,扼杀了活力的源泉,并把理想化的爱情遏制在花粉之中。”除此之外,政治稳定可能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如可靠的市场、稳定的货币,诸抵制如攫取土地和强征苛重税收等不合理的要求,保障财产安全的权利,消除产生贸易和投资不景气的因素。

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所创造的和平的支撑下,至少其初期被外国

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将使濒临死亡的墨西哥经济得到复苏。从短期来说,较多的资本投入到采矿、出口农业和制造业等这些主要产业之中,更多的政府收入也加大了对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和公共工程项目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这些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从长期来看,一个强劲的经济也将给社会利益带来如下的好处: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谢拉将其称为"进步的阶级"),对公共教育的不断投入——这是一帖改变社会不平等的自由主义猛药。不断增强的向上运动的力量可扩大国内市场,后者将加快经济发展,从而可更进一步加强向上的运动,以使经济和社会进步得到螺旋式的提升。一旦形成了如此的运动,现代性就会毫不费力、甚至机械般地将其自身复制到可预见的未来中去。

在墨西哥的地平线上,几乎看不到成熟的现代性;而且更难想象出它的结果。满怀热情的墨西哥精英们聚集在索邦[①]、伯克利等外国的大学里,或广泛游历,从西欧到美国进行必不可少的考察。但是,这些启示性的浏览需要蒙上眼睛和心甘情愿地停止怀疑。毕竟,即使是巴黎这样的19世纪文化之都也有"流氓和暴徒"(虽然他们只是扰乱城市而不是跨国违法)。

但科学家派对一件事是坚信不疑的:从经济发展中将会涌现出一系列辉煌的未来场景。它们可能是各种不同事物的集成:先进技术、资本主义经济学、现代社会关系(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董事会、企业家资产阶级、爱国的无产阶级,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稳固的核心家庭基础之上),最后是民主政治(但只有当墨西哥准备好了的时候)。最后那个东西是对自由主义原则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再次肯定,甚至是政治合法性的试金石。谢拉坚持认为:"墨西哥的社会进化在没有取得其最终目标'自由'前,都将是完全失败和无效的。"不过,即使它具有民族的乐观、科学的主张和自由主义的目的论,这种渐进主义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本国人口中90%的人(精英们选来称呼他们的绰号是"低劣的下

400

① 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注

里巴人")是不利的,因为这些人将不能够分享波菲里奥·迪亚斯现代化的直接成果。

现代性本身固有的许多更为矛盾和含混的东西,就潜藏在科学派意识形态的表层之下。有些尽管令人不安,却是显而易见的。墨西哥城活跃的小报经常批评对现代性的波菲里奥式崇拜。譬如,1904 年《孩童报》(*El Chango*)上的一篇讽刺文章"电死",把街道上的新式电车及其"每天大量受到伤害的人们"谴责为一种现代技术无情感残忍的象征,它们用无情的轮子把许多人压成残废甚至死亡。

现代化的社会行为方式也没有免受讽刺性的责骂。配有通俗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木刻画的连珠炮似的谴责,提醒工人阶级读者对"女权主义"以及一种波菲里奥"时尚"对性别区分造成的危害,因为后者居然容忍穿正式礼服的漂亮男孩(lindos)和男扮女装者一同出现在公众舞蹈之中。此外,社会改革精英们,不管是不是科学派,几乎都不提倡豪哈城这样一种"安乐园般的城市"——在那里,"他们打击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追求幸福更甚于工业生产,必将完全破坏现代性的永恒动力。这些深刻的对立立场还只是世纪之交隐隐呈现在社会工程师们(巧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墨西哥)前面的冰山的一角。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出口导向的波菲里奥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注定了墨西哥向现代化的航行将充满险阻。外国人实际上进行了大量投资,1884 至 1900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以 8%的显著增速在增长,这一段是波菲里奥试验中最太平的日子。然而这种增长只是加剧了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传统的不协调因素。毫不奇怪,富者更富,并把他们新获取的财富大量花费在进口奢侈品上——室内卫生设备、电灯、汽车、巴黎样式的公寓大厦,这些东西既反映了他们的传统地位,又表现出一种摩登的追求。

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自然也以政府职位和出口经济中商业机会的形式流向中产阶级。但"低劣的下里巴人"只是偶然地、有条件地和有选择地获得了些好处。只有极少数人设法跨越了"雇工"(peónes)或

"穷光蛋"(pelados)与"进步阶级"间的鸿沟。一个世纪后，洪堡直言不讳指出的社会特征依然在真实地显现。虽然这些社会不平等很少引发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但其分裂的潜在力量却是相当可观的。

401

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阶级不平等并非墨西哥唯一的结构性矛盾，也不是最具有分裂性的矛盾。当时正值国家巩固的关键时期，但不均衡发展却可能会造成国家的更进一步分裂。一方面，与出口相关的经济部门——龙舌兰纤维、糖、咖啡、纺织品、矿业和钢铁等产业吸收了国内外的资本，它们激励了(有时是很成功的)从技术和金融到工作节奏和劳动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各地区很不相同)。另一方面，与地方和区域市场相关的经济部门，特别像玉米和小麦生产这类产业，却抵制革新。

不平衡发展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地区差异上。墨西哥中部的传统谷物生产庄园与北部和东南部急速发展的外围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使在现代经济部门内，更为多样化的北部经济与南方单一农作物种植经济也少有共同之处。更为复杂的是，墨西哥热衷于吸纳外国投资和开拓国外市场虽然增加了经济机会，但也加深了对全球经济力量的经济依附，并容易遭受后者的打击；正如它在增强中央集权的墨西哥国家的财政和技术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它应对特定的本国需求和关注的能力。现代化的提倡者已许下了物质财富和安全的诺言，但前者是分配不均的和有条件的，而后者仅是一个谎言。

传统社会关系中的猛烈变化有些是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引起的，另一些则是其提倡者期盼的文化力量造成的(其中包括谢拉说的"外国因素")，这些变化可能会铸就一种墨西哥民族文化，并往往是以目的交叉的方式起着作用。从18世纪晚期波旁王朝的改革者们开始，自由主义者们对教会、军队和自治的印第安人公社等社团组织发起了攻击，力求削弱建立在群体认同和相互义务关系网络基础上的传统殖民地社会关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改革和内战，社团组织已丧失了原先拥有的大部分权威，但对这些群体的认同却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

着影响。

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奔走在日趋强大的波菲里奥政府内外的现代化提倡者们扩大了他们对社团的攻击,开始打击一切形式的传统社会关系。他们的目标是用建立在所有成员共享的、普世的、抽象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社会来替代建立在地方忠诚和认知形式上的传统社会。他们认为这种感知上的一致对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波菲里奥·迪亚斯这个大家长本人,也认为"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应接受相同的训练,这样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才会变得和谐,对国家的认同也会得到强化"。为了这一目的,要坚定地把"进步阶级"中的妇女(连同她们的宗教倾向)推向家庭的私人圈子之中,以完成铸就未来(男性)公民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平民妇女则要接受为工厂劳动而准备的职业培训。要通过世俗的公共教育,把墨西哥依然存在的美洲土著人群从充满迷信的野蛮人变为社会的财富。19 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们曾尝试过一场他们设想的法律革命,从而使墨西哥社会得到一番翻天覆地的改造。他们的实证主义后继者们保留了这一目标,但是改变了手段。这些人认为,应先行塑造公民的文化而不是先给予他们法律上的公民权。 402

这种波菲里奥式的文化革命也并不是全无效果。一个成果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基础首先是赋予理性的(即被界定为科学的)知识,尤其是反思性知识以某种特权地位,这种知识不仅仅要积累,而且在过程中还要经常修正其自身。因此,这种理性地运用到人类环境中的反思性知识提供了一种在后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无限螺旋式上升的力量,而政治稳定和经济现代化更使其成为可能。

然而在实践中,反思性知识往往推翻了曾经假定要去修正的东西。譬如,最新收集到的波菲里奥时期的犯罪统计显示,在该政权下犯罪率急剧地上升,这与它被歌颂为"秩序和进步"恰恰完全相反。反思性知识没有想到的结果有时可能会动摇那些最饥渴的现代主义者的信心。

但是这种令人不安的结果甚至会更深入地破坏现代社会的黏合剂——新的信任观念,信任抽象系统而不是个人荣誉,信任科学原则中

而不是地方性知识;它黏合起的这群民众不再从出生起就被各自小小的家乡(patria chica)的社会和生活节奏所束缚。在这新设想的民族社会中,地方政治首领们的腐败,甚至例如龙舌兰酒掺假这类事都会变得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意味着对地方道德体系,而且也是对民族信任的一种侵害。同样道理,波菲里奥·迪亚斯在其任期内大多数时间中如此熟练操纵,并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稳定十分重要的关系网络和政治交易,最终弱化了他的政权,并削弱了他倡导的计划。现代性应保障安全,但实际上它却造成了所有历史事件中最矛盾和最含混的东西:社会革命。

波菲里奥统治下的墨西哥经常被描绘为上演伟大革命的场所。这种基于实证主义宣扬的不可避免的社会进步的解释,既歪曲了历史场景又使其过分简单化。即使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努力实际上是不完善、往往是不真诚,有时是完全失败的,但终结波菲里奥政权的那场革命并不是不完善、不真诚,或失败的现代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它也不是依附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依附性严重扭曲了发展的进程,并由此造成了很大的内部压力。革命是从现代性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含混中形成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新的全球社会的动力边缘上成长起来的。历史运动的任何变量——波菲里奥早逝、有一个可接受的继承人,甚至只是说不清的好运气——都可能预防发生以驱逐迪亚斯为核心事件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暴力斗争。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还是发生了。据说波菲里奥·迪亚斯逃离墨西哥流亡巴黎时曾谈起他的后继者:"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已经释放了一只老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否能驯服它。"这段评论也正好可用作他自己的碑文。

403

秩序是波菲里奥政权的存在理由。在证实其反对民选政府的叛乱为正当行为的1876年图斯特佩克计划中,迪亚斯将军就大声抱怨说莱尔多·德特哈达总统拒不遵守反对连任的宪法条款不断干涉各州和各市的政治,以及他针对"杰出公民"施行的严重暴力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出政治选举的"闹剧"、一个民主的"痛苦笑话"以及对正义的"强奸"。可迪亚斯自己以后也再次参选、行干涉和镇压之举,这让这些早先的抱

怨成为造成尴尬和引来讽刺的根源;小报的编辑们更是嘲弄这位“甩不掉的考迪罗”的虚伪。只有当迪亚斯能够作出承诺要在一个暴力和分裂的国家中恢复秩序的时候,这些攻击的破坏性潜能才会受到遏制。迪亚斯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曾反思说:“我们采取了一种家长制政策,完全相信一种强迫实行的和平在一个天生聪明、文雅和热情的民族中能够使教育、工业和贸易成长出稳定和团结的因素。”无论是为了合法化,或者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该政权对秩序的痴迷为我们展现了此举的高风险。

因此,毫不奇怪,该政权施展了一套范围相当广阔的方法——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现代的;有些明显表现出国家权力,有些为了驯服墨西哥那些不同种类、经常进行顽强抵抗的人们而更具有灵巧的强制性。正如改革精英们看到的,其目标是要打造胡斯托・谢拉所谓的一种“民族魂”。官方的路线是:由于墨西哥人缺乏民主政府和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自我克制,因此就需要一套纠正性和预防性的措施用于克服这种阻碍发展的多年障碍。总而言之,这些方法是相当成功的,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

在这一综合背景下,驯服人的工具就是不那么隐蔽的国家暴力威胁。迪亚斯先生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过:“有的时候,有一点大炮的烟尘并不是件坏事。”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这种事还真不少。

第一个项目就是处理政治反对派。迪亚斯并不是唯一对莱尔多1876年违规连选连任不满的政治强人。最高法院院长何塞・马里亚・伊格莱西亚斯拒绝批准大选结果,并同时宣布反对该政府,从而对依然可将叛乱成功地加以控制的现任总统给予了致命的一击。莱尔多流亡之后,迪亚斯就寻求与依照宪法程序继任总统的伊格莱西亚斯进行交易。而当后者拒绝合作时,迪亚斯在很短时期内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他依然尊重民主惯例,于1877年正式当选总统。 404

如果说许多墨西哥人欢迎和平的降临,那么迪亚斯的政治对手就极尽所能地破坏和平。在其第一届四年任期内,莱尔多的支持者们从相对安全的美国边境发动的一系列叛乱就被迪亚斯的军队,或其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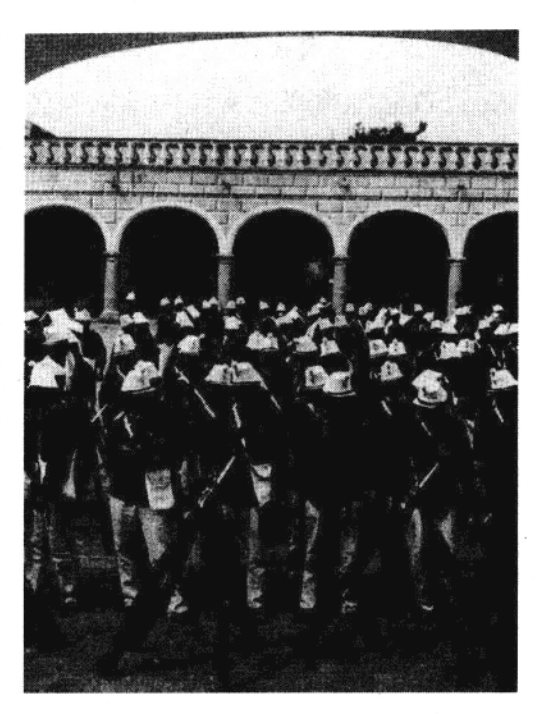
何塞·玛丽亚·伊格莱西亚斯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也是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对头，1876年迪亚斯发动的图斯特佩克革命迫使他辞去了总统一职。

的同盟者(如新莱昂的卡西克赫罗尼莫·特来维菲奥)的军队轻易并且往往是残酷地镇压下去。那些不满的将军们——有些人抱怨分赃不均，另一些人则抵制迪亚斯国家机器不断增大的权力，都面临着同一个命运。而那些名声更小的政治对手也是如此，不论他们是被逐出土地的农民，或是持不同政见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当韦拉克鲁斯州州长路易斯·米耶尔-特兰(Luis Mier y Terin)询问他如何处置被控煽动暴乱的九位当地人时，据说迪亚斯用电报回答说："立即处死。"不管是真是假，这一经常传播的轶事显示了总统对其潜在对手的解决方式。但迅速成长的电报线、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该政权处置公共秩序内部威胁的能力。

现代化也使迪亚斯政权对墨西哥乡村的灾祸——匪徒强盗逐步加强打击，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并展现其功效的方式。从已发表的旅游者的描述来看，墨西哥的盗匪是他们经常烦恼和谈论中的一个问题。19世纪中叶，西班牙第一任驻墨西哥大使的苏格兰-拉美裔夫人"范尼"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曾形象地描绘过一个声名狼藉的"盗匪头目"，他"身披一条黑色毛毯，头戴一顶黑帽，帽檐低垂下来遮在他的脸上，其脸色如死人般苍白，双眼似虎眼，或其他食肉野兽的眼睛"。当时的法国

405

大使曾讥讽说，盗匪帮派是墨西哥唯一按照“完美规则”行动的组织。这些在19世纪中叶旅游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评论，可能会使国际上的读者感到好玩和愉快，但也可能严重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而墨西哥的决策者们正在谋划着要这群人对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



迪亚斯总统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使本国军队变得现代化、职业化的改革，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有可能获取的最先进装备。

更坏的事情是，喜欢抢劫的印第安人，包括阿帕奇部落头领赫罗尼莫和维克托里奥等人在内，经常穿越美墨边界进入墨西哥，袭击小村庄，抢劫旅游者，破坏贸易。对于这些抢劫的戏剧性报道，尤其是在北美报刊上的报道，更是刺激了对到墨西哥进行投资的安全性的关切。迪亚斯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用历史学家路易斯·冈萨雷斯的话来说就是：“干净的来复枪”。

在挥舞那把干净的来复枪时，迪亚斯和他的部长们并没有依托军队(他们也经常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是依靠了贝尼托·华雷斯在1861年创建的国民警察部队——墨西哥乡村骑警队(rurales)。在图斯特佩克起事之前的混乱政治气候中，训练无素和组织性差的乡村骑警队所造成的公共秩序问题几乎与他们所解决的问题一般多。但到了1880年，当迪亚斯暂时放弃其总统职位让给他的军队亲信曼努埃尔·冈萨雷斯的时候，乡村骑警队的人员已增加90%(达1 787人)，资金增加了400%，这使它变成了迪亚斯维护秩序机器中的忠实基石。

有赖于铁路、电报和公路的扩展，乡村骑警队也将日益变长的国家之臂伸展到墨西哥的乡村。对大胆追捕匪徒以及与匪帮们(如韦拉克 406

鲁斯难缠的桑塔农和艾拉克里奥·贝尔纳尔,以及"锡纳罗亚霹雳"等人)进行激烈枪战等事件的渲染报道提高了军队在坚韧性和正义性上面的声名(尽管军队组织实际上既枪杀匪帮,也枪杀乡村骑警队,并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袭击罢工工人和镇压起义农民上,而不是去追逐"强盗头目")。尽管如此,盗抢行为和乡村无秩序状态仍贯穿了整个迪亚斯统治时期。比如,直到 1910 年,桑塔农才被抓获;在迪亚斯政权末期,还爆发了一些最危险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叛乱。

事实是没有什么重要效果。既然迪亚斯政权当务之急是打消国内外投资者的疑虑,于是形象问题(在这方面就是秩序形象)就成了第一位的。在这方面的努力中,乡村骑警队显示了他们的真正价值。这些人穿着传统的墨西哥牛仔服装,本身看上去差不多就像个凶狠的盗匪(这正是该政权的评论家们所宣传的一种虚假形象),并成为遍及墨西哥全国的公众阅兵和牛仔竞技中的主要角色。后来又受国际著名的布法罗·比尔的"狂野西部秀"的启发,乡村骑警队又前往国外表演,以难以捉摸的面貌、异国情调的穿着和华丽的马术吸引那些具有鉴赏力的外国观众。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当乡村骑警队将一种表面上的秩序带到了具有高额外国投资的地区,并经常支持外国业主和监工竭力控制不受拘束的墨西哥工人的时候,这种外表靓丽的形象就有了其实际的意义。虽然乡村骑警队不总能在墨西哥的乡村恢复秩序,但这已足够有效。

虽然没有乡村骑警队的形象那么浪漫,但墨西哥城警察外表上的法式职业化和在首都较好街道对警官进行的战略配置对制造稳定的假象还是有贡献的。当迪亚斯手下的科学派自诩努力收集的"科学的"统计数据揭示墨西哥城的年谋杀率(1‰)比加尔各答还高时,他们不禁感到十分沮丧。但科学派法官米格尔·马塞多 1897 年在向律师们发表的演说中还是说:"在中等和上层阶级中,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个人安全感觉,其表现就是行动非常自由。"迪亚斯治下的墨西哥存在着大量的平民暴力,但它对国内外正在致富的阶级却没有造成什么威胁。

此外,在统计数字之外,稳定的假象造成了一种真实的差异。当新

世纪开始时,外国旅行者们都在谈论墨西哥社会中那些具有民俗风情、离奇有趣的方面,而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这里看上去秩序井然。比如,美国旅游作家查尔斯·弗兰德劳在名为"万岁,墨西哥!"的报道中写道:"除了少量身挎可让人看见的巨大左轮枪的公务警察似乎在每个角落都出现,并在发生轻微违法时出现外,公路都由乡村骑警特别小组进行巡逻;乡村骑警队的人员在四到五千人之间。"

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转变,美国国务卿艾利胡·鲁特(Elihu Root)表示,他信任"不可或缺的考迪罗"本人。他说道:"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感到一生的坚定忠诚都不足以回报他给我的祖国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辞使迪亚斯获得了"墨西哥之主"的绰号和国际声名,后者反过来又给墨西哥带来了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和西班牙比塞塔。"一点点的大炮硝烟"(同时稍加宣传)实际上"不是件坏事。"

407

不过迪亚斯先生也率先承认,现代社会,特别是追求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并不是由大炮的硝烟调训出来的。就在墨西哥独立之前,各式各样的墨西哥社会改革者——波旁王朝的管理者,开明的保守派以及自由主义者,如同他们的欧洲同行们一样,都赞成现代的调训制度应建立在校舍、军营和教养所的基础之上。要驯服殖民地的臣民,可能可以依靠专制的法令驯服,以及在他们起而反抗时加以恐吓和惩罚,但现代公民却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学会规训自己。国家暴力的明显威胁可以安抚外国投资者,但墨西哥几代改革者都认识到:只有心灵纯洁的人——道德的公民才可捧得现代化的圣杯。

但要培养出广大的公民群体非常艰难。虽然墨西哥的公民是在核心家庭的怀抱中出生和养育的,但他们的公民品德却可能更多地受到母爱和宗教的搅扰。因此,民族和国家对其公民群体的形成非常关注。为了这一目的,墨西哥的决策者们倾向于运用其欧洲和美国同行们开创的控制社会的现代技巧:强制性的世俗公共教育、专门的军事训练和重塑人格式的教养制度。之前已经迈出了几大步。华雷斯的实证主义教头加维诺·巴雷达于 1867 年创办了国立预备学校,以培训新一代



华金·巴兰达(Joaquín Baranda)是迪亚斯总统最亲信的顾问之一,也是墨西哥人称之为"科学派"(Científicos)的实证主义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倡导墨西哥应对外开放,以带来他们认为就是现代化的那种经济增长。

408



胡斯托·谢拉至今仍是墨西哥城产生过的杰出教育部长之一。他也是当年主宰了政坛的实证主义群体中的一员,为创建墨西哥国立教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的政治决策者和"科学政治"教育家。华雷斯的司法部长马丁内斯·德卡斯特罗于1871年起草和颁布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刑法典。然而,这些只是最初的步伐,真正的工作还有待完成。如果社会改革者们懂得纪律和诚信是现代化的双面螺旋,那么迪亚斯治下的和平第一次提供了把这些现代化的训练技术带到墨西哥的真正机会。

有可能普及到所有墨西哥儿童的公共教育是该政权的头等大事。墨西哥强大的联邦主义传统(尤其是州和市政府的权力)造成了困难。但1888年,教育部长华金·巴兰达在得到迪亚斯的同意后,推动国会通过了立法,将联邦区的免费义务教育计划推广到全国。两年后,其后任胡斯托·谢拉在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发出警告说:"我们的生活已用铁链与世界的工业和经济生活连在了一起……通过我们可以自主决定的公共教育,必须各种不同习惯、语言和需要所产生的离心力量转变为凝聚力量。"在基层,有关道德教育的文章告诫小学教师:"要唤起(学生)对工作、国家、他人、正义及真理的爱;要尊敬法律和宪政政府。"面临着如此多的问题,迪亚斯时期的教育家们热衷于对下面一些议题展开激励的争论,如:科学在学校课程中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公共教育是否能把印第安人转变成"社会财产",等等。教育一时非常热门。

409

成就是显著的。从1877－1910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入教育的预算百分比翻了一番;小学入学人数是原来的3倍;识字人数比例从不到15%增加到近20%。1910年时,联邦区的居民半数以上可以读和写。为了保证稳定地提供经过培训的教师,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师范学校。1895－1910年,教师人数从12 748人增加到21 017人,即从每1万学生配置10个多一点教师增加到每1万学生配置到近14人。这是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所有行业中增长率最快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世俗性的和公立的。利用迪亚斯政权默许的宽容政策,天主教学校的数目从占全国学校总数的4%增加到近5%。就连新教传教士学校也获准开办,到该政权末年,新教学校的入学人数已达12 000人,是原来的4倍。为了监督这种扩张,1905年成立了一个由胡斯托·谢拉领导的国家教育部。在州的范围内,具有教

育意识的州长们，如奇瓦瓦州的恩里克·克里尔、新莱昂州州长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尤卡坦州州长奥莱加里奥·莫里诺(Olegario Molino)都公开表示支持教育；迪亚斯政权最富争议的最后一任副总统，索诺拉州州长拉蒙·科拉尔(Ramón Corral)也是如此。其中最为尽责的一些人，如克里尔，还亲自创办了一些新的学校。

有充分的理由说，当1910年教育部长谢拉开办了作为指定培养下一代领袖的基地的国立大学时，迪亚斯政权的教育成就达到了顶点。事情看上去确实很乐观，教育家们公开宣布对国立学校感到骄傲和信任。譬如，在1910年革命爆发前夕，普埃布拉的学校当局正在保证将派代表出席全国教育大会；由于公立学校，“普埃布拉人正渐渐去掉他们的偏见、错误和粗俗，同时也正在获得道德、经济和秩序的习惯。”(这些人一点也都没有想到这个城市即将献出革命的第一位烈士——鞋匠阿基莱斯·塞尔丹，当地一家没有特别政治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俱乐部——“光明与进步俱乐部”的主席)。

迪亚斯政权的决策者们也没有忽视兵营——这是造就公民的又一处有效场所。迪亚斯总统本人作为一位前反叛将领，非常了解一支政治化的军队的危险性。1878年，在征得形式上的国会批准后，他开始对军队的指挥机构进行大规模重组。这次重组是在忠于他的迪亚斯派将军曼努埃尔·冈萨雷斯任总统的四年期间(1880－1884)完成的；重组灵活地将墨西哥不同地方分为军区、司令部和司令分部(jefaturas de armas)，它们的实际状况、指挥机构和部队配置全部都由总统或他的陆军部长来决定。

410

迪亚斯治下的和平还鼓励非军事化。军队的人数从3万人减少到1910年的1.4万人；将军的数目也惊人地减少了25%。较高的预算，欧洲军需品，普鲁士式的军装，一所用最新欧洲军事技术培训军官的现代军事学院，以及给军队发更高的军饷都显示出该政权对建立一支现代职业军队的决心。总统甚至还招来另一位军队亲信，新莱昂州能干的“改革派”州长贝尔纳多·雷耶斯将军来监督军队的现代化。履职期间，他创建了一支全国性的志愿民兵队作为第二预备队，以进一步削弱

经过改革的军队的势力。曾经声名狼藉、浮躁的墨西哥军队就这样精心地被打造成一支外表上训练有素、高效的常规部队。

对于那些未经教育和军队训练的人，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使其得到弥补和培养公民责任：监狱。墨西哥的社会批评家们曾长期抱怨国家监狱系统令人叹息的状况。对此，谢拉是这样评论的："它实际上鼓励了犯罪，因为它向罪犯提供了完善其犯罪教育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迪亚斯政权的首席刑法学家米格尔·马塞多更进一步说："国家的惩罚功能在知识、良心和公正的指引下，对促进社会道德大有裨益，它无疑是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回应，1881 年联邦区长官拉蒙·费尔南德斯任命了一个制定现代监狱计划的特别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塞多和未来的财政部长何塞·黎曼托尔(Jose Limantour)等人。次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建议，借鉴法国的经验，提出了一套较激进的方案，按照行为主义的原则执行细心教化的奖惩制度，并对 1871 年刑法典做了相应的修改。

由于墨西哥城的土层不够坚实，厚重的监狱大墙建成后总是下沉，建筑施工延期了一段时候，但国家监狱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开张了。在迪亚斯及麾下精英集团出席的开狱式上，一位官员致辞欢迎"墨西哥镇压系统进化中的一个新纪元"。正如委员会的报告曾指出的，监狱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让该社会的成员认识到"获得健康和幸福的手段是诚实，而恶习往往会导致痛苦和不幸的结局"。刑法学家马塞多甚至更为夸张，他宣称新式监狱"是我们靠努力和独创性创造的种种宝藏中最新的成果，它……标志着国家进步史中的一个新纪元"。这位人士的热情具有感染性，提倡改革的州政府随即也建立了本州相应的现代监狱(普埃布拉州在此前就完成了)。联邦政府于 1908 年在纳亚里特州太平洋海岸的马里亚斯群岛上开发了一块刑事罪犯拘留地，该地被特地设计出来以使墨西哥城摆脱掉那些"由我们监狱中的常客组成的惯犯"。而人数较少、直接威胁也不太大的精神病患者，直到 1910 年才等来为他们建造的第一所现代化病院。

与乡村骑警队这样较为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类似，墨西哥的监狱

制度的形象要胜于实质。而与经济发展模式一样,迪亚斯的教育改革效果也是不均衡的。城市地区的进步远大于农村地区,富裕州的待遇要远胜于穷困州;优秀教师纷纷涌向较为发达的地区。此外,长期报酬低的教师往往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反政府人士。同样,正如该政权在1910年的迅速垮台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迪亚斯的"职业化"军队非常适合像游行、演习及镇压小规模动乱这些和平时期的需求,但它却缺乏实战演练、爱国精神(军队士兵依然是通过可怕的募兵制被强制征来)和领导能力(1910年时,所有师一级将军的年纪都超过70岁),以及足够的人数来处理某些边境地区的大规模叛乱。

新的刑罚设施实质上起到的只是宣扬意识形态的作用,它对国内的那些罪犯人群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一位监狱巡视员的报告,这类社会成员大多数仍继续"睡大觉、抽大麻和香烟来打发时间",或者挤在人满为患的地方监狱中继续堕落下去。此外,被监禁的政治犯则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许多实际的弊端,以及该政权改革家们言论中的根本性谬论。

尽管有这些失败,但迪亚斯政权在公共形象建设方面的过度执着也不是全无实效。当墨西哥的精英们从赴西欧和美国的朝圣中获取知识时,现代化之旅从单独的象征性行动开始了——一节现代学校课程、一位普鲁士式军训教练,以及犯人的每日洗澡。它所产生的切实效果——譬如一代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治国论者,确实给外国来访者留下了印象。该政权对创造现代公民精神明确的支持开启了可保证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螺旋式上升。迪亚斯努力建设现代监狱制度带来的意外后果只有到后期才显示出来:如把教师和识字的皮匠变成了政治反对派,造就了一支人数不足的军队以及一种搅乱人心的改革派言论。

深信公共形象具有推动改革的能力,迪亚斯治下的知识分子阶层显示出一种对实证主义口号的偏好。因此,"秩序和进步"便是该政权的纲领;而"少些政治,多些管理"则是该政权的战略。经过多年两败俱伤的争斗之后,这一建议似乎是充分合理的。按照迪亚斯的社会工程师们的设想,现代民族国家合乎逻辑的建筑师应是官僚而不是将军,是专家治国论者而不是政客。殖民地的臣民由各种人际关系(家庭、社

区、荫庇、教会和君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荣誉观念的熏陶,特别忠于家乡。而现代公民则信任非个人的官僚系统(国家资助的教育、公共行政和铁路),服从法治,并把自己的忠诚献给民族国家。

412

在墨西哥,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要改变忠诚指向的对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迪亚斯治下的墨西哥,那些口号显示出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在墨西哥,希求秩序或许意味着少些暴力,肯定要求多些管理;但它也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和更多的个人化政治)而不是更少。实际上,迪亚斯操纵传统的家长式、保护式,甚至教父母式社会关系的非凡能力,成了秩序拱门中的拱心石。没有了政治尤其是传统政治的形成,迪亚斯政权成功的机会也就少得多。这位"不可或缺的考迪罗"于是仍继续极尽所能地玩弄政治伎俩。

在知识分子阶层看来,迪亚斯是个十分道地的墨西哥政治家。譬如,社会学家安德烈斯·莫里纳·恩里克斯在一篇名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文章中谈到过迪亚斯甚至与无知的印第安人具有相同的品质,而这源于这位将军是梅斯蒂索人,并得出结论说:"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迪亚斯将军是全国的梅斯蒂索人的杰出榜样,而后者已开始成为、并在未来将明显地成为墨西哥真正的典型民族类型。"崇法派小说家费德里科·甘博亚(Federico Gamboa)则认为迪亚斯十足的墨西哥人特性使他成为谜一般的人物。通过数年观察,这位该时代最重要的人物观察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斯芬克斯,甚至从他的肤色和血统来说,他就是斯芬克斯!"

胡斯托·谢拉对迪亚斯"逆向式"思维方式的评论,比大多数人更剖析到了点子上(尽管他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这么说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深思熟虑后便紧接着是决心行动……再以后便是修正或者甚至取消原先的决定。"谢拉又进一步说:"这种典型的梅斯蒂索人思维方式,已经使其背负了政治背信的恶名(为了说服而欺骗,为了统治而分化),哪怕这些传统的政治恶习与我们大家在私人交往中承认的品质相悖。"唐波菲里奥的政治天赋显然扰乱了他的那些科学派人士,但他们依然钦佩他而不是东方人的风采。他们估算,迪亚斯在致力于现代化

时的不可预测性恰恰可能会打开通往光荣的民族未来的大门。因为事情经常是这样,因而谢拉说得非常正确的这句话"为了说服而欺骗,为了统治而分化"(它在某些方面随总统个人诚信的声名而变化),准确地描绘了迪亚斯的行为方式。

普遍认为,迪亚斯最显著的欺骗就是对民主制度的合法颠覆。甚至谢拉都认为迪亚斯已经建立了一种"社会专政"(尽管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但他坚持认为:"虽然我们的政府非常地专制,但它永远不可能冒着灭亡的危险而拒绝遵守宪法。"如果说大多数人喜爱的 1857 年宪法在自由主义时期的墨西哥发挥了基本法的功用,它也总是有可能(并且已经是)在迪亚斯的要求下被修改,譬如允许总统连任、并把总统任期从 4 年延长为 6 年等。由于迪亚斯经常本人挑选各类候选人,因此确保了总统对国会、联邦法院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从而达到其想要的结果。

413 对报刊虽然未达到绝对控制的程度(19 世纪 80 年代,反对派报人公开宣布成立一个"被监禁报人俱乐部";一些小报则继续嘲讽——尽管不常见,政府管理上的缺陷),但还是造成了公众批评的失声。到了 1910 年,迪亚斯"社会专政"的伪善性催生了促使其垮台的法律危机。35 年之间,不管是不是背信弃义,宪法闹剧确实有欺骗性和诱惑性,足以安抚拥护该政权人们的良心,但也满足了墨西哥各式各样地方自由主义集团的仪式上的需求。

但宪政机构或传统政党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权力是掌握在国家和州一级的政治利益集团(camarillas)和地方政治首领(jefes políticos)手中的。正如谢拉所说,迪亚斯是以"为了统治而分化"来操纵实际的权力。

在国家一级,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利益集团:科学派和支持新莱昂州州长雷耶斯的雷耶斯集团(reyistas)。两个集团都与总统本人保持着政治的和个人的关系。科学派是通过 1881 年迪亚斯迎娶墨西哥城 18 岁名媛卡门·罗梅罗·鲁维奥(Carmen Romero Rubio)而搭上关系的。卡门小姐不单单因教会瓦哈卡莽汉[1]社交礼仪(如不在地毯上吐

[1] Oaxagueño,指迪亚斯。——译者注

痰、不在镜子间穿行)而获得了声名,而且她还将迪亚斯与首都的自由主义者们和市民精英连在了一起,这些人的代表便是这位小姐的父亲曼努埃尔·罗梅罗·鲁维奥——前莱尔多内阁的部长和科学派创始人。

这一政治利益集团为迪亚斯提供了其最重要的思想家和专家。作为交换,迪亚斯也给他们施展才华以获取荣誉(如胡斯托·谢拉、米格尔·马塞多、埃米利奥、拉瓦萨、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等)、发财致富(如何塞·伊维斯·黎曼托尔、巴勃罗·马塞多)和政治升迁的机会(奥莱加里奥·莫里纳、恩里克·克里尔和拉蒙·科拉尔)。但这些人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尽管科学派是现代化的提倡者,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摆脱使他们获得显赫地位的传统恩顾关系。他们始终未能创立一个政党,并实现更为宏大的向民主的过渡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位大人物将任何使政治制度化的企图都扫到一边。被反对派报刊经常抨击受贿的科学派们缺少大众(以及军队)的支持去进行哪怕是做做样子的反抗。

另一方面,科学派的竞争对手雷耶斯集团拥有一位战争英雄、自由主义的操行和高效行政管理的声名,并且得到遍布全国的政治俱乐部的广泛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得到军队内部的支持。但是它们的命运却没有什么不同。1904 年,当科学派的拉蒙·科拉尔不得人心地被挑选为副总统后,迪亚斯的军队老亲信和门徒贝尔纳多·雷耶斯却越来越得人心,这时,迪亚斯便派他率一个军事学习团搭船去了欧洲。这位忠实的受恩者也就平平静静地走了。

州和地方上的政客们也遵循着类似的恩顾模式和利益集团政治。强大家族的男性首领以与其总统完全相同的方式操控着他们的追随者(民间称他们为"公鸡"(el gallo),就形象地反映了他们在群体中的强大威望)。从最极端方面说,他们的权力,连同看来不可避免要出现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已可与殖民地时代的土地贵族们相比。譬如,尤卡坦州州长莫里纳统领着由显赫的龙舌兰种植园主(henequeneros)组成的"神圣种姓"(divine caste),这些人监督着本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如"建筑商"这个绰号极为符合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那样,莫

414

里纳及其公司承接了在本州建造从学校到下水道等所有一切有利可图的工程。不过，他同时也担起了不少责任，进行了大量宣传和粉饰，确实捐出了一笔可观的费用，其中包括州长的一年年薪，用来帮助建造一所现代化监狱、一所收容所、一所医院和一家一流剧院。

如同所有成功的"公鸡"，"建筑商"直接与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保持着联系——其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派人物，从而也就与"不可或缺的考迪罗"保持着联系。回报是实实在在的。莫里纳不仅当上了迪亚斯的发展部长，并促成政府将造反的雅基族印第安人从索诺拉州运送到尤卡坦半岛缺少劳力的龙舌兰种植园（付了一定费用）；尤卡坦半岛因此还沾了他成就的光，破天荒第一次迎来总统到访，墨西哥新出现的电影工作者们将这次访问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而在墨西哥的边缘地区并存着大量不和谐的元素（债务劳役制度和新监狱，闹哄哄的裙带关系和新式下水道，极端贫困和现代电影院），墨西哥现代化规划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以及加剧这种矛盾的个人化政治网络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这种传统政治与现代风格的怪异组合在整个墨西哥都很普遍。在奇瓦瓦州，特拉萨斯-克里尔家族起初与总统不和，此后却获取了大批庄园（相当于700万公顷，成千上万的常住小工在那儿干活），控制了州内政治，操纵着地区内最大的银行，并大量投资于从现代钢铁制造到酿酒的一切产业。在莫雷洛斯州，文雅的埃斯坎东家族（其在墨西哥城的豪宅甚至受到贵族们的羡慕）等甘蔗种植园主们，实现了制糖设备的现代化，同时也将地方上独立的自耕农变成了种植园雇农。

战略上的联姻和为儿子或女婿精心挑选的事业使这些家族的财产和影响得到了保证。巴勃罗·埃斯坎东（Pablo Escandón，最巴黎化的墨西哥人）和恩里克·"里基"·克里尔（美国驻奇瓦瓦领事与一位特拉萨斯家族族人的儿子）都当上了州长，并挤入了科学派的圈子，与总统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埃斯坎东当过迪亚斯的参谋长，克里尔则当过墨西哥驻美大使。交易是十分明显的：总统用热心的关切和相当多的地方自治来换取他们的忠心和承担维持秩序的义务。（并非巧合的

是,迪亚斯所讨厌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则是出自被排除在总统核心圈子之外的一个显赫的科阿韦拉家族)。

强大的卡西克(部族首领)不说能抵制迪亚斯政府实际权力的实施,但还是有能力抵制其不断扩大的影响的。在迪亚斯统治的早期,他们也经常这么做了。当他们变得太强大时——如路易斯·特拉萨斯在奇瓦瓦,伊格纳西奥·佩斯克拉在索诺拉,总统便用自己的亲信来替换他们,不过仍允许他们从事经济活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路易斯的女婿恩里克·克里尔帮助特拉萨斯家族恢复了政治影响)。迪亚斯倚重300位地方政治领袖——他间接地控制着这些人的任命,来制衡这些威胁。而州长们则通过任命其可接受的候选人来显示他们的忠诚,但如果这些州长不合作,他们则要承担遭干涉的风险。作为一位前地方政治领袖,迪亚斯懂得秩序保障者这个职位的潜力,为此,他把操控权扩大到包括警察和地方民兵在内的市政事务中。对于政治上的反对派,这些地方政治首领就是迪亚斯政府一种压迫性的法外工具。当然,这些官员也在营造其个人的恩顾网络,破坏地方自治政府,优待政府和国家精英们的利益。与此同时,成功的地方政治首领也竭尽全力调节国家、政府、地方和家族间的利益,虽然通常是谋求他自己的利益。由于在迪亚斯统治末期中央政府逐渐提高了对地方首领的要求,那种欺骗行动也逐渐难以维持。

415

虽然"不可或缺的考迪罗"居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综合网的中心,但迪亚斯政权还不是一个独裁政权。一方面,迪亚斯还缺少强加其意志(尤其是在墨西哥城之外)所必需的集中权力。即使在墨西哥城,依照个人政令治国也危及立宪政府,从而可能毁掉他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迪亚斯作为政权看门人,娴熟地操纵着一群受恩者和政治利益集团,能有效控制(不是削弱)各级政治。科学派、雷耶斯派以及他们在地方上的同党争邀迪亚斯之宠及随之而来的好处——政治优势、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不过都不以牺牲秩序为代价。谢拉评论说:"为了社会其他方面的进展,墨西哥的政治进展(已经)被牺牲掉了。"但这仅仅是暂时的,因为现代化,或更确切地说公众的现代化要求会带来

众多奇迹,其中就有传统政治的最终转变。当新世纪的最初 10 年传统政治开始失去凝聚力,当州和地方当局开始抵制中央政府日益加大的干涉时,当家长呵护的孩童都要求终结宠爱并转向民主时,当迪亚斯式的现代化中所包孕的矛盾变得明显虚伪时,迪亚斯政权最终也就与其潜在的大量自身矛盾发生了冲突。

1899 年 9 月 15 日,一队由铁路公司、酿酒厂、保险公司、睡床制造商和电力公司等多家承办的花车游行车队在站立于国家宫阳台上的迪亚斯的注视下通过。有一辆由联邦特区铁路公司设计的花车,上面有一个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的模型,还有一辆由两个电动车组成的滚轮系统驱动火车,司机和乘客们乘车不断沿一根轨道转圈,钻入火山的半圆隧道中消失,直到火车的停车钟响起时再重新出现。一辆保险公司的花车则画上了一个用红布和银装饰的人像,他呈保护状地站立在一位寡妇的上方,寡妇正为她双腿前的一个婴儿而深深地悲痛,与此同时一位长着银翅膀的粉红色和银白色的小孩(寓意"名望")正漂浮在寡妇的身后。在电力公司承办的花车后方,站立着一位控制着地球仪的代表"电力"的妇女形象。

416

9 月 15 日这一天举行这一活动,表面上看是庆祝墨西哥独立日,但实际却不是。为了使自己巧妙地置身于墨西哥民族英雄伟人祠之中,迪亚斯将这天作为他的圣徒纪念日来庆祝;他为了把自己与墨西哥建国神话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惜重新定义了传统。为总统涂脂抹粉的仪式种类还不止这些。鉴于公司和商界组织了游行,墨西哥各州便为总统和其他显贵建造了一系列的凯旋门,以便他们乘着马车在下面经过时,享受着鲜花、彩纸和"万岁"呼声。在他家乡瓦哈卡州率先建造的凯旋门旁,一位演说者大肆颂扬迪亚斯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当工人们晚上回到家里时,他会发现他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高兴地向他问候;为了他们享受到的每一个幸福时刻,他们都要祈求你的赐福。"

该日的事件显示了许多主要宗旨,它们的特点就是表现了对进步以及共同信念的主流看法,而那些正是波菲里奥·迪亚斯才有可能取

得的成就。虽然所有人都赞同进步需用物质的尺度来度量，譬如铺设铁轨的公里数，电气化的程度，但如同上面那位演说者所说的那样，它还要求有明确的文化价值的教诲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支撑。此外，正如迪亚斯统治精英中许多成员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有机体——一个生物，它依靠自身对外部因素或刺激作出反应的那些能力而生长、发展或衰退那样，有机体的完善(也就是进步)还与明确带有种族意义的国家和民族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譬如，在胡斯托·谢拉看来，墨西哥遇到的麻烦就是患了“贫血症”，因为在墨西哥的血管里流着“致贫的血液”，它产生出怀疑主义，缺少能量，抵制营养，过早老化。他评论说：“该种状况只能用大量的钢铁来纠正，用铁路的形式来补充；而大量的强壮血液，只有以引进移民的方式来补充。”

虽然引进移民从来没有大规模进行，但大量钢铁确实是存在的。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些大项目开始算起，迪亚斯时期共铺设了1.9万公里的铁轨。这只有大量的外国投资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通过把外国投资投入到经济中去，才会带来进步。这些投资多数来自美国，其中三分之一投入到了铁路；而这些投资在迪亚斯统治的30年中

417



波菲里奥当政期间实行的发展项目包括扩建铁路、新建由国外投资的工厂，以及改善港口设施。坦皮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它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扩建，开通了开往纽约、新奥尔良和哈瓦那的定期蒸汽船航线。1900年后不久，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坦皮科经历了一波繁荣。

一直在增长(估计到1900年为12亿美元;1900－1910年间超过30亿美元)。被称为能使墨西哥人"前进"的进步代理人,美国代理商们得到了条件非常优惠的特许土地来建造从墨西哥城到美国边境的干线铁路及地区支线铁路。在19世纪70年代末,认为有了铁路就意味着进步的观点是如此强烈,以至墨西哥风景画中主要和鲜明的进步标志就是一列正在穿越荒野和未开垦的大自然的火车。

铁路建设的影响(有些是有意为之的,有些不是)是惊人的,尽管各地区有所不同。譬如,墨西哥湾的坦皮科港,在1890年墨西哥中央铁路修到这里前只是一个边陲小城,之后便迅速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铁路的修通、港口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河口沙洲的疏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在尤卡坦半岛,一个恰如其名的新港口普罗格雷索[①]自1870年开始建造后地位日升。此外,在墨西哥中部偏北的拉古纳地区,"进步之机"的到达激发了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名的"拉古纳奇迹",该地区从而也变成了"迪亚斯发展的橱窗"。拉古纳地区从一个小小的棉花种植区变成了墨西哥最重要的农业、贸易和工业区,与地方的、全国的,乃至全球的经济都有联系。1880－1910年间,拉古纳地区的农村人口翻了10倍,在农业周期的高峰期甚至增长得更快。这一发展是不断增大的流动人口造成的结果;而大量的流动人口则是现代化的另一个后果,把墨西哥各地区及美国的雇工引到了生存农业中。被称为墨西哥第一座规划城市的托雷翁,其人口很快就增长到4万,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城市空间本身——铺面街道、下水道、电话系统、电车、公共建筑等则成为城市居民适应现代化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渠道。

418

在遥远的北方国土索诺拉州,铁路促使人们设想建立一个新的边界地区。19世纪80年代时,索诺拉人就能够通过墨西哥中央铁路借道美国到达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再折到位于邻州奇瓦瓦的华雷斯市,然后再到墨西哥城。这趟旅程过去要花30天,现在则不到4天,还使得墨西哥中央政府当局对原来很遥远的边境地区能实行更有效的控

① Progreso,西班牙语,意"进步"。——译者注

制。乘坐铁路,索诺拉人还可以花同样的时间到旧金山,花不到一星期到纽约。一旦索诺拉州加利福尼亚湾畔的瓜伊马斯港通过铁路与美国边界相连接,随即就发生了大批土地的被攫取,以及索诺拉州权力和政治的大规模重新组合。随着州内旅行的不断增长,铁路也使索诺拉人彼此面面相对,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独特的地区文化。

整个墨西哥如同索诺拉一样,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土地大掠夺。由于土地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那些经过 300 年殖民统治和 50 年独立已将土地掌握在手中的村民,现在却将土地丧失给了庄园主(大地主)、投机商、本村的有钱人,以及 1883 年通过的新法律促生的土地丈量公司。在全国所有地区,乡村居民都向地方的、州的和国家的官员请愿,诉说他们受到"侵犯",即将被扫地出门。有些人的反抗是向土地测量员投掷石头;而另一些人的反抗甚至更为暴力:在兴建铁路的早期,便发生了 55 起村民和庄园主间的严重冲突,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已建铁路线和计划建铁路线两边 20 公里(12 英里)的范围之内。更有甚者,铁路带来的商品化浪潮又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结果造成了大量的无地人群。到 1910 年,将近一半的墨西哥乡村人口都生活在大庄园之中。

土地集中造成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是出口农业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日常谷物生产的停滞。橡胶、树胶、鹰嘴豆、热带水果、胭脂红原料、畜牧产品也开始与已有商品(龙舌兰、咖啡、香草和皮革等)一道用于出口。譬如在全国铁路最密集的尤卡坦州,其经济几乎全部依靠出口龙舌兰纤维原料(当地称之为"绿色金子"),出口量从 1875 年的不到 4 万捆猛升至 1910 年(迪亚斯统治末年)的 60 万捆。那一时期,属于"神圣种姓"的 20－30 个家族,在"伟大的现代化使者"奥莱加里诺·莫里纳州长的领导下,逐步控制了 80%－90%的龙舌兰生产。但是,等到谷物只能半自给时,该州不得不加大粮食进口的力度。其他一些地区经济也变成依靠一种或两种出口农作物。墨西哥城南部的莫雷洛斯州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甘蔗种植园;而在南方恰帕斯州的索科努斯科地区,1892 年已有 26 家左右的商业性咖啡种植园。这两个地

419

区如同其他地区一样，也出现了谷物、豆类和小辣椒生产的停滞，而人口则还在增长。尽管在墨西哥北方，多样性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土地集中在那里也同样占主导地位。譬如，在奇瓦瓦州，特拉萨斯家族手里除了有纺织工厂、面粉工厂、矿山和银行外，还聚集了1 500万公顷州里最肥沃、水分最充足的土地，同时还营造了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帝国。

大庄园模式的扩大导致了出口的增加，这样追求现代化的方式的混乱，甚至矛盾很快就变得很明显。除了日常农作物生产的停滞——它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升，土地的集中连同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却排除了更多的技术创新。即使在尤卡坦州——被讽刺性地称为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农业种植园，它使用的基本种植和收割技术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农业工人在被批评家称为"奴隶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干活。尽管整个墨西哥的劳动条件千差万变，但毋庸置疑的情况是，工人们缩水的工资中，花费在食物上的比例不断增加，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投入到国内市场之中，从而也就限制了墨西哥的工业化。到新世纪之初，由于农村居民要将其收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花费到基本生活需求上，因此广告上不断宣传的那些作为现代生活基本要件的商品也就很少被他们购买了。

铁路的增长导致了土地持有的集中，同时也带来了矿业的繁荣，特别是在北方。除了传统的银和金外，铅、铜和锌等一些非贵重金属矿现在也都在增大开采并出口。到1910年，据统计已有44条铁路在墨西哥运营，其中一半是用于连接矿产地与大城市的市场。与出口农业形成对照的是，采矿业主要为外国人所拥有；到迪亚斯统治末年，美国公司已控制了现有采矿公司中的近四分之三和冶金工业的70%。尤其是1900－1910年间，金属生产几乎翻了一番，北方的下加利福尼亚州、奇瓦瓦州、科阿韦拉州、新莱昂州、锡纳罗亚州、索诺拉州和萨卡特卡斯州作为金属制造商参与了世界经济。正如一位外国观察者仅在铁路建成4年后对奇瓦瓦州帕拉尔矿区的评论所说："帕拉尔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铁路开通后所开采的矿石比以前所有时间中开采的矿石都要多。"



布恩·托诺制烟厂(El Buen Tono Cigarette Factory)成为了波菲里奥当政时期的墨西哥的象征。国外的达官显贵在访问墨西哥时总是会安排一项行程:参观这家属于法国人埃内斯特·皮吉贝(Ernest Pugibet)的工厂。在逐步几乎垄断墨西哥全国烟草市场的过程中,皮吉贝率先尝试了通过诸如颇具创意的广告等手段来形成一个忠实的消费者群体。

铁路除了促使采矿业扩张外,它还(与电力一起)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进口替代工业。在普埃布拉州和韦拉克鲁斯州(有人预言它们将发展成墨西哥的曼彻斯特),被称为"巴斯洛内特人"的法国资本家(Barcelonnettes 来自法国南部巴斯洛内特的移民,整个 19 世纪都有该地移民来到墨西哥)为现代纺织业的创建贡献了资金,其最大的成就是在奥利萨瓦谷地创建了圣罗萨工厂,1899 年迪亚斯亲自为其揭幕。1903 年,一位来访者曾这样描绘这些工厂:"机器全部是现代的。它们都建造于阿尔萨斯。"总起来说,该地区的 90 家工厂共雇佣了 3 万多个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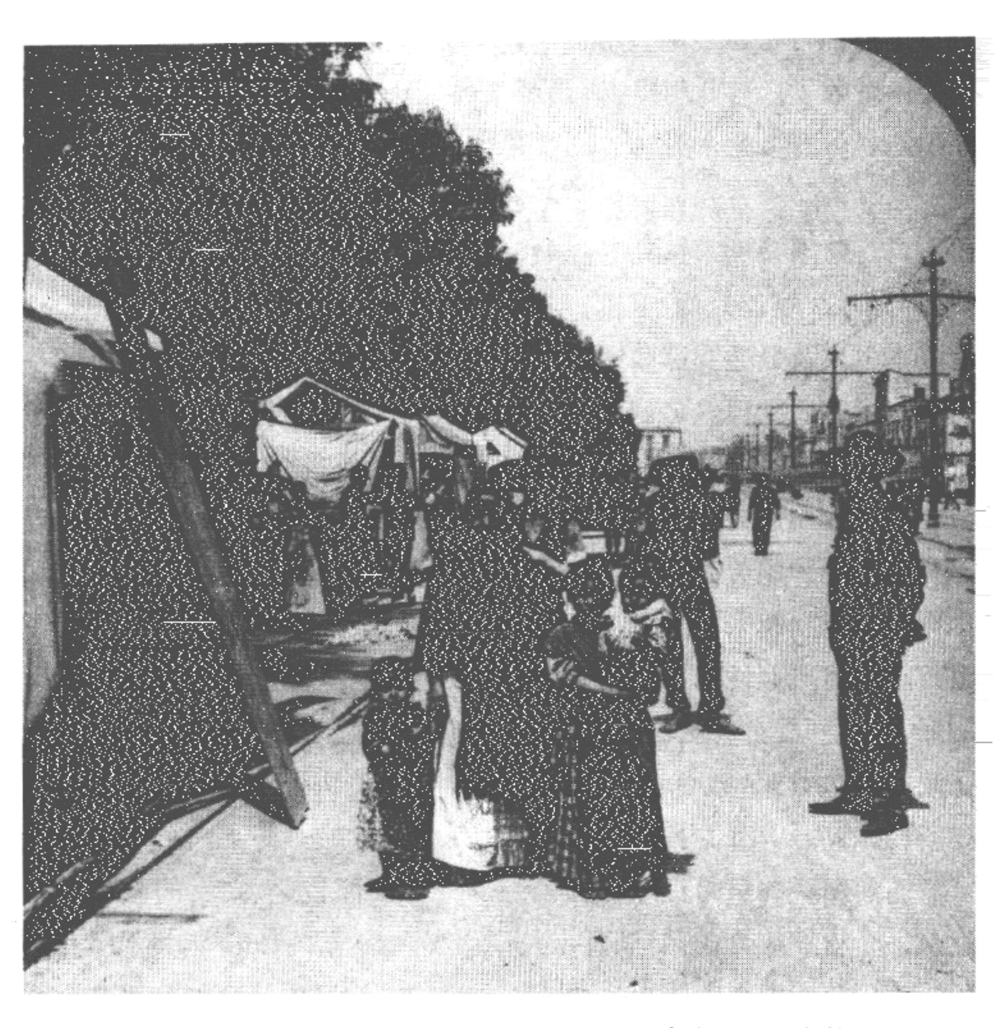
生产纸张、玻璃、鞋子、烟草和食品加工的轻工业工厂也出现了,尤其是在不断成长的北方城市和首都。蒙特雷因其工业的发展而被吹捧为当地的芝加哥,1909 年时,它已拥有一家完全现代化的酿酒厂及其包括一家大型玻璃制造厂在内的辅助企业、一家拥有全套生产工艺的

炼钢厂(从资本总额来说,为墨西哥第二大制造企业),每500个居民拥有一位律师以及1 000家商店。

421 墨西哥城的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烟草业。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布恩·托诺烟草公司的新型工厂,而且其所有者们还通过促销将他们的企业非常成功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如他们把一艘飞艇弄到首都,为工人们免费放映电影;而迪亚斯的儿子就用它而不是国家宫给来访的要人们对墨西哥的发展留下深刻印象。

总之,迪亚斯的工业化模式就是用大型的、垂直联合并使用最先进技术的企业来代替手工业生产者。当时白银价格下跌使进口商品变得更为昂贵,纺织工厂主们从中受益,加上他们受关税保护,于是可以把一种新式的严格的工业纪律强加在成千上万前来谋求雇佣劳动的打短工者头上,这些人的劳作取代了乡村手工业者——这些人正是迪亚斯式进步的一大牺牲品。在制造业的所有部门,当一小撮工厂垄断了任何单一产品市场时,求大于供和垄断生产便逐渐成了惯例。在采矿业中,外国投资意味着矿业所有权的集中及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矿工在这种提炼厂或操作基地中干活:同一家公司就控制了熔炼炉、选矿厂(用来准备矿石去熔炼)、捣磨厂、铁路、锻工设备和发电机以及矿山本身。用一位美国矿业经理的话来说,被他轻蔑地形容为"老鼠打洞"的墨西哥传统采矿方式正在发展得越来越合理、系统。对于一个形容他的面包是"机械生产,绝对清洁"的墨西哥城面包店老板来说,进步的好处是明显的:"在短短几天内,非熟练工人就可懂得与长期干这行活的手艺人一样多的东西。"

如果说这些好话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但它也确实显示出矿山、纺织厂和工厂越来越需要新型的工人——他们虽然不太聪明和自信,但也许更为听话和勤快,并适合新的工作节奏。在矿山和工厂,经理们都用激励和强制的两手努力造就既受到激励又懂得服从的工人,这些工人不会只要积攒足够的钱去购买"一袋豆子和一包面粉",就轻易地离开工作岗位。但是如果更高的工资,连续工作的奖金,学校医院,以及使工人们生出新的消费欲、最终想要丢掉凉鞋而穿上皮鞋的公司商店,



尽管开展了密集的现代化进程，但墨西哥仍然延续着作为一个乡村天主教国家所具有的诸多传统。图中一个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前往阿拉梅达参观为圣周庆祝活动而临时搭建的店铺的建造。图中右边的男性身着从商店里买来的现代服饰，但这个妇女、她的孩子们以及她身后的男人都穿着传统服饰，包括女人戴的大围巾(rebezo)和男人戴的传统的宽边墨西哥草帽。

这些不再起作用时，便实施镇压。矿业公司资助应运而生的市和区监督代理人，去守护工资运载，维护发薪日的秩序，竭力控制恶习，并广泛地对工人进行监视。在纺织厂，经理们利用一种全面罚款制度强制推行他们的秩序与进步。对于许多受改变劳动制度和经济发展狂躁影响的人们，对于那些甚至认可"进步"这种花言巧语的人们，迪亚斯模式展现的是一种强制的，而不是真正的"进步"观念。在矿业工人看来，地方

官员通过强行推行专断残暴的规则以及把资源掠夺殆尽,把真正的进步变得腐败了。与此相反,他们想象的一种进步是将尽可能多的商品分配给尽可能多的个人。

这种消除地方知识而代之以新的、抽象的时代和空间概念的企图还不只是外国管理人员在这么做。在墨西哥社会某些部门,兴起了一股强调节俭、艰苦劳动、卫生、企业至上和道德改良的发展主义思潮,它为资本主义及最适合那些拼命追求现代化的人们的伦理规范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撑。自诩为正派或有教养的社会成员,也就是自称正派绅士的中产阶级,竭力使自己远离酗酒、自然也就是没文化的工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力图将那些拒绝分享墨西哥进步的人们转变为一种爱国公民和平和的劳动人民。带有四个钟面的三层钟塔在遥远的城市和工作场所竖立起来了,它提醒工人时间就是金钱。一些学校里引入了银行。具有典型性的是每个星期一,每个学生都要当着自己同班同学的面,向教师交上一份储蓄金。即使他们只能上交几分钱也要这么做。在政府官员看来,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要让人民认识到学校是直接通往车间的,然后从车间再回到家庭。

423

迪亚斯说的家是受守护天使控制的。简而言之,妇女的教化似乎就是一个秩序社会的保证,这点在胡里奥·格雷罗1901年关于墨西哥犯罪的研究中说得很明白。他把墨西哥中部地区的社会划分为6个群组:(1) 一大群不断增多的街头族,包括乞丐、捡破烂者等;(2) 军队普通士兵;(3) 没有技能或职业的工人;(4) 男女仆役;(5) 工匠、警察和公共与商贸机构低级别职员;(6) 脑力劳动者,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教授、商人、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

格雷罗界定每一个群组特点的根据不是财富或职业,而是该群组中女人的"德行"。当一个人依次从"最低级"向"最高级"上升时,女人便从杂婚"进步"到一夫多妻,再"进步"到"一夫一妻",最后在其上升阶梯的终端变成体面的夫人。只有在自己的家中(格雷罗将其比作为装在一个玻璃罐中——他认为是一个正面形象),拥有最好品格的墨西哥妇女才会演变为一位体面太太。节俭、慈善、谦虚、母仪、献身家庭、爱

国和守时等所有品格加在一起都要在“完美家庭”(hogares blancos)中加以实践,然后再公开地体现在公众女性人物(其中包括迪亚斯的夫人卡门·罗梅罗·鲁维奥)身上。在庆祝墨西哥独立庆典这样的一些时刻,这些妇女会向公立学校中“非常勤奋和值得奖励”的学生分发衣服和玩具之类的礼物。

大力强调家庭生活也被看作是一种强制工人们离开街头、关在安全的家里的手段。实际上,当发展主义思潮的信徒们通过一种道德地理的眼镜看待城市恶习的时候,城市空间本身也成为争夺的阵地。为了控制酗酒、卖淫和赌博(三位一体的恶习),通过了新的法律来限制供酒场所运营的时间,并建造了被称为“容忍区”的城市特别区域,专门容纳妓院。市中心专门留给体面人,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再看到丑恶行为或与妓女(正是与体面夫人相对立的群体)擦肩而过了。在大小城市中,当局还对马戏团、戏剧演出、音乐会、变戏法、杂耍以及在国家法定假日间开设的博彩之类的娱乐实行限制。

这场被某些人形容为“慢步走”(dullification)的道德改革,其精神被认为在两个方面对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色彩的报刊不断抱怨说,物质的进步并不一定也会带来道德领域的进步。设计这些措施是为了匡正这一局面。另一方面,放任恶习被看作会导致进步的反面——具有明显种族主义含义的“退化”。一家北方报纸《邮政报》(*El Correo*)认为,酗酒(在精英们的眼里是与劳动阶级相连的)会导致墨西哥“种族”在四代人的时间内消亡。在他们看来,这类“种族毒药”能够影响到所有人,并威胁着民族自身的活力。

424

正如“进步”能够在物质上、道德上、社会上和种族上加以衡量一样,它也能够从政治上加以衡量。实际上,一种希望不理会意识形态和争执而致力于管理成功的“科学政治”被看作是迪亚斯式进步的重要成就和第一标志,尽管它可能有些缺陷。有许多东西可以支持这一论断。19 世纪 80 年代,财政部长曼努埃尔·杜夫兰(Manuel Dublán)重组了墨西哥的外债,使得国家摆脱了不良信用等级,具备了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同样,出口的增长也使 1893 年后的财政部长何塞·伊韦斯·黎

曼托尔平衡了预算,改革了国库,废除了国内关税,把国家的财政体系置于一个有序的基础上,又把墨西哥从银本位制转变为金本位制,进一步激起了外国投资者的热情。除了健全的信用和健康的预算外,1871年和1884年又先后颁布了新刑法和新民法,再加上技术管理阶层的成长和对收集统计数据的不断强调,墨西哥由此可以宣称自己为现代行政管理科学的实践者。正如新闻记者、文学家和独立运动百年委员会成员萨雅斯·恩里克斯当时所夸耀的那样:现代行政管理用其"机智、诚信和良好的信念,以清晰的方向和只有一个国家政党而非多个政党的科学治理",将使墨西哥解决其所有的问题。

国家的统治者们还以最大热情在各种国际展览会,特别是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上表现这一观点。实际上,各个方面(物质的、道德的、科学的、种族的、政治的)表现出的各种进步就是这届世博会的中心议题,墨西哥和其他国家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参展的。正如毛里西奥·特诺里奥—特里约阐明的那样:墨西哥的展品——搭建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一座阿兹特克宫殿,就是被设计来促进精英们对欧洲移民、外国投资、国际承认的期望,以及他们在国内领导权的显示。墨西哥陈列的展品是其进步的形象表现,同时也以各种形式或象征来展示墨西哥具有的独特的普世原则或观念。这些展品有机器、书籍、绘画和其他突出科学(尤其是卫生、医学、卫生保健、犯罪学、人类学、统计学、公共管理,以及该建筑设计本身)重要性的物品。展馆建筑的正立面展现了"古代墨西哥文明"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它的终结。虽然墨西哥的过去和历史可能是独特的,甚至充满了异国情调;但也正如墨西哥展馆组织者强调的那样,墨西哥国家本身正在以欧洲人熟悉的现代、进步和进化模式演变着。

425 正当墨西哥展览会的组织者们在国外忙于打造国家的现代形象时,在国内,作为进步典范的则是各座城市,尤其是首都。1877－1910年间,奇瓦瓦市的人口从1.2万人增长到3万人;蒙特雷市的人口从1.4万增长到7.9万。联邦特区的人口则翻了一倍多,居住了70多万人,其1910年时人口的近一半来自于墨西哥各地。随着城市发展而来

的是经济生活的活跃与多样化；随着1898年贯穿城市南北的电车干线的开通，市内人口流动也在增大。

一股新的消费浪潮兴起了，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烟草公司逐步加大的促销运动——它们送出金钱、新式法国汽车、房子，有时甚至是一张鳄鱼皮，希望抓住城市吸烟者的想象和对品牌的热衷。这类促销运动有时会引发报纸广告大战，说明印刷媒体的发达和城市中阅读人群的增加。这些刊物还帮助引导消费者去购买正确的——也就那些强调它们"现代"形象的产品；而制造商们就把这些产品与民族主义、进步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天堂的幻象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每个人只要有钱就都能够分享。

随着城中兴起新的商场和集食物、化妆品、丝绸、妇女时装、运动器材、男士服装等商品于一身的百货商店，城市空间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剧场、电影院、公共建筑、公园和花园都出现了。改造后的大街上行驶着马车和自行车；到19世纪末，至少在城市中心区和新的上流社会居住区，还出现了汽车。墨西哥城的精英们搬往老城西南面城郊的新住宅区(colonias)，许多他们的住宅此时已由电灯来照明；而工人们则聚集在靠近东北部的住宅区，中产阶级则住在西区。按照格雷罗的城市恶习道德地理论，曾经有过一次集中行动，试图赶走穷人和印第安人，或给他们穿上适合节日(其中包括独立日庆典)的衣服来掩饰他们的存在。

在迪亚斯时期形成的"理想城市"①，改革大道成了一条权力走廊；沿着这条大街，展现出了一个官方的墨西哥，也刻上了国家进步史诗的铭文。该大道开始的一头是查理四世纪念碑，这为了纪念墨西哥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历史。接下去便是一个耸立着哥伦布纪念碑的交通街心花园(glorieta)，象征着新大陆的发现。再下去是夸乌特莫克纪念碑，这是对墨西哥那段印第安人历史的赞颂。最后是建于1910年的独立纪念碑，该碑也建在一个交通街心花园里。大街的终点一直通往查

① 指墨西哥城。——译者注

普尔特佩克总统官邸。此外，沿着大道还一一矗立着每一个州的两位英雄人物的铜雕像。这条大道也是1899年迪亚斯穿过许多为庆贺他生日而建的拱门时经过的马路。“理想城市”也是为迪亚斯的精英们非常热衷创造传统大进程中最为壮观的壮举——独立运动发端一百周年庆而搭建的舞台。

在1910年9月这段时间内(9月被认为是100年前墨西哥独立战争发端的时间)，墨西哥城的居民尽力使自己适应排得满得不得了的庆典安排。单单头两周，就有一所新的现代化精神病院揭幕；一个卫生展览会揭幕；一个艺术与工业展揭幕；亚历山大·冯·洪堡纪念碑揭幕；一个地震测试站揭幕；一家新剧院揭幕；两所小学揭幕；一座新外交部大楼揭牌；两所新的教师进修学院揭幕——一所为女教师，另一所为男教师；一座新国防部大楼揭牌；以及一所新国家监狱的奠基典礼。

最后两周同样也是繁忙的。其间揭幕的有一座公园、一座华雷斯纪念碑、一座圣豪尔赫雕像(一位帮助抵抗疾病和瘟疫的圣徒)、一家火药厂、几座水利工程、国立大学、一个畜牧业展览会以及一条大排水渠。在国家宫，还建造了一座纪念独立战争英雄的巨大祭坛；并举办了多次有外交使团参加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开幕式和庆祝活动都是为月中出现的庆祝高潮——一连串游行作铺垫。这些游行以9月14日的市民大游行开始，至正式的独立纪念日9月16日的阅兵和建立在改革大道街心花园中的独立纪念碑揭幕而结束。

虽然这些事件都说明了纪念碑(还有纪念建筑物)和市民庆典在设想和打造墨西哥精英们所渴望的现代的、进步的墨西哥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还是9月15日的游行(被当时的报刊描绘为百年盛会)才明显地显示出历史既可以用来创造传承国家主义价值的传统，又可以把迪亚斯描绘为传统之巅(进步的顶端和现代化的先驱)。游行队伍分为三个部分，各自对应墨西哥历史的三大阶段——征服时期、西班牙殖民时期和独立后，这样，墨西哥的历史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街上让所有人观看。

游行的组织者们运用了与庆祝迪亚斯生日花车相同的象征方式，

他们选择蒙特祖马与科尔特斯的会见象征征服，用纪念征服的殖民地庆典象征西班牙统治，用伊图尔维德领导的三大保证军进入墨西哥城象征独立。游行队伍所表现的是：所有种族的墨西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在波菲里奥·迪亚斯领导下的统一国家，这是之前发生的一切合乎逻辑的终端，也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游行的组织者们一方面在所有细节方面强调历史的精确性，而另一方面又不准纯粹的历史事实妨碍宣扬国家建设。正如一位前迪亚斯的发展部长所说："遗忘，我要说甚至历史的虚构，在国家形成中都是基本的要素。"

427

尽管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赶出家门去观看公开演出（一家报纸报道说："总之，每一寸可利用的地方都站满了所有热切期望观看庆典的观众。"），但要是以为这意味着所有观看庆典的人们都参加了行进在官方国家阅兵场上的游行，那就错了。9 月前的几个月，与独立有关的一些象征性场地成了北方地区的工匠与警察争夺的场所。当奇瓦瓦的工匠们想纪念伊达尔戈（墨西哥神父，通常被认为是墨西哥独立的发起者），企图在他的过世纪念日时在独立广场上建造一尊他的雕像，却遭到了毒打，并被逮捕。执政当局硬说工匠们是正在北方起事的反对迪亚斯连选连任党派的成员，因此不可以作为当前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伊达尔戈继承人。

但整个墨西哥的其他地方还是非常认真地学习了官方的历史课程，结果发现如果和官方庆典中所赞誉的那些民族英雄相比，许多迪亚斯的官员太不像他们了，而且现在的行政当局似乎已忘记了他们曾提出过的自由价值。这类观点与农民和工人从官方的过去中自行吸取的教训一起，构成了一种民众的或民间的自由主义，以及一种有选择的民族主义。他们尊崇贝尼托·华雷斯，他是时常被迪亚斯提起、并因 9 月百年庆典期间他的纪念碑揭幕而得到公认的总统；该纪念碑赞颂 1857 年的自由主义宪法，庆祝 60 年代抗击法国和保守党人的胜利；而该宪法和那些胜利也是迪亚斯的官方庆典所赞颂的。这些事件和形象鼓舞并证明了抵制滥用政府权力是正当的。这些人群对社会的批评以精英们在市民庆典中赞颂和理想化的同样事件为前提，这正证明了主

流言论往往会提供象征类工具,而这些工具也可以用来进行反抗。

大众社会群体并没有具备所谓的迪亚斯信条——精英们对欧洲(特别是法国)物品(食物、时尚和盛会)的偏好。迪亚斯时期,精英们不再青睐"蚂蚁鸡蛋"[①]转向喜好食用蜗牛,开始不再参加重申社区价值的庆典,代之的是举办与生命周期有关的庆典,后者可显示他们在墨西哥社会中的显赫地位,并显示出他们正紧紧把握着现代价值。生日、圣徒日(如上面所描述的迪亚斯生日庆),婚礼甚至葬礼(虽由家庭举办,但一般群众可从一定的距离外观看),都成为炫耀自己的机会;引申开来说,通过显赫的消费,墨西哥的财富和地位也就不断地记录在留给子孙的照片中。在一些标示生命周期的庆典上,如1891年庆祝迪亚斯的生日庆典,夫人们、女儿们充当了其丈夫和父亲的鉴赏观众,这些人单独被特许在迪亚斯的主桌上用餐。在这些庆典中,譬如以上描绘的历史大游行,普通的墨西哥男女(甚至上流社会妇女)都从参与者变成了观看者。

428

为反映和传授现代价值而重新打造的公共节日也是如此。90年代,迪亚斯进步派分子最狂热的事情就是用鲜花来模仿打仗。在该种庆典中,精英分子们坐着盛装的马车中列队游行,体面阶层中的年轻人则互相投掷鲜花,或骑着四周特地围上花边的自行车行进。突出秩序、等级、稳定和进步的阅兵式取代了传统的庆祝仪式,在迪亚斯精英分子们的头脑中后者是与无秩序和可能颠倒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在奇瓦瓦,在迪亚斯统治的最后十年期间,圣丽塔节——一个传统上庆祝该州主保圣徒的节日,变成了一场消费至上的狂欢节,成为一个公开展示构成体面人士那套现代性价值观的机会。当组织者们用提供铁路车费来吸引人们从远处来到奇瓦瓦市并把钱花在本市的时候,庆典的重心从一开始就不再是本地,而变成整个地区,甚至国际性的了。这些人会还是不会在此花钱就很明显了。奇瓦瓦的新工业产品在花车游行中凸显了出来(花车上搭建了一个酿酒厂,甚至还打造了一个埃菲尔铁

① esquimoles,一种传统食品。——译者注

塔的模型,这样就把它的产品与现代性的突出象征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为了与正在进行的革除恶习和利用城市空间相一致,传统上与节假日相伴的喝龙舌兰酒和玩碰运气游戏,也被取消了。

与圣丽塔节相关的体育项目同样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赛马依然举行,但骑手已主要来自商人、上层社会、军队和乡村骑警队,而不再是乡民。汽车赛和射击表演也加入到庆典之中,这不但要使参与者们认同现代娱乐形式,而且还反映出对体育和“科学锻炼”的一种新兴趣,希望那些东西将有助于改变文化价值观。

在奇瓦瓦市,和在墨西哥城和蒙特雷一样,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上层社会的鼓励和支持下开设了许多主要面向城市白领的分支机构,这些人在该机构中找到了一条获得尊重并使自己与社会阶梯中占据较低地位的那些青年有所区分的途径。该组织的成员转而创造一种自己的关于民族节日的新传统,举办各类运动会,如体操、田径等等。这些活动可以使墨西哥的男性不仅检测自己是否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还可以检测自己接近理想化男性的程度。这些项目推崇自律等男性美德,而做到这一点就可能会使事业成功甚至闻名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与这些现代价值联系得异常紧密,因此,作为1910年庆典的一部分,迪亚斯亲自主持了墨西哥城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揭幕典礼。

429

占据协会比赛和其他体育比赛中心舞台的男性角力只给妇女留出很少的位置,除了两边的座位;妇女的主要角色是分发奖品。即使墨西哥城协会中的女保龄球手也发现自己两球补中和一球全中的每周记录并没有上报纸,后者宁可关注她们作为男人内助的角色,由此而更加与关于家庭生活的主流言论保持一致。不过妇女还是找到一些灵活机动的空间,特别是当她们在新休闲活动及相关商品消费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的时候。譬如在70年代,墨西哥城掀起了一股滚珠滑冰热,新开张的溜冰场老板以演奏音乐和最新式木轮冰鞋为号召,并以一小时一角钱的低于男人价格招徕妇女前来滑冰,这使得那些“有名望”家族大为吃惊。同样,新的百货商店也吸引妇女前去公共场所,这样又在报刊上掀起了反对“奢华”的充满敌意的讨论,而奢华则被认为是妇女特别

容易受感染的一种恶习。正如像《妇女专辑》(*El Album de la Mujer*)这类报刊上的文章写的那样,有关家庭生活的言论为那些上层妇女提供了一批话语弹药,从而使这些人能够在国家公共场所中代表女性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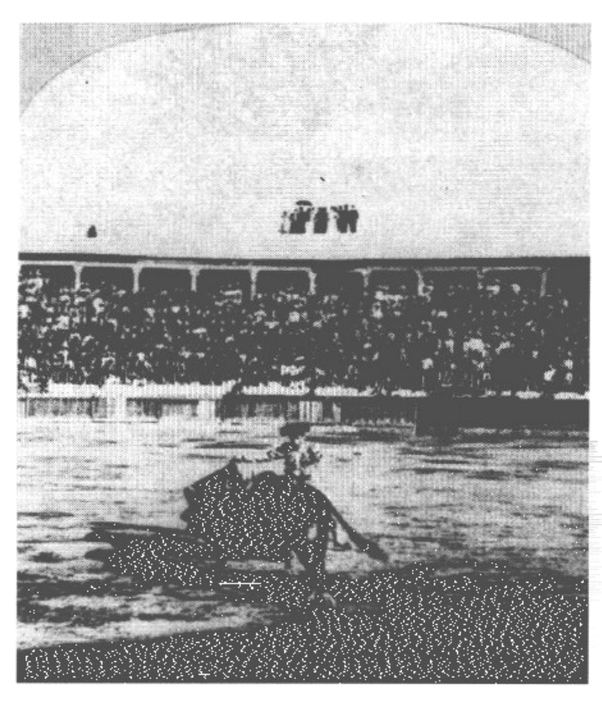
不仅仅只有女性报刊才讨论上流社会预想的社会规范问题。在19－20世纪之交,一家面向工人和独立手工业者的尖刻讽刺性小报出面驳斥将工人视为恶习累累和下流肮脏的主流偏见。有些报纸,如《蜘蛛报》,其标示的特色就是警察、神父和电车司机都陷入了它的讽刺蛛网中,身着大礼服的人士(即上层阶级)很快也要成为其捕获对象,它们用揭露其弱点的方式反过来对付那些精英分子。在一张插图中,地上不幸的人们向端坐在云中众钱袋上的迪亚斯先生举起双臂,此时一位天使(山姆大叔)则交给他另一只钱袋。该报强调,这些财富是以墨西哥工人的贫困化为前提而得来的。

小报一直宣称工人阶级是值得尊重的。实际上,诸多报纸的主题和有组织工人的行动都表明工人们在应对体面人士鄙视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已构建了对世界和对本身的看法。譬如1908年,墨西哥机械工会主席在答辩设置劳动节的观点时,指出了其所在工会在限制"过多节假日"中所起的作用。他强调,设置(劳动节)这么一个节日对教育、教化和提升工人阶级具有潜在影响,而这也正是组成"体面"社会的那些人士内心珍视的观念。

但是有些人坦率地反对将道德说教。一家讽刺报纸《金刚鹦鹉》(*La Guacamaya*)对联邦区区长吉列尔莫·德兰达· 埃斯坎东政府相继颁布的道德改良措施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讽刺:"他确保用他的好方式使儿童不学饮用龙舌兰酒;也不会进入酒吧。但他那超凡的法律,尽管是一位可敬和诚实男人的法律,但也仅仅是埃斯坎东自个儿的法律。"

430 在墨西哥城,也如在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不那么现代化的墨西哥人是绝大多数,他们依然还是聚集在龙舌兰酒店(有位作家估计,在联邦特区,每149个居民就有一家卖酒店)、桌球店、妓院以及诸如此类的场所里;而且在那些地方,他们仍继续制定自己的规则和惯例。同样,斗牛和斗

鸡依然还是最受喜爱的消遣，而且不仅是下层人士如此。迪亚斯第一任期内曾禁止的斗牛，到了19世纪末又重新回到墨西哥城，甚至还吸引了时尚阶层。一位记者报道说体面人士中的老板是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市郊看斗鸡的。其他的大众娱乐还有各种流行戏、马戏、木偶戏等；而在像烧犹大（该节庆中往往充满惊吓的犹大像被烧毁）这样的传统民间喜庆活动中，哈哈大笑、语言游戏及反串社会与性别角色的狂欢，都嘲笑了官方审查的价值，并提供了一种贬低体面人士自命不凡姿态的手段。在游走全国的木偶戏表演中，像瓦雷·科约特这类角色——一个"混血大老粗"，正帮助死硬的迪亚斯分子处理现代化产生的危险；至少搞得大家大笑。



斗牛在波菲里奥当政时期引发了了激烈的争论，并多次遭禁。总统的妻子——第一夫人罗梅罗·鲁维奥（Romero Rubio）是反斗牛协会的荣誉主席。虽则如此，但很多人并不认为斗牛是残害动物的野蛮行为，相反，他们认为这代表着一种以艺术形式对生命、危险以及对死亡的终极思考。

迪亚斯时期，体面人士努力追求重新打造自己及城市环境，并以此作为向自己和墨西哥示范现代性以及达到现代性的方法。他们指出了迪亚斯版本的秩序和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铁路、百货大楼、电影院的到来，墨西哥城改革大道和一般城市空间的改造，新庆典和节日日程——其中有体操课程、典雅的私人宴会、鼓吹标志着个人和国家生活过程阶段的新消费产品的寓意花车，以及在联邦区周转的6 000

431



像图中所示的这家位于圣赫尔图德斯的地毯厂里的这些工人一样，很多工厂的工人都寄希望于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免受外国工厂主和经理们的侵害。他们组织了互助会、工会和非政府团体来发出维权呼吁。可是波菲里奥·迪亚斯没能保护他们的权利，这成为导致墨西哥革命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辆自行车。这些不仅是墨西哥现代化的范例，而且也是国家实际上已经感受到现代性分娩阵痛的警示标志。

如果说体面人士一心一意地修炼自己的外表、情感和身体，以此作为这种现代性的证明，那么对他们的男女同胞们却不能这样认为。首先，他们需要通过统计去测算整个国家才得到确认和界定，而这正是迪亚斯的社会工程师们积极执行的一项任务（虽然结果并不总是合乎他们的喜好）。其次，他们需要通过乡村骑警队、现代监狱制度以及包括公共教育、军事训练和教养所等各种手段得到调训；再次，他们需要通

过引导脱离恶习并回归传统家庭，消费新商品，以及顺服地注意经常在他们面前展示的国家象征，被转变成和平的劳动群众和善良的公民。432 这些展示和体面人士自身装饰强调的许多东西都是装点门面的一种时髦，就像巴黎世博会上的阿兹特克宫殿一样，从而证实表现和幻想在塑造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性。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墨西哥人为自己谋划的现代化中的途径，从根本上说，并不完全符合他们头脑中设想的方式。

在塑造现代性的进程中似乎还要求既为工人阶级，也为体面人士开出一剂较强的传统性别角色处方，但这只是这一过程中特有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另一个矛盾是：带有“多些管理”目标的著名的迪亚斯式公共管理，实际上是被恩顾制和朋党政治操纵着，这是迪亚斯式的秩序和进步背后的肮脏秘密。第三个矛盾是经过迪亚斯式的进步，墨西哥的老寡头集团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强大了；一位观察家曾恰如其分地评说迪亚斯式进步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地现代化，但又一如既往地传统”。对于这一群体，现代化无疑就意味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又将自己描绘为是与国家利益同一的。因此，虽然迪亚斯的时事评论员骄傲地指出了铁路、码头、现代城市空间和工业化的开端，但这些增长中的许多东西其实是以外国投资及其内含的外国控制为前提的。其他矛盾也是大量存在的：一方面富人越富，而另一方面则穷人越穷；一方面出口业蒸蒸日上，另一方面食物生产却停滞不前，土地日趋集中，而人口却继续增长；一方面工业生产出新的消费品，而另一方面工资却依然如此低，食物花费则如此高昂，以至只有少数人消费得起，这些都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

而所有矛盾中最大的矛盾——也许是追寻现代性中固有的东西，就显示在“秩序与进步”这个含混甚至矛盾的口号之中，而该口号正是迪亚斯政权特定的一句口头禅。既要保护老的特权、阶层和价值观，又希望用时间、空间、抽象知识和民族-国家的新概念来塑造公民和适当激励工人；既追求与过去决裂，又要实际上保留过去的许多东西，因此它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不仅使迪亚斯政权公开

遭到指责它未能达成两个目标的尖锐批评，而且也产生了预想不到的后果：变成政治反对派的新教师、一支不胜任的军队以及能够被别人用来批评该政权本身的改革主义言论。到了1910年，对于绝大多数墨西哥人来说，迪亚斯版本的现代化蜜月已经过去，如果说它确实曾经有过的话。

第四部分

墨西哥革命：1910－1940

433 1910年后，一批业余的而非专业的将军再次统治墨西哥。与包括波菲里奥·迪亚斯和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在内的那些通过在抗击法国占领的战争中存活下来才获得勋章的军官不同，这些革命者多半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一些反叛者比如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拥有军事才华；其他人比如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擅长领导众人；也有些人比如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能够以某种正当理由激励跟随者。当为这些和其他领导人而战时，墨西哥人经历了20世纪首场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伟大社会革命，之后类似的革命在俄国、中国和古巴发生。也许正因为不朽的墨西哥斗争包含着所有其他伟大社会革命中都出现的反抗政治和经济镇压的民众怨恨和排外运动，墨西哥革命隶属于这个发生社会剧变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时代。另外，它的模式现在已经作为"民族解放战争"(引人瞩目的是越南，也包括安哥拉和阿富汗)为人熟知。此外，因为没有那些限制了20世纪其他革命的理论束缚，墨西哥革命者有机会进行社会和经济项目实验。苏联已经崩溃了，但墨西哥仍然存续。

只是在教会的问题上，这些革命者以其领导的革命的名义，特别是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担任总统期间，采取了如此过激的运动导致流血再次发生。1926－1929年的基督派(Cristero)战争是大众对革命政府未能承认村民宗教信仰力量和没有庆祝教会改革者成就的反应。这些教会改革者推行与墨西哥革命的社会运动类似的社会行动政策。

在近期的革命领导人传记和学术专著中，历史学家们考察了那些竞逐土地、劳动力、社区自治、与外国人工资和待遇平等、以及食品、住房和教育供给的运动，把革命者描述为更加有人性的兼具伟大与缺陷的人。让他们更像凡人并不会贬低其革命(1910－1920)，通过公平分配商品和正义改造社会

的努力(1920 — 1938),和通过经济发展增加可支配收入和商品的建设公正社会的运动(1938 — 1945)。革命时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此外,这一时期与大约 1940 — 1970 年间的大众文化黄金期重叠,那些抓住了电影、音乐、无线广播和艺术中的新墨西哥精神的大众传媒的崛起部分导致了这种结果。

第十四章　墨西哥革命：1910－1920

约翰·梅森·哈特(John Mason Hart)

435　20世纪早期的全球危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俄国、中国、伊朗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引发了剧烈的政治革命。西欧和美国在这些本土文化异常强大的国家的经济扩张显著影响了其政体、生产和文化实践。到1910年，经济日益繁荣带来的好处和争取分享政治权力的运动已经让位于对财富和权力集中在都市精英和外国人手中，以及省级和地方精英、工匠、产业工人、小农和农业工作者地位趋于削弱的关注。

墨西哥率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它的革命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在剧烈而持久的内战中，持不同政见的精英加入了民众之中。墨西哥起义者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而伊朗的起义者却不够强大，俄国和中国在对外战争中遭受的决定性失败削弱了其古老的政权，而墨西哥的革命没有经历这些。引发这四个国家的革命的条件类似。政府都曾试图通过外国资本、私有化或农业的商业化，以及集权专政统治下的经济扩张，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这四个国家中，这些规划均产生了对更广泛政治参与、土地改革和国家对资源和生产方式进行控制的需求。在墨西哥，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停滞，加上外国人在国内权势过大而墨西哥政府虚弱不堪，导致了一场西方从未见过的人民暴动。

许多因素导致了墨西哥革命在波菲里奥执政时期爆发。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的长期统治始于1876年。迪亚斯夺取政权时，意图仿效美国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成功。他构建其体制的方法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但最终却导致灾难。在最初执政的15年里，迪亚斯取消了对贸易、农村公社土地私有化的限制，引入政府控制下的独立却较激进的工会，吸收外资改进工业和技术，并鼓励移民开发农村。

436

土地私有化运动很快重新分配了大量的农业从业者，他们占到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波菲里奥执政时期，农村公社拥有的土地从占国家土地的25%缩减至2%；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在新兴的大牧场和农庄找到了工作，并且由于竞争不过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实体和进口商品，许多城市工匠加入那些来自农业人口的移民当中，在新工厂寻求就业。

外国资本为增长提供了动力。到1900年，外国投资者持有墨西哥工业约90%的股份，美国投资者单独持有70%。外国人也拥有墨西哥4.85亿英亩土地中的1.5亿英亩。美国人以1.3亿英亩再次在外国人中拥有最大的份额。然而，在20世纪的头些年，经济不稳定导致人们抗议赋予非墨西哥人的"特权"，侵蚀了他们对迪亚斯政权的信心。在其执政后期，墨西哥经济严重萎缩，实际收入大大下降。农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1907年后遭受灾难性的挫折。纺织业也是如此：1895－1910年间，对墨西哥经济至关重要的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在1908－1909年，奇瓦瓦、科阿韦拉、杜兰戈、萨卡特卡斯和墨西哥城以北其他州的玉米和棉花歉收，导致部分北方城市发生饥荒和食品暴动。当世界白银市场价格跌至最低点时，对工业现代化很关键的采矿业崩溃。不利的市场条件也打击了木材行业，许多公司被迫关门。失业的矿工、伐木工人和农场工人挤满了北方的大小城镇。

同时，一项新的旨在保护在古巴的美国蔗糖生产商的美国关税法导致墨西哥城以南莫雷洛斯州的蔗糖生产商和工人失去了美国市场。墨西哥的甘蔗种植者必须消减7%的产量并以降低的价格增加对国内

市场的销售。以下数据可以说明莫雷洛斯州遭遇了多大的困境：在20世纪[1] 8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5%的收缩导致大湖地区各州超过20%的失业率。莫雷洛斯的危机意味着许多牧场和作坊的工人发现自己失业了，而他们只是在过去65年中一些墨西哥最强大的地主推动的私有化运动和法律行动中通过不情愿地放弃农村财产才换取到工作的。阿亚拉(Ayala)和库奥特拉(Cuautla)的城镇充满了失业的工人，而他们是革命的潜在成员。

437

铁路和港口业务的减少反映了采矿业、木材业、农业和大牧场业的整体下降。饥荒笼罩着墨西哥城北部和南部无依无靠的农民和工人。墨西哥经济受到了创伤，但是迪亚斯和他的顾问们害怕国家负债，相信市场的运转可以恢复繁荣。他们拒绝投入资金救济事实上已经丧失土地的农村劳动阶层，并拒绝帮助那些遭受巨大损失的城市工人和小商人。这个在1876－1899年的繁荣年代里曾经赢得过赞誉的独裁国家，在1900年后日益成为受批评的对象。经济上脆弱的地区精英越来越受够了迪亚斯的政策，开始表达对自身缺乏政治影响的愤怒。

即便在那些繁荣年代，一些墨西哥人也已开始批评迪亚斯政权。在19世纪90年代，富有魅力的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Ricardo Flores Magón)在国立自治大学法学院领导了一场支持民主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预示了19世纪90年代末期至1910年间知识界提出的类似需求，这些作家和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抗议文学作品。到1901年，改革者和激进力量已经形成了50多个“自由主义者”俱乐部；其全国总部由圣路易斯波托西州一个名门望族的子孙卡米洛·阿里亚加(Camilo Arriaga)领导。

在那年的全国自由派大会上，弗洛雷斯·马贡在警察驱散集会之前发表了一篇严厉攻击迪亚斯独裁的演说。这次演讲使他成为这场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在墨西哥城聚集了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激进律师、作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一同出版了一系列秘密报纸。这些报

① 原文如此，疑为19世纪。——编者注

纸成为政治对话的主要阵地。因受警察的骚扰，墨西哥城俱乐部的领导人逃到了美国，最终在洛杉矶建立了总部。他们在那里出版了《再生》(*Regeneración*)杂志，它成为墨西哥人提出书面抗议的主要途径。1906年，他们宣布成立墨西哥自由党(Partido Liberal Mexicano, PLM)，弗洛雷斯·马贡担任党的领导人。

墨西哥自由党与那些预示着暴力即将来临的1906年和1907年的劳工活动有联系。位于墨西哥索诺拉州的美资卡纳内亚(Cananea)铜业公司和位于韦拉克鲁斯州奥里萨瓦(Orizaba)的法资里奥布兰科(Río Blanco)纺织厂的罢工演变成武装战斗。里奥布兰科的工人夺取了拥有几千居民的城镇，直到次日被军队打败后失守。罢工领导人和普通工人也是自由党的支持者，警察和士兵突袭了工厂附近工人的住所以寻找自由党的文件。那些被发现持有这些文件的人受到了驱逐。在1906－1910年，墨西哥自由党主张取消大庄园，赢得了奇瓦瓦和韦拉克鲁斯州农民的支持。到1910年，超过100个遍及全国的墨西哥自由党俱乐部开始准备更多的武装暴动。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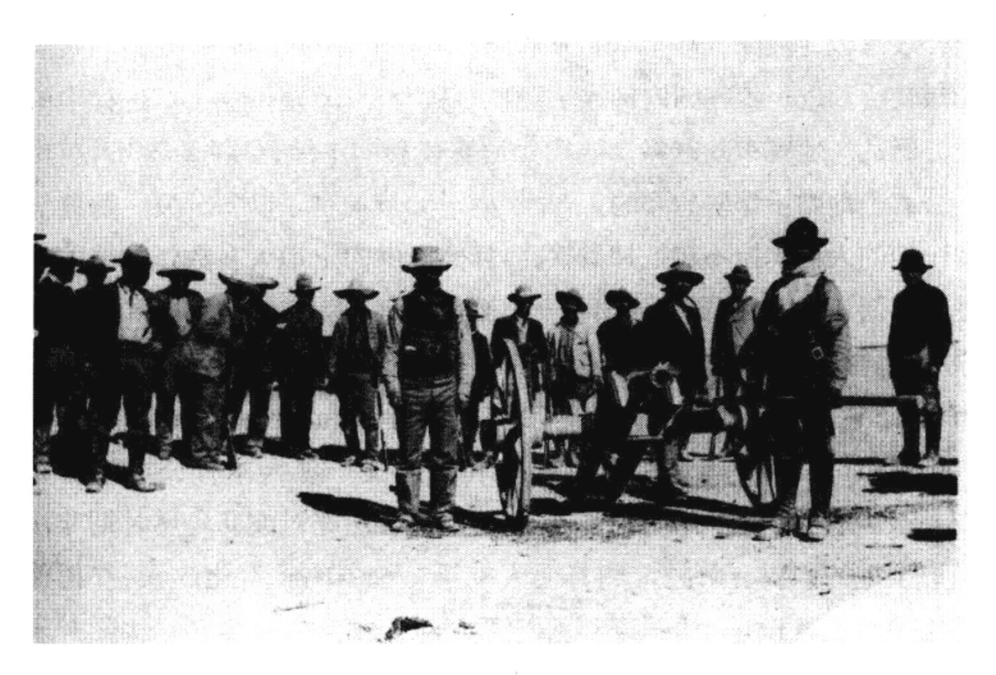
1911年5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从埃尔帕索渡过格兰德河，来到奇瓦瓦州的华雷斯城。1911年4月，马德罗的部队在华雷斯城击败了联邦的军队，全国各地叛乱频发，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派出代表商定了一项协定，该和约终结了他35年的统治，将政权移交给了马德罗等革命党人。

墨西哥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多元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崛起、全球经济紧缩和美国这一墨西哥主要贸易伙伴的市场衰退，迪亚斯基于独裁控制、外资及外国移民持续流入和出口市场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在西北部的商品经济中，乡村的农业和城市周边的工业生活方式，导致与公社生活、手工艺和当地精英的个人主义等墨西哥文化的基本元素相冲突。1910－1917年，这种内容广泛的冲突变成了危机，精英中相互对立的派别彼此争斗，而群众运动让普通大众卷入了起义。那些年代席卷墨西哥的革命运动暴露了贫富、城乡之间的冲突。

革命开始于1910年春季，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是一位地方精英，为科阿韦拉的地主、工业家和银行家，他激励了迪亚斯的政治反对者。马德罗的支持者(或者迪亚斯的反对者)来自墨西哥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其中最重要的集团是墨西哥自由党。担心失败的迪亚斯通过逮捕马德罗及其部分支持者打乱了选举进程。当群众抗议欺诈性的选举结果时，马德罗从软禁地逃脱并来到了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他在那里公布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一份承诺民主、联邦主义、工人集体谈判权利和土地改革的文件。这些承诺动员了墨西哥全境的农民和部分工人与中产阶级支持者。规模可观的游击组织开始在奇瓦瓦、杜兰戈和莫雷洛斯进行战斗；规模稍小的马德罗派各组织则在其他地方开展了行动。

在1911年春季，政府失去了对一些州的控制。在奇瓦瓦，包括牛仔、矿工、木工、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多种成分在内的势力追随当地的马德罗派首领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在该州的西北部，墨西哥自由党的激进分子在奥罗斯科指挥下发动了叛乱，在西南部，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也在奥罗斯科的领导下战斗。在一次策划巧妙的战役中，叛军攻占了华雷斯，一座位于得克萨斯埃尔帕索对面的城市，埃尔帕索位于美国南方横贯大陆的铁路沿线。叛军由此可以从美国的军火商那里获得大量的武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下的叛军在墨西哥城以南的莫雷洛斯夺取庄园土地，并将之分配给当地的农场

439



这支反对派的炮队所着的服饰，尤其是所戴的帽子，表明他们应该来自北方。虽然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于1911年5月宣布获胜，但像图中这样的士兵仍然参与发动了多次零星的叛乱，扰乱了马德罗短暂的统治。

工人，为创建合作社和公社做准备。在这场动乱的中期，马德罗带着他父亲号召的“我们18个百万富翁支持者”隆重地穿过边境，与迪亚斯的特使进行和平谈判。独裁者认识到工人阶级暴力浪潮上升带来的危险，迅速与马德罗达成一项协定，通过选举和临时政府完成政府的和平过渡。

1911年秋天马德罗当选总统并就职。他一上台就违反了成功统治的一些基本原则。与迪亚斯奖赏和拉拢自己最有力的支持者不同，马德罗疏远了奥罗斯科、比利亚、萨帕塔和北部奇瓦瓦的墨西哥自由党领袖，反而把最主要的政府职位给予了墨西哥城的官僚、正规军军官和地方精英，其中的许多人在冲突中持观望立场，而另一些人甚至支持旧政权。可是新总统确实认识到使其政府通过注意土地改革和民主问题变得受欢迎的重要性。不幸的是，马德罗的土地条例太软弱，他也没有时间去将诸如进行公正选举之类的民主改革制度化。 440

马德罗的发展部长阿尔韦托·罗夫莱斯·吉尔(Alberto Robles Gil)发起了土地改革，宣布“根据去年政治运动深刻的土地问题本质，

联邦政府极为关注土地改革和分解大的产权的需要”。但是马德罗政府的最初行动进一步在国内加强了财产的私有化,激发了在这一进程中的地方骚乱。他宣布政府将借钱购买适宜耕种的土地,会将 2 500 万英亩的公有土地赠予那些想要的人,并收集了大量的种子以备分发。那些需要土地的人们承担不起抵押借款,而且他提供的土地大多数是贫瘠的旱地。简而言之,马德罗的建议看上去像是刻意来为省内的精英和投机者服务的。被分配的总共 16.5 万英亩中售出的最大片土地是 10.5 万英亩,买下它的是杜兰戈和爱德·哈特曼银行(Bank of Durango and Ed Hartman),一家美国房地产推销商和杜兰戈一家大木材公司的运作商。很少有农场工人获益。总统也承诺执行法庭对波菲里奥时期非法攫取土地的判决。萨帕塔和其他人批评马德罗的私有化政策,并把他的法律纠正看作是一场闹剧,因为根据这一土地法,土地转让实际并未有多少法律上的差错。法律问题在马德罗的批评者看来变得更糟了,因为在迪亚斯政府时期任职的绝大多数法官都获得了聘用。

马德罗就职后不到三个星期,被激怒的萨帕塔和他的平均地权支持者就在莫雷洛斯颁布了阿亚拉计划(Plan of Ayala),谴责马德罗“血腥的背叛”和不称职。奥迪利奥·蒙塔诺(Otilio Montano),一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在阿胡斯科(Ajusco)的公立学校向有相同思想的农村教师学习政治学知识,由他撰写了该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倡导城市自治、土地重新分配给公社与合作社、民主和工人阶级的谈判权。该计划通过给其要求以明确定义使革命合法化。它激起遍布墨西哥农村地区的乡村工人阶级的同情。很快,那些加入萨帕塔反对马德罗的人开始自称萨帕塔派(Zapatistas)。

在 1911 年末和 1912 年期间,法律和秩序持续崩溃。美资的坎佩切湾种植园的工人爆发罢工,两位著名的领导人贝尔纳多·雷耶斯将军和前任官员埃米利奥·巴斯克斯·戈麦斯(Emilio Vázquez Gómez)也在此时试图在北方单独起义但失败了。巴斯克斯·戈麦斯,是一位高度智慧和富有雄心的领导人,同意左翼的马德罗派的看法,认为总统已经转向波菲里奥·迪亚斯主义。当他的部队攻占华雷斯城时,他的起义开始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追随者是墨西哥土地革命的代表，他们决心夺回自己耕作的土地。这幅画由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绘制，描绘了正准备奔赴战场的萨帕塔派人士。

变得引人注目。但随后并没有出现与马德罗早期成功相类似的结果。

奥罗斯科当时尽管只是区区一个小官——奇瓦瓦农村警察所长，但仍然忠诚于马德罗。他赢得了大众的热烈拥护，被视为英雄般的战场指挥官和爱国主义者。他统帅联邦部队并很快击败了巴斯克斯·戈麦斯。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且更雄心勃勃的雷耶斯在战斗了两星期后于1911年的圣诞节投降。雷耶斯和巴斯克斯·戈麦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马德罗还没有出现使其支持者丧失斗志的决定性行为之时就太早地挑战了他，而且他们在他仍然处于最强点的时候进行攻击，此时北方各州信奉马德罗主义的地方精英仍握有权力。该地区最重要的马德罗派是科阿韦拉州长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当革命仍然处于被怀疑状态时，他在圣安东尼奥加入了马德罗，跟随后者在华

雷斯城与迪亚斯谈判。作为马德罗的坚定支持者，卡兰萨不能容忍科阿韦拉的反对力量。在奥罗斯科和当地寡头集团成员的挥霍之子西尔韦斯特雷·特拉萨斯(Silvestre Terrazas)的支持下，同样能干的亚伯拉罕·冈萨雷斯(Abraham González)治理着更是麻烦不断的奇瓦瓦州。

马德罗的支持者本已击败了雷耶斯和巴斯克斯·戈麦斯，但是萨帕塔的起义是一个更加深刻且尚未解决的挑战。总统从持久而又血腥的镇压叛乱战斗中抽出力量，转而去制服南方的叛乱者，其中的许多人一度曾是他的支持者。很快，奥罗斯科开始领导奇瓦瓦民众中具有同样不满情绪的人，战争有了北方和南方两条阵线。

442

萨帕塔派认可奥罗斯科这位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英雄作为重新寻找社会正义的领导人。尽管军事上受缺乏大炮的限制，萨帕塔代表了一种草根阶层的农民战争，它的拥护者远远超出他在莫雷洛斯所控制的区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自称萨帕塔派的乡村工人阶级于1922年在全国范围内袭击大庄园、种植园和矿井。从1913年开始，其他追随潘乔·比利亚的自称比利亚派的人将在南方远至恰帕斯的地方展开类似的行动。

奥罗斯科的起义主要集中在奇瓦瓦，其队伍主要由来自西北部的墨西哥自由党激进分子和各地的牛仔组成。奥罗斯科的北部追随者中也包括索诺拉州的雅基印第安人(Yaqui Indians)，他们袭击了乡村的庄园和大城市周边的居住区。此外，奇瓦瓦精英中的特拉萨斯(Terrazas)家族的保守成员痛恨马德罗倡导的民主，便抓住这个机会削弱总统势力——他们静悄悄地支持奥罗斯科，尽管他倾向民众主义且有时会显得比较危险。

奥罗斯科公布了奥罗斯科计划(Pacto de la Empacadora，又称"一揽子计划")，基于1906年墨西哥自由党社会纲领中的一揽子深远的改革措施。它吸收了圣路易斯波西计划和阿亚拉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并且谴责马德罗背叛了他自己的宣言。萨帕塔派和奥罗斯科的追随者中自我标榜为"红色旗手"的那些极端分子要求罢免马德罗，并创建新的

农业秩序。奇瓦瓦北部的墨西哥自由党激进分子很快控制了哈诺斯(Janos)和大卡萨斯(Casas Grandes)周围的大片区域，将在那里的定居点居住的数千美国殖民者驱逐了出去。

没有证据证明，是奥罗斯科授权他的支持者采取行动攻击索诺拉与奇瓦瓦边境附近由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拥有的大农场，但是与萨帕塔类似，他很难控制他位于大城市周边区域的支持者。索诺拉和奇瓦瓦北部的奥罗斯科主义者的行动很少受外部指挥。同时，一小群萨帕塔派开始侵扰远至北部的锡那罗亚(Sinaloa)和塔毛利帕斯的大庄园和美国移民区。在 1912 年，遍布墨西哥的乡村起义袭击了那些被认为危及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机构。其中的大部分是墨西哥人所有的大庄园，但是在墨西哥的 3.5 万至 5 万名美国人开始卷入这场斗争，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占据了这个国家约 27%的土地。随着乡村动荡局势的发展，美国的难民乱哄哄地越过边界地带。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政府派“布福德”号(USS Buford)到太平洋沿岸去带回绝望的美国人。在萨利纳克鲁斯(Salina Cruz)的特万特佩克地峡(Isthmus of Tehuantepec)，130 名出逃的美国公民在船上避难，这艘船携带了总计约 364 名难民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

1912 年 10 月，塔夫脱总统下令实施武器禁运后，严重削弱了奥罗斯科的主力部队，使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率领的军队迫使他们撤退，另一场起义爆发了。在前独裁者的外甥、保守的费利克斯・迪亚斯(Félix Díaz)的领导下，这场起义造成了一定威胁，因为迪亚斯对仍然按兵不动的波非里奥军队里那些理想破灭的军官仍有吸引力。然而，政府军队迅速除掉了迪亚斯的支持者，逮捕并在军事法庭审判了迪亚斯，他被判进入联邦区的监狱服刑。

443

此时，马德罗的政府看上去似乎正在对乡村起义获得先手；而实际上，这个政权的内部正在瓦解。从一开始，马德罗就已经与墨西哥城及其郊外的产业工人和城市劳动阶层产生了矛盾。工厂工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曾集会支持马德罗关于民主选举和劳工权利的承诺，但当警察使用武力对待罢工者时，他们的幻想很快破灭了。来自墨西哥城印刷工

会的组织良好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对马德罗展开攻击。他们出版政治论战文章并挑战亲马德罗的工会,即劳工部赞助的工人大联盟(Gran Liga Obrera)。马德罗派试图拖延实施工人对变革的要求。工人关注的是以下这些内容: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建立独立的合作与互助团体的权利,以提供伤残、人寿和生存保险;为经常处于危险工作环境中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保护;以及创建独立工会和进行没有政府干预的罢工的权利。其中的一些内容来自迪亚斯时期政府控制的工会的长期经验,当时罢工被禁止而工会领导会受到惩处。当马德罗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通过大联盟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尽力展开竞争。马德罗对工人带有理想色彩的同情激怒了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外国工业家和国内精英,所有这些人都相信,总统的软弱正在纵容1912年工人起义的蔓延。产业工人阶级团体持续增加。1912年9月,他们组成了工人之家(Casa del Obrero)——墨西哥城的一个工人委员会。它出版了批评马德罗的报纸,并开始在邻近城市设立分支。1913年1月,工人之家通过"直接行动"的策略在墨西哥城内及其周围赢得了一系列暴力罢工的胜利,袭击了罢工破坏者并抵抗警察。巷战极大地打击了警察的形象,工人称他们为哥萨克人(Cosacks)。与此同时,马德罗的大联盟悲惨地失败了。左翼嘲笑它是政府的花招,而右翼愤怒地把它谴责为由软弱导致混乱的例证。马德罗美式民主的理想没能把握住1911－1913年墨西哥阶级冲突的现实。

大地主聚集在墨西哥城,以求躲避乡村的斗争。报纸出版商谴责萨帕塔派和罢工工人是"共产主义者"。马德罗宣称自己从未想过要"掠夺"大庄园主,他只是想通过转售来创建小的地产,结果他把双方都得罪了。到1913年,支持他的改革者在数量和热情方面都减少了,而且农村已经成为冲突的集中地。在乡村公社派、农业工人和牛仔一方与庄园主和外国人一方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抗。随着被当地农民从自己的地产上驱逐,越来越多的美国地主、公司经理和移居者心怀恐惧和厌恶地向他们的政府提出抗议。那些亲迪亚斯的墨西哥精英从一开

444

始就反对马德罗，现在则有许多外国投资者同意他们的看法。在政治频谱的另一端，马德罗面临着来自日趋增长的自由主义者、工人和农民的反对。

被关押在墨西哥城区不同监狱中费利克斯·迪亚斯和贝尔纳多·雷耶斯并未放弃控制政府的希望。他们与曼努埃尔·蒙德拉贡(Manuel Mondragón)将军合谋，后者于1913年2月9日把他们从监狱中释放，然后一同带领2 000人的军队向国家宫前进。总统卫队确实是忠于马德罗的，他们在交火中杀死了雷耶斯。迪亚斯率领残余的叛军前往城堡(Ciudadela)——政府中心以南约3英里的一个废旧的堡垒。被包围的叛军与联邦军队接下来的战斗史称“悲剧的十天”(decena trágica)。它决定了总统的命运。

当叛军击伤马德罗忠实的指挥官劳罗·比拉尔(Lauro Villar)后，总统不顾他的支持者的反对，选择了能干但却属于敌对阵营的维多利亚诺·韦尔塔指挥联邦军的进攻。费利克斯·迪亚斯和韦尔塔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定，双方在城市周围发射了十天火炮弹。在这次大破坏中，炮弹落在了英国使馆附近，但双方都确保美国使馆不会受到威胁。墨西哥城的居民极度渴望解决这场危机。马德罗对韦尔塔未能攻击叛军虚弱的阵地而感到震惊，遂命令费利佩·安赫莱斯(Felipe Angeles)从莫雷洛斯带来的忠实的部队前往城堡。

韦尔塔现在开始向攫取权力前进。他命令安赫莱斯的人在没有大炮和其他支援的情况下进入堡垒前敌方的有效射程内，以使其丧失战斗力。叛军击倒了他们后，保留下来的联邦军队都是忠于韦尔塔的。接着，这位将军会见了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并辩称其行动是“保护美国利益”并商妥了大使馆条约(Pacto de la Embajada)，费利克斯·迪亚斯也接受了其条款。威尔逊根据刻板印象来想象墨西哥人，说他们是“情绪化的拉丁种族”的“不成熟的”民族。他预计费利克斯·迪亚斯将挺身而出，并以他的名义支持新政府，但是韦尔塔超越了他们两个。2月18日，炮弹好像照旧零散地落在城市周围，他命令奥雷里亚诺·布兰奎特(Aureliano Blanquet)将军率领部队袭击了国家宫。

根据情报报告，士兵前往附近的饭店杀死了正在享用午餐的古斯塔沃·马德罗(Gustavo Madero)，他是总统的兄弟和最亲近的顾问。韦尔塔除掉了古斯塔沃·马德罗这位被认为是政府最活跃的人物，以使他不能聚集力量对政变进行抵制。然后军队把总统马德罗、副总统何塞·玛利亚·皮诺·苏亚雷斯(José María Pino Suárez)和无数的政府官员羁押起来。同谋者迪亚斯和韦尔塔公布了大使馆条约，断言马德罗总统是无能的，并辩称他们的接管是为了结束暴力。

445 马德罗和皮诺·苏亚雷斯在监狱中宣布放弃自己职位的第二天，外交部长佩德罗·拉斯库拉因(Pedro Lascurain)作为共谋的成员之一，获得了总统职位。拉斯库拉因随后任命韦尔塔担任内务部长，一个仅次于行政首长的职位。24 小时后，拉斯库拉因辞职，韦尔塔成为总统。马德罗和皮诺·苏亚雷斯希望通过辞去职务而获得流放：毫无疑问是想借机组织一场新的革命。但是他们低估了其对手的冷酷无情。由于他们主动放弃职位，韦尔塔获得总统职位在技术上是合法的。然而失去了职位的保护，他们遭受谋杀变得更加可能。感觉到这种危险，马德罗的妻子向威尔逊大使求助。后者此时却换了一副调子，告诉她他不能调解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2 月 21 日，护送他们去另一处监禁地的士兵谋杀了马德罗和皮诺·苏亚雷斯。关于这次谋杀，部分人认为韦尔塔直接参与了此事，而另一些人则断言军队可能执行了费利克斯·迪亚斯的命令。无论谁授权了这次谋杀，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执掌了总统职权。

精英阶层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分裂了，一部分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而另一部分主要是州级领导人，他们相信卡米洛·阿里亚加的自由主义运动和马德罗的选举民主。这种分裂在韦尔塔攫取权力后仍然持续。此时，一场反对新独裁者的革命爆发了。这些精英中的一些成员将会支持韦尔塔，而其他人则声称自己是反对派的领导者。

韦尔塔知道他不得不尽快压制南方的萨帕塔派，后者控制着莫雷洛斯这一国家糖业的中心和联邦最富的州。蔗糖产生的财富集中在萨帕塔派目前控制的区域。他们通过违法的蔗糖交易生存，同时允许有

限数量的商业生产。韦尔塔给予几位萨帕塔主义领导人以特赦和土地。这种策略使得新总统能够在东部的普埃布拉等州、韦拉克鲁斯州和塔瓦斯科等州重建秩序。但是在莫雷洛斯的萨帕塔派进一步结合，强化了他们对散布在遥远的几乎难以通行的崎岖地区的当地市政领导人的控制。这种联合使其准备好了应对随后的猛攻。

随着在墨西哥湾沿岸势力的巩固，除莫雷洛斯外，叛军主要被限制在国家边缘地带，韦尔塔决定粉碎萨帕塔派。在解散了倾向于改革的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州政府之后，他派遣霍文西奥·罗夫莱斯(Jovencio Robles)将军作为装备良好的入侵部队的首领。罗夫莱斯使用了焦土战术，尽管起义者避开了决战，但是大量无辜的村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许多地方的居民聚集在萨帕塔派周围，尽管他们身处困境。例如在普恩特-德伊斯特拉(Puente de Ixtla)，一位名叫拉·齐纳(La China)的玉米饼制造商领导妇女和儿童支持萨帕塔派，并以暴力抗击军队。

446

在罗夫莱斯在南方的战斗进展缓慢时，韦尔塔还必须面临来自北方更大的问题。当韦尔塔赢得帕斯夸尔·奥罗斯科的支持时，他曾在那里取得了某些进展，当时奥罗斯科与韦尔塔的结盟超越了个人利益；韦尔塔谦卑的出身和答应土地改革吸引了一些乡村的反叛分子。但是他不能依赖这些州级精英的支持。科阿韦拉州州长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和他在索诺拉有些懦弱的同行何塞·迈托雷纳(José Maytorena)拒绝了韦尔塔，并联合起来加入反对他的革命。起初，随着卡兰萨担任叛军领导，迈托雷纳宣布了对他的支持，但他很快溜过边境进入美国。在奇瓦瓦，一支由矿工、木材工人、牛仔和佃农组成的更加危险的反叛力量正聚集在受欢迎的领袖旗帜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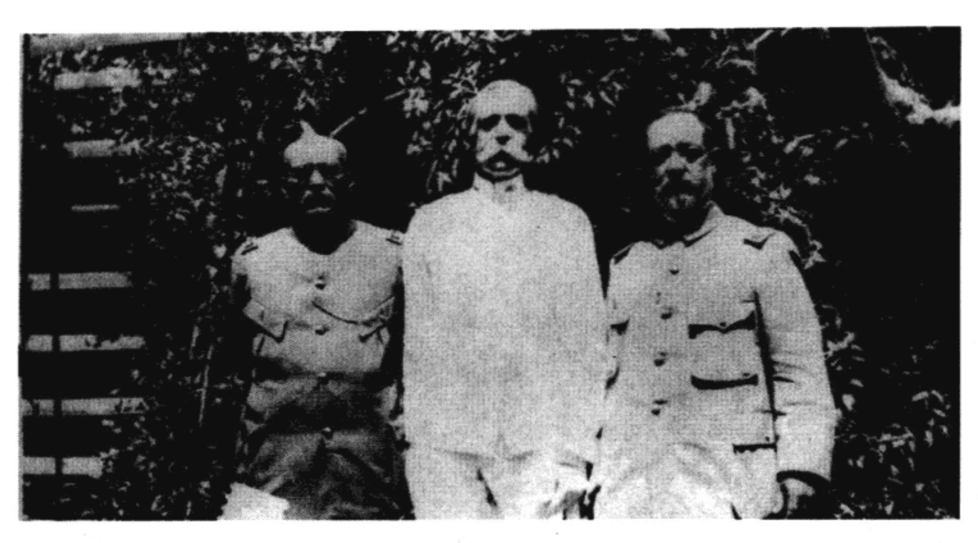
对马德罗革命时期的奇瓦瓦州州长亚伯拉罕·冈萨雷斯的谋杀事件与对总统的谋杀正好同时发生，一举清除了该州的革命领导层。那次事件及奥罗斯科对韦尔塔的支持，使得潘乔·比利亚的崛起成为可能。与奥罗斯科相似，比利亚经营的运输公司为奇瓦瓦的马德雷山脉一带数千矿工及其家庭提供补给。他的财产包括骡队、四轮马车和仓库，

他每次雇佣几十个车夫。他的骡夫把他作为一个成熟和智慧的领导来看待,像他们一样,他也是一个勤劳、顽强的人。比利亚熟悉崎岖的奇瓦瓦乡村的一草一木。他和他的助理人员决心为劳动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包括公平的工资和土地改革。因此,他们制定了比索诺拉和科阿韦拉的大庄园主叛军领导人更加激进的议程。比利亚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里聚集了来自奇瓦瓦和杜兰戈乡村的大量牛仔、佃农、矿工和木材工人,共同来从事他的事业。在比利亚的领导下,北部乡村的下层民众运用他们在与波菲里奥·迪亚斯战斗的经验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事编队。他们利用艾尔帕索和其他边境点的牲畜市场,用赚取的钱从雷明顿(Remington)、柯尔特(Colt)和杜邦(Du Pont)等制造商的销售代理人手中购买武器。许多经销商都愿意把武器出售给现金买家。

然而,韦尔塔也拥有重要的支持者帮助他在墨西哥城掌权。首先,他通过将特万特佩克地峡与墨西哥湾海岸的石油开采许可权交给显赫的墨西哥商人和威特曼·皮尔逊——一位拥有能够主宰墨西哥南部石油工业的阿吉拉(El Aguila)公司的英国大亨,在墨西哥城的精英和英国人中巩固了对他的支持;韦尔塔还试图尽可能地保护美国人的财产。韦尔塔拥有绝大多数军官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他将是一位有才干并且很果断的领袖。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也支持他。在北方,他有能干的奥罗斯科。但是韦尔塔不能控制乡村的叛军,并且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政府将会很快认识到他不能维持和平与稳定。美国人在1913年9月停止向他供应武器。

447 在北方,比利亚正在崛起。由于支持韦尔塔,奥罗斯科已经失去了许多北方革命者的尊重,他们曾支持他反抗波菲里奥·迪亚斯,甚至马德罗。他们现在转向支持比利亚作为他们的领导。与韦尔塔作战的萨帕塔派谴责奥罗斯科是个叛徒。他们逮捕并处死了他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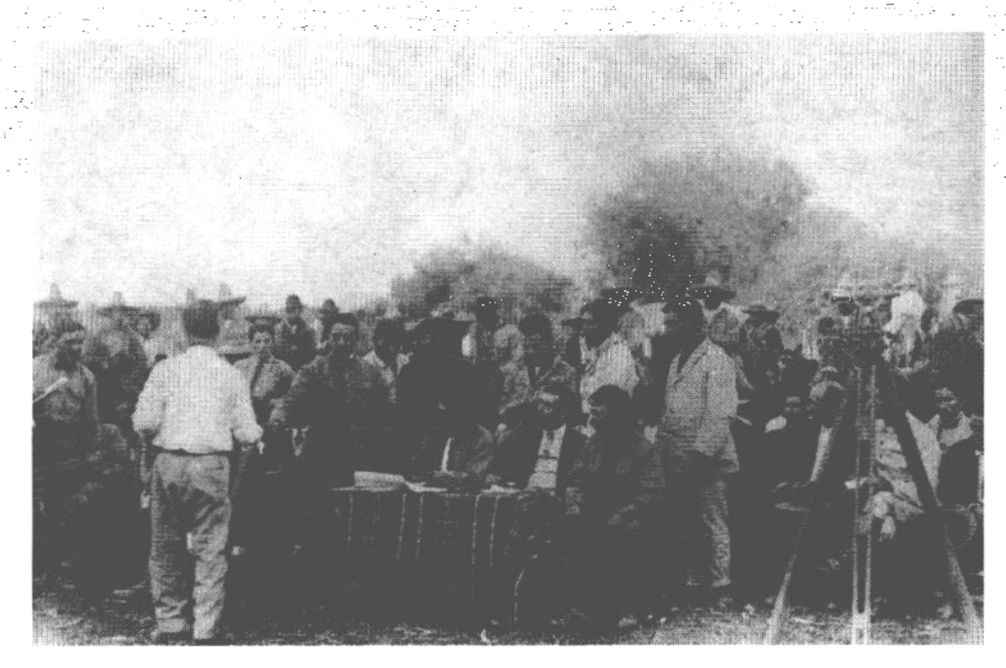
北方革命领导人结盟关系的变化可能引发了混乱,但是这些人的选择对他们是有意义的。比如1911年,马克西莫·卡斯蒂略(Máximo Castillo)将军跟随和支持马德罗,因为他承诺土地改革与民主。卡斯



维多利亚诺·韦尔塔，E.Z.斯特贝尔和华金·特列斯三位将军于1913年2月18日留下的合影。此时正值墨西哥城闹市区发生被称为“悲剧的十天”的残酷战斗。韦尔塔最终背叛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总统，自己登上了总统之位。

蒂略是一位手头比较富裕的人，他本人并不需要土地，但是他相信农村的穷人需要公社土地和小块农田以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财富和尊严。他曾经在奇瓦瓦发动了土地改革计划，夺取了路易斯·特拉萨斯(Luis Terrazas)在加莱亚诺(Galeano)地区的六个庄园，并把它们分配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和牛仔。当马德罗拒绝向冈萨雷斯州长提供其要求的600万比索贷款用于满足该州农业项目的需要时，他激怒了卡斯蒂略和奥罗斯科。此时，卡斯蒂略加入了奥罗斯科的叛军，他说：“我看到了以劳动偿债的制度，它比以往更为强大，对我的人民的控制更紧。理想破灭的我将在军队中重组我的旧部。”但是当奥罗斯科加入了韦尔塔一方时，卡斯蒂略拒绝跟随他。当时比利亚在奇瓦瓦占据了先手，卡斯蒂略逃离了这个国家，因为“比利亚”在社会地位上是他不可接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了革命者的忠诚度。

比利亚的官员和他们的士兵在墨西哥中北部的草原上驰骋，令联邦军队惊诧的是，他们的袭击快如闪电，并招募了更多的追随者。一些妇女甚至儿童加入了男人的战斗队伍中。当这些相互分离但又彼此协作的力量合并成更大的单元时，他们中更多的人直接听从比利亚的指



1913年8月30日，在新莱昂的马塔莫洛斯附近，进行了土地革命中的第一次土地分配。卢西奥·布兰科将军的手下之前已经清查过土地的情况，图中，将军正把几块土地分给十个农民。这些土地属于博雷戈斯庄园，所有人是费利克斯·迪亚斯。

挥。到1913年2月，比利亚的武装力量达到3 000人。比利亚的精英骑兵队“剑鱼”(Dorados)于7月成形。比利亚的部队在11月袭击了州府所在地奇瓦瓦城。在被军队击退后，他们突然掉头占领了华雷斯城(Ciudad Juarez)，它是牲畜出口和武器进口的关键性中心。此后，比利亚派在州内通过扇形出击和赶走联邦守军巩固了他们的胜利。1913年12月8日，比利亚成为奇瓦瓦的临时州长。

比利亚夺取了该州的精英和曾经支持韦尔塔的人的许多财产。他创建了奇瓦瓦银行，并将1 000万比索用于土地改革项目的执行和创建城市合作商店。他发行货币，并批准了革命中的首个集体农庄。但这是他的军队而不是他的治理造成了这些变化。到1914年初，比利亚的主力部队“北方师”(División del Norte)成为革命中最大和迄今为止最强的叛军。主力部队现在乘坐火车行军，墨西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他们攻克了科阿韦拉州首府萨尔蒂约以及托雷翁(Torreón)和帕雷东(Paredón)。4月，费利佩·安赫莱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

士兵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离开了索诺拉较为保守的立宪派队伍，成为比利亚的炮兵指挥官。诸如杜兰戈的卡利斯托·孔特雷拉斯(Calixto Contreras)等其他的左翼人士也加入了比利亚的队伍。孔特雷拉斯为北方师带来了一支3 000人的农民军。这些人的诉求主要是恢复他们的自治村社、市镇自由或者他们公社的政治自治。

比利亚包围了萨卡特卡斯，并于6月击溃了守卫该城的联邦军队，夺取了这座堡垒。这是比利亚最大的胜利。它为叛军进入墨西哥中部打开了门户。曾自命为革命第一首领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命令比利亚的队伍停止前进，但是他们还是向前进入了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calientes)，一个居于圣路易斯波托西和瓜达拉哈拉中间关键的铁路枢纽。比利亚的队伍此时控制了墨西哥中北部。

449



潘乔·比利亚的部队来势凶猛地从北向南袭来，直逼首都。比利亚的部下沿着墨西哥中部铁路线向南推进，一路上屡屡击败支持维多利亚诺·韦尔塔的联邦军队。

正如在1810年独立革命时期伊达尔戈神父的追随者那样，比利亚部队的主体也是乡村民众。北方师在向墨西哥城进军前在内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起义部队背后的地方团体和一些土匪打着比利亚的旗号

袭击了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所有的大庄园。比利亚部队中的一些人犯下了丑恶的战争罪行：鲁道夫·费耶罗(Rodolfo Fierro)将军，一名来自锡纳罗亚的精力充沛但残忍的铁路工人，因为杀害无助的战俘而臭名昭著。比利亚努力说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派遣的代表相信美国人所有的土地、矿产、木材公司和其他商业不会面临威胁。他甚至向部分美国人提供保护，但是没有用。尽管比利亚视美国人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但是他坚持一个强大的墨西哥政府和监管权，美国人对此不能接受。埃尔帕索的美国当局切断了运送比利亚军队的火车的燃料供应。比利亚卑微的出身和他不堪的过去(包括曾当过土匪)、他的民众主义、他对精英的攻击，以及他一些部下所犯的战争罪行，混合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形象，这直到最后都一直困扰着比利亚的运动。

韦尔塔的情况持续恶化。叛军正从军火经销商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于是在 1914 年 4 月 21 日，美国出于掌控革命进程的目的而进行军事介入。美国海军以 15 艘一线作战军舰和多达 38 艘辅助战舰向韦拉克鲁斯发起大规模攻击。它的借口虽然荒谬但却很有效：与其不让名为伊皮兰加(Ypiranga)的战舰停留在公海并判定它装载着武器，不如直接攻击它的到达口岸韦拉克鲁斯。与墨西哥军官的协议似乎可以确保美国人轻易地占领这座城市，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刚一登陆，就遭到当地居民和墨西哥海军军事学校学员的攻击。美国人马上撤退并开始了一场军舰炮击，抵抗者与无辜市民在现代战舰可怕火力的覆盖下遭受了严重伤亡。美国海军得到了这座城市，并在弗雷德里克·芬斯顿(Frederick Funston)将军的领导下开始了占领行动。伊皮兰加号的货物在韦拉克鲁斯以南的墨西哥港(Puerto Mexico)卸下，但是这艘船及其装载的武器并不重要，它们仅仅是威尔逊政府干涉墨西哥事务的借口。美国人巩固了他们在韦拉克鲁斯的地位，并在那里观察韦尔塔与革命者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

450

随着韦尔塔地位的恶化，起义组织间的竞争开始浮现。萨帕塔派、农民和已经在莫雷洛斯甘蔗种植园劳动的工厂工人与比利亚派结盟，后者是来自奇瓦瓦和杜兰戈的骡夫、矿工、铁路工人、牛仔、佃农和伐木

工。这种从南方和北方乡村来的民众力量间的结盟与一个同样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宪主义运动发生冲突。实际上，所有的立宪主义领导人都是北方和南方地主阶层的地方精英。他们中有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他的女婿坎迪多·阿吉拉尔(Cándido Aguilar)以及巴勃罗·冈萨雷斯(Pablo González)，他们都是来自科阿韦拉的贵族出身且能力超群的领导人。他们是以联邦主义、民主权利和墨西哥人控制国家资源的名义吸引大众的民族主义者。这些立宪派尽管反对社会主义，但还是支持科阿韦拉矿工的罢工权，以此反抗被马德罗派和美国人控制的公司。

他们在索诺拉的对应人物是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阿尔瓦罗·奥夫雷贡、罗伯托·佩斯基耶拉(Roberto Pesqueira)和本哈明·希尔(Benjamin Hill)。前两位是寡头政治集团的边缘成员，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中产阶级。他们倾向于一个比科阿韦拉更加开放和流动的社会。与科阿韦拉人一样，他们拥有领导众人的能力，但是他们把这种力量与公众对政治自由、农业改革、深远的工业改革(包括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薪水保障、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保障)、教育权和许多其他改良的强烈诉求结合起来。最终，广泛的政治诉求成为索诺拉人最强大的力量源泉，这甚至为他们赢得了城市工人的支持。

1914 年春天，比利亚的部队在托雷翁战役中击溃了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军队主力。接下来在 6 月，他的军队在中部的萨卡特卡斯战役中粉碎了联邦军队的核心。当萨卡特卡斯失陷后，联邦军队开始瓦解。此时，美国在边境线上的海关切断了对比利亚的进一步供给。埃尔帕索的美国海关关长扎克·科布(Zach Cobb)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比利亚是一个“土匪、伪君子、盗贼和杀人凶手”。在美国停止向比利亚的火车供应燃料后，比利亚的部队不能够再向南深入，替代供应也很难到达。同时，奥夫雷贡领导的叛军在比利亚胜利后沿着太平洋海岸前进，占领了瓜达拉哈拉。然后，他们向东朝墨西哥城前进，恰恰从北方师停止不动的火车的南边通过。比利亚的人沮丧地看着奥夫雷贡的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北的克雷塔罗(Querétaro)。1914 年夏天，战败的韦尔塔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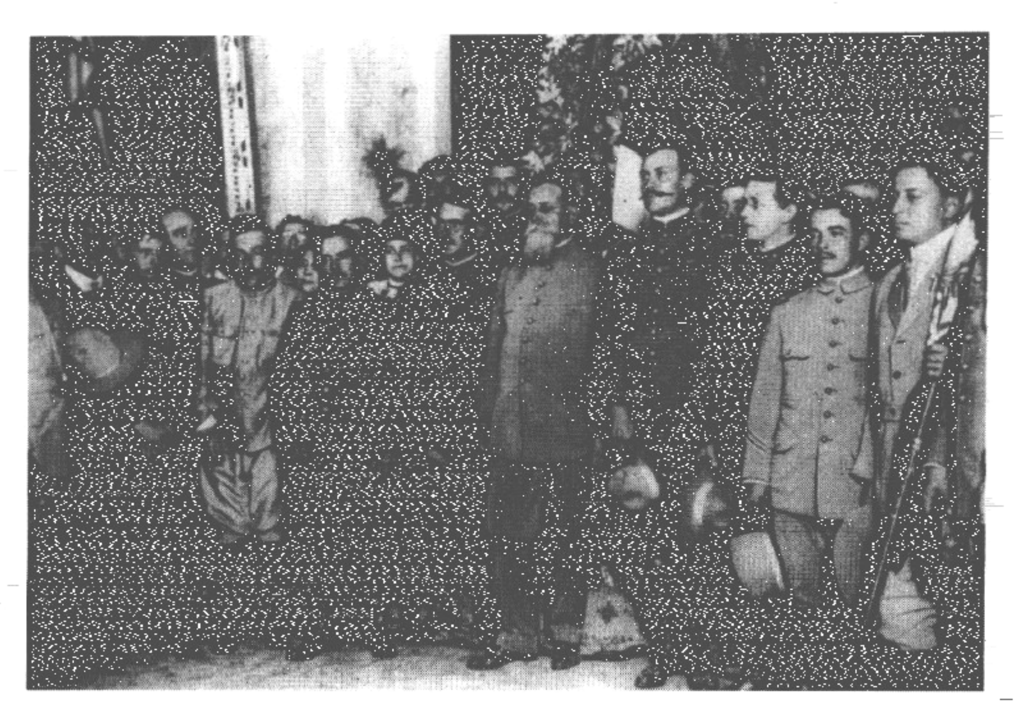
451



维多利亚诺·韦尔塔于1914年被迫离开首都后，墨西哥城在内战期间数易其手。这场内战是在立宪派和会议派之间展开的。会议派的领袖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潘乔·比利亚。

去总统职位后逃离了这个国家。10天后，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卡瓦哈尔(Francisco S. Carbajal)领导的临时政府安排它的军队向奥夫雷贡的军队投降，以确保墨西哥城私有财产和富人的安全。

此时，卡兰萨和奥夫雷贡的军事状况比比利亚和他的盟友萨帕塔更加虚弱。如果他们想要与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在吸引农村工人阶级的竞争中完全取胜的话，立宪派领导人需要争取时间和找到其他支持。双方开始了旨在巩固其追随者和吸引更广泛支持的宣传战。在比利亚更加强大的军队进发之前，奥夫雷贡所剩的时间不多，不过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他前往首都并设法成功地获得世界工人之家(Casa del Obrero Mundial)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支持，声称墨西哥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世界工人之家号称有超过5万名成员，为奥夫雷贡的军队提供了工人阶级支持的基础，以此换取在他的军队进入的任何城市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利。在奥夫雷贡前往韦拉克鲁斯之后，世界工人之家的领导人签署了双方联合的协定。



立宪派的领导人包括革命元首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图正中间)、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将军(最左边,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手臂)和巴勃罗·冈萨雷斯(在前两人之间)。

1914年9月,当奥夫雷贡设法争取世界工人之家和城市知识分子支持的同时,比利亚和萨帕塔发动了一场对农村群众的全面呼吁。萨帕塔派要求立宪派接受几乎未作修改的阿亚拉计划(Plan of Ayala),其中包含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纲领,同时比利亚也呼吁卡兰萨支持任何一项包含土地重新分配的农业改革。卡兰萨没有认识到他面临的形势是多么令人绝望,而是坚持必须尊重拥有田产的人的财产所有权,并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土地给予那些没有权利的人"来侵犯那些权利。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的领导人立刻分别谴责卡兰萨背叛了人民的需求。奥夫雷贡挽救了形势。他个人痛恨比利亚并反对萨帕塔的激进主义,但是他承认短期内比利亚的力量将赢得军事对抗的胜利。他把双方带到阿瓜斯卡连特斯,提供了一个谈判的机会以解决他们的分歧。1914年10月10日举行的这次历史性会议深深地分化了革命者。

那时,威尔逊总统派往墨西哥的特使约翰·林德(John Lind)是卡

兰萨的支持者,他开始反对比利亚并称其为叛徒。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卡兰萨坚定的民族主义和他拒绝了美国对其石油和其他财产进行特殊保护的要求,已经激怒了美国的领导层,后者正在努力让比利亚和卡兰萨彼此为敌。正如美国人所观察到的那样,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会议上结成投票同盟。他们要求立即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属于美国人),并要求创建自治的工人阶级农业公社。卡兰萨派没有答应这一要求。

453

在入侵韦拉克鲁斯之后,美国人被遍布墨西哥的下层社会群众的激进主义所震惊。民众在墨西哥的各个角落威胁和袭击美国公民,事态常常失去控制。8 月,美国军队运送武器给坎佩切州的军警以镇压首府坎佩切市的暴乱者。他们在报告中指出,邻近的尤卡坦半岛正处于农民和市民暴动的状态。

谨慎的美国政府在 10 月做出了决定性的并且是最终的决定,即支持卡兰萨、奥夫雷贡和他们的领导层,包括索诺拉的精英以及更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商人、专业人士和中等阶层的官员。这些人支持激进的改革,但是比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更加灵活。他们想要的改革尊重私有财产并受中央政府控制。威尔逊总统视奥夫雷贡为忠实的下属。在 11 月的前三周,美国舰船在韦拉克鲁斯卸载了军事物资,它们与那些已经被占领当局扣押的物资一同构成了巨大的武器库存,足以武装整支军队。美国的战略类似于俄国革命期间威尔逊命令威廉·格雷夫斯(William Graves)将军占领海参崴(Vladivostok)时的做法:为白军提供武器同时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在韦拉克鲁斯,这个战略得到了完美发挥。美国军队 11 月 23 日撤离,移交给驻扎在港口区的制宪主义军队 1.2 万支步枪和卡宾枪,337.5 万发子弹(包括达姆弹)、大炮、机关枪、632 卷铁丝网、军用机械表、小车、卡车、短波收音机、军刀、制服和 1 250 箱氰化钠(当与氮和硫酸结合后会产生毒气)。韦拉克鲁斯的立宪派指挥官是卡兰萨的女婿坎迪多·阿吉拉尔。

在查普尔特佩克高地精英聚居的郊区仅仅发生很少暴力事件的情况下,比利亚和萨帕塔于 12 月进入墨西哥城。在霍奇米尔科的著名会

议上，比利亚和萨帕塔强调了促使他们的运动与立宪派分道扬镳的原因。比利亚把他们的对手描述为“总是睡在软枕头上的人”，并补充说，“我们并不打算让那些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承担责任”。更加愤世嫉俗的萨帕塔对奥夫雷贡和卡兰萨周围那些精英和小资产阶级作了概括，宣称：“他们总是人民的灾难。那些杂种们只要看到一丁点儿利益，便想利用它赚大钱！”他随后又补充道，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革命者不应该信任他们的对手，“他们将会被砍头”。

比利亚和萨帕塔是聪明人，但是他们大概低估了自己的对手。立宪主义领导人准确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并且真的做到了。1915 年 1 月，卡兰萨宣布了一项专门的农业改革法并且立即开始执行。在立宪派控制的韦拉克鲁斯地区，官员大张旗鼓地宣布对被骗取土地和贫困的农场工人将立即给予土地。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资格取得土地。萨帕塔和比利亚谴责这个计划是一次欺骗，但是已经太晚了。双方的道义差异已经模糊，立宪派正在展示实践成果。 454

因为萨帕塔不信任小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使追随阿瓜斯卡连特斯会议领导人的“会议军”(Convention forces)丧失了团结。这种分裂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和他们低估立宪派所带来的伤害一样多。在会议军内部，比利亚和萨帕塔惧怕的社会类型，即政府低级别公务员和小资产阶级破坏了南北军队的协调。会议政府内的公务员未能把急需的供给从比利亚的火车转运给萨帕塔，使正在遭受美国海军封锁的后者难以收到精良的武器。一位官僚曾将农夫革命者的“兽性”和“野性”作为他未能行动的理由。会议政府的许多官员对他们自己军队中的将军和士兵非常惧怕。

同时，来自世界工人之家的 5 000 名工人响应了他们领导人的征召，聚集到韦拉克鲁斯的奥里萨瓦，立宪主义的官员在那里组织他们进入军队编制并培训他们。这些部队被称为“赤卫营”(Red Battalions)，其成员宣称信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目标，即一个由工厂和城市工人领导的社会。他们有自己的校级军官和低级别的官员，但是他们在军事事务上接受立宪派将军的最终指挥，由此也预示这支部队的未来。约

翰·默里(John Murray)是一名威尔逊总统的观察家,他冒充报刊记者并满意地注意到赤卫营的进步。一支主要由工厂工人阶层妇女组成的1 500 人的队伍,包括约 500 名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者(Acratas),即"反对所有权威的人",为赤卫营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医疗队伍。1914 年 12 月,这支重新组织和装备的立宪派军队接受奥夫雷贡的号令,在那些将决定谁是这场革命胜利一方的战斗中直面比利亚的部队。

比利亚派遣的会议军队没能夺取坦皮科周围的油田,以及东北和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同时,立宪派的主力军队准备在巴希奥迎战北方军。巴希奥是一个长 250 英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峡谷,从墨西哥城北面的克雷塔罗(Querétaro)延伸到西部的瓜达拉哈拉。1915 年4—6 月,奥夫雷贡的军队在塞拉亚(Celaya)、莱昂(León)和阿瓜斯卡连特斯等一系列延续多日的战斗中击败了比利亚的军队。在塞拉亚,奥夫雷贡部署了与德国人在佛兰德斯(Flanders)和皮卡第(Picardy)大量杀伤英军的战术,即用铁丝网与机关枪形成的交叉火力网,延缓了比利亚的步兵和骑兵的冲击。他也在城市后面的群山之后间接部署了大炮火力。

455 尽管美国的军事情报说奥夫雷贡"从前是一个只受过公立小学教育的小农和店主,没有受过军事培训",但奥夫雷贡的战术取得了显著成功。冲突双方都请了德国的军事顾问。奥夫雷贡也利用了美国在韦拉克鲁斯提供的现代大炮,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优势。在塞拉亚遭受重大失败之后,比利亚撤退到莱昂,等待他最好的战地指挥官费利佩·安赫莱斯(Felipe Angeles)带来援军和更多的火炮。在比利亚军队冗长的集结和试探性的接触后,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战斗打响了。奥夫雷贡的部下,包括赤卫营,再度取得胜利。当威尔逊总统派去接洽立宪派的特使约翰·西利曼(John R. Silliman)收到奥夫雷贡胜利的消息时,他通知德国领事:"我们已经占领莱昂,我们已经击败比利亚,我们将很快占领墨西哥城。"

比利亚的军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一些部队事实上已全军覆没。比利亚试图在墨西哥中部的阿瓜斯卡连特斯立足,却被赶了回去。比



1920 年时，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将军逐渐成为墨西哥最受拥戴的人，并几乎全票通过当选总统。图为 1920 年初他在墨西哥城向其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情景。

利亚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被解散，并返回到他们的故土。从那时起，绝大多数武装斗争是在北方，尤其是杜兰戈、奇瓦瓦和索诺拉等地进行。由当地人发动小规模武装斗争，然后转化为残酷的游击战争。

当革命在北方的许多地方转变为一种反抗之时，南方和墨西哥中部城市中的革命活动则变得更加激进。1915 年 10 月，萨帕塔派骨干中主要的土地改革倡导者曼努埃尔·帕拉福斯(Manuel Palafox)发布了一个新的法令：所有从大庄园夺来的东西，将不会有任何补偿。帕拉福斯宣称，“所有墨西哥人都有权拥有和耕作一片土地，其产品能使他满足他和他的家人的需要”。萨帕塔派在农村通过标榜自己为农民的救星而获得了不少政治筹码。立宪派部队也有激进元素。赤卫营和劳工组织者进入了诸如米却肯、哈利斯科和圣路易斯波托西等州，他们中间的激进劳工开始组织中部墨西哥的全体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立宪派领导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他们的军事胜利。 456

到1915年中期，革命的军事结果已经不再存在疑问。政治和社会后果已经成为核心问题。立宪派曾经团结起来对抗比利亚军队的军事威力和萨帕塔势力的意识形态力量，但他们对墨西哥能实现的民主程度、农业改革的节奏和应该给予劳工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的权利与独立性看法不一。劳工运动正在激进的领导人领导之下迅速发展，现在大约有10万名工业和城市工人属于世界工人之家下属的集团。与农场工人和工匠一样，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传统，世界工人之家的领导持有工人在所有生产领域自我管理的想法。这种未来观是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因为占据着正在转型的墨西哥工人阶级头脑的仍是工匠自由和社区凝聚的丧失，而不是获取国家权力。这是一种危及国内和美国资本主义者的观念。

世界工人之家的一些领导人设想了一种新的工业秩序，其中青年工人将参加一种由联合组织创建的名为"理性学校"(Escuelas Racionalistas)的教育机构。除了读、写和算，他们还将学习工人自我管理的价值与实践——它起源于古老的城市公社在地方自治、工匠作坊和互助方面的传统。这种教育将为年轻工人在产业中从事社区服务并参与管理做好准备。通过这种方法，工人阶级能够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保持其文化实践的完好无损。世界工人之家的一些领导人秉承其传统，以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眼光审视未来。其他人则期待一条更加激进的武装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在军械库收集武器，组建民兵并为与政府的冲突做准备。

1915年夏天，世界工人之家的领导人在瓷砖大厦(House of Tiles)建立了他们的总部，这里靠近墨西哥城中心城区的阿拉梅达公园和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会议厅装点着红色和黑色的旗帜，工人们每天聚集在这里听取振奋人心的演讲和举行战略会议。1915年10月13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他们希望它能成为一所全面发展的理性学校。他们也开始出版工人之家的报纸《攻城槌报》(*Ariete*)，它传播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并呼吁围绕工人的联合组织重整经济和政体。到那年秋天，许多赤卫营的老兵已经返回这座城市，成为争取"权利"的

457

市民。同时，世界工人之家领导的日益增长的罢工浪潮也席卷了墨西哥中部。

1915 年末和 1916 年初成功举行的罢工导致世界工人之家的成员增长了 5 万人，同时城市中的粮食短缺也使劳工运动的战略更为紧要。工会开始要求支付银本位货币而不是代金券，后者在公司商店之外的地方会很快贬值。他们也提出政治要求，呼吁制宪主义政府惩罚囤积主食的粮食经销商，建立固定价格以防止敲诈。卡兰萨和他的顾问不信奉由政府控制市场，但是他们认识到工资和价格控制在面对粮食短缺时是受欢迎的，粮食短缺已经到了造成饥荒的程度，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骚乱。

因此，工人阶级中的激进主义者加入了萨帕塔派，对墨西哥城的经济精英和立宪派政治领导人构成了威胁。这些精英和政治领导人虽有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们在联合反对要求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工人方面有共同利益。卡兰萨身边的人没有忘记他们的革命承诺，当想起奥夫雷贡这位墨西哥最有势力的人在面对比利亚威胁的最黑暗的日子里如何招募工人之家加入其事业，他们在是否采取行动镇压工人上犹豫不决。但是他们也未能限制经济精英的盘剥，后者继续使用代金券和操纵食品价格来牟取暴利。1915 年 10 月，石油工人在一次暴力罢工中关闭了威特曼（Weetman），皮尔逊（Pearson）的阿吉拉（El Aguila）石油公司。在 10－11 月，纺织工人在墨西哥中部关闭了制衣工厂，并赢得了 100％的工资增长、8 小时工作日和 6 天工作周。尽管是在外国人控制的石油和纺织工业，这些罢工还是花费了政府相当的财力。于是在 12 月，木匠罢工，令工业工程瘫痪：他们赢得了 150％的工资增长。墨西哥州的奥罗（El Oro）采矿区的罢工再次针对外国所有者，花费了立宪派政权额外的收入。

1916 年冬天，立宪派政府和世界工人之家之间的危机到达顶峰。首先，卡兰萨阵营的领导者将剩下的赤卫营成员遣散回家。这清除了工人之家在军队的势力，但是增加了墨西哥城、坦皮科和韦拉克鲁斯的工人阶级群众中军人的规模和好战性。贫困的老兵在街上游行要求工

作、工业国有化和补偿他们在军队的服役。巴勃罗·冈萨雷斯将军是一位保守人士和卡兰萨最忠诚的军官之一,他命令他的部队突袭了墨西哥城世界工人之家的总部,并逮捕了其中的几位成员。作为抗议,工人之家的领导人在联邦区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Federal District Syndicates)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大罢工,该联合会据称在大墨西哥城区约有 9 万成员。1916 年 5 月 22 日,罢工者使首都的交通和绝大部分服务与工业瘫痪。与此同时,比利亚和萨帕塔的军队继续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和南部的抵抗。为了控制韦拉克鲁斯的形势,州长埃里韦托·亚拉(Heriberto Jara)颁布了戒严令。

458

卡兰萨总统命令他的驻联邦区军队指挥官本哈明·希尔将军与工人之家工会举行谈判。他的选人之道再好不过了:在比利亚崛起为全国领袖期间,希尔就曾在索诺拉的卡纳内亚矿镇上成功整肃亲比利亚的工人,从中获得了与劳工谈判的经验。他命令墨西哥城最重要的工业家参加让工人表达对工作条件、薪水和实物分配之怨言的公开会议。对话没有触及政治权利或者释放被巴勃罗·冈萨雷斯领导的军队抓走的囚犯。在会议结束时,希尔命令结束不公正的工作条件、代金券和食物囤积。工人之家的领导人打算相信他并复工。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所有人都很清楚了:什么也没改变。

由希尔将军承诺并由政府发行的纸币比索已经贬值,并且比代金券强不了多少。7 月,银行家已经把汇率降低至与仅仅两分钱金币相当。工业家继续向他们的工人支付仅限在公司商店消费的代金券。同时,工人之家中的“赤色分子”计划进行另一场罢工以推动他们早些时候认为已经获得的让步。7 月 31 日,辛迪加联合会所属的工会组织再度罢工,但是政府这次准备好要对付他们了。军事情报机构已经密切关注工人之家的领导人。军队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入城内并占据战略位置。在工人努力汇聚时,军队发动袭击,驱散了他们。士兵们也占领了瓷砖大厦。

著名艺术家赫拉尔多·穆里略(Gerardo Murillo),外号水博士(Dr. Atl),作为卡兰萨总统的密使参加在市中心剧院举行的工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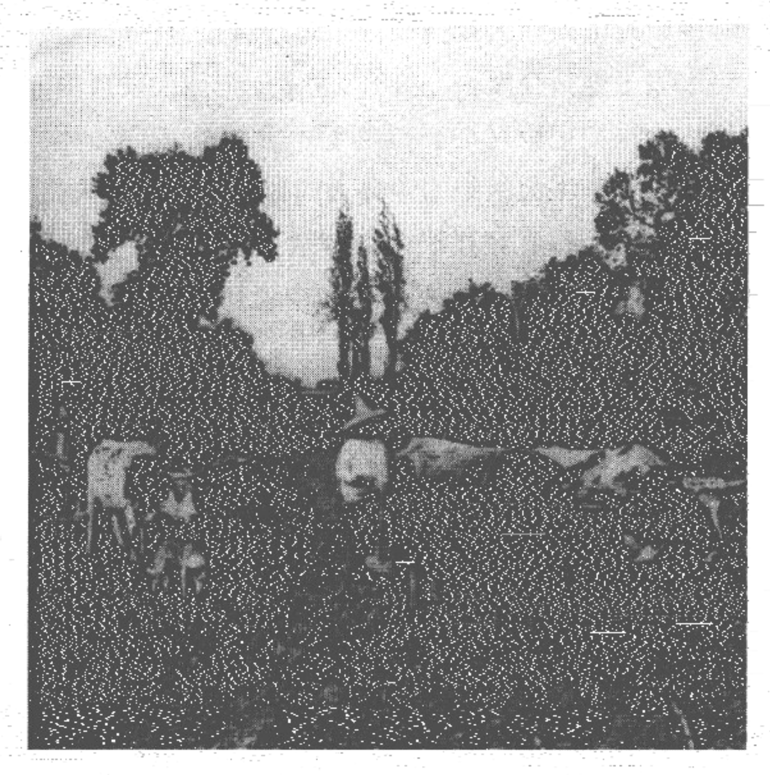
议。穆里略邀请罢工领导人到国家宫与总统讨论他们的问题。当卡兰萨与工人之家罢工委员会发生冲突时，他命令把他们以叛国罪逮捕，这是一种极刑。士兵们把枪对准一位电工工会领袖，强迫他恢复城市供电。该国最大的一些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向他们的盟友奥夫雷贡将军求助，令他们惊诧的是，后者竟建议他们解散工人之家。与此同时，军队突袭了工人之家在偏僻城市的军械库和会议厅，逮捕其成员并攫取武器和设备。

击败无政府主义工团联盟对政府和它的军队来说并非难事，他们曾在军事和政治上击败了比利亚和萨帕塔。但是农村革命并未结束。在莫雷洛斯，萨帕塔派仍然控制着这个曾经是而且将再次成为联邦首富的州。他们已经划分了田地并且准备好永远战斗。除了那些政治动荡的地区，立宪派在其他地方所推行的土地改革项目已经走向没落了，即便是前者，当地土地所有者精英也对其进程制造障碍或进行阻碍。在杜兰戈的卡纳特兰(Canatlan)周围，亲比利亚的卡利斯托·孔特雷拉斯的部队已经返回农田和牧场。他们通过武力获得了土地，但是发现新的立宪派当局在其后的争端中坚持与以前的地主站在一起。尽管比利亚的军队在1915年战败，但他们仍然能够在远至北部的杜兰戈、奇瓦瓦、科阿韦拉和东北方的索诺拉因时因地进行战斗。

459

1915年11月，他们曾挑选索诺拉靠近奇瓦瓦的边境城镇阿瓜普列塔(Agua Prieta)与卡兰萨一决雌雄。被迫在困难地形上进行了一场快速行军后，比利亚派遣6 500人前去打击一支明显弹药不足的驻防军队。但是威尔逊总统不能容忍比利亚在美国边境的胜利，特别是这可能使武器再次流入他曾有效禁运的组织。美国通过铁路把立宪派的军队和大炮向西穿越新墨西哥运送到阿瓜普列塔。这些增援部队的突然到来使得战斗变为比利亚的一场失败，他不得不在离开时把辎重扔在战场上。在对埃莫西约(Hermosillo)的袭击失败之后，北方军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愤怒的比利亚试图向西马德雷山脉的美国矿产经营者行使其权威。他在杜兰戈的圣迪马斯(San Dimas)处决了一名美国矿主，只因为



虽然会议派最终失利，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也遭刺杀身亡，但获胜的革命党人仍然在1917年的《宪法》中包括了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条款。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和1940年前的其他历任总统都把完成土地改革当作自己执政时期的第一要务。

后者引进了新的工人和设备，并且在没有事先与他结算的情况下运出矿石。对比利亚来说，那些试图在不向他缴税和承认他合法地位的情况下经营矿场的美国人，是立宪派的协作者。1916年1月，一支比利亚的部队在奇瓦瓦的圣伊莎贝尔(Santa Isabel)截留了一列火车。火车上乘坐的是持有立宪派颁发的安全通行证书的16名美国工人和工程师，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比利亚方面发放的旅行许可。比利亚的部队把他们拉下火车予以杀害。

两个月后，比利亚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比利亚集结了自从阿瓜普列塔一战后规模最大的部队，攻击了新墨西哥的哥伦布市(Columbus)。那里的美国守军给比利亚的部队造成巨大的伤亡，但是袭击者收获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基础性的，另一个是战略性的。首先，

他们向两名收了比利亚代表送的钱但是没有运送货物的美国武器交易商报了仇。其次，他们促使威尔逊总统派军入侵墨西哥。这支陷入与比利亚对抗泥潭的美军，在立宪派政府迟疑观望的时候，增强了比利亚作为民族英雄的名望。为了捕获和惩罚比利亚，美国派遣了一支由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率领的1.2万人的部队。讨伐部队深入墨西哥。美国人携带的地图表明，美国计划建立一个包括奇瓦瓦全境和南部边境从东边的坦皮科延伸至西边的马萨特兰(Mazatlán)之间区域的占领区。但是远征军在粉碎比利亚军队和抓获其首领的企图中挣扎了数月。与此同时，墨西哥民众认识到，他们的政府面对外国入侵者时表现得犹豫不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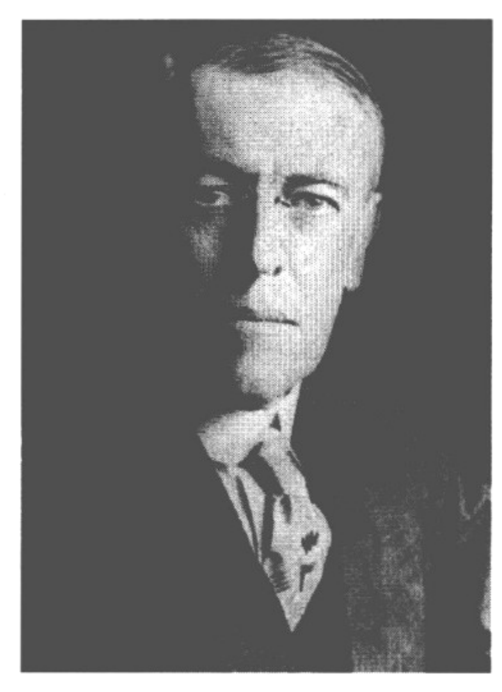
尽管在关于墨西哥的服饰、烹饪、娱乐特性上以及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的观点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农民、工业工人阶级和地方、地区以及大都市的精英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观点一致。所有这些集团都被美国人的入侵激怒了。比利亚通过抗击侵略者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收益。尴尬的卡兰萨宣布在潘兴部队(Pershing)的前沿阵地以南创建一条防线。6月，美国人误入卡里萨尔(Carrizal)，在小冲突中输给了立宪派部队，从而无意中帮了墨西哥总统一把。然而，墨西哥公众的高兴是短暂的。

比利亚的力量成倍增长。随着他成功地避开了讨伐军的围剿，墨西哥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位游击队领导人的身上。比利亚几乎成为一名传奇人物，代表了一种神出鬼没的强大而又机敏的战斗者形象。当美国军队违反协定进入南部奇瓦瓦的帕拉尔(Parral)市时，侵略者最后，也是最大的政治失败到来了。反美和亲比利亚的骚乱爆发。1916年秋天，复活的比利亚势力占领了奇瓦瓦城。美国人看上去很不幸。卡兰萨总统的耐性已经到头，他公开警告了潘兴。美国军官也很清楚，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被击败。他们宣布自己已经完成“清理”边境地区的任务，然后撤退了。

当比利亚在北部取得了军事和政治收益之时，5 000人的萨帕塔部队战胜了士气低落的3万人政府军，迫使后者在南部防御。但是立宪 461

派领导人不再满足于被动应战。他们集合了一支包括多阶层人士的忠实的革命者队伍,并新制定了一部大胆的成文宪法,足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最终结果显示,奥夫雷贡及其支持者强调由中央集权政府调控的民主和进步改革的主张占了上风。

新宪法的条款主张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人民及其代表的政府对国家的海岸线、边界和地下资源的所有权不容挑战。这些规定挑战了在墨西哥的美国人。其他条款为国家重组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包括所有农村居民拥有土地的权利、政教分离、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普及教育的权利、工作条件的规定,以及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农民、工人、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都充满喜悦。1917 年宪法的勃勃雄心还未实现,但是与马德罗要求的民主一样,它指引了墨西哥人民。这恰好是这个名为立宪派的政权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墨西哥的影响力,在墨西哥发生革命期间曾多次出手干预。其结果是增强了墨西哥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其中就包括对美国政府的敌意。

立宪派已经击败了比利亚-萨帕塔的努力和世界工人之家,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未结束。比利亚和萨帕塔在他们的家乡奇瓦瓦州和莫雷洛斯州享有强大的支持,工人阶级领导人仍在致力于脱离国家控制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工运动。另外,诸如那些尤卡坦半岛顽固的州级精英

仍然坚决抵制，由奥夫雷贡及其有阅历但仍然年轻的支持者倡导的进步改革和更加开放的社会。

与萨帕塔在莫雷洛斯的战斗已经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萨帕塔派已经组建地方性的"保卫革命原则协会"。这种去集中化的战略实现了两个主要目标。首先，它适应了莫雷洛斯分散化的军事现状，那里的革命缺乏正规军所需的资源，破碎的地形也对人员和物资的大规模调配构成障碍。第二，它把决策重心集中在关注已经获得土地的印第安村民身上。因此，当巴勃罗·冈萨雷斯率领的立宪派军队在1916年进入该州时，他们因需要在敌对的农村驻军而进展缓慢，并被更大的萨帕塔部队闪电般的快速袭击击败。对叛乱的有效镇压意味着失去乡村人民的支持，而政府已经为这些人设计了新的农业改革规划。结果，权力斗争在莫雷洛斯陷入僵局，这对国内某些最富裕的地主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北方的比利亚比南方的萨帕塔取得了更多的军事成功，但是他依然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在奇瓦瓦、杜兰戈和索诺拉州的州级和地方精英执行的改革，足以使这些州里重要区域的局势平静下来。对战争感到厌烦的人民接受了官方对他们在战斗中获得的土地的承认。而且，即使没有农业改革法令，那些持有这些州大份额土地的美国地主的逃跑也有利于土地的再分配。占用未付税的土地为重新安排地产和平定从杜兰戈中部经大卡萨斯(Casas Grandes)和奇瓦瓦境内的哈诺斯(Janos)到索诺拉的广大区域的农村提供了基础。比利亚的游击战争看上去永无止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前的支持者认为他会对稳定和家人幸福构成威胁。

由于地处城市，劳工领袖比在农村的革命者更加容易失败。世界工人之家解散后，亲政府的领导人与激进势力在一系列会议上发生了冲突。激进势力主导了头两次会议，令他们的竞争者受挫，但是在腐败的路易斯·莫罗内斯(Luis Morones)的领导下，亲政府团体在1918年创建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Regional Obrera Mexicana，CROM)。莫罗内斯的每根手指上都戴着钻石，还带尚处青春期的女孩参加声名狼藉的狂欢，他建立了这个全国范围的组织，并逐

渐将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边缘化。政府对他所领导的罢工的支持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壮了胆,他们与破坏罢工者和激进分子进行斗争。当地的警察常常帮助他们。有时,当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老旧的纺织工厂攻击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时,他们会得到来自军队的帮助。

1920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已经成为该国发展最快的劳工组织。当然,它面临竞争。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前世界工人之家的领导人重组了拥有4－8万名成员的工人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CGT)。他们在纠察线和基层组织上努力战斗,成功渡过了一段困难时期。其间,他们遭遇了能够想象到的各种困难。1928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解体了:莫罗内斯在政府失势并从内阁辞职时,它失去了超过80%的成员。那些并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工人和领导人的涌入冲击了工人总联合会,淡化了它的无政府主义色彩。1931年,工人总联合会的领导人做出让步,接受了使政府能实施严格控制的劳动法(Ley del Trabajo),这部劳动法规定政府对成立工会、举行罢工和签订合同有批准权。

463

在莫雷洛斯和奇瓦瓦,萨帕塔与比利亚的势力在人数和影响方面都在下降。而那些成功地重组了政治的立宪派经济上也在得到类似的成功。石油和矿产出口的恢复减少了苦难和饥馑,公众期待重返正常的日常生活。

然而1919年4月10日,卡兰萨犯了一个大错。立宪派赫苏斯·瓜哈尔多(Jesús Guajardo)上校策划刺杀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军事意义上,这次行动砍掉了南方农村革命首领的头颅,但是萨帕塔被尊为烈士,因而极大地降低了卡兰萨在公众中的信誉。即便诸如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等忠诚的将军也表达了他们的震惊和失望。卡兰萨的国防部长奥夫雷贡已经辞去了他的工作,以便撇清任何与刺杀有关的联系。

1920年,随着萨帕塔的被刺、世界工人之家的解体和比利亚被鄙视为惹人烦的游击战士,墨西哥经历了最后一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事

变。卡兰萨总统已经赢得了对农民和工人阶级革命领导人的胜利，但是他认识到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因而对一个更广泛和更加民主的政体没有信心。也许卡兰萨本可以利用他在面对强大的美国金融家、工业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压力时对国家利益的顽强捍卫，来提高民族主义的公众对他的支持：从1917－1920年，他不断地回绝美国商人关于放弃宪法对地下资源、海岸线和边境土地的国家主权主张的要求。但是为了鼓励美国商业活动的持续和墨西哥经济的复苏，他并没有公开这么做。

很明显，卡兰萨打算挑选他的前美国特使，副总统伊格纳西奥·博尼利亚(Ignacio Bonilla)作为他的继任者。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范围狭窄，继续与劳工、农民和美国人产生冲突的政治体制。这是许多人都不欢迎的前景。卡兰萨没有在农业改革上坚持下去，他对工会和罢工的敌意以及美国人对他的不信任，助推了他在奥夫雷贡领导的战略上静悄悄但却致命的革命中倒台。首先，奥夫雷贡颁布了阿瓜普列塔计划。在其对农业改革的定义中，该计划提供了农民要求的土地，但是最终保护了私有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它创建了一个公社的、合作的和私人的土地所有体系。奥夫雷贡对重要的萨帕塔人士介绍了该计划，后者加入了奥夫雷贡进军墨西哥城驱逐卡兰萨的大规模行动。总统在首都拥有的支持很有限。他已经疏远了工人阶级，而中产阶级没有理由反对奥夫雷贡和他扩大政治参与的计划。作为立宪派军队与比利亚军队作战时期的主要指挥官，奥夫雷贡享有军队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464

与此同时，北方的费利佩·安赫莱斯转向比利亚，并试图在1919年领导另一场比利亚派的进攻。然而，奇瓦瓦革命者的力量已经被削弱，并且在几次遭遇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包括在华雷斯市这一发生过许多重要转折的地方的战斗。在把比利亚部队驱逐出奇瓦瓦城之后，联邦军队又把几十个比利亚分子作为强盗吊死。被美国封锁而在逃的比利亚派现在甚至被许多农村的人所恐惧和憎恨。从前支持比利亚的纳米基帕(Namiquipa)和大卡萨斯的印第安村民组成了称作白卫军(Guardias Blancas)的基于公社的民兵武装，来防卫自身免受游击

队无穷无尽的征用。乡村的抵制仍然重要,奇瓦瓦州州长伊格纳西奥·恩里克斯(Ignacio C. Enriquez)通过继续维护积极的土地改革计划,将所获财产中的许多分配给欠税者和懒汉。杜兰戈的农民斗争以地方暴力的形式继续,那些曾经在卡利斯托·孔特雷拉斯手下战斗过的老兵,面对土地所有者的激烈反抗,运用他们的经验和勇气在村社中予取予夺。奥夫雷贡总统的政府(1920－1924)必须对1923年比利亚遇刺承担责任,后者当时已不再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墨西哥革命是全球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一部分,但是走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它是一场由奇瓦瓦出身卑微的领导人和索诺拉和科阿韦拉州级和地方精英联合领导的产业工人、牛仔、矿工和伐木工人的斗争。在莫雷洛斯,大规模的解雇使依靠种植为生的甘蔗种植业劳动者与仍然生活在自由村落的糖场工人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改变他们无权无势的地位而战斗。对合作社土地所有权的需求植根于印第安村社居民古老的权利。

为了实现他们的需求,所有这些团体都呼吁全面的政治参与。他们拒绝那种旧式的、控制在大都市精英手中的基础狭隘的政治制度。波菲里奥时期的领导人已经成功地扩展了经济参与,把墨西哥从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商业国家,但是他们未能向新兴的已明确提出需求的公众提供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基础。在革命的高潮,艾米利亚诺·萨帕塔写信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解释自己的运动追求全面的政治参与。他想确保强权者无法滥用权力。政府不仅必须与投票者个人打交道,而且要与一个公开组织的自由市打交道,让村民拥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免受那些与人民失去联系的人所制定的不规范的政策之苦。

465

与北方工人阶级的革命一样,萨帕塔派想要现代化的、更好的学校、道路和卫生保健。萨帕塔曾经抱怨,与他共事的那些精英马厩中的马儿比人受到的照料还要好。农村劳动阶级进行的运动寻求现代性和包容性,而不是复古和农民式的封闭。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一只脚迈向了现代化的未来,同时努力把另一只脚踩在过去的传统上。他们建

议将政治和经济上自治的市镇作为变革的工具。产业和城市的工人阶级所追求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还希望控制工厂。把农村团体与城市和工业部门的农民工区别开来的，是后者被欧洲化的程度，表现在语言、服饰、饮食和政治态度方面。他们曾在昔日“用他们的脚投票”，现在则离开他们家人居住的农村，融入了城市用照明、自来水、有轨电车、领带、光亮的鞋子、公园、歌剧院、专业的娱乐和广泛的市政服务所构建的生活。当他们激进的领导人输给立宪派时，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接受了雇佣，并且仅进行了温和的抵抗便接受了新秩序中相对无权的地位。

州级和地方精英在1915年的暴力对抗后获得了掌控权，他们也想要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政治制度，但是该制度要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运用寻求盟友的经验，首先通过为供应商开发边界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然后通过把自己标榜为民主和进步的化身，并给作为他们竞争对手的农村劳动阶级贴上反动的返祖文化标签，来争取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立宪派通过这种办法使大都市的精英和美国人相信，他们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在韦拉克鲁斯获得了美国人的武器之后，他们击败了他们的农村对手，并将劳工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领导人边缘化。1917年，他们成功地制定了首部现代宪法，其中不仅涉及政府的正式结构，而且涉及那些导致革命爆发的未决的社会问题。

革命大规模地拓宽了政治参与。它也开辟了农业改革，后者为农村劳动阶级对付全面的商业化提供了时间；它还废除了仍旧困扰着大量美洲土著生活的拉美地区的等级制度，并且维持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1920年，墨西哥人在革命的最高成就——1917年宪法的指导下，开始重建他们的国家。

第十五章　国家的重建

托马斯·本杰明(Thomas Benja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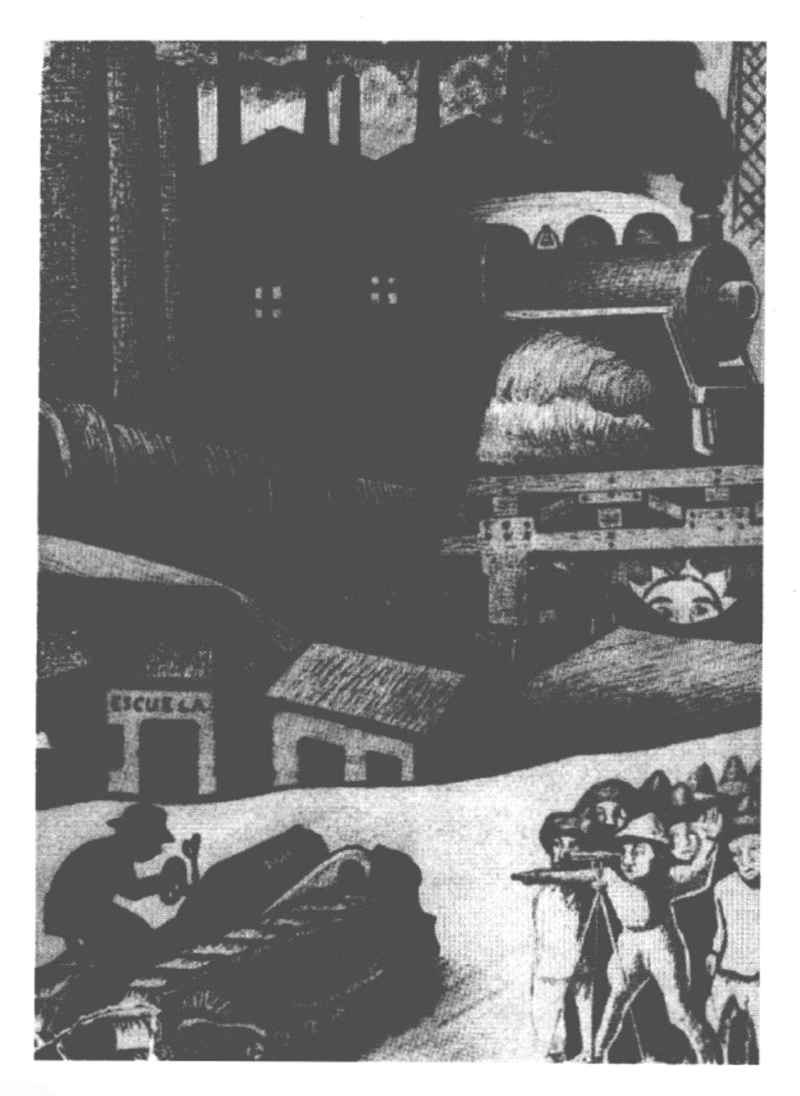
467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掌握了权力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和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与大批墨西哥老百姓一起致力于重建这个国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修复近十年政治动荡和内战所留下的创伤,而且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令墨西哥及其人民获得新生。不仅在墨西哥的历史上,而且在20世纪动荡的世界里,他们重建墨西哥的许多形形色色的努力构成了最不寻常的一个篇章。一个为工农福祉而组织起来的国家正在建设之中,精神和结构的根本变化正在成型。随后的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人选择了不同的路线,舍弃了他们在社会民主上的卓越实验。

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各个政治层面上存在的权力和利益的易变性使改革进程充满不确定和不彻底,往往发生暴力冲突,在国内各地区改革进程也发展不均衡并经常遇到阻碍。从现在回头看,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正在展开的进程。在州和地方层面上,革命领袖培养了激进主义,鼓励民众行动起来,攻击天主教会,修建学校,重新分配土地。在20世纪20年代,民众政治也迫使国家领导人进行超越其愿望的改革。20世纪30年代初,在大萧条的压力下,从地方、各州和群众组织那里涌现的一股革命动力寻求彻底的改造,并得到了居于统治地

位的“革命家族”的领导，“革命家族”是白手起家的将军、各州强人、工农领袖组成的内部分歧严重的同盟。在上有强有力的总统领导(这种领导得到了新执政的革命政党的支持)，下有大规模动员起来的群众的情况下，改革者试图完成墨西哥革命。

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革命的思潮和行动在全国层面上汇合。

468



这幅画是《墨西哥的社会和经济规划：一家之言》(*Programa Social de Mexico: Una Controversia*)一书的封面，它概括了“国家重建”计划所包括的内容。图中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现代化的墨西哥应具备的元素：工业、学校、农业和土地改革(见图中那名土地测量员)。

吸取了近 20 年土地和劳动力改革、经济民族主义、反教权主义和文化复兴的经验教训，并且以此为基础，革命者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要创造一个新的墨西哥。他们要把这个国家设计成以农为本的国家，由民主的拥有土地的农民村社构成，这种村社被称为“集体农庄”[①]。大多数集体农庄将田地分给各个家庭耕作。一度在种植园盛行的商业性农业生产地区栽种的是棉花、甘蔗、剑麻和咖啡豆这样的作物。不将土地交各家分种的集体农庄，由全体成员像经营一家企业那样集体加以管理和耕作。在政府信贷机构和地区性农业院校的支持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收入。在农业之外，广泛的农村初级学校系统会将雇工塑造为现代农民、有知识的公民和爱国的墨西哥人。

这个由集体农庄组成的国度会得到一个小型工业部门的帮助和物资供应，该部门由墨西哥商人、工人合作社以及政府——针对某些关键行业——共同拥有和经营。长期以来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国民经济部门会被国有化，为全体墨西哥人的福祉而营运。剩余的少数外国企业会严格按照墨西哥的法律经营。强大的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并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夜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外加运动和娱乐中心，将那些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转变为快乐而富有生产力的公民。

469

群众政治的新制度保障了这种新的社会和经济。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工会、军队、官僚机构都会加入执政的革命政党。通过该党，工农部门的利益得到推进，依靠谈判消除分歧，选择州长、国会议员和在各种政府部门的代言人，每 6 年选举一次联邦总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墨西哥相当接近这种革命的愿景。然而，国内外的强大势力则在致力于破坏这种理想，消灭已经取得的成就。在 20 世纪 40 年代掌权的新一代政治家是墨西哥革命的“幼仔”，他们引入了不同的愿景——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此后历届政府致力于迅速的工业化并发展商业性农业生产。以集体农庄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刺激了农村的都市化，而都市化则使农村进一步边缘化。

① (ejidos)该词源于西班牙语，指“村庄的公有地”。——编者注

联邦政府粉碎了工会的斗争精神，并代表私营工业利用劳工积累资本。之所以可能出现这种新方向是因为群众政治的组织——农业和工人组织，还有这个政党自身——全都将视野局限在自我发展上，因此被代表着新的统治和商业阶层的野心家和无耻政客所颠覆。

这种向右转并不意味着反革命。诚然，工会受到了驯化，但它们还存在着，去满足或抚慰基层群众。过去30年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阻止了任何对革命性改革的大规模逆转，甚至不时鼓励民粹主义的政府行动。这种较为保守的墨西哥依然远远不同于其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寡头政治或赤裸裸反动的政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南美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残暴的军人政权发动的“肮脏的战争”中受苦受难时，墨西哥抵制了这种专制主义的诱惑，反而向数以千计的政治难民打开了它的大门。

尽管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进步的知识分子仍在谴责墨西哥革命的“死亡”。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每一次革命都是转瞬即逝的，当然也就不能期盼墨西哥革命无止境地继续进行，尽管官方号称在不断革命。因此，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墨西哥的重建仍在继续，甚至加快了速度，但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描绘的革命蓝图已成过眼云烟。取而代之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墨西哥革命之名恢复的老旧的、革命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致力于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却不将发展的果实分配给最广大的人群。此后，墨西哥人更注重的是实现表面上的经济奇迹和政治稳定，而不是坚守革命的希望和梦想。人们开始着手建设秩序和进步的新时代。 470

在1910－1920年的十年间，墨西哥人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战争和破坏。当1920年政府宣称的和平与重建的时代开始时，这个国家的人口比之前更少而且更穷了。无论根据什么标准，那十年的代价都是巨大的。192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该国比11年前少了80万人。不过，大多数下落不明的人其实移民到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移民人数还在增长。致死人数最多的是两次流行病。在1915年前后最糟糕的年份里，饥荒也夺走了许多条生命。人口的缩减自然减少了就业人口，农业工人、工厂工人和矿工总共减少了差不多50万人。

全国铁路系统崩溃，而且破败不堪。那曾是支持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科学家派(científicos)最为骄傲的成就。在一个比得克萨斯州大两倍有余的国家里，电报线路只有2万英里左右，其中超过1 000英里的线路被毁。修复那些损坏之处会耗时十年以上，而20世纪20年代的军队暴动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

在这十年里，农业和矿业产量减半。庄园系统是由农业种植园构成的一个经济部门，虽然它在武装革命中得以幸存，但数以千计的种植园被毁，或者彻底销声匿迹。在这十年中唯一出现增长的部门是石油业，它使墨西哥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外债是令人咂舌的10亿美元，而且利息过期仍未支付。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要求赔偿其公民蒙受的损失。然而，膨胀起来的革命军队耗去了60%以上的联邦预算。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墨西哥经济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并未实现持续的增长。

国家重建需要在最佳环境中进行巨额投资和多年努力，更不用说重大的改革了。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难以找到有利的条件。就全国而言，军队叛乱和民众起义消耗了稀缺的资源。暴力事件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严重打击了墨西哥，美国遣返30－40万名流动工人的举动更是加重了墨西哥的困境。

471 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墨西哥为1917年制定的宪法所付出的代价。那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宪章，为重建事业提供了基本规划。它规定的条款成为革命的象征。然而，在1920年，这部宪法的规定不过是纸上谈兵，只有少数例外情形。国会没有通过使之落实的法律。代价似乎是巨大的，成果却少得可怜。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这部宪法是有力的目标和手段。它是1910年后那十年里的民众动员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性改革之间的桥梁。胜利的革命将军往往以这部宪法作为包括工农组织在内的政治新秩序的根基。团结在民粹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周围的老百姓利用这部宪法重建国家。但这一法律上的革命，在成为政体之前，并无意义。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武装斗争逐渐破坏了联邦政府。1913年，维

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解散了议会；1914 年夏，联邦军队被打败并消灭；随着新的将军实施革命的正义(revolutionary justice)，法院彻底销声匿迹；而各州和地方成为强人的领地。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1917－1920 年在任)是根据 1917 年宪法当选的第一任总统，他试图恢复秩序，重新集中权力并重建政府。但实际上，他的政权并不重视这部宪法和墨西哥在革命后的新政治现实——工农参与地方和地区的政治。1920 年，当大部分革命军队为支持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1920－1924 年在任)将军而叛变时，卡兰萨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后来的领导人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卡兰萨政府是在 20 世纪被武装叛乱推翻的最后一届政府。

随奥夫雷贡到墨西哥城掌权的那些人来自索诺拉州，他们有着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政治悟性。阿道弗·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和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曾是州长。三头统治的主角是奥夫雷贡，他在州和联邦层面上作为政治掮客磨炼其政治技能，拉拢派系，形成民粹派的同盟。在州政府任职的岁月里，这些索诺拉人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军队，支持工会并与之结盟，扩大州政府的权力以推动经济发展。现在这些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已经准备好了，渴望在联邦范围内做相同的事情。

他们手头的第一个任务是和解。虽然各路军队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墨西哥依然处于战争状态。奇瓦瓦、莫雷洛斯、恰帕斯和其他地方的地区性叛军依旧在与联邦政府战斗。在地方和公社，乡村与庄园、派系与派系，争斗数不胜数。1920 年 11 月，在奥夫雷贡当选为任期四年的总统之前，阿道弗·德拉韦尔塔当选为临时总统，他设法让潘乔·比利亚(奇瓦瓦的造反者)隐退，平息了萨帕塔派(莫雷洛斯州的农民革命者)的起义。其他地区性的叛乱者停止了斗争，倒向新的胜利者一边。卡兰萨的敌人有许多是先前的马德罗分子(Maderistas)——在 1910－1911 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成功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运动中追随他的人，比如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他们受到欢迎，返回墨西哥，加入革命家族。

472

这些索诺拉人声称自己是马德罗的合法继承人和真正的立宪主义者,是赋予1917年宪法先进的社会和经济条款的激进分子。他们自视为墨西哥革命的真正代表。革命的暴力阶段已经告终,他们会把这次革命转变为政体。"革命变身为政体"(La Revolución hecha gobierno)是用来使秩序重建合理化的措辞。

新总统是无可争议的"考迪罗首"。他在斗争中战无不胜,而且严厉反对教会干预政治,是农民和工人的朋友。奥夫雷贡的声望如日中天,未因卡兰萨政权最后岁月的错误和腐败而受到玷污。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客和资本主义者,而没有更倾向于社会革命。他切实认识到,为了抚慰那些农村人口,有必要在各处重新分配土地。他还与劳工组织结盟,以此抵消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政治权力。然而,在这些姿态的背后,奥夫雷贡只不过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墨西哥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复苏和增长,其基础是商业化农业生产和小型的工业部门。对奥夫雷贡来说,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协调阶级利益,因为那会带来和平与进步。

在1920年,即使最乐观地估计,政治稳定的前景也是不可预测、无从保证的。奥夫雷贡继承了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有十多万名士兵、数以千计的将军和准将军。地方上的铁腕人物和派系有的激进,有的保守,许多人只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控制了各州,对中央政府干预的容忍程度各异。为使其石油公司和寻求损失补偿的公民争取到更好的谈判条件,美国在卡兰萨被推翻时召回其大使,拒绝承认新政权。没有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支持,奥夫雷贡无法得到外国融资,而其潜在的敌人却可以在边境上购买武器弹药。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政权临时拼凑了一种新的群众政治。革命斗争为广泛的联盟提供了丰富的机会。1913年,奥夫雷贡以分配土地的承诺招募了土著雅基人(Yaquis),而在1914－1915年针对潘乔·比利亚的内战中,他与墨西哥城主要的劳工联合组织达成协议,将由武装工人组成的"赤卫营"投入前线。1919年,他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重新塑造了那种结盟关系,与新兴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携手。该

473



图中，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总统坐在总统专座上，正在接待中国来的大使。这是第一位被派来承认墨西哥新政府的外交使节。总统和他的两名助手：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及阿道弗·德拉韦尔塔并称为“索诺拉铁三角”。在把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赶下台后，他们结束了 1910 — 1920 年的革命时期，开启了重建时期。

联合会的首领是路易斯·纳波莱昂·莫罗内斯(Luis Napoleón Morones)，他以前是电工。

因此，奥夫雷贡在国会中得到了莫罗内斯领导的新党——“墨西哥工党”——的巨大支持。这位总统也在墨西哥农村地区巩固了对他的支持。在农民被动员起来参与革命战斗最积极的地区，以及激进的州

长鼓励农民组成农会的地方，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相应地，农民领导人组建了“全国农党”(National Agrarian Party)，保证该党支持这位总统。这些有着广泛基础的组织提供了抗衡难以捉摸的军队、多如牛毛的独立政党和墨西哥革命的“敌人”的政治力量。

20世纪20年代，在各州开展了成果丰富的政治实验。在卡兰萨下台的情况下，改革者爬上了州长的位置，少数州的州长甚至还是意志坚定的激进分子。奥夫雷贡总统需要他们的政治支持，而他们需要他的支持。这些州长开始创建农民和工人组织(一些州还将他们武装起来)，组成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在这种支持下，他们着手实施改革，进一步鼓励和巩固民众动员。1923年，美国记者卡勒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这样赞扬这些“实验室”：“在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控制方法。”

474

韦拉克鲁斯州州长阿达尔韦托·特赫拉(Adalberto Tejeda)鼓励组建工会、农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他与当地的共产党结盟，成立了“农会”和“韦拉克鲁斯州农业联合会”。在米却肯州、阿瓜斯卡连特斯州(Aguascalientes)、恰帕斯州和其他许多州里组建了类似的官方农业社团。韦拉克鲁斯联合会成为“全国农民联盟”的核心，该联盟在1926年组建，拥有30万名会员。在东南方的尤卡坦州，费利佩·卡里略·普埃尔托(Felipe Carrillo Puerto)在1922年就任州长，宣称是“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他的“抵抗同盟”招募并组织玛雅农民，从而推动土地改革和农业工人的联合。在尤卡坦州和邻近的坎佩切(Campeche)，这些同盟随后组成了“东南社会党”。卡里略·普埃尔托也组建了“妇女联合会”，后者激发了新生的墨西哥妇女运动。在尤卡坦州，他使离婚合法化，引进了妇女投票权，鼓励妇女通过选举成为政治官员。

塔瓦斯科州的州长托马斯·加里多·卡纳瓦尔(Tomás Garrido Canabal)组建了一个工农联合会，为激进的“塔瓦斯科社会党”提供了大众基础。加里多的激进主义更偏重文化而不是经济的结构改革：他的政府寻求打破天主教会对塔瓦斯科人的心理和灵魂的掌控。在东北的塔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州长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Emilio

Portes Gil)在当地农会和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边境社会党"。像许多州层面的执政革命党一样,波特斯·希尔为了塑造新型的墨西哥公民而发动了道德攻势。通过禁令和规章制度,这位州长试图减少赌博、狩猎、酗酒、卖淫和其他"反革命"的罪行。

当然,不是所有的州政府都是革命的。在革命后的墨西哥,权力成为公开竞标的对象,游戏规则复杂,而且随时变化。在与危地马拉接壤的恰帕斯州内,保守的反叛者支持奥夫雷贡,并在1920年取得本州的统治权。地主组成的政府试图恢复摇摇欲坠的旧秩序。虽然在奥夫雷贡任期内,这个政权得以幸存,但它最终的命运和卡兰萨政府一样,而且导致此结局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在恰帕斯州内,政治的新要素——有组织的村民和农场工人——与民众主义政治家联手,与墨西哥城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结盟。正如恰帕斯社会党在1925年胜利占领州长官邸和州议会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实践政治的新体制成为此后的一种潮流。无论是在州还是全国层面上,这种旧政权的复辟都没成功,而且也不可能成功。群众政治的兴起是墨西哥革命永久的革命成果之一。

475

作为自封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他曾主张"有效选举,不能连任",但最终却背离了这一主张)的继承人,也因为1917年宪法的限制,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无法在1924年争取连任。然而,确如1920年选举揭示的那样,一次选举就意味着一场会导致军队哗变这样的政治阴谋。虽然这位领袖做了准备,但冲突无从避免。在1923年的春天,这些索诺拉人在布卡雷利会议(Bucareli Conference,因墨西哥城的一条街道而得名)上修复了与美国的关系。在随后的7月,难以捉摸的潘乔·比利亚在其奇瓦瓦州帕拉尔(Parral)的庄园附近被枪杀,从而无法实施叛乱或插手。8月,美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墨西哥新政府。数日内,内政部长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宣布他将竞选总统。虽然奥夫雷贡选定了他的接班人,但他是否能够如愿以偿还得走着瞧。

于是,上一任总统阿道弗·德拉韦尔塔吸引了怀疑、害怕和反对卡列斯的那些人。受各色人群的推动,韦尔塔成为一场大规模叛乱有名

无实的领袖。这场叛乱始于1923年12月,超过半数的军队、数十名将军、不在少数的州长和铁腕人物加入其中。联邦政府(也就是奥夫雷贡和卡列斯)请求并得到了劳工和农民组织的支持。革命派的州长,比如阿达尔韦托·特赫拉和托马斯·加里多·卡纳瓦尔,还有更为传统的地区性铁腕人物,比如圣路易斯波托西的萨图尼诺·塞迪略(Saturnino Cedillo),动员农民组成军队保卫该政权。在墨西哥中部,大约12万名农工被武装起来,与反叛的韦尔塔派(Delahuertistas)战斗。

叛乱在1924年3月被平定,大约50名将军被消灭,留下了一支更小、更驯服的军队。7月,47岁的卡列斯当选总统,任期是1924－1928年。据说他比奥夫雷贡更激进,民族主义色彩更浓。他在就职之前前往欧洲旅行,考察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德国的工业与合作社。奥夫雷贡回到他在索诺拉州的农场,自豪地宣称:"我从国家宫(National Palace)的前门离开,沐浴在我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之中。"即使不是历史学家,人们也能想起,有另一位将军从一届任期上"退"下来后,又接连7次再度当选总统。

新总统卡列斯在其前任的成就上前进。他的政权与劳工结盟,并通过任命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路易斯·莫罗内斯出任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长,使这种结盟关系得以巩固。他在任期内,加速土地的重新分配,修建了更多的乡村学校,铁路系统也得到了积极的扩建。卡列斯顺应时尚,增强了联邦政府的经济作用。1925年,他创建中央银行,即墨西哥银行。次年,新的"全国农业信贷银行"开始向地方和地区的合作社提供贷款。他的政府在全国修建了许多灌溉设施、一套新的公路系统和不少农业学院,以使那个部门现代化。

476

在卡列斯任期内,总统权力扩大,反之,军队更为职业化,且势力缩小,州政府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在卡列斯任期内,军队减少到4万名士兵,而15个州里有25名州长先后被免职。在州和地方层面上,激进的领导人越来越少,所有的州政府都依靠与工农的联盟实行某种形式的群众政治。

两股强大的力量抵制着这个革命性政府的强大，即美国和天主教会。华盛顿开始认为卡列斯政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对“苏维埃墨西哥”的歇斯底里在1927年造成了一次战争恐慌。与以前一样，对石油的管理才是根本问题。1926年，当挑衅的反教权法获得通过时，天主教会停止举办弥撒活动，富有战斗精神的天主教徒挺身而出，在墨西哥的中西部发动基督派叛乱(Cristero rebellion)。1927年，野蛮的战争展开，直到1929年战争结束，数以万计的墨西哥人因此丧命。

尽管存有争议，但考迪罗的回归并不出人意料。没有哪条革命原则比不能再次当选总统更为神圣。然而，支持者主张，不是选择奥夫雷贡，就是选择混乱。1927年，宪法被修改，以便允许不连续的再度当选，到了1928年初，总统任期被延长为6年。奥夫雷贡开始其竞选活动，并得到全国农党的支持，但没得到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及其领导人的支持，因为那位失望的领导人渴望自己成为总统。两位与奥夫雷贡竞选的候选人都是将军，他们在1927年发动叛变并被击毙。从索诺拉到恰帕斯，这次暴动提供了以谋杀手段清除政敌的借口。在1928年7月再度当选为总统之前，奥夫雷贡挫败了两次暗杀他的企图。他告诉卡列斯：“我证明了总统宫并不必然是坟墓的前厅。”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在一次户外宴会上刺杀了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就像波菲里奥·迪亚斯在先前的岁月里那样，奥夫雷贡知道如何操控政治——如何平衡利益和敌人，如何抚慰和威胁地区与全国的政治派系。他从舞台上突然消失导致磨刀霍霍的局面产生。奥夫雷贡的支持者怀疑卡列斯及其亲密盟友莫罗内斯。在基督派叛乱期间，又一次规模空前的革命分裂有可能爆发。为了阻止灾难发生，卡列斯总统试图将所有革命分子团结在一条共同的政治阵线上——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最紧迫的问题是总统的继任。1928年9月，在其任内最后一份年度咨文(Informe)即对议会的演讲中，卡列斯总统宣布墨西哥的个人统治时代告终，而“制度和法律的国家”诞生。他谨慎地抵制了再度当选

的诱惑，在12月其任期结束时退位，把总统职位交给奥夫雷贡分子（Obregonistas）和卡列斯分子（Callistas）都能接受的政治家：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Emilio Portes Gil）。次年，两派创建了所有革命政党的联盟——国民革命党（PNR），并提名默默无闻的驻巴西大使帕斯夸尔·奥尔蒂斯·鲁维奥（Pascual Ortiz Rubio）作为其总统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是真正信仰马德罗主义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后者或许实际上得到了大多数选票，但奥尔蒂斯·鲁维奥才是最终的赢家，得到了总统职位。不过，卡列斯现在是墨西哥革命的"最高领袖"（Jefe Máximo），他的权力和威信比鲁维奥总统更大。

1928－1934年这个阶段被称为"领袖时期"（Maximato），墨西哥有三位总统在政治上与铁腕人物卡列斯角力。当墨西哥城的居民经过查普尔特佩克城堡（Chapultepec Castle，总统的住所）时，有时会说俏皮话："总统在这里生活，但下命令的人住在街对面。"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1928－1930年在任）设法结束了基督派叛乱，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镇压了最后一次针对联邦政府的军事政变。帕斯夸尔·奥尔蒂斯·鲁维奥（1930－1932年在任）的起点并不顺利，就职日的一次暗杀就差点令其受伤。他难以接受"最高领袖"那边下达的政治指示，最终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是阿韦拉尔多·罗德里格斯（Abelardo Rodríguez，1932－1934年在任），人们称他为"乡村俱乐部总经理"。他在奥夫雷贡任期的剩余两年里出任总统，知道如何接受命令，哪怕他并不喜欢。

在"领袖时期"和大萧条时期，卡列斯变得越来越保守，而墨西哥的农民和工人变得越来越激进和固执己见。1930年，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当口，"最高领袖"宣布，农业改革失败，立即停止改革。一些州长仍继续分配土地，让革命梦想存活。米却肯州的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就是其中之一。但在其他地方，农业减产和乡村的艰难造就了更富有斗争精神的农民社团和政党。

农民运动在各州复兴并发展壮大，在新的革命党内变得尤其有影响力。国民革命党由全国和地区的革命党组成，其成员大部分是农民。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未被邀请加入该党(因为莫罗内斯与卡列斯密切结盟,且反对奥夫雷贡再次当选总统),因此,卡列斯在国民革命党内没有抗衡农民影响力的力量。在1933年春天,各州和该党党内的农民力量采取行动,由波特斯·希尔牵头,成立了"全国农民联合会"。他们发表了要求恢复农业改革的宣言,提名拉萨罗·卡德纳斯作为该党参加1934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最高领袖"选择不与舆论及其创建的政党对抗,于是改变了他在农业改革上的立场,并在1933年12月该党的大会上赞成卡德纳斯——他的朋友和忠实的支持者——的提名。

虽然作为执政党的候选人,卡德纳斯没有对手,但他在墨西哥东南西北展开的竞选活动的密度,却是自1909－1910年马德罗那次失败的竞选以来闻所未闻的。卡德纳斯寻求的不止是选票:他希望得到民众对革命的授权。1934年7月,"童子军"当选为总统,这个昵称是政界人士因卡德纳斯诚实和朴素的个性而赋予他的。他在12月就职,随后着手推动墨西哥的重建。

478

然而,他首先遭遇的是"最高领袖"问题。新总统亲眼看到他的前任受到的挫折和羞辱。因此,卡德纳斯慎重地确定政治盟友,任命官员,而且设法让许多将军和州长退职或被取代,从而增强对自己的政治支持。新政府加速了土地改革,容忍罢工,这使卡德纳斯赢得了农民和工人组织的支持,还有执政党内重要人物的支持。因此,当1935年中,卡列斯开始批评农民和工人的骚动并向政府施加缓和其政策的压力时,卡德纳斯从其内阁中清除了大多数卡列斯的忠实支持者。这次行动证明,"最高领袖"的权力已经名不副实了。此后,卡德纳斯接管了国民革命党、国会和14个州的政府。

虽然卡列斯宣布他"永远"退出政治生活,而且前往美国,但他不可能长期置身事外。1935年底,他回到墨西哥以捍卫其名誉,以及墨西哥革命。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卡列斯分子和卡德纳斯分子(Cardenistas)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为暴力活动。1936年4月,卡德纳斯总统把卡列斯送上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我被流放了,"卡列斯告诉记者,"因为我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与马德罗、

萨帕塔、卡兰萨、比利亚和奥夫雷贡不同,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未被谋杀。“领袖时期”终结了,却没有流血。

此后,卡德纳斯总统及其继任者完全控制了执政党和政府。虽然卡德纳斯是被党的领导人推上总统职位的,但民众政治令其大权在握。对人民来说,“权力的革命”不完全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是“一种新的民主”,正如1937年国民革命党的一份宣言所述,“组织起来的工农应该在其中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权力的革命”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政府行动。卡德纳斯主张,因为其政府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所以改善那些团体的境遇是其“最紧迫的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的潮流。一股是社会和经济的潮流,即致力于创建一个工农富裕的国家,由工农控制这个国家的资源和命运。另一股是文化的潮流,即致力于塑造新型的墨西哥男人和女人。莫伊塞斯·萨恩斯(Moisés Sáenz)在1926年说:“为墨西哥人而拯救墨西哥和为墨西哥而拯救墨西哥人,综合起来,就是墨西哥革命。”这两股改革的潮流,即文化革命和社会经济革命,实际上是墨西哥革命内部的两种革命。

重建国家首先意味着“拯救”墨西哥人:改造、提升和解放男人和女人、农民和工人、家庭和社区、土著人,而最重要的是孩子——这个国家的未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者是改革时代自由主义前辈的忠实继承人。两代人所设想的国家是共和的、世俗的和开明的。这个现代墨西哥的最大障碍和敌人依然是该国的异质性(指其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和天主教会。这些革命者拥护使这个国家墨西哥化的新目标。他们鄙视波菲里奥对欧洲高雅文化的模仿,力求以墨西哥的方式发展新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希望融合该国多种多样的民族和地区要素,形成墨西哥化的国家。

479

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的其他所有东西那样,文化革命也充满了矛盾。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州政府往往遵循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议程。有关教育和教会的全国政策随着领导人和政权变化而改变。温和的改革者往往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计划放在激进的官

员和教师手上，而由于保守分子占据地方和州级的职位，激进分子同样经常遭遇挫折。虽然普通的墨西哥人往往反对国家的劝诱、禁令和侵入，但墨西哥还是经历了真正的文化革命。在全国的各个层面上，有许多真诚的革命者不仅致力于转型的细小行动，也致力于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改革。就像16世纪的传教士那样，20世纪的文化改革家在雄心壮志、努力程度和成就方面出类拔萃。

墨西哥的新型公民会在政府学校里成型。那时的口号宣称，“受教育就是得救赎”。教育家试图救赎孩子、成年人、印第安人、农民和工人，还有这个国家。救赎的计划不仅包括三个R[①]，而且包括卫生和营养、运动和体格健壮、道德和自律、艺术和有用的技能。农业和工业的知识技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也得到了强调。这项计划被其最初的倡导者——思想进步的美国改革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称为整体教育或职能教育(创建“行动学校”)。

墨西哥的教育振兴首先是因为一个异常有感召力的人，即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他使教育成为20世纪20年代改革的核心问题。1920年，在索诺拉人获得胜利后，39岁的他回到墨西哥，被任命为国立大学[②]的校长。在那个职位上，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每人教一人”，该运动招募志愿教师并激发了这个国家的想象力。次年，他撰写法律，让联邦政府有权设立和维持学校，为之配备人员，而且创设了公共教育部以管理这个新系统。巴斯孔塞洛斯自然得到了公共教育部长的任命，成为墨西哥革命的文化权威和社会工程师。

巴斯孔塞洛斯迎面直击最大的问题。公共教育部在国家财政提供两年慷慨拨款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农村小学系统。流动的教师训练机构被称为文化使团，它们深入乡村，修建校舍，设立图书馆，组织学校和社区改善委员会。教师得到学术科目、教学方法、卫生和营养、运动、音乐、农业、机械技艺等方面的培训。作为长远规划，公

480

① 读、写、算的英语首字母缩略词，指基础教育。——译者注

② 全称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译者注



1934年11月1日，国会议员在国家革命党(PNR)主席卡洛斯·里瓦·帕拉齐奥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游行，声援政府以反教权及教育改革政策开展的文化革命。这些革命性措施造成了墨西哥民众的大分裂。

共教育部建立了农村中学系统，免费提供食宿、教育和培训。公共教育部还出版了关于西方文明的名著的廉价版本，把它们放在数以千计的乡镇小图书馆内。

公共教育部部长助理在1926年这样向美国听众描述农村学校及其教师——墨西哥革命的新"战士"——的作用："通过农村学校团结墨西哥，也就是说，教育山区和偏远山谷的人们，那里有数百万人是墨西哥公民，但还算不上是墨西哥人，教他们热爱墨西哥，知道墨西哥的含义。"他继续说，"我们的乡村小学校在那些遥远的角落里代表墨西哥，象征墨西哥，那么多的人属于墨西哥，但还算不上是墨西哥人。"

结果令人赞叹，也令人沮丧。在1920年之前，农民子女的教育要么是州政府的责任——大多数的州几乎毫无作为，要么是教会的责任——在革命者看来，教会的表现差劲。在奥夫雷贡任期结束后的1925年末，全国只有近2 000所农村小学和3 000多家图书馆。对此后历届政府来说，修建更多的农村学校依然是要务，这个系统因此得以扩大。到1936年，农村学校超过1.1万所，1.4万名教师执教70多万名孩子。这些学校的作用不仅仅是教育：它们给孩子接种疫苗，将营

481

养丰富的早餐供给饥肠辘辘的学生。

这些学校也欢迎女孩子,此前她们总是退缩在家中。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孩入学率与男孩入学率基本持平。在那时的官方话语中,妇女的尊严并不完全是空洞的口号。

在州的层面上,激进的政府也在扩充教育计划。恰帕斯社会党的新政权在 1925—1927 年执政期间,增加了由州政府提供经费的农村小学的数量。各州教育预算的匮乏和国家层面的努力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到 1927 年,恰帕斯州国立小学的数目几乎是州立小学的两倍。该州也要求地主为其工人的子女提供学校和教师。(直到 1931 年才有联邦法律要求雇主建立类似的"第 123 条"学校。)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扩大农村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对此的要求和支持。乡村领导人、地方农民运动、学校委员会向州和联邦政府请愿,要求为孩子们修建学校。地方政府普遍通过修建教室并提供家具扶助它们的学校。政府赠予学校土地、动物、工具和书籍,有时还会耕作一片公共土地,将其收益作为公立学校的经费。随着教师开始参与农民请愿、发起戏台演出、在国定节日组织爱国仪式,学校成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之一。

然而,尽管进行了这些巨大的努力,墨西哥的文盲率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里下降的幅度仍然很小。1937 年,公共教育部估计,该国需要将其目前在职的农村小学教师的数目提高一倍。然而,教师辞职率的居高不下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一个依然以农为本的社会难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部分源于政治。理想主义的乡村教师经常不得不面对当地地主和政治首领的暴力对抗,后者并不希望其劳动力受教育、识字、了解新的革命性法律和宪法。教师开始卷入农民运动,经常帮助村庄向政府请求土地。因此,教师常常受到攻击、驱逐,甚至暗杀。

许多乡村学校位于土著聚居区,它们在那里的主要目标是教授国语并使印第安人融入国家文化之中。卡列斯总统的公共教育部长曼努埃尔·普伊赫·卡绍兰克(Manuel Puig Casauranc)博士在墨西哥城为

各州的土著学生建立了一所住宿学校。他希望教育各州领导并训练会回到其社区修建学校的教师。不幸的是，极少有毕业生愿意放弃城市生活。虽然 20 世纪 20 年代的公共艺术颂扬土著文化，但造福于墨西哥土著人口的全国性的重大行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实施。

482

巴斯孔塞洛斯及其后任创造了其他重要的受教育机会并扩大了已有的机会。他们在城镇建立了幼儿园系统，以便帮助要上班的母亲照料孩子。1925 年形成了公立中学系统。公共教育部也开设夜校、青年人的职前教育学校、技术和职业教育学校和青年农民的乡村农业学校。

1921 年，巴斯孔塞洛斯在公共教育部内设立了艺术局，用以鼓励和支持造型艺术、音乐和文学。与此同时，他委托艺术家在公共建筑的墙面上绘画，用以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并提高公众的美学鉴赏能力。然而，壁画家们的想法与其不同。1922 年，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为技术工人、画家和雕塑家联合会起草了“社会、政治和美学宣言”，用以指导新的工作。“我们宣布，”该宣言说，“处在社会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型的这个时刻，为了实现对人民有价值的艺术的目标，美的创造者必须竭尽全力。”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和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绘制了大量富含教育意义的著名壁画。里维拉的作品致力于赞颂墨西哥革命，将其浪漫地描绘成工农运动。他的传记作者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D. Wolfe)说里维拉“画的是墨西哥革命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另一方面，沃尔夫在其《迭戈·里维拉的传奇一生》(*The Fabulous Life of Diego Rivera*)中指出，奥罗斯科“画的是那次革命的实际情形，它的野蛮，它那煽动和背叛的冷漠范式”。尽管如此，两位画家和参与绘画的其他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赞美墨西哥，赞美她的人民、习俗和历史。墨西哥的这次壁画复兴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里得以持续，壁画覆盖了墨西哥许多最重要的建筑——国家宫、公共教育部大楼、艺术宫——的墙面。这些革命者强有力的形象被复制并在全国散发，造就了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如今依然回荡在墨西哥(详见第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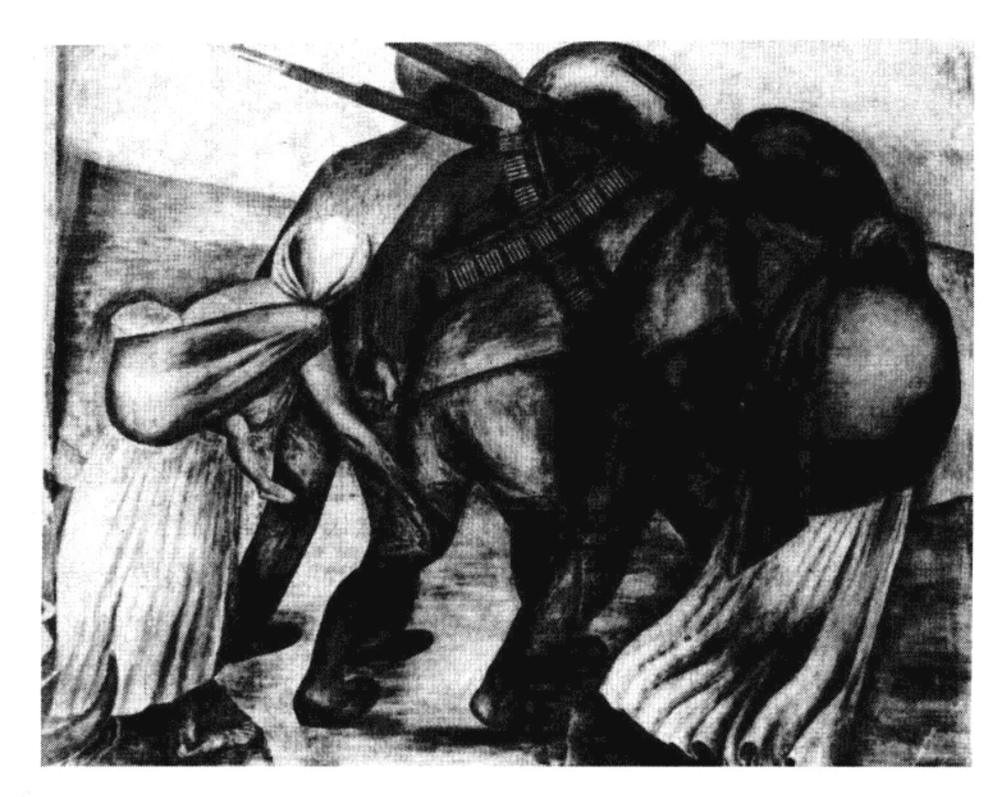
这些壁画家往往把天主教会及其僧侣描绘成阻碍一代又一代人进步的反动力量之一。革命人士指责教会在1913年支持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对付马德罗,赞同在1917年的宪法中进一步限制天主教会及其僧侣。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打破天主教会的垄断,领导墨西哥人民摆脱保守主义、顽固、偏执、迷信和狂热。

虽然这部革命宪章在第130条试图消除任何残余的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但完全没有涉及劳工组织。这一疏忽使一些天主教工会有可能兴起。1922年,它们在"全国劳工天主教联合会"(National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r)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不过,对那些索诺拉人,尤其是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来说,教会进入民粹政治的这条后门通道是不能容忍的。教会也开始插手农民纠纷和冲突,牧师经常支持地主,并就村民加入各种联合会和请求土地等事务提供建议。在许多村社,教会和政府分别以牧师和教师为代表相互对抗。因此,两种最高权威之间的冲突几乎无法避免。

483

就像在强大力量的冲突中常常看到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自己受到了对方的挑衅。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暴徒攻击天主教工会,炸毁教堂,而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23年,教会组织了到瓜纳华托的大规模朝觐,使耶稣基督加冕为墨西哥之王。墨西哥政府因此驱逐了参加那次仪式的教皇大使。天主教的斗争精神随着"墨西哥青年天主教协会"(ACJM)的成立而增长。在卡列斯任期的第一年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路易斯·莫罗内斯鼓动成立一个与之竞争的教会——墨西哥全国正统使徒天主教会,它的第一任大主教华金·普雷斯(Joaquín Prez)娶有妻室,而且是共济会成员。

革命的反教权主义在一些州里变得相当严厉和广泛。那里的州长没收了教会建筑,把它们改建为图书馆、学校和工会礼堂,并经常关闭教会学校,驱逐抗议的牧师和主教。他们在传统上应摆放天主教图标的位置放上了社会主义的符号,有时甚至把它们放在教会建筑上。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雅各宾式政府是塔瓦斯科州州长托马斯·加里多·卡纳瓦尔的政府。在该州,反教权的法律禁止展示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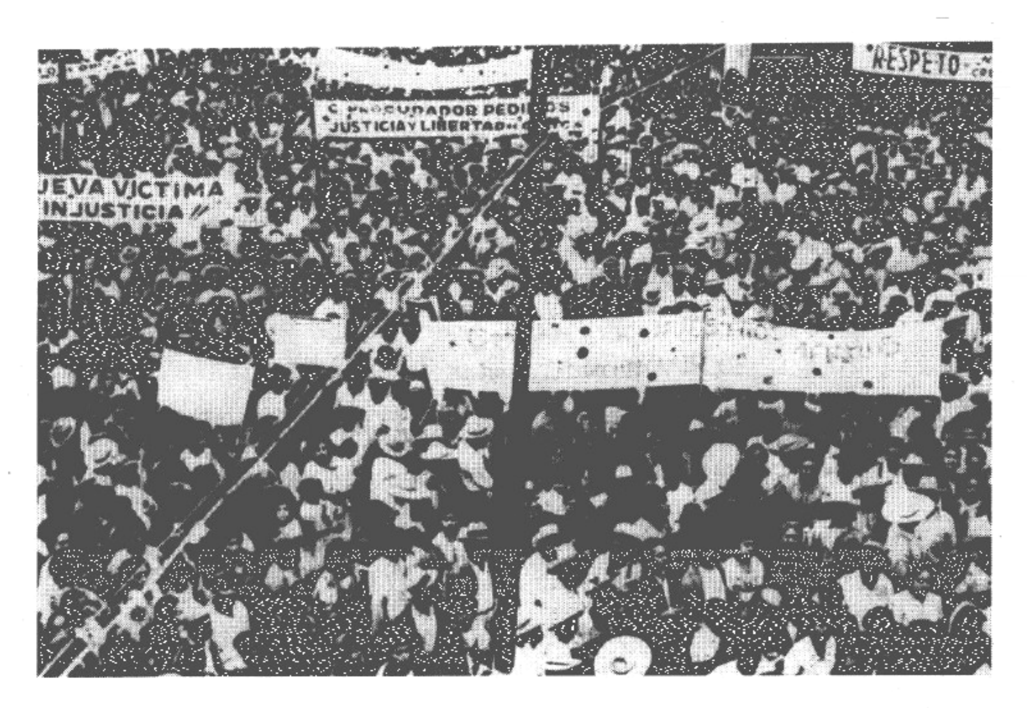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时，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迭戈·里维拉和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通过他们绘制在公共建筑上的杰出壁画作品，讲述了革命时期的历史，刻画了墨西哥人民的形象。凭借他们创作的非常深入人心的墨西哥起义者形象，他们为许多不识字的墨西哥人解释了这场革命。这是奥罗斯科的壁画作品《重返战场》的一个细部。这幅作品绘制在墨西哥城国立小学的墙上。

宗教图像，要求每名牧师结婚，并最终关闭了该州所有的教堂。

484

在全国层面上，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在1926年陷入僵局。那时瓜达拉哈拉的大主教公开抨击1917年宪法。在危机酝酿的阶段，卡列斯总统驱逐了200名外国牧师和新的教皇特使，并在国会强行通过了针对“宗教罪行”的新刑事法典。“宗教保卫全国联盟”是一个新成立的世俗组织，它发起经济抵制以迫使卡列斯政府取消反教权的法律。最终，教会上下停止了所有宗教服务。天主教会罢工了。

在这次摊牌之前，墨西哥中西部的哈利斯科州(Jalisco)和邻近各州山区的农民起义者开始在“基督王”的名义下向政府宣战。这些基督派叛乱者加入了当时转入地下的“宗教保卫全国联盟”，该组织在1927



1937 年 2 月 15 日，韦拉克鲁斯州奥里萨瓦的天主教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警察突击检查一次秘密举行的天主教弥撒，导致一名女孩丧生。他们举的条幅有些呼吁重新开放教堂。虽然由虔诚的天主教徒发动的基督派叛乱在 1929 年时就已经平息，但在包括韦拉克鲁斯在内的一些州，反教权主义者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严酷斗争仍在持续。

年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基督派叛乱持续了 3 年，消耗了将近一半的联邦预算，夺去了大概 7 万人的性命。此事的后果之一是当选总统奥夫雷贡在 1928 年被杀。那时联邦政府断定军事镇压不会奏效，波特斯·希尔总统在 1929 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开放教党，与之相应，那些冒犯性的法律将不予实施。

事实表明，基督派叛乱只是漫长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当国民革命党在 1929 年成立时，革命者有了可以发动文化革命的新媒介。在波特斯·希尔就任该党领袖期间，他规定每个星期天举行“文化一小时”活动，在每处乡村、集体农庄和工会礼堂中将群众聚集起来欣赏和学习文化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民间音乐、爱国故事、育儿讲座和其他居民感兴趣的话题。这些星期日项目和整个星期的其他活动会通过国民革命党拥有的新电台用无线电向整个国家播送。该党不愿意向教会让出任何

485

阵地,哪怕是在星期天。

就像那一代的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拉萨罗·卡德纳斯是一位道德家,憎恶他认为会使其人民堕落的不良习惯。作为总统,他发起了禁酒运动,并希望发布美国最近尝试过的全国禁酒令。他禁止生产和销售骰子、扑克牌和赌博。在他的任期内,北方边境的赌场和墨西哥城的红灯区被迫停业。

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革命在30年代加速发展。1934年,"最高领袖"埃利亚斯·卡列斯在瓜达拉哈拉发表了被广泛传扬的演讲,他在其中宣告:"我们必须进入并征服孩子的心灵和青年人的心灵,因为他们属于且必须属于(墨西哥)革命。"那年后期,该执政党以"六年计划"贯彻他的精神。该计划宣布,中小学教育应当基于"墨西哥革命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方向和要求"。这份计划打算在其结束之前关闭所有的私立学校。

这份社会主义教育计划是纳西索·巴索尔斯(Narciso Bassols)的智力产物。他在1931－1934年出任公共教育部长,是第一位出任部长职务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索尔斯得到了激进的教师工会、一些激进的州政府和复兴的农民运动的鼓励和支持。他希望墨西哥的教育提供对世界的理性解释,以此打击宗教的蒙昧主义和宗教狂热,同时向孩子灌输集体主义的道德观,从而终结人对人的剥削。

1934年12月,议会修改了宪法,以纳入社会主义教育。卡德纳斯总统把落实该法案的任务交给了新的公共教育部长伊格纳西奥·加西亚·特列斯(Ignacio García Téllez)。虽然新的"社会主义学校"实际上是老的"行动学校"(Action Schools),但现在它们负有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试图对我们的孩子进行真正同情工人阶级和捍卫(墨西哥)革命理想的谆谆教诲,"拉蒙·贝特塔(Ramón Beteta)在1927年写道,"我们希望他们相信土地分配和保护劳工的好处;我们希望他们认识到保护本国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并且推崇工作的尊严。"新的教科书强调均田主义(agrarianism)、劳动的尊严、对待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和新的墨西哥化的民族认同感。以20世纪20年代的努力为

基础，教师特别注重以弘扬爱国和革命的新日历取代传统的宗教日历，新日历上标注了用来纪念墨西哥历史上伟大的男男女女——他们全都是革命者——的国定节日。

当社会主义这个词被应用于教育时，受到了社会保守分子的强烈抗议和抵制，其中包括上层社会的人物、农民、新的法西斯主义者，当然还有教会和僧侣。著名的神职人员把社会主义教育说成是“犹太-共济会的计划”。大主教莱奥波尔多·鲁伊斯-弗洛雷斯(Leopoldo Ruiz y Flores)认为，天主教徒不可以成为国民革命党的党员。对于把孩子送到社会主义学校的农民，教会可能以逐出教会来威胁他们。1935 年，天主教会发表牧函，宣称教会应该“凭借它在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道德信念组织并指导人类的完整生活”。教会的俗人受到结社的鼓励，而且他们也确实组建了天主教行动的协会，诸如“墨西哥天主教联盟”和“墨西哥青年天主教协会”，形成了一条反对“无神论的政权还俗主义(laicism)和荒谬的实证主义”的联合战线。教会的领导人宣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取得(这个国家的)合法的自由”。 486

在一些州里，反教权主义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恰帕斯州州长关闭了该州的每所教堂，驱逐了主教和每一位牧师，组织公开的篝火活动以销毁宗教物品。一部新的州法禁止在地名中包含圣徒的姓名，因而圣巴托洛梅-德洛斯亚诺斯市(San Bartolomé de los Llanos)就变成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市(Venustiano Carranza)。有 17 个州里完全没有牧师。1935 年，随着塔瓦斯科州州长加里多·卡纳瓦尔加入这位新总统的内阁，该州富有战斗精神的反教权运动转移到了墨西哥城。来自塔瓦斯科州的激进团体“革命青年团”(Bloque de jóvenes Revolucionario)的成员被称为“红衫军”，他们在首都设立总部，攻击并在一次冲突中杀害了走出教堂的天主教徒。

墨西哥就快有另一场基督派叛乱了。但卡德纳斯总统说他不打算“重犯往届政府的错误”，尽管他自己反对教权。他对在墨西哥城和塔瓦斯科州的“红衫军”采取严厉的行动。1936 年，在基督派斗争的温床哈利斯科州，卡德纳斯宣称墨西哥革命事业的“根本”性质上是社会和

经济革命。他说:“本届政府不打算发动反对宗教的运动。”当政府的和解政策得到教会的配合时,紧张状态消失了。1938 年,数以千计的朝圣者聚集在墨西哥城,共同庆祝瓜达卢佩圣母显圣 400 周年。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妇女强烈而肤浅地笃信宗教,令许多男性革命者认为给予妇女选举权会推进“反动分子”的利益。在墨西哥革命中出现了力量虽弱但相当执着地争取投票权的妇女运动。然而,从 1920－1934 年,只有 4 个州——尤卡坦在 1922 年,圣路易斯波托西在 1923 年,恰帕斯在 1925 年,而塔瓦斯科在 1934 年——允许妇女投票,其中两个州后来取消了这种权利。

“妇女必须组织起来,”拉萨罗·卡德纳斯在一次竞选活动的演讲中说,“从而使家庭对她们而言不再像是监狱。”妇女就此被组织起来了。1934 年,革命女权运动党支持卡德纳斯,一年后,这位新总统把该党并入了国民革命党。这一举措只是第一步。此后,一些州赋予了妇女选举权,而国民革命党允许妇女成为正式党员,并赋予她们在该党初选中的投票权。

487

因一次在其住所外发起的绝食斗争而受到压力,卡德纳斯在 1937 年向国会提交了允许妇女投票的宪法修正案。1938 年,参众两院通过了该修正案并送往各州审批。那年年末,在得到所有 28 个州的批准之后,该宪法修正案和新的全国选举法在 1939 年被提交国会最终批准。但这项倡议却渐渐失去了动力。到 1939 年,保守派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抵制日益严重,随着新一任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革命者阵营内部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时,卡德纳斯总统即将离职,他的影响力迅速消退。对墨西哥妇女在事关重大的选举中,天然的保守性的旧顾虑导致议会在这一问题上犹疑不决。

不像社会主义教育和妇女选举权那样有争议的是卡德纳斯主义(Cárdenista)中有关印第安人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它被称为“本土主义”(indigenismo)。民间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变得更有影响力,它完全不顾墨西哥早先使印第安人“文明化”并将其变成墨西哥人的目标。莫伊塞斯·萨恩斯指出:“革命的墨西哥已经形成了对印第

安人的新共识。"然而，旧成见的消退相当缓慢。恰帕斯州——拥有土著人口最多的州之一——的"土著保护厅"在 1934 年发起了"裤子运动"，迫使印第安人放弃其传统的服装并穿上裤子。尽管有像恰帕斯这样强硬的地区，但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的知识分子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在推动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和精神解放的同时，保留土著文化的优秀特征和习惯。

虽然卡德纳斯政府在 1935 年 12 月成立了新的全国性的"印第安事务局"，以便推动本土主义的新政策，但支持那个目标的大多数行动来自其他机构。例如，在卡德纳斯下令之前，惠及印第安地区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启动。在奉行卡德纳斯主义的恰帕斯州的新政府中，事关印第安人的政策得到彻底改革。该州土著保护厅将该地区的流动咖啡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土著工人联合会"(Syndicate Indigenous Workers)，终结了对他们的虐待并提高了工资。在雅基人的地区，卡德纳斯和索诺拉州承认土著地方长官的权力，从而结束了由军队实施的殖民统治。

土著教育项目依然归公共教育部管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公共教育部建立了地区性的"土著教育中心"，实际上是住宿学校，以便教育 15－20 岁左右的青少年。1937 年，该部设立了"土著教育局"，监管 33 个地区中心。就像农村小学那样，这些中心偏向初级教育——整体教育。在那里，学生修建自己的住房，照看园地，组成合作社，学习不同的艺术和手工艺、跳舞、歌曲和游戏，使用机械和现代工具。政府希望毕业生能回到自己的村庄将学会的知识付诸实践。 488

墨西哥的 20 年文化革命，以及它在社会运行上的实验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大众深感愤怒，而许多它最忠诚的支持者也因教会和资本主义未被彻底铲除而倍感失望。尽管如此，新的墨西哥出现了。到 20 世纪 40 年代，大多数青年人学会或正在学习读写。有史以来第一次，阅读不再是少数精英抑或小规模中产阶级的特权。墨西哥人对其祖国有了新的理解和评价。此前波菲里奥时期法国化的墨西哥被墨西哥化了，墨西哥自己的人民和传统否定了这种肤浅的模仿。大型壁画现在描绘并歌颂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墨西哥艺术和手工艺、舞蹈和音乐得到发

现、欣赏,并与全世界分享。在许多方面,在墨西哥革命之前便久已存在的塑造这个国家的目标通过这场文化革命而基本得到实现。

重建这个国家也意味着提高墨西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享有真正的利益。不过,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者对社会革命采取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的意见不如对文化革命那样一致。1917 年宪法激发了不同的愿景,而它本身是妥协的产物。因此,两种相当不同的社会革命开始争夺在各州和联邦的优势地位。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全国层面的政策由来自墨西哥北方的人指导。他们的态度反映了他们所在地区对墨西哥问题和革命愿景的理解。北部边境地区是艰苦创业的个人主义者、殖民者和边疆开拓者,还有羡慕并渴望成为庄园主的小农场主的土地,这里并不属于密集的农民社会。对北方人来说,墨西哥革命的目标就是调和阶级利益,平衡农民和地主、乡村和庄园、工人和雇主的权利与利益。对那些索诺拉人来说,"土地问题"更多涉及农业(与生产率有关)而不是耕地(与土地占有和平等有关)。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提高生产力,并以这种方式改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土地改革被视为纠正过往不公的一种方式,而在农民富有斗争精神并被动员起来的地区,那则是一种政治必要。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国家领导权转移到那些来自墨西哥中部的人手上,他们对墨西哥及其革命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他们所处的墨西哥地区往往被称为"旧墨西哥",农民和印第安人居住在那里的高原和山谷中,经常处在庄园的控制之下或与庄园冲突不断。在这里,墨西哥革命的手段和目标更为激进:村庄的福祉要求缩小庄园体系,许多人甚至主张将之摧毁。因此,土地改革对革命事业至关重要,集体农庄被视为农业和乡村社会的未来。

489 有一个问题,两种不同的地区视角趋于重合。他们一致认为墨西哥应该自己掌控国家,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大部分由外资企业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也应该得到权利的保障并且不受剥削。因此,获得政府对劳工权利和组织的支持是该国为独立而斗争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宪法的表述极其清楚:国家拥有和控制本国资源,外国企业必须严

格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工人有权成立组织，举行罢工，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享受八小时工作制，获得部分利润，等等。目标是明确的，但这正是障碍所在。美国和英国都反对革命宪法对财产和劳工权利的重新界定，遂向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以使这些条款无法落实。

卡兰萨在 1915 年 1 月 6 日颁布的土地法（后来被结合进 1917 年宪法）为土地改革确定了基本的指导方针。自由的村庄可以要求重获过去被夺走的土地。耕地不足的村庄可以申请土地拨付，而那些得到土地但还是不够用的村庄可以请求更多土地。不过，在 20 世纪 20 年代，根据这些指导方针，因为这个进程始于各州的土地委员会，不同的州法和州长往往控制着土地改革的速度和程度。更为保守的州议会和州长制订的土地法保护几乎所有最大的庄园，豁免用于种植出口作物的土地。

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地区，神父积极反对耕地管理和改革。更为激进的州政府将这部法律用足用活，把土地改革的进程推到极限，重新分配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地主用所有想得出来的手段抵制土地改革，例如从法官那里得到停止令，控制村庄的领导人，抢在改革之先在家族成员当中分地，给当地农民不需要的耕地，等等。

土地改革既依靠来自下面的压力，也需借助于上层领导人。在农民被组织起来参与武装的革命战斗的地区——主要是墨西哥中部，农民的能动性依旧很强，当地的政治家必须认真对待，否则会迎来相当大的反对。另一方面，在农民的身份主要是庄园的忠实仆从的地方，改革有可能不受重视。1930 年的人口普查揭示，20 世纪 20 年代的改革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在农民积极而州长激进的州里可以看到广泛的土地改革（莫雷洛斯州、特拉斯卡拉州、格雷罗州、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伊达尔戈州[Hidalgo]、墨西哥城、圣路易斯波托西州、普埃布拉州和尤卡坦州），而缺乏这些条件的州则没有实际的改革可言（科阿韦拉州[Coahuila]、新莱昂州、瓦哈卡州、塔瓦斯科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州）。

土地改革并不仅仅是法律、行政管理和政治的进程，而且还是暴力的斗争，在许多地方，这种斗争持续多年才告终。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



1934－1940 年当政的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成为革命时期，尤其是当时的土地改革措施的象征。这幅宣传画表明卡德纳斯试图弥补革命对萨帕塔的不公正对待。画中的三个农民有着浓密的胡须，身着平纹细布衣服，说明他们是艾米利亚诺·萨帕塔的追随者。

代里，农村社会依然是墨西哥革命的战场。地主为捍卫私人财产的“神圣”而经常杀害农民领袖。庄园以自卫的名义组织武装的“白卫队”，而参加农民组织的农民有时会被吊死在路边的树上作为警告。农民则进行反击，焚烧庄园，杀死地主。在一些州里，激进的州长武装了农民民兵。敌对的力量经常在选举期间短兵相接，为控制当地的投票站而战斗。

490

对土地改革来说，总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全国土地委员会必须批准暂时由州委员会划拨的赠地。奥夫雷贡在莫雷洛斯把四分之一的土地分给各村，从而确保萨帕塔运动——即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农民起义——不会再次兴起。从 1915－1934 年，每任总统的政府对土地改革进程的看法恰好证明了国家领导人有多么重要。例如，临时总统韦尔塔在 6 个月里分配的土地几乎与卡兰萨总统在 5 年里分配的一样多。

“新的墨西哥正在建设，而重新分配土地是其基石，”拉蒙·德内格里(Ramón P. de Negrí)在 1924 年这样写道，“我们正在用流血的双手铺设基石，还必须顶住巨大的压力，但我们仍在不停铺设。我们挖得如

此之深，深入这个国家的心脏，从而使这种革命成果永远留存”。1934年，在土地改革实行近20年之后，州和联邦政府向80万名农民和4 000个集体农庄分配了将近1 800万英亩的土地。然而，当人们将这个成绩与农民阶级的总体需求相比，会发现需要做的还有多少。只有约10%的可耕地被分配给新的集体农庄部门。超过200万名农民——村民和常驻的农场工人——依然没有土地。将近三分之二的大庄园和种植园，即大地产(latifundios)，未被触及。这种看起来并不大的成就在地主眼里仍然是激进的，随之而来的大量流血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些地区，曾经强大的庄园体系不再发挥作用，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受到威胁或正在衰落。在这一切发生以后，成功的改革激励村民成立组织并发动请愿。因此，如果没有之前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卡德纳斯在1934年之后急剧扩大的土地改革就不可能进行。

491

虽然那些索诺拉人确实重新分配了土地，但他们将大部分信心和努力放在帮助私人所有的农业上。卡列斯在1926年设立了“全国农业信贷银行”，它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北方的大地主。(在1926年，得到贷款最多的人是索诺拉的鹰嘴豆农场主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卡列斯政权尤其注重修建大坝和灌溉设施，受益者几乎全是墨西哥北方的大规模商业性农业。其他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也旨在推进商业性农业和增加出口，如道路铺设、铁路修复和扩建等。

卡列斯下命令终止了土地改革，奥尔蒂斯·鲁维奥总统使其减速，再加上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土地运动的复兴。来自基层的压力导致上层政策的调整。1931年，全国农业信贷银行重组，以便帮助由集体农庄和小农构成的合作社。该行向合作社发放购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的贷款。一些州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加大了土地改革的力度，但1933年改革的总体速度仍是19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时此刻，农民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执政党内一些著名的土地改革家和领导人物——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格拉西亚诺·桑切斯(Graciano Sánchez)、恩里克·弗洛雷斯·马贡(Enrique Flores Magón)、萨图尼诺·塞迪略和马尔特·戈麦

斯(Marte Gómez)等——走到了一起。依托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米却肯州、奇瓦瓦州、特拉斯卡拉州和其他州的农会,他们在1933年春天组建了“墨西哥农民联合会”(Mexican Peasant Confederation, CCM)。墨西哥农民联合会推举卡德纳斯作为总统候选人,而且参与讨论了刚刚开始制订的准备提交12月召开的国民革命党全国大会通过的“六年计划”。与此同时,它也开始在国会组织卡德纳斯主义的“农民党团”。

这种努力颇有成效。即使是卡列斯也要看清楚风在往哪个方向吹。他在1933年宣布有必要恢复土地改革。在该党大会上,卡德纳斯获得提名。通过的“六年计划”包含了在强化国家监督的条件下分配更多土地的号召。虽然国会在1933年底前修改了宪法第27条,以消除土地改革进程中的任何司法干预,但在1934年初,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总统设立了新的、独立的农业部,立即加速了土地的分配。3月,新的土地法获得通过,使改革进程发生巨大变化。庄园的常驻工人第一次有权申请土地,而生产出口作物的土地也被归入土地改革的范畴。改革得以简化和集中,使总统拥有推进改革的新权力。两年后,国会授权总统征用私人地产和企业。

1935年,也就是卡德纳斯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拨付的土地增加了3倍。他最激进的土改行动发生在1936年“领袖时期”终结之后。在墨西哥北方的拉古纳(Laguna)地区——那是大型棉花庄园的所在地,这位总统开始征用该国商业化农业最发达地区的土地。在拉古纳60万英亩的土地上成立了300个公社型集体农庄(communal ejidos),令3万名农民受益。一旦他们组成合作社,新的“全国集体农庄信贷银行”就会发放贷款,以帮助他们购买数以百计的拖拉机和其他农场工具。类似的行动随后发生在尤卡坦州的剑麻种植园区(1937年8月)、索诺拉州的雅基河谷(1937年12月)、米却肯州库西(Cusi)家族的庄园和锡纳罗亚州(Sinaloa)的甘蔗种植园(1938年),还有恰帕斯州的咖啡种植园地区(1940年4月)。

“我们选择了集体农庄作为我们农村经济的中心,”卡德纳斯的理论家之一拉蒙·贝特塔在1935年如是说。在卡德纳斯的任期内,他的

政府向近 80 万名农民分配了 5 000 万英亩左右的土地，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超过 1.1 万个。土地拨付和农业信贷的发放与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成立相配合。到 1940 年，墨西哥的近一半可耕地由 2 万个集体农庄持有，其成员的人数超过 1 600 万。其中 900 个是公社型集体农庄。4 个世纪演化而成的大庄园体制不复存在。在新的道德规范下，新的农村经济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贝特塔写道，“重要的是人民及其幸福，而不是财富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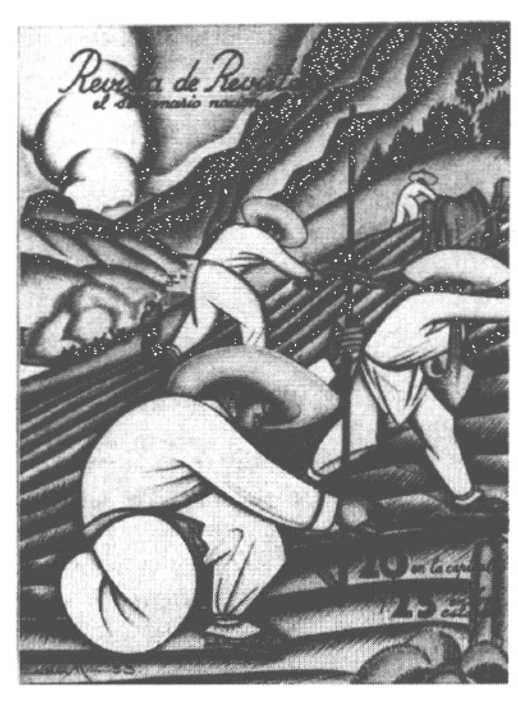
土地改革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墨西哥公民自己掌控的一种墨西哥体制。另一方面，那部革命宪法中有关工业资本和劳工条款主要针对的是外资企业，直到那时，外资企业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直享有特殊的市场准入权利和待遇。墨西哥的矿业、石油、纺织业，以及道路和公用事业全都归外国人所有并经营，他们所雇佣的工人自然是墨西哥人。

索诺拉州的政府相当软弱且地位不稳，它对切实执行宪法有关地下资源权利(subsoil rights)的规定采取拖延战术，从而避免与美国的冲突。全国的民族主义者深切希望将第 27 条溯前应用于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从而使那些油井从公司财产转变为只拥有国家批准的临时开采权。1925 年的石油法预示了这种行动，导致美国政府先是宣告危机，谈论干预，随后展开谈判以迫使墨西哥让步。

493

通过组织工会赋权工人，让政府站在劳工一边，使民族主义者拥有一种不那么直接——从而危险性更小——的对抗手段来消弱外国企业的力量。因此，在 1917 年，在这样一个只有少量工人阶级而劳工运动的规模甚至更小的国家里，劳工在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会急剧改变。但这种变化不会立刻显现。卡兰萨损害了他与工会完全建立在政治权宜基础上的结盟关系，从而促使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在 1920 年支持奥夫雷贡成为总统候选人。那些索诺拉人发现这种新的结盟关系相当有用，因此一旦掌权就开始支持劳工。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工会第一次可以自由组建和罢工，而不会遭到政府反对或镇压。在政府支持并在相关部门获得有利的任职的情况



这是一期《杂志评论》(*Revista de Revistas*)的封面,描绘了几个正在自己的田地里辛勤劳作的农民。对许多墨西哥人而言,革命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他们能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大多数土地是以"集体农庄"(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分到个人耕种)分下去的,这是卡德纳斯发起的改革运动的核心举措。

下,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会员迅速增加。倾向于劳工的调解和仲裁委员会通过与雇主达成有利的协议从而让他们提高工资,这也有助于巩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地位。1925 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获得了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份集体劳动合同。到 1926 年该联合会如日中天的时候,超过 2 000 个独立工会和 75 个劳工联合会(代表了墨西哥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追随路易斯·莫罗内斯及其"官方"的劳工运动。美国劳工联合会会长塞缪尔·冈珀斯[1]指出,任何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都无法像墨西哥那样迅速在资本和劳工之间达到均衡。

494

尽管如此,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不曾成功团结劳工运动,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莫罗内斯想在政府的监管下实现阶级和解,他的政策是支持政府并参与党派政治,这些与墨西哥劳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t)的主流传统相悖。1921 年,工人总联合会(CGT)披上了那件外套,在纺织和石油工人中吸收了大量会员。全国范围内还有天主教和共产主义工会,外加星罗棋布的独立工会。

① Samuel Gompers,历史文献中曾译为龚帕斯。——译者注

所有这些工会都感受到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压力，其中包括暴力、政府的反对，甚至是镇压，因此为其独立性付出了代价。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工会为非作歹的行径可以与美国街头的黑帮火拼相提并论。

虽然政府对劳工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相当支持，但莫罗内斯很快就感到奥夫雷贡没有信守为赢得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选举支持而许下的诺言。议会既没有批准全面的联邦劳动法，也没有设立独立的劳动部。落实宪法提出的那些保障的立法工作被交给各州自行解决，因而造成了相当大的差异。1924年，奥夫雷贡和莫罗内斯公开地相互指责，但政府-劳工同盟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兴盛。在那一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和莫罗内斯倒向了卡列斯总统这边，成为这位新总统最大的支持者，而后者也给予了回报。

1924－1928年的卡列斯任期是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黄金岁月。莫罗内斯被任命为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长，成为墨西哥第二有权势的人。他的影响力可以在1925年颁布的石油法中看到，也可以在1926年通过的反教权法中看到。1926－1927年，他动用联邦军队镇压铁路工人的罢工，那些工人属于墨西哥最大的独立工会。莫罗内斯树立了许多强大的敌人，播下了他自己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走向没落的种子。他本人无疑想在卡列斯之后担任总统，因而反对奥夫雷贡再度参选。当奥夫雷贡在1928年被暗杀时，大多数他的支持者认为莫罗内斯是那次行动的幕后指使。卡列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渐渐疏远了莫罗内斯。

在“领袖时期”阶段，我们不仅看到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垮台，而且看到了政府与有组织劳工的决裂。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及其附属的政党“墨西哥自由党”(PLM)并没有加入新执政的国民革命党。波特斯·希尔总统是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出了名的敌人，他将政府的支持转向独立工会。与此同时，大萧条抹去了在20世纪20年代增加的工资，提高了失业率。正是在这个不祥的时期，议会最终通过了全面落实宪法第123条的劳动法。

第 123 条平衡了劳工和企业的权利与责任,1931 年的联邦劳动法忠实地体现了它的规定。该法用近 700 项具体条款取代了所有的州劳动法。它重申了强制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罢工权利和禁止童工的宪法原则。它也规定了事故赔偿、最低工资和其他更多的方面。它设立了一个进行调解和仲裁的中央委员会和 15 个地区性的联邦委员会,用以解决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争端。两年后,劳动部成为独立机构。

495



1924 — 1928 年总统任期结束后,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仍然是墨西哥国内最有权势的人。虽然他后来在 1936 年被迫流亡美国,但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最高领袖”,就连总统也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虽然事实证明 1931 年的这部劳动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劳动法之一,但它的通过违背了劳工运动的意愿,也违背了墨西哥企业界的意愿。首先,这部联邦法并没有像许多州法那样有利于劳工。它确认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趋势:让联邦政府在工会、罢工、调停等事务中拥有巨大的权力。“领袖时期”的各届政府相对保守,所以它的裁决也是如此。墨西哥城一家重要的美国公司的经理在 1932 年概括了劳工的问题:“只要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站在一起,调解和仲裁委员会就不会令我们感到很为难。”(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当 1931 年英资的托希卡[Toheca]水泥公司解雇工人而不给补偿时,伊达尔戈州没收了这家工厂并向该公司索要赔偿。数年后,该公司的所有权被移交给了一家工

人合作社。)

然而,从总体上看,“领袖时期”的劳工处于不利的地位。随着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衰落和新竞争者的出现,劳工运动进一步四分五裂。1933 年出现了新的劳工集中管理组织——“墨西哥工农总联盟”(CGOCM),其领导人是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前任官员、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比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20 世纪 3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劳工运动更有斗争精神,在政治上更为独立,只有少数例外。然而,政府与劳工之间的任何重新结盟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工人总联合会还是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在 1934 年都没支持卡德纳斯参选总统。

496

尽管如此,有利于新联盟的条件正在形成。国民革命党的“六年计划”采用了阶级冲突的措辞,呼吁加强政府的干预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卡德纳斯就职后解除了对劳工的束缚,此后政府批准的罢工形成了一波浪潮,打击了所有的外资基本产业。罢工数目从 1933 年的 15 次增加到 1934 年的 202 次,在 1935 年甚至超过了 600 次。按照“最高领袖”卡列斯的说法,正是这种“不必要的煽动”和“激进主义的马拉松”导致他在 1935 年挑战卡德纳斯。

此时此刻,电工工会开始组织联合的劳工阵线以支持卡德纳斯政府。1936 年 2 月,参与的工会包括隆巴多·托莱达诺的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无数的独立工会和共产主义的工会,它们创建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在隆巴多·托莱达诺的领导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支持卡德纳斯政府的政策,很快开始在选举政治中与国民革命党联手。卡德纳斯政府用重要的人事任命、补贴和对工资要求的支持照顾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新的联盟就此形成。

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和政府的支持使劳工能动性在 1936 年之后开始表现出真正的增长。随着新合同的签订和卡德纳斯政府落实法定的星期日工资,工资增加了。罢工成为卡德纳斯破坏外国经济力量的楔子。在拉古纳地区,农业工人的总罢工和雇主的固执使卡德纳斯趁机没收了主宰该地区的三大外国公司的土地。后来,美国控制的下加

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卡利河谷(Mexicali Valley)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此后,劳工问题导致1937年的铁路国有化。近一年后,工人经理层成形。在全国范围的其他事例中,无论是在糖厂、矿山,还是在工厂,卡德纳斯政府通过合作社确立了对工人的控制。

最重要的劳动争议发生在1938年的石油业。那个产业的一再罢工把问题交到一个联邦仲裁委员会的手上,后者的裁决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但石油公司拒绝支付提高的工资,并向联邦调解和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当该委员会的裁决有利于工人而那些公司依然固执己见时,卡德纳斯采取了行动。这位总统在1938年3月18日向全国宣布将墨西哥这一实力最强、价值最大的产业收归国有。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张张海报都在欢呼"墨西哥的经济独立"。毫无疑问,这个时刻是墨西哥革命的顶点。

497

"墨西哥就这样给了世界一个大教训!"一首关于这次没收的流行民谣宣告,"通过我们的革命,历史得到了救赎!"到20世纪30年代末,墨西哥的"大教训"不仅包括重新占有该国的土地和资源,而且包括一类新经济的实现,"一套更为人道而公正的生产关系体制,"就像拉蒙·贝特塔所说的那样,"凭借的是支持工人阶级利益的明智干预。"

为了巩固其改革成果并向农民和工人永久赋权,卡德纳斯改组了国民革命党。他把卡列斯的这个充满地方派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完全融合民众主义的大众组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成为劳工部门的基础。为了使农民融入这场运动,卡德纳斯依托老的墨西哥农会成立了"全国农业联合会"(CNC)。党员身份是集体赋予的:所有属于集体农庄和工会的成员自动成为新执政党的党员。除了工人部和农民部,该党还包括军队和一个主要由各州雇员构成的民众部。1938年,该党大会正式批准了这些改革,并决定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党"(PRM)。拥有400万名党员的墨西哥革命党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众党。

1938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展望1940年的总统选举。任

期将满的卡德纳斯总统的力量缓慢消逝，即使他宣布不会干预大选过程也于事无补。他的对头开始组织起来，政治占据了中心舞台，而改革减缓了速度。到20世纪30年代末，墨西哥人认识到这个国家到达了至关重要的节骨眼上。

卡德纳斯主义复兴了墨西哥革命，而这样一来也激活了它的敌人。对保守的领导人和先前的革命知识分子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Manuel Gómez Morín)来说，“1938年的墨西哥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日益发展的右翼也无法忍受，它得到了许多热诚的天主教徒和强大的企业利益的支持。1937年，“辛纳基全国联盟”(National Sinarquista Union, UNS)成立，旨在使墨西哥革命倒退。它是基于大众的天主教运动，是赞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基督派叛乱的衍生物。两年后，更为温和的天主教活动家在大企业的支持下组建了“国家行动党”(PAN)，其领导人是戈麦斯・莫林。右翼也包括反犹太人的法西斯运动，它被称为“反共革命党”(Anti-Communist Revolutionary Party)，领导人是一名前国民革命党领导人，墨西哥勋章最多的将军之一。那时还有墨西哥长枪党、金衫队、灰衫队和“第五纵队”——即德国控制的墨西哥民族社会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依然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希望墨西哥能够顺应“历史的方向”，而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指明了那个方向。

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目睹了右翼是如何毁灭了一次革命。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是两方面的对抗：一边是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另一边是西班牙天主教会和欧洲法西斯独裁者支持的坚定的反革命。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组成了名为“西班牙传统主义者长枪党”(Spanish Traditionalist Falange，一译“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的右翼联盟，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出任党魁。就是它打垮了这次革命。卡德纳斯向革命的共和国[①]提供了物资支持。当它失败时，他欢迎数以千计的西班牙难民来到墨西哥。然而，佛

498

① 指1931年成立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译者注

朗哥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胜利在保守的墨西哥圈子里得到喝彩,后者甚至将之视为卡德纳斯必然失败的先兆。西班牙内战就是意识形态极其分化后造成的暴行,而卡德纳斯知道这一点。

卡德纳斯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两年,同时也是西班牙共和国逐渐走向死亡的岁月里,调整了自己的航向。土地改革的速度减慢了。他的政府设立了"小地产办公厅"以保护小地主。在 1938 年 3 月将石油业收归国有之后,卡德纳斯要求劳工减少罢工活动,从而不会进一步扰乱生产。好斗的反教权主义寿终正寝,社会主义教育被搁置一边,尽管它依然是官方的政策。不过,缓和并不意味着抛弃墨西哥革命。卡德纳斯认为墨西哥革命党会继续保持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改革路线。他会说他留下了"革命的手段"——那确实是强大的手段,"墨西哥靠它会继续自己的解放"。

卡德纳斯总统信守诺言,在 1940 年的大选中置身事外。墨西哥革命党的中右翼政治家将卡德纳斯的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 Avila Camacho)将军推举为候选人,巧妙地赢得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的支持。由此,该党绕过了真正的卡德纳斯主义候选人——激进的弗朗西斯科・穆希卡(Francisco Múgica),而去支持温和的、强调和解和国家团结的候选人。阿维拉・卡马乔的竞选承诺是"巩固卡德纳斯政权的成果"。

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Juan Andreu Almazán)将军是代表反对卡德纳斯的保守派各种利益的另一名军人,他竭尽全力反对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国家统一革命党"得到了天主教会、小地主、城市中产阶级、对政府均田主义不满的农民,以及不少工会和工人的支持。因为阿尔马桑在农民和工人当中明显受到欢迎,墨西哥革命党实施了紧张——而且肮脏——的竞选。两位候选人的追随者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甚至持续到 1940 年 7 月的选举日。卡德纳斯从未支持阿维拉・卡马乔。他希望这次选举自由而民主,但每个部门的首长、州长和地方官员自然会支持官方的候选人。革命家族不会放弃权力。阿维拉・卡马乔被宣布以绝对多数赢得选举,尽管阿尔马桑有可能实际得到了更多的选票。



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常被称为"无名的战士",因为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而他的兄弟马克西米诺·阿维拉·卡马乔则是个招摇的花花公子,还控制着普埃布拉州,他的光芒完全被掩盖住了。虽则如此,卡德纳斯总统却钦点他为革命党的正式候选人,接替自己竞选总统。阿维拉和保守派候选人胡安·卡马乔将军之间的选战非常激烈。阿维拉最后虽然胜出,但普遍的选票作假现象降低了他胜利的成色。

虽然阿维拉·卡马乔政府(1940－1946年执政)公开承诺巩固卡德纳斯政权的成果,但它实际上引导墨西哥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卡马乔被称为"绅士总统",因为他彬彬有礼,穿着得体。他以国家团结和阶级调和的名义结束了"理性教育"和实施它的社会主义学校,走了另一条道路,增加教会学校,并且将学校建设转向城市。不过,在1943年,海梅·托雷斯·博德特(Jaime Torres Bodet)接任教育部长,发起了新的扫盲运动,其中包括印第安人学习中心的双语教育,为州指导中心提供经费,向偏远村庄派出新的文化团体,等等。到1946年,国家致力于使所有墨西哥人接受教育的原则没有引起争议。

另一方面,国家对无地农民的承诺动摇了。与卡德纳斯在任的最后一年相比,1943年的土地分配减少了50%,1945年减少了超过90%。集体的合作农庄缺乏必要的融资,而且在可能的地方,土地被切分为个人田地。公共政策、投资需求和技术变革全都有利于私营农场和商业化农业。

194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农业部设立了"墨西哥农业项目",推广杂交粮食和现代技术。它所导致的"绿色革命"极其有利于商

业农场主(他们的小麦产量最终成为拉丁美洲最高的),但该项目基本上跳过了墨西哥的个体农民(他们的玉米平均产量依然是最低的)。

500 卡德纳斯主义所设想的由繁荣的集体农庄构成的墨西哥乡村被政府偏向工业化的新政策所取代。美国在 1941 年末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墨西哥在 1942 年加入。这极大地刺激了墨西哥的工业,扩充了工业劳动力。在背后争取工业发展的隆巴多·托莱达诺和其他劳工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了罢工活动。墨西哥的实业家组织了强大的企业协会,用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影响官方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用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帮助墨西哥发展钢板和锡板轧制厂。从 1940 — 1945 年,墨西哥的工业部门以平均每年增长 10%的速度发展。

墨西哥的大型工业工会在战争期间眼看着通货膨胀吞噬了增加的工资,随着和平的到来,他们希望自己能在国民收入中获得公平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害怕罢工和提高工资会减慢资本积累的速度,吓跑外国投资,从而破坏工业化。1941 年以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落入菲德尔·贝拉斯克斯(Fidel Velázquez)和其他热切的工贼(隆巴多·托莱达诺被赶下了台)之手,它愿意与政府保持一致。这一趋势可以从它在 1947 年修改了宗旨——将“没有阶级的社会”改为“为了墨西哥的解放”——中看出端倪。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战后兴起,但它更软弱,更依赖政府。它后来落入阿维拉·卡马乔的继任者米格尔·阿莱曼总统(1946 — 1952 年在任)之手。阿莱曼惩罚劳工运动,加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保持低工资。正如他在 1947 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墨西哥需要“秩序和进步的政策”。

卡德纳斯的“革命手段”,即墨西哥革命党,未能阻止这种向右转。阿维拉·卡马乔在 1941 年从墨西哥革命党中去除了军队部,在 1943 年加强了民众部[1],创建了“全国民众组织联合会”,以此作为抗衡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强大的保守力量。墨西哥革命党在 1946 年初解散,重组

---

① 墨西哥革命党是一个集体成员的政党,分为四个部(sector)。分别是工人、农民、军人和民众。前二个都有组织,最后一个也成立了组织。——译者注

为革命制度党(PRI,旧译立宪革命党),同时推进增加其高层领导人权力的"改革"。卡德纳斯的"革命手段"因这些措施而变化,蜕变为政府的选举组织。

在1946年末阿维拉·卡马乔的任期将尽之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写了一篇题为《墨西哥的危机》(*The Crisis of Mexico*)的文章,宣告了墨西哥革命的"死亡",次年发表在墨西哥最有声望的思想评论刊物上。科西奥·比列加斯在其中指出,墨西哥革命的伟大原则已经被玷污或舍弃。4年后,在以西班牙译文发表的《墨西哥:为和平与面包而奋斗》(*Mexico: The Struggle for Peace and Bread*)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坦嫩鲍姆对此表示赞同。墨西哥革命的这段历史批评了阿莱曼的工业化政策,因为它以大多数墨西哥人为代价,造福于范围狭小的少数群体。虽然许多墨西哥人因这位外国人对其革命的"攻击"而愤慨,但科西奥·

501



为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社会党领导人(左)隆巴多·托莱达诺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的新领导人菲德尔·贝拉斯克斯虽然表面上通过这个拥抱(abrazo)达成了和解,但彼此之间仍然敌意很深。随着贝拉斯克在官方机构中越来越得意,并在此后的五十年里主宰了官方工人运动的发展,隆巴多·托莱达诺的立场则变得越来越激进。

比列加斯为坦嫩鲍姆及其结论作出了辩护。

随着岁月的流逝,事实证明科西奥·比列加斯和坦嫩鲍姆是正确的。墨西哥革命的"死亡"并不仅仅表现在群众政治的瓦解、农村学校的关闭、庄园制度的重返,抑或工会的废除,它意味着背离社会的人道愿景,这种愿景强调的是"人民及其幸福,而不是财富的生产"(拉蒙·贝特塔)。这种愿景谴责"机器时代的邪恶",赞美富足的农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理想。它包含的期望是人民最终会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在一份国民革命党的宣言中,这种愿景抨击破坏这种共同利益的"那些资本集中的形式"。它承诺,"如果任何像繁荣这样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墨西哥的话,它的基础应该是工人获取的力量不断壮大"(拉蒙·贝特塔)。放弃这种愿景就要求败坏和削弱正在着手创造这种更好的新社会的制度。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人们设想并创造的是一个不同的墨西哥。在国家农业中,集体农庄越来越无足轻重,而农村的日益贫穷迫使农民迁移到城市的棚户区。人数相对较少的企业团体开始拥有和控制工业、贸易、通信和金融。比例越来越大的国民经济由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拥有,其中主要是美国的资本。私人农田开始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农业公司的手中。大多数工人的工资跑不过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10年又10年,正如连续发表的每一次人口普查报告所证实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502

当设想了另一种社会愿景,并为创造这样的社会而采取破坏性的暴力和建设性的行动时,革命到来了。在20世纪头10年里,墨西哥的革命家为一个更好的墨西哥而战斗。在20世纪20、30年代内,他们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开始进行国家的重建。因此,墨西哥革命是革命的。在20世纪40年代采取的向右转甚至将这种革命的性质凸显得更为清晰。但是,在1940年以后,虽然墨西哥官方继续依靠革命的言论和象征,但却已无法掩盖墨西哥革命已经结束的事实。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它被"陈旧的、毫无意义的话语"替代了。

第十六章　墨西哥与外部世界

弗里德里希·舒勒(Friedrich E. Schuler)

19 世纪法国占领结束后,历届墨西哥政府和马克西米利安的那不合时宜的自由君主政体都曾努力通过吸引外资来带动民族经济发展。这意味着需忍受引进国外专家、技术和投资带来的后果。外部压力表现为傲慢与苛刻的法国债主,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压力以及新近获封爵位的英国石油大亨的操控。墨西哥政府的规划师还要对付来自刚刚统一的德国的商人与金融家,他们被认为较伦敦和巴黎的同行而言不那么帝国主义。然而,墨西哥的规划者们也讨论了来自委内瑞拉和加勒比的流言蜚语,在那里德国炮舰的行为预示着德国也抱着把拉美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带入新的 20 世纪的想法。私下里,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也有这种富有侵略性的向外扩张冲动。毕竟,几十年来墨西哥人曾坚称其对危地马拉和其他小的中美洲国家拥有独特的影响。看来霸权企图并不仅限于欧洲或美国,它既是白人西方“文明”政治的一部分,也被单纯的人类控制欲所激发。 503

外国文化影响与来自伦敦、巴黎或者华盛顿的资本主义经济约束和外交压力同等程度地塑造了墨西哥人的看法。墨西哥的天主教堂一如既往地被西班牙牧师所主宰,宣讲着基于反宗教改革信条的欧洲虔诚信仰复兴的颂歌。随之而来的是对保留西班牙社会、种族和性别等

级制度的坚持以及虚无缥缈但能够鼓舞人和富有罗曼蒂克意味的西班牙文明至上主义理想。也就是说,那些讲西语的群体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几乎在生物学意义上同文同种的单独群体。墨西哥也卷入了19世纪天主教会阻止信徒倒向诸如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等新的和富有吸引力思想影响的全球努力。间接地,教廷对新兴的、更加激进的天主教劳工政策的支持也反映了普埃布拉和蒙特雷等城市的工厂工人的毫无人道而言的工作条件。

在少数大的城市中心,上等阶层的墨西哥人持续努力把一种基于欧洲人道德观念的民族文化强加给本阶层之外的墨西哥人。有时这意味着推动意大利歌剧和模仿巴黎人的着装要求。它有时又表现为在小的作坊推行新行为的形式,有时也表现为不那么虔诚但却更具企业家风范的现代人士对天主教节日的一种正面攻击。波菲里奥政府不断建造标志性的联邦建筑,并设计历史纪念碑和邮票设计以此来赢取墨西哥梅斯蒂索人群体的支持和欢心。甚至于本国的考古学和参加国际博览会也被用于这种目的。社会精英期待着这些新的文化仪式及其相伴的公然的政府象征主义将会把墨西哥从一个墨西哥城主导的、由许多不同的地理区域构成的混合物转变为一个丢弃了当地美洲人遗产并越来越按照欧洲实证主义标准运转的国家。

墨西哥的乡村民众通过文化上蔑视这些做法的各种行动,甚至是偶尔举行的暴动,倔强地破坏这些上等阶层对外国思想的谄媚。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想变得现代,试着在情感上接受工业生活方式,并嘲笑法国式的审美思想。所有那些由近34年波菲里奥发展政策的矛盾导致的紧张把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通过不断增长的挫折经验联系起来。到1910年,来自各阶层的墨西哥人发生了政府及其总统必须改变的声音。

许多当代的外国观察家不理解墨西哥矛盾的深刻程度。无论在1900－1911年波菲里奥·迪亚斯、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和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之间的选战期间政治多么紧张,并有起义爆发,国外观察家把这些解释为在一个他们认为

的文化和政治极为“不文明的”背景中可以预见的事情。他们注意到北方的地方叛乱事件超乎寻常的多，萨帕塔派(Zapatista)在莫雷洛斯反对甘蔗种植园主，以及对墨西哥城城市革命谋划者秘密组织的镇压。但他们用这些也不过是另一场“拉美暴动”的陈词滥调来安慰自己。外国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最初把这些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挑战看作是扩展其经济地盘的机会。现在，他们认为不满的、不和的墨西哥精英可能会对外国经济利益作出新的让步，并可能降低他们的竞争者的影响力。比如，美国的石油利益强化了马德罗对英国石油的保留态度。巧合的是，这种态度转变成德国金融影响在日趋巩固的马德罗阵营中的上升。毫不奇怪，英国和法国公司支持墨西哥城的现状，希望波菲里奥士兵的铁拳和乡村的民兵组织最终取消美国和德国的所获。

505

相反的，墨西哥地区革命的领导者对他们与外国利益的联系要现实得多。对潘乔·比利亚来说，进入美国内陆地区的通道确保了美国武器流入他和其他奇瓦瓦反抗者手中。对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来说，临时性地流亡到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提供了避难场所和使那些之前随他挑战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城市政治改革者转向与奇瓦瓦的反抗势力结盟。莫雷洛斯的萨帕塔派因极度缺乏国外支持而著称，结果在莫雷洛斯发生的一次种族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到政府的全面镇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尤卡坦半岛与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有利可图的联系巩固了社会与政治现状，因此避免了持续的革命运动的爆发。

墨西哥的反抗者领会到，获取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联系与获得资金、武器和进入后勤腹地同等重要，如果他们的反抗不仅想要持续几天，想要坚持更久并有机会反对墨西哥城政府的话。对于墨西哥城的反革命势力来说，控制墨西哥城的港口和来自英国石油工业的持续税收为发起加速的现代化和军事部署提供了充足的金钱。

波菲里奥时代在1911年的政治崩溃和墨西哥各地革命者对武器回购和加入马德罗新创建的联邦政府军队的厌恶告诉国内外的观察家，墨西哥正在发生完全不同的东西。很清楚，这些发展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反抗或者国内竞争对手间的可以被国外商业利益利用的斗争。

国外利益和国内精英均意识到需要停止低等阶层持续扩展权力及其不断增加的缺乏引导的政治行动。

不同阵营对问题解决之道的建议相差很大。欧洲政府和公司的代表倾向于直接的暴力镇压,同时毫不奇怪地支持那些他们认为将成为新波菲里奥、打击北部和莫雷洛斯反抗势力的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式的反革命势力的人。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持中间立场,他最遵从自己的目标并无视新当选的白宫领导人伍德罗·威尔逊的指示。他仍然在促使韦尔塔将军发起反对马德罗政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政变中那位墨西哥总统和他的副总统被暗杀。

在华盛顿特区,威尔逊总统开始将墨西哥的发展视为把拉美转变为美洲又一民主治理区域的模范,但这只是他的理想主义和天真的想法。在试图控制韦尔塔的几个月努力失败后,或者至少未能与其达成权宜之计后,威尔逊总统转而成为韦尔塔正在形成的军事独裁的一名坚定的反对者。在选择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威尔逊转而支持北方立宪派的革命联盟。威尔逊的普世主义理想把冲突升级为一个地区性的拉美问题。

506

1914 年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随后对大西洋海域实行的经济封锁再次重构了墨西哥革命的国际环境。对欧洲人来说,墨西哥的石油储藏和地理上接近美国预示着把控制革命派系作为剥夺对手宝贵战略资源和未来战争人力的间接工具。比如,德国战争策划者详细探讨了对一场可能的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如何把美军阻滞在墨西哥并因此确保美国在大战中保持中立。同时,蓄意破坏墨西哥油田可以阻止英国海军获取防卫德国的一种重要燃料。反过来,英国战争策划者就他们如何保护英国在墨西哥的石油开采在未邀请美国公司竞争者帮助的情况下免受德国攻击进行讨论。对于英国海军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对大西洋运输线路的控制,确保关键的燃料资源不被剥夺。

也存在着是否以及如何把美国拉出中立并进入盟军一方作战的问题。把美国放在盟军一方必然在数月内颠覆针对德国的战略平衡,并

阻止德国上升到世界大国的地位。美国的策划者密切关注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代理人在不同墨西哥革命阵营中的活动。尽管原因不同，墨西哥革命的持续是所有主要国外强权的利益所在，因为此时，墨西哥国内就国家发展问题而起的冲突已经成为一个美墨双边问题、拉美各国关注的问题和欧洲和美国军事战略家们需要考虑的日趋重要的附属事件。

墨西哥反抗者也认识到他们增长的重要性，反过来尽力以最高的价钱出卖他们的参与。短期的军事收益开始取代国家长期的政治计划。对于立宪主义者来说，革命的国际化为他们在墨西哥城武力反对韦尔塔独裁提供了关键的国外盟友。当威尔逊总统命令在 1914 年出兵进行有限干预并现身韦拉克鲁斯州时，维多利亚诺·韦尔塔总统遭受到决定性的羞辱。最终，国内革命和美国反对的联合压力迫使他接受谈判结束其试图倒转墨西哥政治时钟的努力。敏感的国际形势要求威尔逊总统与每一位主要的革命派系进行接触以决定韦尔塔的继任者。最后，不断扩大的世界大战和欧洲势力与革命派系的联系使得美国人很难挑选出一名墨西哥总统。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反而在确保总统竞选中成为协调者。意想不到的胜者是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对威尔逊来说这当然不是一名让其感觉舒适的候选人。在卡兰萨成为总统后，革命的性质演变成之前团结的反韦尔塔革命阵线成员间的内战。此外，墨西哥没有参加革命的地区被卡兰萨的追随者占领，被迫将其地区政治和经济与墨西哥城的变化保持一致。

507

墨西哥国内斗争的加剧仅仅为幕后的欧洲和美国继续操纵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威尔逊总统对卡兰萨在墨西哥统治的不情愿但又不断扩展的支持使潘乔·比利亚感觉到被背叛，决定侵犯美国的领土主权并于 1916 年 3 月 9 日攻击美国边境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等小城。比利亚希望以此达到双重目的，既让广大民族主义者不再支持卡兰萨，又挑动美国入侵墨西哥。这样的话，一旦美墨发生冲突，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卡兰萨政府的缺陷就会暴露无遗。比利亚期待着卡兰萨注定的无

助能够实现比利亚反抗者在北部的复兴。届时比利亚将同时与卡兰萨和美国做斗争,希望能够重新进入争夺总统的战斗。在这种挑衅计划下,德国秘密卷入的谣言比比皆是。

比利亚的行动未能挑起美墨之间的全面军事对抗。然而,愤怒的美国舆论要求威尔逊总统采取一些公开的惩罚行动打击比利亚侵犯美国领土主权和杀害美国公民。威尔逊选择通过派遣约翰·潘兴将军和10 000名士兵带着抓捕潘乔·比利亚的任务讨伐奇瓦瓦来抚慰民众的反墨情绪。在之后的几个月,比利亚逃入奇瓦瓦州的崇山峻岭中逃避美国的追捕者。更加重要的是,卡兰萨扭转了危机,重新处于有利地位。令人意外的富有侵略性的外交、对抗性的高压政策和驻守卡里萨尔(Carrizal)的坚毅的墨西哥士兵导致了美军的撤回。潘兴将军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被在美国边境墨西哥一侧的长期扎营以及其后的令人印象深刻但却不合理的得胜回朝所掩盖。卡兰萨和威尔逊之间的关系经受了持久的破坏。卡兰萨认识到未来几年很难期望从美国那里得到重建他的国家所需的任何经济与政治帮助。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它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话,也只剩德国可能成为卡兰萨政府的朋友了。

1916 年爆发的德国与英国、美国之间的无限制的海战仅仅确认了墨西哥冲突对欧洲列强的持续的国际重要性。德国人在思索如何使美国无法使用在美洲的资源,不能将其部署到欧洲去。可供考虑的一个选项是创建德墨军事联盟,把墨西哥转变成美国的敌国。德国通过提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归还墨西哥在 19 世纪中期美墨战争中丧失的领土来努力诱使卡兰萨认真考虑这个选项。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与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海因里希·冯·埃卡特(Heinrich Von Eckardt)关于这个选项的讨论被英国情报部门截获,让盟军幸运地获得一个将会被 20 世纪铭记的宣传武器。[①]所谓的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布加强了华盛顿政策制定者对卡兰萨的忠诚

508

① 原文关于阿瑟齐默曼是德国驻墨西哥部长和亨尼希·冯·艾克哈尔特是德国外交部长的描述有误。——译者注

度以及他民族主义背后可能动机的深深疑虑。毫不奇怪,卡兰萨在战争中坚持墨西哥中立被美国国会解释为代表德国利益的非交战政策。对墨西哥更具破坏性的是,美国随后拒绝为卡兰萨重建受内战折磨的墨西哥提供救济和帮助。

卡兰萨并未把墨西哥的真正利益与德国卷入混为一谈。他对德国把墨西哥仅仅看作美国的后门、潜在的战略地带和利用墨西哥的战时中立作为秘密攻击的理想集结地已经不抱任何幻想。然而,卡兰萨不能简单地拒绝德国的提议。任何对德国的公开消极态度都可能引发德国代理人放弃对墨西哥感受的认真考虑并发起对油田的破坏行动以损害盟国海军的战争能力。最可能的是,油田的破坏行动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这将会导致墨西哥成为一个盟军与德国进行战争的纯战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余下的时间里,德墨关系维持了官方的友好和接触。同时,华盛顿的美国观察家们继续把任何德墨互动描述为国家安全事项并考虑在德方特工能够到达美国土地前在墨西哥对抗德国力量的可能性。只有到 1919 年德国战败才把墨西哥与卡兰萨从这种非常危险的地缘战略困境中解脱出来。

现在看来,卡兰萨的确称得上是 20 世纪墨西哥最伟大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在最困难的革命环境中,他成功地保持其国家和国民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军事卷入德国或者盟军中的一方。他极富技巧的外交防止了一场毁灭性的美墨战争或者美军在墨西哥土地上更长时间的存在。与此同时,他成功确保德国人相信未来与墨西哥合作的利益以免对墨西哥境内的英国和美国石油工业的破坏。他也孤立了奇瓦瓦的潘乔·比利亚及其德国操纵者,此外还通过外交、宣传和非常象征性地展示墨西哥的军事勇气与美国总统威尔逊进行有力对抗。在这种极易引起争论的背景中,他和其他革命派系的代表通过了 1917 年宪法,这为继任的总统们实现墨西哥对国家领土和国内自然资源真正主权奠定了法律基础。

最后,卡兰萨发展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卡兰萨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引领了 20 世纪头几十年间的墨西哥对外关系。它最重要的观点

509

是拒绝门罗主义,要求外国尊重墨西哥的经济和领土主权,坚持所有外部强权接受不干涉拉美的概念,以及最后一点,强调与欧洲和拉美国家谈判形成同盟以平衡墨西哥与美国接壤这一地缘命运的不利局面。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卡兰萨打破了波菲里奥的放任政策,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民族主义的与温和的墨西哥后革命议程,形成了本国应对国际上因帝国主义扩张和百年来欧洲列强竞争形成的挑战的解决之道。

卡兰萨对墨西哥应自我定义的固执己见式的坚持被证明是及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拉美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而且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承认了门罗主义在拉美的有效性,拒绝援助拉美国家反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短视和浅薄的大棒与金元外交政策。

到 1921 年,潘乔・比利亚从革命中退出,萨帕塔和卡兰萨被暗杀以及威尔逊从白宫离开为墨西哥与美国的代表形成一种更加密切、更富建设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接下来的四年对于革命后墨西哥新兴的国家来说仍然与之前的年代一样困难。新当选的共和党总统沃伦・哈定与威尔逊的普世主义和道德决定主义彻底决裂,减轻了民主可以在革命后的墨西哥一夜间实现的天真认识的影响。然而,美国转向孤立主义带来的可能好处没有实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带有仇外色彩的移民辩论背景下,美国对墨西哥人的种族歧视还在继续甚至加剧。共和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放任立场使美国与墨西哥的双边关系更加困难。既然美国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华盛顿许多自由放任政策利益团体的其中之一,美国与墨西哥的联系就会有许多可能性,甚至到产生破坏性混乱的程度。美国国务院,沙文主义和好战的反墨西哥的内政部长、参议员艾伯特・福尔,美国商务部,美国陆军和海军,美国财政部,白宫,美国新教团体,美国天主教会,与教派无关的宗教团体,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的私有银行(特别是摩根公司),美国矿业,美国商务部国家商会,中小型美国企业,美国报业集团,或者是美墨边境美国城镇的市长,各方都宣称自己是唯一代表美国权威立场的一方,要求新一届由

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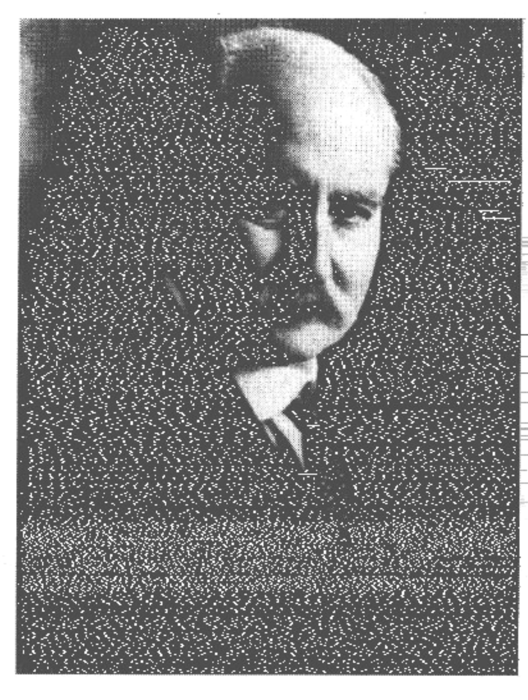
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为首的墨西哥政府满足各自所代表的特殊群体的利益。革命后的墨西哥国家如何能够确定在美国的权力靠山或者在这种环境下游说获得外交承认？墨西哥城"索诺拉王朝"的权力不再稳固，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各方又有必要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的策略，与墨西哥具有潜在影响力的团体形成联盟，这再次为美国操纵者挑战和破坏奥夫雷贡总统创造了无数的机遇。

几年来，艾伯特·福尔成功地从内政部主宰了美国官方的外交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因为被控在1923年蒂波特山(Teapot Dome)石油丑闻中受贿而被免职。在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的支持下，福尔努力迫使奥夫雷贡接受一项无法忍受的外交补偿：美国以外交承认墨西哥换取1917年宪法第27条的废止，该条赋予国家底土权。美国和欧洲的银行界也注意到墨西哥在这一时期困难的金融形势，希望以当前采用的拒绝外交承认手段将会带来更加有利的墨西哥外债解决办法。波菲里奥和革命时期他们已经成功地这样做过。同时，福尔和那些跨国企业遇到来自美国中小企业、商会和美国边境地区市长的激烈反对。他们这些人支持迅速承认墨西哥以引发墨西哥经济的重振，他们寄望这种重振能够增加与墨西哥的批发与零售业务。赫伯特·胡佛领导的商务部也支持迅速的外交承认。

奥夫雷贡政府以一种三管齐下的外交政策方法作出反应。获得美国的外交承认和债务清偿是一个优先事项，因为欧洲的外交承认会随之而来，墨西哥也因此可以重新正式进入国际政治机构中。这意味着采取抵制外交压力，而在无关大局的问题上作出可以接受的妥协的策略，这样既从原则上维护了1917年宪法中申明的墨西哥民族权利，同时也根据现实以暂时让步保持开放的立场。在美洲，奥夫雷贡努力影响泛美联盟的发展以避免创建一个美国能够向拉美传递其优先政治立场的排他性机制。只要位于欧洲的国际联盟尊重门罗主义，向这个全球性的国际机构申请成员身份毫无意义。

最后，墨西哥在中美洲地区的传统优势再次浮出水面。这次墨西哥支持那些能够引发拉美第二次成功社会革命的个人和社会运动，由

511 此结束墨西哥在拉美保守主义精英中的政治孤立。总之,集中为新生的革命后国家创造国际合法性的长期战略开始取代那种革命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典型的短期对外关系。然而,与他们在苏联的革命兄弟不同,新生的墨西哥革命国家的外交家接受了百年习俗和西方外交游戏的规则。



艾伯特·福尔是美国总统沃伦·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在墨西哥的商业势力,尤其是石油利益的代言人。他在美国由于蒂波特山石油丑闻而失去公信力后,就不再成为美墨之间合理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

在1910－1917年间,革命的动荡性已经使由一个地点来执行统一的墨西哥外交政策变得不可能了。内战的压力,加上变换的联盟和与外国操纵者间持续变化的联系,已经使对外关系派系化了。与他国的联系必须通过各个叛乱团体的地区总部和墨西哥城无所适从的外交部。比利亚、萨帕塔、韦尔塔、卡兰萨和奥夫雷贡的私人特使都曾为了他们领导人的特别利益完成过独立的私人任务。1920年之后,奥夫雷贡面临着不同的背景。韦尔塔的出逃,萨帕塔与卡兰萨的遇刺以及潘乔·比利亚撤回奇瓦瓦从事牧业使得在一个中心位置重建外交制度成为可能。奥夫雷贡委任他的亲密助手爱德华多·帕尼(Eduardo Pani)负责在墨西哥城恢复外交部。帕尼为外交部获得了一笔永久性的预算,并以优厚的养老金系统地从城市小中产阶层中招募受过良好教育

的成员。他为职业规划制定了标准，发布了公务员的规则，并规定了低级别外交人员的责任。这也包括在那个层面上减少任人唯亲现象。更高级别的墨西哥大使绝大多数仍然是政治任命，他们在国外可以自己的风格行事。接下来，帕尼在华盛顿、汉堡、柏林、日内瓦、伦敦和巴黎购买了使馆建筑，在这些第一世界国家的城市中，以第一世界的风格代表革命的墨西哥。

奥夫雷贡灵活多变的方法在早期部分取得了成功。墨西哥的外交家与美国商业集团和美墨边境的其他人形成了重要的联系。美国的知识界和艺术家也支持奥夫雷贡，呼吁取代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同时，墨西哥的财政部长阿道弗·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在纽约与以摩根集团首席谈判家托马斯·拉蒙特为首的国际银行家就革命时期的债务进行了谈判。不幸的是，德拉韦尔塔是一名政治家，不是一名国际金融专家。因此，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家获得了显著的优势。奥夫雷贡从这次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是革命政治家未必是好的国际金融谈判家。正如波菲里奥时期国家需要专业的科学顾问一样，这个革命后的新国家需要专业人士在国际外交、经济和金融界代表它的利益。墨西哥国际经济和政治谈判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已经开始及时地应对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

在有关外交承认的谈判中奥夫雷贡表现很顽强，拒绝对来自美国国务院、福尔参议员或者外国石油公司的威胁和骚扰让步。他不能对墨西哥法律主权的侵犯让步，并激起墨西哥地区许多相对独立的革命军阀的敌意。而且，离下届总统选举仅仅只有几年时间。美国干涉带来的墨西哥民众的敌意犹存，这阻碍着奥夫雷贡为了实现墨西哥国家的重建而追求与美国建立一种较少民族主义、更加务实的关系。最终，奥夫雷贡的冒险成功了。

当福尔参议员因蒂波特山丑闻而名誉扫地，德拉韦尔塔在1924年总统选举前夕发动危险的全国范围军事叛乱挑战奥夫雷贡时，美国国务院改变了航向转而承认了奥夫雷贡政府。奥夫雷贡做出了事实上的让步，其中许多实际上对墨西哥大众来说在感情上是充满争议和令人

不快的。但同时,他顶住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相当大的外交与大财阀的压力,保全了1917年宪法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奥夫雷贡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的国内对手,则视美国为关键性的资源。地方军阀不得不承认,尽管美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墨西哥总统,但确定无疑的是没有一位墨西哥反对派领导人可以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情况下,成功挑战卡列斯。这次,美国军队和政府通过关键的军事支持和外交承认带来的独特合法性保护了墨西哥的现状。奥夫雷贡成功地把1917年宪法作为强有力的法律工具完整地交给他的继任者,进一步巩固了墨西哥的经济主权。现在墨西哥已经持续获得国际外交和金融界的承认,从此以后较少受美国国内关于墨西哥的令人迷惑的和相互矛盾的想法变动所带来的折磨。尽管在这些年代里,国内经济重建受损、墨西哥民众的贫困加深,这个革命国家却成功地把反革命的西方外交当局的立场转向承认拉美的这个政治体制,该体制的掌权既不是通过君主世袭也没有通过民主投票箱。从那时起,随着墨西哥成为泛美联盟的确认成员,新当选的卡列斯总统可以把墨西哥争取合法性的斗争与革命运动带入拉美的外交环境。

513

既然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在拉美发挥影响力的首要外国强权,门罗主义作为界定含糊但却有效的工具不得不遭受较之前更多的挑战。墨西哥外交部长赫纳罗·埃斯特拉达(Genaro Estrada)把外交承认这一熟悉的主体带到了新的高度,要求未来任一新的政府都应得到外交承认而不论它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这一倡议成功,墨西哥将因此可以使任何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获得承认,并结束它在拉美的持续性政治孤立。因此,美国和拉美保守主义国家的一项主要政策目标将会遭受失败。通过外交和公开的政治手段将不可能阻止在墨西哥-危地马拉边境以南出现一个革命性和替代性的墨西哥。埃斯特拉达的努力是大众力量、农民和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行为体自由进入20世纪拉美政治必须予以承认的一个注脚。

卡列斯总统在中美洲范围内走得更深。基于他的个人倡议,开展

了一场富有攻击性的反对美国炮舰外交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加勒比与中美洲的行为的宣传攻势。墨西哥还与古巴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一时期这个加勒比岛国正在努力重新定义其与美国的关系。此外，卡列斯用行动支持外交和宣传，例如向尼加拉瓜革命者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asar Sandino)提供支持及其后的政治庇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处理墨西哥国内政治时，卡列斯却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使用恐吓与暴力手段以避免在国内出现替代性的政治选择。

当他在卡兰萨总统手下担任索诺拉的州长时，卡列斯曾热衷于努力消除当地天主教会的残余影响。他采纳的19世纪墨西哥反教权论与梵蒂冈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复兴天主教制度与权力的努力正好撞上。因应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自然科学以及后来的俄国革命，教皇曾支持发展更为激进的天主教劳工政策，希望在工业化国家和拉美城市中心的工人和雇员中重新获得影响力。对革命后政权来说更为恐惧的是基督派运动在墨西哥心脏地区和西部获得了大量的民众追随这一现实。这次运动的神秘主义使其最终难以取得实效，只是一种面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剧变、农业商品化、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和随壁画家革命象征主义出现的文艺创新等产生的心理保护和慰藉方法。千禧年主义、社区精神和天主教制度复兴的结合承诺了强有力的慰藉，因此对于一个遭受了20世纪20年代苦涩和持续暴力的国家来说，是其重建政治一个严重的挑战。 514

卡列斯使用1917年宪法的法律规定迫使既有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与梵蒂冈直接对抗的程度。比如，可以主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神父的数目被削减，西班牙出生的教会领袖被诋毁为外国反墨西哥势力，并且最重要的是卡列斯振兴了19世纪贝尼托·华雷斯总统的努力，即建立独立于罗马和仿效亨利八世及其圣公会的墨西哥民族教会。梵蒂冈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与西班牙出生的教会领袖一道，暂停了宗教服务。许多神父为其生命担忧，放弃了教区而在墨西哥大的城市中心和美国边境通过隐姓埋名寻求保护。对那些天主教仪式和实践仍然是他们信仰体系基石的墨西哥人来说，他们被困在由梵蒂冈和国家官所代表的两

个极端之间。洗礼、婚姻、忏悔和殡仪服务的缺失与乡村节日和庆典取消地方守护神,激发了一种大规模的大众心理危机。立即,这种对抗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成自1810年墨西哥独立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三次最激烈的内战。斗争的焦点是墨西哥地区的传统习俗与位于墨西哥城的政府施加的现代化压力。随后的基督派血腥反抗持续了3年,耗尽了革命后国家的储备,迫使国家经济发展再次放慢速度。

除了梵蒂冈,美国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其他宗教人士也成为在墨西哥国外支持基督派对抗卡列斯政府最重要的压力集团。这次运动代表了美国干涉墨西哥事务的一种不同类型。从基督派反抗开始,美国派往墨西哥的大使必须代表美国公众对墨西哥境内破坏宗教自由的关注。那些从未听说过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斗争复杂性的美国公民,把墨西哥的事件等同于发生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教权论。突然,美国的新教和天主教会发现他们与那些激进的、非常保守的大商业团体站在一起,这些团体很乐见卡列斯陷入另一场国内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可以被用来削弱墨西哥解决对宪法第27条挑战问题的勇气。最终,卡列斯不得不认识到在迫害相当一部分墨西哥人的同时,他不能继续国家重建的计划。逐渐地,宗教冲突在接下来的几年减弱了,双方都暂时采取一个权宜之计。宗教服务缓慢恢复,西班牙在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存在被削弱,而对神职人员的暴力迫害被终止。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总统才公开确认其天主教徒身份。教廷与革命后墨西哥国间的外交关系的决裂一直持续到1992年。

515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卡列斯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接触较少争议。苏联声称它进行的是20世纪首次和唯一真正的革命,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说法对墨西哥的革命后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建设计划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象征性挑战。墨西哥的革命宣传声称,因为民众所有的苦难都正在被革命后国家解决,墨西哥境内未来不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当时那些来自共产国际的威胁是次要的和潜在的,卡列斯在应对这一挑战时比他在处理天主教问题时拥有更好的技巧。首

先,他支持将墨西哥虽小但正在成长的产业工人组织纳入保守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工会运动。很快,卡列斯的劳工领袖路易斯·纳波莱昂·莫罗内斯(Luis Napoleón Morones)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同化式工会结构,系统地对抗独立的替代性工会和汇集一小部分利益给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站在一起的劳工群体。

在墨西哥的农村地区,农业工人浓厚的天主教情结使得苏联式的组织徒劳无益。同时,苏联通过派驻其在别国的首任女大使到墨西哥旅游,主张女性更大的权利和解放,以此挑战墨西哥的传统性别角色。有一种至今尚无根据的说法,称苏联官员的兴趣是利用墨西哥国内的紧张使美国变得不稳定。然后,墨西哥用一个小的事件作为借口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墨西哥政府为此没有牺牲什么,只是给美国内部那些关注共产主义活动影响的集团以深刻的印象。

德怀特·莫罗(Dwight W. Morrow)1927年作为美国新任驻墨西哥大使的到任为美墨双边关系带来了显著的改变。与1924至1927年间的詹姆斯·谢菲尔德(James Sheffield)大使不同,莫罗偏爱静悄悄的非冲突性的外交方法,把两国间严重的紧张局势带到民族主义公众的视线之外。在卡列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莫罗与墨西哥总统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把困难的讨论放入国家宫的里屋。在公开场合,莫罗避免指出分歧并强调两国之间的共同性。这种特殊的大使-总统关系成为美墨外交的固定程序,一直持续到接下来的三届政府。赫纳罗·埃斯特拉达这位在1930年擢升为外交部长的娴熟职业外交家的出现帮助了莫罗。卡列斯、莫罗和埃斯特拉达一道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实现了墨西哥对外关系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墨西哥对外关系走上了全球舞台。在20世纪2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集中关注美墨问题和泛美联盟之后,墨西哥开始准备获取它在位于欧洲的国际联盟的成员资格。 516

这一发展恰逢美国股市在1929年10月的崩盘和随后的萧条。从那时起,美国的政治注意力重新聚焦国内议题,而且美墨关系面临的压力进一步缓解:尽管早期的国际联盟曾经尊重门罗主义以及美国在拉美的主导地位,但它现在在西半球内变得活跃。此外,大萧条迫使英



虽然美国大使德怀特·莫罗(右)曾是在摩根大通的华尔街银行家,但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中)认为他是一名温和派政治家,并力图排除影响美墨两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莫罗在结束基督派运动的谈判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和卡列斯一直定期会晤,即使在卡列斯总统正式卸任后依然保持。

国、法国和德国忽略了在拉美的大国对抗,而把国内问题作为他们本国的首要政策问题。突然地,开展独立行动的新空间对墨西哥开放了。正如泛美联盟之前做的一样,国际联盟现在在西半球挑战美国,稳固了墨西哥作为格兰德河以南唯一革命国家的一直不太安全的地位。

墨西哥无条件尊重国家边界和自决权的箴言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越来越多地得到共鸣。对国家边界的侵犯已经不再限于美国、西欧与拉美的关系。在亚洲和东南欧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很快转变成侵略性的专制帝国。结果,墨西哥外交家在抗议美国和英国在赤道以南野心的同时,开始攻击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行为。墨西哥驻国际联盟大使也在南美国家范围内的国内冲突中扮演起调解角色。这些场合总是墨西哥在拉美国家中加强政治和社会独特性想法的可喜之机。因此,墨西哥的外交家在国际劳工问题、妇女权利、拐卖妇女、环境问题和 1932 — 1935 年巴拉圭与玻利维亚间查科(Chaco)战争调解委员会中变得活跃。

517

墨西哥的经济规划者视大萧条为那个世纪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观察到所有传统的振兴国家经济的经济措施正在如何失败。渐渐地，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替代物成功挑战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好像变得可能。在国际联盟的墨西哥外交家对20世纪自由国家面临的这场危机做出的反应是在墨西哥背景下思考其他国家的教训。他们研究了意大利的汇率实验，英国使用的新的、未证明的赤字消费工具实验，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国家指导工业化的实验，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性效应，以及最终的美国新政。明显地，这个革命后国家也必须找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来应对国际农业贸易的急剧削减和外国对墨西哥发展投资的持续缺乏。

在这个背景下，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Abelardo L. Rodríguez)于1932年担任墨西哥总统。当他到墨西哥城执政时，他能够依赖1927年已经创建的国家金融机构，以及现有的各部，它们曾努力把墨西哥农业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强化国家对地区农民组织控制的新手段。1933年，罗德里格斯指示外交部长何塞·曼努埃尔·普伊赫·卡绍兰克(José Manuel Puig Casauranc)进行外交部第二轮重组。其目标是把墨西哥的驻外领事和外交官转变成热心经济和发展的新人。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外交部长爱德华多·帕尼(Eduardo Pani)的改组已经把外交部锻造成对抗美洲地区反墨政策的国家工具，普伊赫·卡绍兰克把重点转移到对提供专业性报告方面的加强，以帮助国家在今后几年扮演民族发展中心代理人的角色。外交部正在转变成一种信息服务机构，系统地观察世界的发展和讨论其对墨西哥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外交部从国外引进了外交报告的专业标准和发布时间表。有时，外交部长本人编辑和评估外交报告以提升来自国外的政治和经济信息的品质。待发表的报告中常常包含关于外国经验优点与弱点的分析，以便墨西哥能够正确评估欧洲局势。逐渐地，外交政策和贸易决定受到专业信息的影响与受到总统和其他墨西哥政治要人的政治倾向的影响一样多。表面上，革命后的话语持续主宰着日常事件；

518

然而在幕后，专业人士和技术专家已经和政治家在一道处理国家事务。

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经由旅游、文化、文艺、音乐和其他艺术等途径发生的基于私人的美墨互动充实了墨西哥在外交、金融、军事、经济和政治上与世界的外部联系。墨西哥与世界的持续繁荣的文化对话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已经开始，当时革命暴力阶段的结束使诸如弗兰克·坦嫩鲍姆和卡勒顿·比尔斯等美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到墨西哥旅行成为可能。美国公民为应对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压力可以在墨西哥寻求庇护和替代选择。表面上，墨西哥的革命后社会似乎提供了替代性政治方向和比美国消费文化提供的更加深刻、更富意义的感情满足。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赞助的考古学家和科学家成为建立这个早期学术和新闻文化桥梁的团体成员。当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在完成他著名的跨大西洋飞行后对墨西哥进行航空测量时，他的飞机被美国媒体作为一项融合科学工作和旅行的创新性、有用的工具而广为宣传。在芝加哥百年进步展览上，从墨西哥蒙特·阿尔万(Monte Albain)七号墓发掘的黄金和珠宝让美国公众对墨西哥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华盛顿和纽约等站举行的更多展览传播了有关墨西哥的第一手经验。并且革命后墨西哥的关于印第安人社会对当代文化贡献的公开讨论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兴趣。

墨西哥的艺术发展与美国艺术界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不断扩展的、多面向的文化相互联结的独特篇章(参阅第17和20章)。墨西哥的壁画运动，特别是迭戈·里维拉和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的画作，向美国的艺术家们介绍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现代主义、抽象主义和缺乏政治参与的艺术形态的有活力的替代选择。墨西哥壁画因其色彩使用和表现形式的独特风格，让普通观众深受感染，同时也是有力的社会政治声明。随着考古发掘中前西班牙艺术品的发现，美国艺术家视墨西哥为艺术形式和设计的一个灵感。正如非洲艺术曾激发欧洲画家灵感一样，阿兹特克、玛雅、奥尔梅克、托尔特克和米斯特克文化的陶器和珠宝同样地影响了美国的大众和艺术家。

墨西哥的画家反过来更多地把美国的艺术环境看做一个安全的工

作场所,没有卡列斯统治下墨西哥的动荡的政治环境。当这个革命后国家努力把它同壁画家们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隔离开的时候,美国"彻底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环境突然成了一个不错的避难所。既然墨西哥城的国家宫已经开始限制诸如奥罗斯科和里维拉等画家的机会,他们在美国以一次画一张壁画来继续他们的艺术竞争。因此,绝大多数未到墨西哥旅行过的美国画家能够有机会去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美术馆里研究墨西哥对世界艺术的贡献。

但是那里的美墨文化交流圈是封闭的。而在巴黎、伦敦和柏林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展、报刊文章和大众传媒得到关于墨西哥文化的印象,因而艺术不再是唯一了解墨西哥的途径。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壁画技术、艺术家具有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前西班牙时期的设计在墨西哥的融合,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不亚于(如果不是好于)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发生的艺术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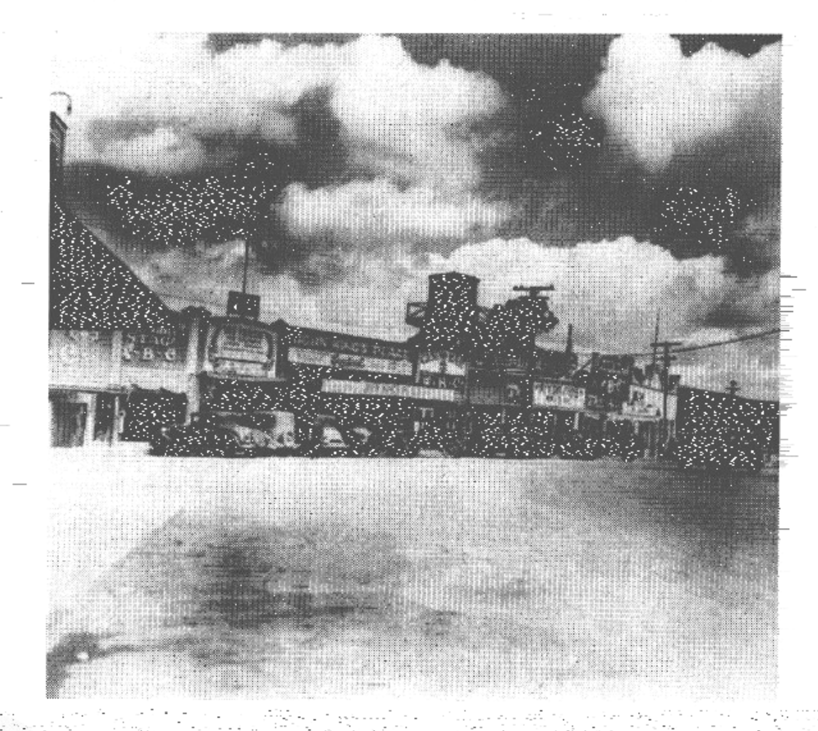
这种不断扩展的大众艺术互动的一个比较令人烦恼的方面是关于墨西哥人模式化特征的漫画的持续创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电影的缺乏使墨西哥市场重新以放映美国生产的影片为主。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强化了拉美人作为懒惰农民、感情失衡的稚气人物和没有文化价值观的性疯狂人士的描述。关于无节制午休的墨西哥农民、浪漫但残暴的土匪革命家和拉丁情人的刻板印象与考古学家和画家介绍的墨西哥情况一道,成为人们关于墨西哥人看法的主流。外交部的代表和国家的领事们通过创立具有创新精神的宣传部门和在美墨边境张贴的公告,强调墨西哥社会的复杂性,与美国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斗争。那只是与美国州一级官员对抗的一小步,这些官员急于使用本土主义的法律把拉美人长相的民众驱逐到墨西哥的沙漠,但同时也侵犯了人性尊严和美国宪法。美国人中关于是欧洲人发现了墨西哥的流行看法,无疑具有一股令人厌烦和压抑的种族主义潜流。对美国风情的渴望也有其自身黑暗的文化潜流。

与此同时,墨西哥人民和墨西哥政府也在与自身的种族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抗争。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美国的流行音乐和舞蹈,

特别是爵士乐和查尔斯顿舞，被谴责为一种危及墨西哥当权人物和一小撮中产阶级成员的西班牙社会价值观的颓废艺术形式。公开进行跨越种族和社会鸿沟的艺术交流和享受，对于那些追随国外音乐趋势的大多数墨西哥人来说并非易事。源自欧洲的分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艺术的概念，使墨西哥官方把美国多种族、跨越阶级的艺术通俗表达作为堕落颓废和非墨西哥的艺术加以拒绝。

美墨边境线上个体的、基于民间的文化交流则根本不管这些文化战斗。在墨西哥一侧，外出打工者从美国的农业工作和中西部的工业企业回来，坦然地追求他们自己的文化经历和表达。在美国一侧，那些想要逃避新教小城镇生活道德约束的人跨过墨西哥边界，在赌博、吸毒、嫖妓和酗酒中寻求逃避、放松和乐趣。有时，这些越界也提供了进行同性恋的唯一机会。美墨边界沿线的地带仍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区

520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从联邦、州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颁布政策阻止墨西哥移民到来。虽则如此，边境线上每天来往过关的人流量还是很大。一些墨西哥人从蒂华纳越过边境线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这张照片展示的是蒂华纳在大萧条时期其主干道的面貌。

域,它被独特的跨文化现实、技术创新、农业的加速商品化和禁酒令政治所塑造。

1934年,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把墨西哥总统的职位移交给拉萨罗・卡德纳斯。那时墨西哥与世界的关系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争取外交承认时已有显著不同。大量的短期的革命性关注已经被更加集中的、长期的议题取代。革命后的墨西哥国家曾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美国美元外交、苏联操控和宗教保守势力与梵蒂冈联系的斗争。在拉美内部,革命的墨西哥一度以一种独特的政治存在出现,这与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政策极为不同。作为泛美联盟和国际联盟的永久成员,墨西哥持续地塑造一个政治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形象,而且没有受到教条式意识形态体系的约束。自1927年德怀特・莫罗大使到任以及胡佛总统的"睦邻"政策低调开启之后,美墨关系变得更加可预测、集中和恭敬有礼。墨西哥外交努力不再专注于保卫国家主权。对国家经济发展、对替代性国外意识形态进行防护以及与美国国内对墨西哥人人权侵犯进行斗争的需要变得紧迫。现在大萧条的持续危机和墨西哥私有工业部门的虚弱加强了国家作为未来几年国民经济发展代理人的关键作用。墨西哥的国际关系包含了传统外交,经济政策,金融关系,文化政策,美国的墨西哥裔人口以及报纸、艺术、电影和音乐中的大众文化。

521

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总统任期现在以其进步的社会和劳工政策而闻名。这些是寻求墨西哥工业化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推动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转向一种能够维持墨西哥工业独立的消费者文化。大多数墨西哥私营企业主和精英拒绝基于意识形态原则的国家带动的发展。毫不奇怪的是,政府的技术专家和治国精英因此必须充当民族企业家。

来自财政、外交、农业、通信与基础设施、国家经济发展等部门,以及来自银行的墨西哥经济规划者们策划出一项实验性的发展政策,设想有一天墨西哥可以停止作为原材料出口者,而保持一种能够单独支撑工业增长的经济体。财政部长爱德华多・苏亚雷斯(Eduardo Suárez)、墨西哥银行行长爱德华多・比利亚塞尼奥尔(Eduardo

Villaseñor)以及卡德纳斯的朋友、国家发展部长弗朗西斯科·穆希卡(Francisco Múgica)以一种非常非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支持这一思想。在1934年和1935年,墨西哥实验性的发展主义出现了,它主张利用大萧条带来的全球危机实现墨西哥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变革。令这些进步的墨西哥政府规划者气馁的是,唯一急于提供发展援助的外国势力是那些专制和法西斯国家。凭借完全不使用货币的易货贸易安排,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程度较低)寻求消弱英国和美国在拉美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墨西哥的那些岁月中,德国很容易地担当起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的角色。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认识到,进入拉美的贸易流正在按照法西斯经济形式进行静悄悄的金融重组。然而,跨国公司的反民族主义政策以及他们弄巧成拙的文化优越感限制了美国官方政策抵抗这种趋势的力量。由于美国政策的变化主要是危机驱动的,罗斯福政府必须等待紧急情况的出现。同时,由于希特勒迫在眉睫的威胁和英国自身持续的国内经济危机,英国对墨西哥的经济政策受到弱化。

522

纳粹德国利用易货贸易交换在墨西哥新兴的电气、药品生产、化肥、小的矿产开发、汽车和铁路建造等工业部门得以立足。墨西哥人努力通过吸引意大利人帮助发展丝绸工业、苏联人帮助发展农业机械、日本人帮助发展航空技术、西班牙人帮助创立国家的商船来限制德国人的参与。美国公司被要求帮助发展钢铁生产、创建国家航空公司系统、提供军事装备和石油化工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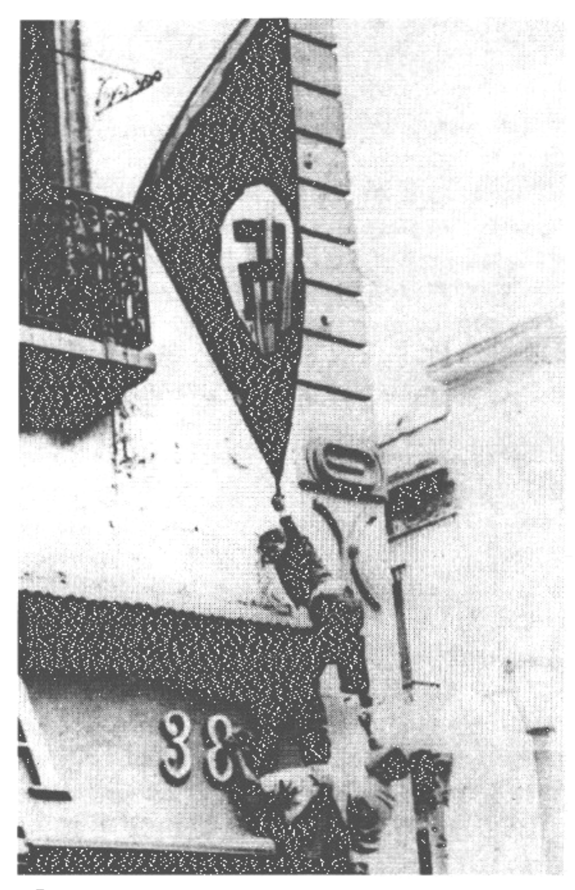
当卡德纳斯开始墨西哥集体农庄(借用自阿兹特克的法律概念,指对土地的集体所有)的商业化项目时,德国在墨西哥发展中的角色甚至变得更加重要。抛开其他因素不论,集体农庄商业化努力的成功有赖于在持续低迷的国际农业市场上销售预计的更多农产品的能力。只有德国对长期进口墨西哥农产品真的感兴趣,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为其进行战争做准备。再者,墨西哥的长期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在处理与纳粹德国关系时的政治和个人拒斥。

在1934—1936年间，一种两分化的墨西哥-德国关系出现了。它混杂了实用的经济合作与坚定的、非常个性化的卡德纳斯本人抵制法西斯主义全球崛起的政治斗争。早在1934年初期，卡德纳斯已经通过支持比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的迅速崛起，及其对纳粹迫害德国工会成员、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公开斗争，而表达了自己对墨西哥左翼联盟的积极支持。墨西哥的犹太人组织已经成为墨西哥境内首个采用经济抵制来动员墨西哥境内反对德国法西斯代表和利益的团体。卡德纳斯本人通过墨西哥驻国际联盟大使伊西德罗·法韦拉(Isidro Fabela)引导了这场反法西斯政治斗争。墨西哥在国际联盟内攻击法西斯分子和极权主义者在埃塞俄比亚、德国的鲁尔区(工业地区)和日本征服南京时的暴行。卡德纳斯也在1937年发表一份个人声明，当时他在墨西哥为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sky)提供政治庇护。

从1936年起，卡德纳斯认识到，佛朗哥在西班牙日渐成功的反叛将会导致一种西班牙版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以及为未来法西斯扩张至拉美创建一个危险的桥头堡。因此，卡德纳斯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给流亡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提供庇护来帮助陷入困顿的西班牙共和国。这些人带来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多数黄金，这些黄金是被预留用来为未来的共和党人反击佛朗哥的起义提供经济基础的。卡德纳斯坚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国家边界的侵犯，这也在墨西哥对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的查科战争进行的干涉以及它对日本人血洗南京的尖锐谴责中得以证实。甚至在石油业收归国有之前，卡德纳斯已经发了一封敦促声明给罗斯福总统，邀请他发起一项联合外交倡议，在另一场世界大战爆发前反对全球暴力的威胁。他的政治家才能遭到漠视。

这项政策的另一面是加强与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其他愿意帮助墨西哥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的经济互动。只要欧洲的民主政府和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仍然不愿为墨西哥坚定公开的反法西斯主义政治立场给予经济回报，墨西哥的发展专家们别无选择，只能利用法西斯主义者与自由政治经济秩序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帮助墨西哥的国家发展。在美

523



随着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势力的强大，欧洲的局势日益紧张。墨西哥也受到波及，尤其是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政府支持的虽然是西班牙共和国，纳粹和法西斯分子却支持佛朗哥将军的长枪党人。1935 年 10 月 8 日，图中的示威者扯下了墨西哥城里的纳粹旗帜，随后又扯去了意大利使馆前的法西斯旗帜。由于害怕共产主义在墨西哥兴起，保守派的墨西哥人逐渐投向了法西斯政权。

国，罗斯福总统身边的一个小团体包括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利斯(Sumner Welles)，驻墨西哥大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等人对卡德纳斯的政策做出一项间接但却重要的贡献。美国财政部以高于公开市场的价格不断买进数量很大的墨西哥白银，间接地推动了墨西哥采矿业的繁荣。这反过来转化为 1934—1937 年间不断增长的税收收入，为墨西哥国家作为经济引擎和公共建设项目雇主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收入。美墨之间该项关于购买白银的协定创造了美墨在国际金融关系中史无前例的相互依存关系。另一个在这种隐形链条中的重要纽带是墨西哥国家赞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为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的就业提供了财政支持，这些人的政府薪水强化了他们与卡德纳斯的精神联系。所有这些因素一起阻止了墨西哥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而危机本可以为极右翼政治组织提供可乘之机，

524

这些组织太渴望抓住任何能够通过密谋导致美国边境以南混乱的漏洞。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卡德纳斯的发展政策展示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尽管劳工的焦虑不断上升，政府对工会的支持和更加激进的社会政策使墨西哥的经济指标仍持续乐观。尽管几乎没有外国投资流入墨西哥资助发展项目，墨西哥的经济仍然在扩展、多样化并朝着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国民经济体前进。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困境持续恶化相比，墨西哥却在以更加乐观的态度看待 1935 年之后的前景。墨西哥的发展主义者们正利用全球经济危机来实现重要的结构性经济改革。

1936 年，既有的指标表明，以产权集体所有为基础重组墨西哥一些商业部门是大势所趋。集体农庄项目甚至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收入来资助购买必要的拖拉机、种子和肥料。同时，卡德纳斯的六年任期(sexenío)将要在四年内结束，这几乎不能提供足够的时间使集体农庄项目在政治、社会和商业上取得成功。因此，财政部长决定强力提供额外的贷款，这些贷款在墨西哥银行的账户上没有抵押品支撑。理论上，未来的好收成将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抵冲掉贷款，政府预算将以合理的收支平衡情况结束该年度。

根据财政部长这项规划的愿景，来年德国墨西哥联合石油公司和国有油田增加的石油产量和销售，将带来足够多的新资金为未来几年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基础。届时墨西哥将收获从原材料出口得来的直接收入，而不仅仅是出口税。有理由假定这将为高速公路、铁路和集体农庄体系的扩展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持续投资。同样重要的是，墨西哥的规划者们可以规避工会要求征收外国石油和矿产公司的压力，这一步本会导致外国私人投资长期持续从墨西哥消失。

但是突然地，在 1937 年 5－12 月间，这些乐观的发展规划和墨西哥的国外经济关系遭受了一场戏剧性的崩溃。1939 年，当这个国家复苏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已经发生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致这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基于国内驱动的发展战略不得不放弃。

525



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于 1938 年 3 月 18 日宣布将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这一行动的起因是外国石油公司拒不接受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有利于工人的判决。图为卡德纳斯总统在视察塔毛利帕斯被收归国有的油田时与一群工人在一起。

现在看来,我们很容易辨识出那只最初的雪球。半年后,它发展成为具有破坏力的雪崩,几乎把前些年创建的所有破坏殆尽。按照计划,财政部长爱德华多·苏亚雷斯于 1937 年初期强行让墨西哥银行提供新的贷款以资助扩张中的集体农庄项目。他建议用年底的预期收成作为抵押。他认为这些收成在欧洲市场的销售将在财政年度结束前赚足够的钱平衡墨西哥银行的账目。一个假设的大丰收现在被用来确保墨西哥国家发起的农业商品化项目。从 1937 年 5 月的视角来看,苏亚雷斯的行动的风险是合理的算计。到当年年终它将向传统的、反卡德纳斯势力证明,国家赞助的、具有集体基础的农业商业化可以运转。

巧合的是,墨西哥的石油工人在 5 月发起一场极具象征性和情绪性的反对英国与荷兰所有的阿吉拉(El Aguila)石油公司的罢工。绝大多数墨西哥工会成员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力量。相反地,他们把卡德纳斯对劳工组织的支持作为一个迫使政府支持他们长期以来进行的

已形成传统的反对傲慢的和帝国主义的英国-荷兰石油跨国公司的民族主义斗争。这场罢工既关注工资问题,又展示了民族经济自决和左翼政治团体日渐增长的、在总统卡列斯曾经为墨西哥工会运动编织的政治控制体系之外的政治角色。墨西哥的所有社会团体都理解这次罢工的象征意义。特别是私有银行、中等规模的公司所有人和小商人把这次罢工解释为墨西哥经济的一个潜在分水岭。几年来劳工焦虑的增长和征收传言充斥的政治氛围,加上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导致他们偏执地解释为共产主义正在墨西哥内部推进。从该视角出发,只有观望的态度是聪明的经济行为。一夜之间,心理因素开始对墨西哥私营经济部门的决策产生强大影响。 526

接下来,大量的村社资金进入墨西哥金融系统催生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激增,这表现为日常食品项目和其他消费者日常物品的价格上涨。这次,墨西哥普通消费者意识到国家的经济正在发生某种变化。现在,他们的经历也告诫在近期的日子要谨慎。消费以及整个零售业的发展开始变缓。产油地区持续的石油罢工导致了更加急剧的经济下滑。首先,燃料短缺警示地区制造商,罢工甚至可能会更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企业。如果罢工在不远的未来未能解决的话,私人工业生产的基础可能会更加危险。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心理圈正在形成,并稳固地改变了公众和私人对卡德纳斯领导下的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在国内发展政策、私营企业和消费者的认知以及石油罢工的反响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开始挑战卡德纳斯统治的经济基础。

外国企业将其国际货币资产转移出墨西哥以防止可能的征收带给他们的潜在损失,这使危机进一步加深。现在墨西哥的汇率开始面临压力,因而改变着墨西哥私人工业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决定谨慎行事,纷纷回收未偿贷款。结果,墨西哥经济的国内私人投资严重缩水。这种投资匮乏、燃料短缺和通货膨胀混杂的状况不可能实现经济在近期内的持续增长与发展。因此,资助发展的必要税收将会削减,卡德纳斯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其基础设施项目。人人都明白墨西哥的经济之船遭遇了非常混乱的局面。所有社会团体开始

重新思考他们与政府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进一步激化了革命后国家与极右和极左翼替代力量之间既有的紧张关系。

卡德纳斯的政治对手欢迎这场危机。对迅即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要求在大众讨论中不断增多。左翼联盟支持阶级斗争，而右翼私营企业主则关注佛朗哥在西班牙进行的内战，讨论要把农民和工人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保守主义者喜欢的模式是重返19世纪早期的等级制社会和性别价值观。墨西哥历史上关于一个独立国家的形式与目的的尚未结束的历史性辩论又在继续。与从前不同，反对力量现在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西班牙正统天主教圈内找到了热情的听众。

527

卡德纳斯的经济规划师们通过加快墨西哥国有石油储备转化为产品的速度来努力扭转这种趋势。他们希望这样将再次为国内工业提供燃料，获得新的外汇以稳定新设立的比索汇率，以及提供新的政府收入来启动处于收缩中的经济。卡德纳斯甚至走得更远，加大了对英荷石油公司的供应，这令墨西哥工人持续蒙羞。

但于事无补。德国和墨西哥的石油联合企业谈判仍未取得足够的进展。墨西哥国家石油储备不能迅速用于生产，因为政府已经花光了金钱。财政部长苏亚雷斯拒绝让墨西哥银行背负更多的坏债。在伦敦，私人金融家拒绝资助这样的联合企业，它将会为墨西哥石油销售创建独立于石油跨国运输船队之外的墨西哥石油运输船队。而且只要更加便宜的美国石油能够不经昂贵的巴拿马运河路线到达日本，日本对墨西哥石油的兴趣就并不迫切。当然，跨国公司致力于阻碍墨西哥经济民族主义前进的每一步。即便民族主义的扩散在墨西哥不能被阻止，墨西哥的情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拉美和近东政治的警示。

集体农庄项目的收成远低于预期，当自然界也参与合谋来反对他的政府时，卡德纳斯的局势变得令人绝望。1937年早期的这种强制贷款不能够得到归还。20世纪30年代赤字开支的经验还很有限，墨西哥国内驱动的发展走向公开的破产。到1938年底，墨西哥政府必须承认，它的财政储备不足以继续之前的发展议程。政府赞助的基础设施项目首次被迫停工。这一代人首次经历了政府不能偿付承包人账款和

公务员的薪水。一些集体农庄的农民意识到，在 1938 年将不会有信贷来播种未来的收获。军队的士兵认识到资金的缺乏已经危及这支职业化军队所承担的社会安全体系。从 1934 年起在政治上支持卡德纳斯的军队、工人和农民之间不稳固的政治同盟开始瓦解。经济基础的丧失使卡德纳斯统治权面临倒台的威胁。



墨西哥的极端主义分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日益组织化。图中是墨西哥的共产主义者与墨西哥被称为“金衫队”的法西斯分子发生了武装冲突。这场冲突发生于 1938 年 11 月 22 日，地点是中央广场，一共导致 2 人死亡，47 人受伤。

财政部长苏亚雷斯通过向美国财政部的亲墨西哥团体寻求帮助来努力防止迫近的紧急情况。确实，摩根索部长和白宫通过特批的白银购买计划和使用美元稳定基金帮助了苏亚雷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城，美国这种对墨西哥史无前例的支持没有打动人。墨西哥的私人银行断然拒绝与苏亚雷斯合作。城市和乡村的墨西哥人承受着价格飞涨与食品短缺的痛苦。工人的工资不能发放，失业率在上升。村社农民没有钱为新的播种季节购买种子。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保守的墨

528

西哥流亡团体与国内反共产主义的墨西哥企业家共谋反对卡德纳斯。来自圣路易斯波多西(San Luis Potosí)的军阀萨图尼诺·塞迪略拉拢外国石油公司、国外法西斯集团和墨西哥的农业小业主支持反对卡德纳斯的政变。墨西哥西部各州的正统天主教社区受亲法西斯天主教团体的影响,游行反对卡德纳斯的农业政策。大量的声音要求卡德纳斯公开承认其政策的失败。墨西哥发生内战的前景指日可待。

外国石油财产在 1938 年的国有化是卡德纳斯走出这场危机的途径。它一夜之间结束了石油劳工问题并强化了墨西哥政府与石油产业之间这一关键纽带,同时确保国家将在未来控制工人。石油生产的恢复为工业提供了新的燃料,重振了国内生产。国内企业家也忽然明白了自己的本分,恢复了经济活动。零售业的复兴也在望了。最重要的是,国有化是比索贬值必要的障眼法,贬值使墨西哥商品在未来出口中更加便宜和更具吸引力。政府对石油部门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稳定地获取直接而不再依赖向外国中间商征税。征收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大众民族主义,这暂时掩盖了卡德纳斯派与所有社会阶层在过去 9 个月里出现的严重分歧。它带来了充足的时间等待宏观经济变化产生让卡德纳斯足以完成其任期所需的实际经济成果。对政府的发展规划师来说,最重要的是,国有化是继续进行已经经过调整的发展议程的唯一办法。

529

墨西哥的外交观察家和墨西哥外交部曾告诉政府国有化将会是一次值得的冒险。来自伦敦的报告预测英国政府代表将主要关注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威胁,而不是墨西哥的跨国公司石油储备。墨西哥城的英国大使不受英国在墨公民和企业的喜爱,并缺乏任何真正的权力。美国大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是亲卡德纳斯人士,而且原则上愿意在跨国石油公司获得补偿的情况下维护征收。1938 年时,独立石油商人和船运公司的大量存在足以让人做出合理的假设,即尽管面对跨国公司的抵制,墨西哥也将能够在征收后让其石油进入市场。最后,在各个大陆蔓延战火的时候,为满足国家间战争机器的需要将增加外国石油订单,不去理睬跨国公司的经济原则。墨西哥征收工业资产的决定因

此标明了一次绝望的救援尝试,但也提供了证明,即正在出现的世界大战再一次改变着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石油国有化只对外国人来说才是难以想象的大胆举措。

1938至1940年间,国有化的石油部门融入了墨西哥经济,这向所有参与者证明了这一点。征收之后不久,政府官员和所有政治派别与社会各界的卡德纳斯的支持者们向外国买家提供石油储备。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帮助的希望因为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失败而受挫。法国人拒绝采购墨西哥的石油,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在未来的德法战争中失去英国的石油供应。德国起初也因为壳牌和标准石油允诺在未来的战争中供应德国而拒绝购买墨西哥石油。对卡德纳斯石油贸易商来说,其最初和唯一的突破来自1938年秋天,当时德国海军在德国征服捷克苏台德山脉地区期间遭遇到复杂的石油运输问题。德国海军界于是认识到在真正的危机时刻,石油跨国公司可能与同盟国站在一起。

从那时起,德国政府当局不再拒绝通过独立的美国油商威廉·罗兹·戴维斯(William Rhodes Davis)扩大进口被没收的墨西哥石油产品。于是,中间商戴维斯和他的独立石油公司销售了足够多的被充公石油,帮助墨西哥在石油跨国企业的经济抵制中生存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墨西哥的石油被用来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一方。德国在1939年挑起与英国和法国的战火后,墨西哥石油马上流向了墨索里尼的海军。突然日本海军增加购买墨西哥的石油量以强化其燃料供应情况。亚洲和欧洲地区战争的发展使卡德纳斯没有屈服于跨国石油公司。

530

卡德纳斯利用与戴维斯的关系终结了英国在墨西哥的外交存在。结果英国很难从墨西哥内部向墨西哥政府施加直接的压力。与此同时,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供墨西哥石油和外交合作反对轴心国。形势逐渐明朗,在不远的未来美国公司将成为帮助墨西哥运作其这一国有化工业部门的主要外国技术团体。

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小型石油公司辛克莱(Sinclair)与墨西哥政府签订协定,打破了被征收公司的统一战线,并且证明墨西哥愿意

并能够支付补偿。此时,欧洲的地区冲突已经变成了一场欧洲战争,跨国公司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利润高于民族主义"战略如何帮助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崛起这一事实。1941 年,另一家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就补偿问题与新当选的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政府达成协议。

最终,墨西哥石油再次获准进入美国并且帮助民主国家抗击轴心国。正如卡德纳斯多年来许诺的,墨西哥停止运送石油给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并且它四年来对民主国家事业的经济支持现在被认真对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的石油公司继续坚持反对墨西哥。而美国的石油公司已转变为墨西哥国有化资产发展的未来伙伴。

墨西哥国民经济发展的恢复在欧洲和亚洲战争的背景下被证明更加困难。德国公司在 1940 年 1 月已经承认,不断增长的生产战争用品的需要使它们要到德国最终取胜后才能着手完成墨西哥在战前向它们下的基础设施建设订单。尽管墨西哥已经用石油付清了所有订单的款项,德国却在未来几年什么回馈也不能提供。接下来,意大利 1940 年 6 月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墨西哥之前在欧洲的关键石油市场完全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墨西哥在欧洲的剩余农业市场。欧洲战争已经关闭了墨西哥三分之一的战前市场。在未来的几年中,欧洲的技术和知识将不会帮助墨西哥发展工业。为了应急,墨西哥的规划师们寻求加强与日本的贸易和技术交流。然而,一个在 1940 年春季访问日本的墨西哥贸易委员会只带回了石油出口的合同。毫无疑问,日本也只是把墨西哥看作原材料出口商,而不是看作一个正努力使其经济独立于第一世界的国家。只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美国无疑是剩下来的可作为墨西哥发展伙伴的唯一国家。

531

在墨西哥技术专家与美国政府集团能够在经济事务上更加紧密的合作共事之前,两国都必须赢得总统选举。只有墨西哥总统的官方候选人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在墨西哥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华盛顿特区当选之后,睦邻政策的延续才能得到保证。然而,反对党候选人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Juan Andreu Almazán)或者弗朗西斯科·穆希卡在墨西哥成功或者一位共和党人当选美国总统,都

将再度恶化美墨关系。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将出现相互争吵的政治派别，而其领土将成为外国操纵的工具，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

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形势，我们必须检视反对卡德纳斯的各个集团于1937－1939年间在墨西哥的行为。纳粹德国的代表在1937年前已与所有主要的墨西哥反对团体进行联系。另外，日本和德国的职业间谍正在把墨西哥作为收集信息的中心，用于接下来的战争中破坏美国和英国在墨西哥与中美洲的船运。墨西哥的右翼西班牙人圈子同样危险，他们当时集中关注新组建的墨西哥反共产主义集团和西班牙佛朗哥持续进行的叛乱。佛朗哥逐渐成功地混合了独裁主义和天主教，为亲法西斯主义的墨西哥集团首次提供了独特的西班牙版的极右翼社会政策，某种希特勒的反天主教纳粹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不曾提供的东西。墨西哥的主要退伍军人组织代表是如此迷恋佛朗哥的叛乱，以至于他们要求卡德纳斯政府在墨西哥创建一个法西斯国家。这些团体与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反卡德纳斯流亡者保持着松散的联系。

对卡德纳斯来说幸运的是，佛朗哥的胜利在1939年前并不确定。那时，德国政府不愿重视当地德国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墨西哥右翼支持者们的颠覆计划。墨西哥石油流向欧洲对征服欧洲来说比墨西哥发生不成熟的革命更加重要。希特勒本人强烈要求纳粹党和德国秘密机构的成员暂停在美洲的暴力行动直到德国主导欧洲得到确保。

针对这些发展，墨西哥总统竞选在1938年征收石油工业后开始早早启动。许多墨西哥企业家和中小企业主视此次选举为撤销卡德纳斯任内首个四年间发生的社会、劳工和农业政策变化的最后机会。受佛朗哥在西班牙成功的激励，墨西哥的保守主义和天主教反对力量聚集在地区强人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将军周围。阿尔马桑本人希望1940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能够当选总统。 532

在墨西哥极右翼和极左翼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分化墨西哥选民之前，随着希特勒-斯大林协议的公布，卡德纳斯政府获得了急需的



1940 年发生在官方候选人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和保守派候选人胡安·阿尔马桑之间的选战非常激烈，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腐败事件。阿尔马桑本应该在墨西哥城更受欢迎，会赢得该城的大多数选票，但当投票结果公布时，获胜的却是阿维拉·卡马乔。图中，阿尔马桑的支持者在墨西哥城中游行，他们手持的横幅上写道："阿尔马桑已经是总统了。"

喘息之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宿敌的突如其来的合作令绝大多数政治化的墨西哥人在意识形态上难以理解。一夜之间，墨西哥左右翼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爆发，被个人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反省所取代。希特勒和斯大林对意识形态的轻视游戏导致他们在墨西哥普通群众中的同情者陷入了深深的政治迷乱之中。双方的一般追随者们抛弃了他们。这种流向转化为反卡德纳斯力量的自动弱化。随后德国袭击波兰和苏联入侵芬兰进一步疏远了墨西哥左翼和右翼的大众群体。这些事件使人想起 20 世纪 20、30 年代对待小国的大国行径。卡德纳斯宣称墨西哥在欧洲冲突中保持中立，预示着墨西哥独特的政治立场即避免与英国、法国和纳粹德国等国家建立紧密的合作。政治动力再度转而有利于卡德纳斯和其官方的总统候选人阿维拉·卡马乔。这种发展的贡献者是墨西哥的既存现状，其独特的墨西哥特色使极左和极右

政治和社会替代力量突然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533

只有那些最疯狂的墨西哥反共产主义谋叛者和加利福尼亚的流亡者在这段时间进行着他们反对墨西哥的破坏性工作。1939年末,墨西哥谋叛者首次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新政权进行间接联系。在西班牙方面,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Ramón Serrano Suñer)和他在西班牙秘密安全部队中的支持者们把即将进行的墨西哥总统选举作为一个独特的机遇,以在拉美创建首个亲佛朗哥的桥头堡。苏涅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幻想着1940年后的亲法西斯的墨西哥将交付给他们大量的流亡墨西哥的共和党人,并拿走这些流亡者们持有的财政资源。此外,亲西班牙的墨西哥可以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军队提供一个反对清教式资本主义美国的行动基地。它甚至可能成为在拉美成功建立西班牙新殖民帝国的首站。在1940年上半年德国战争疯狂胜利之后沉醉于建立全球法西斯运动胜利美梦之中,苏涅尔和佛朗哥已经幻想着自己成为重新聚合起来的、从马德里经阿卡普尔科一路直到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体系的未来君主。

在墨西哥一边,右翼谋叛者视这个机会为发动一场文化战争的机会,可以推翻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成果并推动墨西哥重返殖民时代。在他们胜利后,传统的西班牙社会等级制将把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放回到社会各领域中不那么重要的社会空间中去。西班牙的领主文化将再次把高阶层社会代表的重要性置于那些来自资本主义、暴富社会群体和革命的“浅薄之辈”(shallow glow)之上,后者的社会地位纯粹是依靠暴力和金钱取得的。保守主义和正统天主教等级制在墨西哥的重建将强化理想化的殖民道德价值和性别角色。在这个梦幻般的计划中,非常现代化、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将作为美国标准石油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被征收石油储备的运营商发挥关键角色。

该历史想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美国与拉美分离。在谋叛者看来,美国将成为格兰德河以北一个奇特的民主国家并被迫慢慢地向世界法西斯主义屈服。最终,这个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残余将被消除,世界将重返反西班牙独立运动之前的时代,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民主和

国家的世俗形态。

反对党候选人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将军在1940年7月的选举中败北。然而,当选总统阿维拉·卡马乔的就职典礼直到1940年12月才举行。这段空隙给右翼反对势力提供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来改写墨西哥的历史进程。正如1939年所期待的那样,阿尔马桑不会接受总统大选失败而不施加严肃的挑战。阿尔马桑离开墨西哥去了加勒比地区,他的支持者于是在美国和中美洲组织了公开的斗争以挑战选举的结果。在墨西哥内部,一小部分已经在地方和地区职位竞争中输掉了的阿尔马桑派(Almaza nistas)发动了有限的暴动。另一个与墨西哥前流亡总统卡列斯保持联系的团体从美国市场购买了枪支以支持一场更大的军事暴动。西班牙的塞拉诺·苏涅尔宣布西班牙长枪党代理人将在墨西哥推动颠覆活动。德国的方法是提供为数不多的坦克、重武器和飞机,打算由日本发送到墨西哥太平洋海岸。

534

幸运的是,因为美国与墨西哥武装力量之间空前的合作、罗斯福总统的再次当选以及德国拒绝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行动,这些努力失败了。当选总统阿维拉·卡马乔的支持者们系统性地赢得了美国支持者的帮助,要求美国早点提供外交承认,并因此赋予阿维拉·卡马乔作为1940年墨西哥总统选举的正式获胜者以国际合法性。阿维拉·卡马乔的竞选主管米格尔·阿莱曼(Miguel Alemán)州长,成功地在1940年秋初达到这一目标。白宫和国务院甚至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和墨西哥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就认可了阿维拉·卡马乔。在争取承认的政治斗争中落败后,阿尔马桑转向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然而,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军事情报局,以及财政部、内政部和军队支持的墨西哥代理人的帮助下,美国境内、美墨边界沿线以及墨西哥境内的阿尔马桑叛乱者被全面镇压,他们的准备被破坏。墨西哥军队平息了墨西哥北部的地方叛乱,并在墨西哥海岸线进行巡逻以阻止革命部队登陆或者武器输入。当阿尔马桑想要潜入美国为他下一阶段叛乱做铺垫时,美国移民和规划局给了他公开的欢迎。白宫和国务院拒绝会见阿尔马桑的人,不支持他们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德国外交部决定不与西班牙人一道反

对墨西哥,因为阿维拉·卡马乔看上去比即将离任的卡德纳斯更亲德。希特勒本人那时更喜欢一个中立的墨西哥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结果,阿尔马桑在墨西哥从来没有收到对进行和维持一场墨西哥境内有力的军事行动所必需的重型军事装备。

最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1940年11月的再次当选确保了白宫在未来四年继续亲墨西哥的政策。为了强调这一点,罗斯福总统派遣美国当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代表美国出席墨西哥总统在1940年12月的就职典礼。这是阿维拉·卡马乔阵营与罗斯福政府首次公开展示美墨在过去五个月共同抗击亲法西斯力量中变得如何亲近。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对卡德纳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后者曾赞同卡兰萨(Carranza)关于墨西哥在拉美多边框架内反对美国的思想。结果,战败的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阿尔马桑承认了现实,公开承认失败并返回墨西哥家乡,成为革命后国家的经济精英中的一员。墨西哥的私营经济部门很快从预期的美墨战时经济合作中看到了赢利机会。墨西哥最后一个主要的地方革命军阀变成了企业家。革命后的政治和发展最终彻底取代了暴力革命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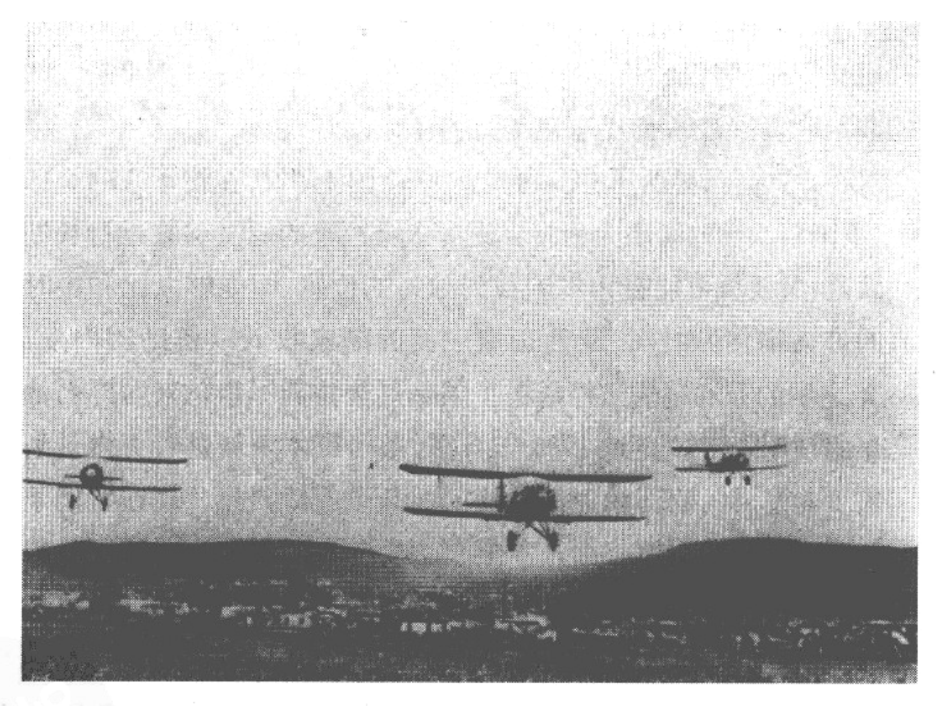
535

早在1936年,墨西哥的国内观察家们已经建议,在接下来的全球战争中,美国与欧洲的军事力量将会更加依赖拉美的原材料来维持长期战争。因此,墨西哥可能会为本国找到独特的位置,即能够以比和平时期更高的价格销售原材料,从而创造出新的国家收入以资助国内发展。1938年之后的石油销售已经证实了国际形势重新军事化对国际石油贸易产生的预期效应。直到1939年春季,墨西哥才重新进行更富计划性的国家工业发展。欧洲和亚洲的战火在几个月后点燃。现在有助于推动墨西哥工业化的引擎将会是重整军备的外部刺激与战时的原材料需求。只要罗斯福和英国政府接受卡德纳斯向民主国家供应石油,墨西哥的规划师们就可以运用这笔钱获得美国的知识与技术来扩展墨西哥的制造业基础。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在战争结束时,墨西哥的工厂将能满足对消费品和耐用品的被压抑的需求,并留出外汇用于其他发展需要。

然而,从政策设想走向经济实践的脚步远为复杂。甚至在阿维

拉·卡马乔1940年12月5日的就职仪式之前，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和墨西哥政府代表已经原则上同意未来数月在未解决的、最关键的双边议题上达成全面解决方案。确实，从1940年12月起，一场程度上前所未有的墨美外交展开了。双边委员会在陆军、海军和空军防卫等领域谈判合作方式。根据华盛顿的官僚主义的战时经济规则制定了墨西哥原材料与美国制成品与工业技术的交换计划。一个委员会解决了由石油征收引发的与美国跨国石油公司间持久的冲突。另外的团体讨论了双边的水权利、土地征用、农业劳动力、革命期间的索赔要求、墨西哥公民参加美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战时金融问题。1940年11月之前20年中绝大多数主要的美墨冲突获得解决。亚洲和欧洲的战争赋予美国政府史无前例的权力去迫使不爱国的跨国公司服从国家的战时需要。并且双方前所未有的外交善意已经为未来几年更加深厚的双边合作扫清了道路。

53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墨西哥人为击败轴心国做出了直接贡献，他们派遣了一整支飞行大队，包括飞行员和后勤人员前往菲律宾。201飞行大队的成员们都成了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这张照片中，墨西哥飞行员正在进行巡逻墨西哥西部沿海地带的训练。

墨西哥的开发者们安排他们对美国的让步，是以产生对他们的发展远景的最大经济收益为准则的。比如，1940 年 4 月的飞行协定打开了获取美国租借法案资金的道路，也为墨西哥空军的现代化引进了军用飞机。在墨西哥港口夺取的德国和意大利船只一夜之间为出口墨西哥石油到美国和赚取外汇提供了之前没有的国有海运能力。1940 年 7 月盟军黑名单的公布为把德国的化工和制药工业设施与专利纳入国家监管和准备战争结束之后的最终征收德国垄断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掩护。1940 年 7 月 15 日，阿维拉·卡马乔的谈判代表签订了一项广泛的美墨商业条约，确保美国市场以保护价格购买墨西哥产能过剩的 11 种战略物资。从大萧条一开始，墨西哥就不曾享有类似的优惠待遇。另外，墨西哥达成了特殊的白银购买协定，获准使用美国的货币稳定基金。1940 年 11 月关于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协定使得墨西哥的这一行动在法律上不可变更。更加重要的是，它更进一步孤立了英国在墨西哥的石油索赔要求，并且证实了卡德纳斯关于征收是一次合理冒险的想法。战争已经迫使跨国公司向墨西哥的经济民族主义屈服。美国关键性的石油技术和专家力量再度获准进入墨西哥，帮助发展国有化的资产。罗斯福政府也向阿维拉·卡马乔提供了对墨西哥征用的铁路系统急需的检修行动，并为泛美高速公路、下加利福尼亚公路等建设项目和墨西哥港口现代化提供融资。

537

从长远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墨西哥的国家外债减少了几乎 90%。墨西哥财政部长爱德华多·苏亚雷斯认定：希特勒完全控制欧洲会确保取消墨西哥对欧债务的绝大多数。正如所料，战争的外部刺激向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和墨西哥类似于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就业项目提供了融资机会。如果墨西哥能够避开战争，使本国国土不经历战火，它将逐步具备强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对国际投资家和银行有吸引力的财务状况。优秀的谈判代表们将重新定位墨西哥在战争结束后使用外资加速发展方面的国际宏观经济状况。

有利的宏观经济特征的创建没有转化为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改善。与之相反，在一些农业部门，美国要求的作物变化导致了饥饿和持续数

年的区域性经济失调,而之前这些地区市场运作良好。只有美国大使乔治·梅塞尔史密斯(George Messer smith)的果断个人干预才避免了更加严重的饥荒灾难和一次公共关系的噩梦。从美国和欧洲涌入的金融激流以及用墨西哥原材料换取的大量金钱,导致不断扩大的通货膨胀,这侵蚀掉了工人本已虚弱的购买力。劳工权利甚至更加受限,工会成员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获得许多政治自由被压制。简而言之,战争变成了攻击墨西哥政治左翼的借口。美国政府的官僚们对墨西哥的支持也远不如白宫和美国驻墨大使明确。制造业工厂的地区转移或者重建以及高端技术的取得没能实现。美国经济战争的需要仍然比墨西哥的发展更加重要。很少有美国规划师承认墨西哥的原材料运送供应了美国战争工业的40%。这是拉丁美洲对抗击轴心国最重要的贡献。最终,当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得日本军队不可能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登陆时,美国对资助墨西哥项目的军事支持一夜之间结束了。

到1943年,阅历丰富的墨西哥经济学家认识到,过去三年美墨热烈的战时经济合作的理由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财政部长苏亚雷斯提醒内阁,双边的战时合作已经成为一个临时的例外,而不是一个长期性的美墨关系的开始。对政治左翼来说,前任的卡德纳斯力量和更加激进的政治家们继续他们的批评,认为美墨战时合作只是美帝国主义者在拉美建立持久霸权的简单借口。早在战争进程允许时,苏亚雷斯部长和墨西哥银行行长爱德华多·比利亚塞尼奥尔重启他们战前对其在欧洲、亚洲和苏联的经济伙伴的接触,探索美墨经济关系的替代选择。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苏联、美国和很快将重构的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会成为战胜国,墨西哥传统的在美欧之间的外交立场将因之开始重构。

538

作为对墨西哥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挫折感的回应,罗斯福总统和阿维拉·卡马乔做出了果断的个人努力来延续早期积极的战时合作到战后时代。在1943年的总统互访期间,一个特殊的双边研究委员会创建起来,为那些随着不平衡的战时发展带来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双方的官僚习气和惯性要更加强大。墨西哥仍然是唯一受到白宫如此

特殊关注和美国真诚善意的拉美国家。

由于绝大多数墨西哥人持续担心美墨战时合作，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和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Ezequiel Padilla)外长未能公开推动墨西哥向轴心国宣战。1941 年秋季，德国决定关闭拉美在被占领欧洲国家的领馆给了国家宫关闭轴心国驻墨西哥领馆的机会。这一步消除了轴心国秘密颠覆活动的许多秘密基地。日本 1941 年 12 月袭击珍珠港和该月晚些时候德国宣布与美国开战之后，阿维拉·卡马乔政府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对德宣战。尽管其他较小的拉美国家对所有轴心国宣战，直到 1942 年 2 月后德国潜水艇反复袭击墨西哥湾的墨西哥船只才为帕迪利亚和阿维拉·卡马乔创造了足够有力的理由克服民众的保留态度，并说服国会正式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

卡马乔通过邀请流亡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前总统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回国、任命民族主义者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担任国防部长和把防卫墨西哥湾的任务托付给保守主义的前总统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以此强化脆弱的国内阵线。工会首领比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受到限制性的劳工—政府协定的进一步束缚，被迫成为在墨西哥之外活跃的一名拉美工会领袖，但在拉美其余地方持续的政治保守主义背景下，这项事业注定要失败。

那时，在盟国的平媒、无线电、电影甚至邮票等所有媒体不间断的宣传培育下的大众文化交流，已经为那一部分人数不多但地位重要的墨西哥城市中产阶级带来了某种战时危机感。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宣传机器接管了所有的外交事务报道。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从公众场合了解战争，比如德国潜水艇击沉墨西哥轮船“波特雷罗·德亚诺”号(Potrero de Llano)之后墨西哥城的索卡洛(Zócalo，中心广场)表演的戏剧。针对牧师的特殊宣传招募了一小部分亲盟国的牧师来影响他们在当地的教区。在轴心国拥有资源发起一场对拉美的持续攻击之后，墨西哥人长久以来从事着反对轴心国的几乎超现实的国内防御“紧急状态”和真实的战争军事演习。后革命时代的精英和其外国支持者之前从未对其公民的政治观点拥有这么多的影响力。轴心国入侵的威胁

539

赋予阿维拉·卡马乔政府推动形成新的保守主义国家共识的机会，努力在地理、种族和阶级的严重裂痕间架起桥梁。

阿维拉·卡马乔政府害怕德国或者日本可能登陆墨西哥领土，同盟国会以入侵来回应这一突然行动从而把墨西哥转变成战场。为了确保轴心国不进入墨西哥海岸，阿维拉·卡马乔允许美国秘密部队在墨西哥进行频繁的活动。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代理人格斯·琼斯(Gus Jones)的领导下，美国顾问培训并与墨西哥的反间谍部队进行合作。这些顾问还帮助起草了墨西哥第一部反对间谍、颠覆和破坏的法律。此外，大批的来自海军情报和战略情报局的美国间谍遍布墨西哥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线的每一个海湾，调查关于德国和日本登陆准备的传言。

然而，在 1941 年希特勒还能改变主意和在美洲下令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或者合作在美洲发起与珍珠港类似的袭击之前，美国的秘密部队与墨西哥内政部、财政部、军队和总统安全部队的代表，发现了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巴拿马运河以北最完善的间谍和从事破坏活动者网络。由于轴心国的颠覆行动系统性利用种族团体来准备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墨西哥政府把墨西哥沿岸地区的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驱离。但只要西班牙保持中立，就必须容忍那些亲佛朗哥的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沿岸的存在。1942 年在墨西哥逮捕日本海军随员和德国间谍后，美国和墨西哥的调查人员获悉了下述计划的可能性，即攻克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破坏美国在圣迭戈的飞机生产和攻击巴拿马运河。事实上，在 1942 年墨西哥宣战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愤怒地建议破坏墨西哥的石油产地。1942 年之后，墨西哥仍然保持警惕以防剩余的轴心国势力试图给这个国家造成严重的伤害。正如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墨西哥免受德国颠覆和破坏的严重后果一样，阿维拉·卡马乔与美国和英国秘密部队的合作保护了墨西哥各州和墨西哥人日常生活免受德国在本世纪的第二次设计的损害。

540

在波特雷罗·德亚诺号沉没后，墨西哥在 1942 年 6 月宣战，这给

华盛顿的美国军事领导人造成了困扰，他们要更加严肃地看待墨西哥的军事贡献并至少允许墨西哥战斗部队象征性地进入欧洲或者亚洲的战场。发展一支现代的墨西哥空军力量成为一个妥协选项，它考虑到民众对在海外战斗的持续犹豫，也顾及所有墨西哥专业化武装力量盼望的尊重与合法性。当时正值巴西部队准备部署在意大利而墨西哥军队在政治中的官方角色正在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墨西哥高级军官急需的荣誉。阿维拉·卡马乔总统本人表达了到海外战斗的个人意愿，声称只是总统职位使他未能成行。

墨西哥空军的飞行员 1944 年在美国接受了培训，并在 1945 年菲律宾的空战中表现英勇。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墨西哥飞行员以及整支墨西哥空军中队共同表现了墨西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盟军事业的坚定承诺，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墨西哥正确地要求与胜利方站在一起。在美国，对卡兰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政策的糟糕记忆正在被下述认识取代，即没有美国工厂里的墨西哥原材料，外交部长帕迪利亚的拉美外交，美国农业和工业中的墨西哥短期合同劳工，墨西哥士兵以及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分支的墨西哥-美国志愿者，美国反抗轴心国的战争效应将变得不那么有力和自信。更可能的是，一个政治上弱化的墨西哥将会容忍德国的反美活动在墨西哥领土上进行。在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阿维拉·卡马乔政府坚持不懈的亲民主立场和行动为外交部长帕迪利亚要求其在美国与拉美之间担任调解人和在新创建的联合国中发出独特的拉美声音提供了正当性。墨西哥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泛美联盟和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联盟中的经验和教训现在帮助它在联合国活动。

那时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的突然退休和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从华盛顿去除了最坚定的亲墨西哥拥护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赫伯特·胡佛和美国国务院的其他成员早在 1943 年重拾在西半球反对苏联的冷战。他们恢复的单边主义政治压力未能理解墨西哥左翼政治文化的特性。然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梅塞尔史密斯的离任去除了美墨战时特殊关系剩余的最后支柱。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继续担任墨西

哥外交部长并在 1942 年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代表墨西哥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他孤独的决心不足以避免消极的变化。那些在美国希望把西半球看作是一个地区集团、而不是众多有着各自独特政治议程的政治实体的人,正在华盛顿占据优势。在西半球,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成冷战。米格尔·阿莱曼在 1946 年总统选举中轻易地击败了帕迪利亚,并和杜鲁门政府建立了他自己的关系。

541

在推动墨西哥民众对北方邻居爱恨交加关系之时,战争也提供了大众旅游经济可能性的新证据。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关闭,墨西哥铁路系统的修缮,以及泛美高速公路的开通为边界以南地区带来了史无前例数量的美国旅游者。好莱坞电影对墨西哥影院的渗透在 1945 年之后仍在持续。不存在替代选择。英国破产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被消灭了,苏联对墨西哥的工业化不感兴趣。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原材料继续与墨西哥的原材料展开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墨西哥革命结束后相比,美国更加成为墨西哥对外关系的焦点。从那时起,冷战的新环境为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主题增加了新的变化。

第十七章　墨西哥文化：1920－1945

海伦·德尔帕(Helen Delpar)

543 1921 年 9 月，墨西哥城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纪念活动，庆祝其脱离西班牙取得独立 100 周年。有 100 多个历史事件被列入纪念活动规划之中。这个周年庆的性质还有些模糊不清，它纪念的是阿古斯丁·德伊图维德于 1821 年 9 月 27 日进占墨西哥城的这个历史功绩。不过，百年庆祝活动的根本动机却离 1821 年的历史事件很远，它的真正的意图是想宣布墨西哥已从 10 余年的内战中复兴以及对墨西哥文化的肯定，并有意识地与 1910 年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为纪念 100 年前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发端而搞的那场奢华的庆典活动形成对照。1921 年时的外交部长阿尔韦托·帕尼(Alberto J. Pani)后来回忆说："与 11 年前波菲里奥搞的那些为突显贵族气而与我们的传统、人文及风俗格格不入的庆典活动相比，1921 年的庆祝活动一视同仁地包囊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并展现出一种鲜明的民族特色。"

1921 年庆典活动的安排包括：墨西哥艺术的展览；在霍奇米尔科举办一场赞颂阿兹特克女神霍奇克察尔(Xochiquetzal)的花舟大游行；邀请外交官和外宾到新发掘出来的特奥蒂瓦坎古遗址参观；参观结束后再举办一个大型午宴，以烤肉、鼹鼠酱火鸡、豆类，以及龙舌兰酒和啤酒招待客人。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中的"墨西哥之夜"使整个庆典活动

达到高潮，画家阿道弗·贝斯特·毛嘉德(Adolfo Best Maugard)策划了该项盛典。根据庆典活动规划，富有特色的烟火、地方舞蹈和音乐都是为了显示一种“由不同民族艺术构成的地道而全面的墨西哥特色。”

544



罗伯托·蒙特内格罗绘制了这幅名为“重建”的壁画作品。这幅画是绘制在墨西哥城中原圣佩德罗和圣巴勃罗修道院的墙上，这里后来变成了第六公立学校。这里截选的局部图表现了“墨西哥大家庭”。革命正是为了他们才发起的。

帕尼夸大了1910年那次百年大庆中的反民族主义特质，因为那次庆典活动中也有特奥蒂瓦坎博物馆的开馆、献给独立运动和19世纪中叶改革运动英雄贝尼托·华雷斯的两个纪念碑的揭幕。不过，1921年的纪念活动确实显示了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它将是以后20年内墨西哥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最大特色。这些活动还预示了将要得到世界空前赞扬的美术、音乐和文学的特别繁荣，尤其是迭戈·里维拉、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和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三位大师创作的壁画。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文化上的复兴不仅是一种力量的表

现和因进行中的革命而释放出的灵感，而且也是与革命进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个很有价值的部分。

如果民族主义可以被看作是1921年后墨西哥文化产品的第一主题，那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绝对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追随某个单独的派别或运动。1921－1924年间的公共教育部长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śe Vasconcelos)是壁画运动最初的发起者，但他首先是西班牙文化的仰慕者。壁画家本人，以及其他的艺术家和作家，也始终沉浸于欧洲文化的潮流之中。迪亚斯政权鄙视本国的传统，尤其是那些源自于土著民族的东西，并将这些人看成是土地改革和革命政权其他政策的指定受益者，大家对此表示谴责。但即使那些最热衷于改善印第安人境况的人士，如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和教育家莫伊塞斯·萨恩斯(Moisés Sáenz)，也只是想把印第安人同化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一体化民族中去。实际上，除了纯粹的土著传统，印欧混血种人也建构了那个时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根基。

545

那一时期艺术论述的第二个突出主题是，画家和其他艺术家的创作工作，不但要具有审美意义，而且还要为劳动人民所接受。这一信条使人们开始重视公共场所的壁画，因为这样能够使工人和农民都可看到，从而接受壁画中民族主义、有时是革命主题的教育或鼓动。至于壁画对工人阶级究竟能起什么作用，那就不得而知了，就连奥罗斯科也不认为单凭艺术就会激发群众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此外，在墨西哥壁画家的国际声望上升之时，墨西哥和国外的名流极为过分地笼络他们，结果后者的画架画最终都落到了北美百万富翁的收藏之中。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对里比利亚和其他画家在他们的作品和主题中过分强调民间元素的做法表示关切，认为这些东西已不再与墨西哥的现实相关，而只是满足了外国旅游者和收藏家的需求。

1921年独立百年庆典的一大亮点是画家赫拉尔多·穆里略(更以“水博士”而闻名)、豪尔赫·恩西索(Jorge Enciso)和罗伯托·蒙特内格罗(Roberto Montenegro)组织的墨西哥民间艺术展。阿尔瓦罗·奥

夫雷贡(Alvaro Obregón)总统亲自出席了开幕式,有报道说,“展览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总统走后,留下的政府高官又走到展会近边的一个庭院去品尝玉米粽子、玉米粥及玉米饮料。展会促成了一场当代艺术运动,支持把民间艺术作为墨西哥人民先天审美感的真正代表。在1920年的《杂志评论》(*Revista de Revistas*)杂志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表述:“我们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形成了一种流行和美观的表达方法,它是真正本土的,因为在西班牙殖民文化以及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东方文化影响的后面,人们感觉到了先辈的精神,他们创造的石头和粘土艺术品比世界上除了希腊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艺术品都更美。”关于这次展览,水博士写出了《墨西哥民间艺术》(*Las artes populares en México*, 1922)一书,希望以此鼓励对他称之为墨西哥艺术精粹的那些东西进行研究。此次展览后来移到了洛杉矶,成千上万的人参观了展览。曾经在墨西哥居住过的美国作家凯瑟琳·安娜·波特(Katherine Anna Porter)为展览会撰写了英语参观指南。她在指南中指出,墨西哥自独立后时兴模仿欧洲,而自己的民间艺术却“不再流行了……只有印第安人才去搞它”。

546

但是现在,就像历史学家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回忆的那样:随着每个家庭想要获得出自于格雷罗的奥利纳拉(Olinalá)的一只漆碗、瓦哈卡的一只土罐,民间艺术也在复兴。就像两位北美移居者弗雷德里克·戴维斯(Frederick Davis)和威廉·斯普拉特林(William Spratling)那样,里维拉、恩西索、米格尔·科瓦鲁维亚斯(Miguel Covarrubias)等墨西哥艺术家也成了认真的收藏家。他们五人都从自己的收藏中拿出一些物品提供给即将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重要的墨西哥艺术展。1930年,墨西哥艺术展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开幕,展览为民间艺术辟出了一块显著的地方。按照展览会的组织者勒内·达农古(René d'Harnoncourt)的说法,墨西哥民间艺术“因丰富的自然原料、高度发达的手工技巧以及多个世纪的传统和本土风味,已达到了最高的优秀水准。这里有许多个人用品保持着墨西哥印第安人对其国家文明所作的独特贡献”。

虽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珍爱墨西哥的民间艺术，并为它们可能随着国家的工业化消失而惋惜，但奥罗斯科在他的自传中说，这些民间艺术主要只是吸引资产阶级。当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把泥土罐和锡烛台摆满自己的住所时，劳动人民却热衷于购买大量生产的现代物品作为家用。

1921年的民间艺术展还间接地导致了1925年《墨西哥民俗》(*Mexican Folkways*)杂志的出版，这是一本双语杂志，在其发行的7年多时间内，登载了与当时墨西哥生活，特别是印第安人生活有关的文章、照片和美术作品。其主编是一个美国公民，名叫弗朗西斯·图尔(Frances Toor)，她被那次展览深深感动，以致后来决定永久移居墨西哥。“我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卑微民众居然创造出了这么美的东西。”该杂志创办初期曾受教育部的资助，其撰稿人中有墨西哥和北美的顶尖艺术家、作家和学者。

1921年独立百年庆典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美术学院学生的绘画作品展。这些学生都得到了院长阿尔弗雷多·拉莫斯·马丁内斯(Alfredo Ramos Martínez)的鼓励，后者在韦尔塔执政的1913年第一次担任这个有影响的职位。当时他拟定了一个纲领，从中已可察觉出该美院的一次激进转向。马丁内斯在写给教育部长的一封信中表示：他要把他的学生带出校门，这样他们才能直接在大自然中作画。他补充说道：“我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学生对自己国家之美的热情，从而促使一种真正与民族艺术相衬的艺术的诞生。”他在圣阿尼塔(Santa Anita)村租借了一幢房屋，学生们就在房屋的庭院中支起画架，开始进行印象主义的绘画试验。韦尔塔倒台后，马丁内斯也失去了他的职位，但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1921年再次选举他为美院院长。他又在科约阿坎(Coyoacán)创办了另一所露天学校，学生们在那里对墨西哥的风光和居民重新进行观察。水博士曾在1914年暂时接替马丁内斯担任美院院长，他在1921年的美展上发表讲话，把美展称为一次“艺术与意志的强有力展示”，而且意志明显多于艺术。《至上报》(*Excelsior*)上有位批评家却持不同意见，他赞扬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新倾向，它们将帮

547

助学生与传统教学决裂,从而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

马丁内斯表达的艺术民族主义可能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大主题,但墨西哥艺术的崛起还要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从西班牙统治的最初时期,就有迹象显示前哥伦布时期的表现手法,特别是装饰艺术就开始对欧洲传统施加影响。到 1700 年左右,许多出生在墨西哥的画家已转向本土题材。譬如,印欧混血画家米格尔·卡夫雷拉(Miguel Cabrera,1695—1768)描绘了种族的混合;而安东尼奥·佩雷斯·德阿吉拉尔(Antonio Perez de Aguilar, 1749—1769 年为其创作高峰期)在其绘画《画家的食柜》(*Painters Cupboard*, 1769)中则画了许多圆木盒,其中以"圆盒盖"(Cajeta)闻名的工艺品是供出售的。

1785 年圣卡洛斯美术学院(Academy of San Carlos)画廊正式建立后不久,上述油画就出现在画廊之中。虽然早期的美院人员中出生于西班牙的艺术家占主导地位,但到 1825 年,有着土著血统的墨西哥人佩德罗·帕蒂尼奥·伊斯托林克(Pedro Patiño Ixtolinque)担任了美院院长。墨西哥画家与外来西班牙教师间的对立是整个 19 世纪持久纷争的根源。不管是哪个民族,美院中的大多数画家都是按照外国画作中最受青睐的地点——罗马的主流倾向,不断地创作出历史和宗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但 19 世纪初期的美院派画家及迭戈·里比利亚的老师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José María Velasco, 1840—1912)却是个例外。他关于墨西哥谷地的风景画显示了他在透视和色彩方面的匠心。在美院之外,外省画家如阿古斯丁·阿列塔(Agustín Arrieta)和埃尔梅诺希尔多·布斯托(Hermenogildo Bustos,1832—1907)也创作了许多真实地捕捉了墨西哥现实生活的肖像画和静物写生画。

真正具有墨西哥特色的还有描绘骷髅(活生生的骨头架子)的人体图解画,这些画在一些如亡灵节这样的特殊节日还会被印刷出来。这些画往往带有嘲讽性文字,评论政治事件或死亡的必然性。被人们记住的还是版画家何塞·瓜达卢佩 ·波萨达所作的那些插图。此人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引人注意,但后来却因其对迪亚斯时期社会的深刻描



尽管后来在政治上开始右倾，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还是因其在 1921－1924 年担任教育部长期间做出的贡献而值得墨西哥人民铭记。

绘而大受欢迎，并成为 1910 年革命后时代具有民族倾向的艺术家的灵感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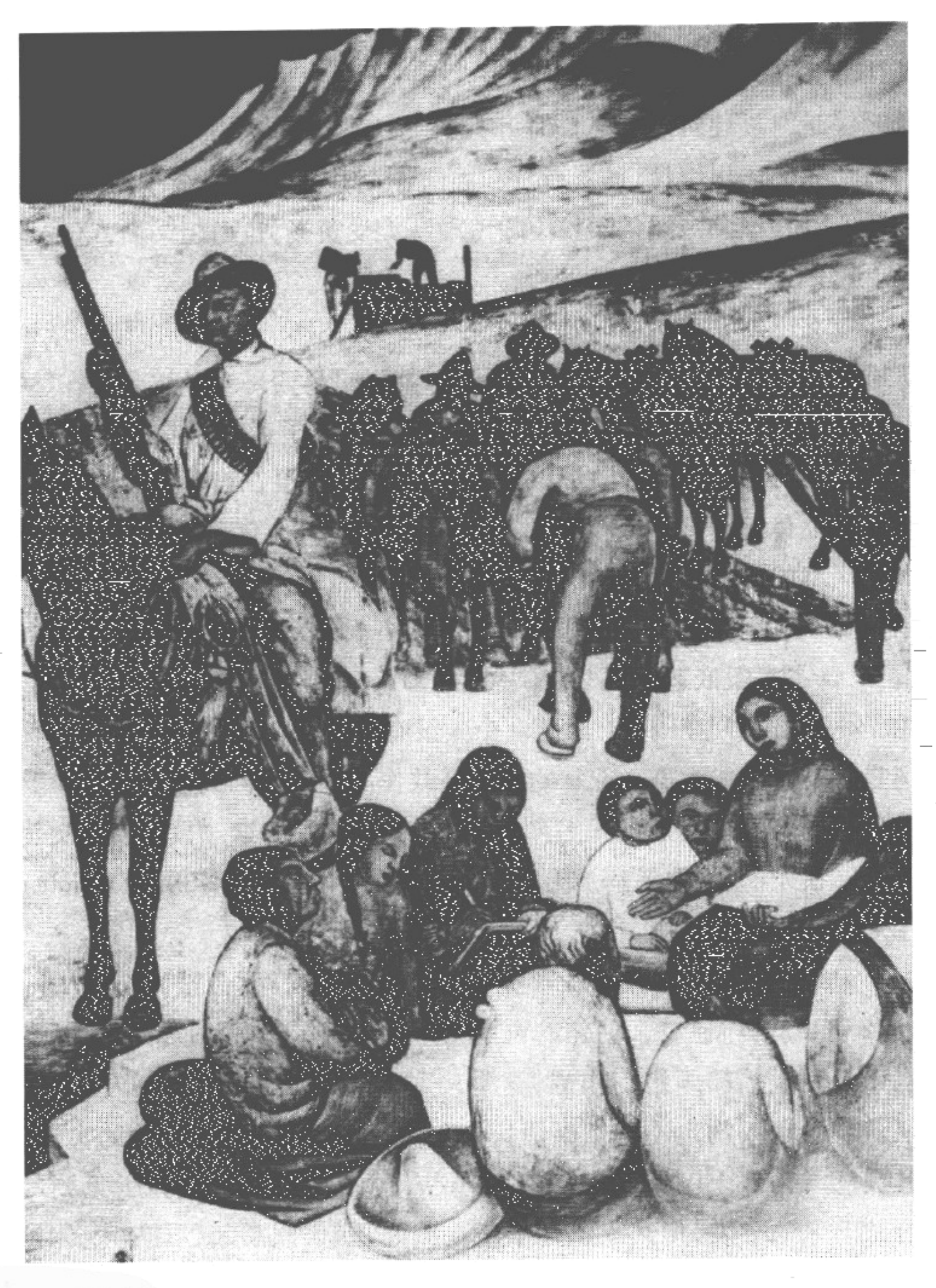
1910 年左右，一股新的气象在美院弥漫：青年画家不再去意大利而转去法国和德国留学，他们在这两个国家关注现代主义潮流，然后回国进行传播。不过艺术民族主义却更为强大。当 1910 年迪亚斯政府将资助举办一个当代西班牙大型艺术展作为独立百年庆典活动的组成部分时，美院学生在水博士的领导下举行了抗议。他要求院长安东尼奥·里瓦斯·梅尔卡多(Antonio Rivas Mercado)准许他们利用美院的墙壁悬挂墨西哥绘画和雕塑。梅尔卡多是在墨西哥独立百年庆中揭幕的独立纪念碑的设计者，他欣然同意，并与教育部长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a)一起向他们提供办展览的经费。这个展览展出了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和本土主题的绘画，如何塞·恩西索的《阿纳瓦克》(*Anahuac*)，该画描绘了一位以墨西哥风景为背景的印第安人形象。

1910 年,水博士也变得热衷于壁画装饰,他把壁画看成是一种集体事业,并组建了一个艺术中心来挑选可画壁画的公共建筑物墙壁。

虽然墨西哥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墨西哥艺术家们的工作,但从本土主题和素材中吸取灵感的民族主义潮流却依然很强大,如画家蒙特内格罗、贝斯特·毛嘉德和萨图尔尼诺·埃兰(Saturnino Herrán)描绘了前哥伦布时期和近代民间传说中的场景和人物。出生于危地马拉,1919 年到墨西哥定居的卡洛斯·梅里达(Carlos Merida)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类绘画呈现了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文学与轶事形式。他还强调,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对民族主义血脉中的色彩和成分进行探索。他本人在自己的装饰性油画中就是这么做的。简而言之,如何发展民族主义艺术在墨西哥已争论了很久。正如奥罗斯科在其自传中所说:"到了 1922 年,绘制壁画的工作台已经搭起。"

549 壁画运动的发起始终与巴斯孔塞洛斯(1882 — 1959)有关。1921 年公共教育部重新建立时,他出任部长。该部被授权领导图书馆、美术和各级教育机构,联邦政府想要在这些结构中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作为一个教育家,巴斯孔塞洛斯没有什么背景,但他是墨西哥的权威知识分子之一,并于 1909 年创建了为支持文学与哲学复兴的人们开设的论坛"青年协会"(Ateneo de la Juventud)。他后来还声称,他是受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的引导而当部长的,尽管他并不赞同后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支持乡村学校和本土教育,然而他把西方文明的经典作品教授给群众的努力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这些人认为,在一个文盲的国度里实行这种政策简直是荒唐可笑。他的努力反映出他相信墨西哥的西班牙和欧洲文化遗产具有优越性。他在他的《宇宙种族》(*Raza Cósmica*, 1922)一书中对印欧混血种人大加赞扬,但艺术史专家莱奥纳德·福尔加拉伊特(Leonard Folgarait)却观察到:"在这种混合中……土著居民可能被同化到不被承认的地步。"

巴斯孔塞洛斯资助的第一批壁画是由水博士、蒙特内格罗、恩西索等人在已属于教育部的墨西哥城的圣佩德罗(San Pedro)和圣巴勃罗



教育部长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决心要让墨西哥人民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他发起了一项在乡村地区增建学校的运动，还遴选出一批壁画家，请他们在公共建筑的墙壁上描绘出国家的历史。这幅壁画绘制在公共教育部大楼的墙壁上，名为“乡村女教师”，画家迭戈·里维拉在画中描绘了革命时期教育改革运动的情形。

(San Pablo)教堂遗址创作的。然而,人们一般都认为,壁画运动是从为国立预备学校(一所为中学生进入国立大学而设立的中学)所在的一幢殖民地时期建筑进行装饰时开始的。就是在该校,墨西哥艺术复兴的三巨头——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和其他一些画家第一次被聘请来创作壁画。预备学校中的壁画既大受赞扬,也引起义愤,这也是整个壁画运动的一大特点。

就在巴斯孔塞洛斯聘请迭戈·里维拉(1886 — 1967)在预备学校大礼堂中创作一幅壁画的时候,后者可能已是墨西哥当时技艺最娴熟、知名度最高的画家了。1898 — 1906 年,他完成了美术学院的学习后,用一笔政府的奖学金赴欧洲旅行。在那里,他沉浸在当时新艺术流派,特别是立体派(Cubism)之中。1913 — 1917 年,他创作了近 200 幅立体派风格的绘画,后来又开始受到塞尚风格的影响。1921 年离开欧洲前,他到意大利旅行,他在那里所见到的各种艺术把他弄得眼花缭乱:壁画、拜占庭镶嵌艺术、伊特鲁里亚(Etruscan)陪葬花瓶和墓碑绘画。由于里维拉长期在国外,因此他个人没有经历过 1910 年的革命,但他还是抱着创作能为群众理解的大型公共作品的愿望回到了墨西哥。当他作为巴斯孔塞洛斯的一名随从去尤卡坦旅行时,这一目标变得更为强烈。在尤卡坦,他考察了玛雅文明古迹,其中包括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虎神庙中的壁画。

里维拉在预备学校大礼堂拱形墙上创作的壁画《创造》(*Creation*, 1922 — 1923)与他后来创作的一些画不同,该画不是用通常的壁画颜料而是用金箔和画蜡制作的,这是一种应用颜料与融化的蜡油的画法。其主题人物也不特指墨西哥人。相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寓言,其灵感既来自于巴斯孔塞洛斯的作品,也受到他在意大利所见到的公共艺术的启发,但其人物形象是平面的,使人联想起他迷恋立体主义的那些岁月。里维拉赋予了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以印欧混血种的特征,并在拱墙的凹形部位画上了布满华丽植物和异国禽兽的热带场景。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 — 1974)的早年生活昭示了他

551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洛斯是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壁画家。这幅壁画局部图名为"富人的盛宴"，截选自奥罗斯科绘制在国立小学墙壁上的壁画作品《当工人们争吵时》。

成年后以政治激进主义著称的性格特点。1911年，当他还是美术学院一个13岁的学生时，就参加了反对当时的院长里瓦斯·梅尔卡多的学潮。1914年，水博士的美院院长职务因革命派内讧而被迫中断，西凯罗斯便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跟随他去了韦拉克鲁斯州的奥里萨巴(Orizaba)，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流亡美院。他后来加入了卡兰萨派将军曼努埃尔·迭戈斯(Manuel Diéguez)的参谋部，从而亲眼目睹了革命中草率的残忍和暴行。1919－1922年，西凯罗斯去了欧洲，在那里，他和里维拉一样有机会学习过去的名作，同时也变得十分了解当时最新的美学理论。1921年，他在巴塞罗那发表了一篇致美洲画家和雕塑家们的宣言。在宣言中，他赞美了机器时代的动力，表示了对未来艺术的信心，并号召现代艺术家从他们前哥伦布时代的先辈的作品中吸取灵感。

552 西凯罗斯也应邀参加了预备学校的壁画项目。1922年12月,他开始在一座小楼梯的天花板上用画蜡制作壁画。这幅名叫《元素》(*The Elements*)的壁画反映出他对意大利壁画的观察,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位天使。他在预备学校的第二幅壁画(未完成)名叫《牺牲工人的葬礼》(*Burial of the Scarificed Workers*),该画标志着他转向了公开的政治性艺术,为此,他在棺材顶上画了一副斧头和镰刀,并把此画献给不久前被杀害的尤卡坦州社会主义派州长费利佩·卡里略·普埃尔托。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1883－1949)年长于里维拉和西凯罗斯。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预备学校学生时,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左臂,视力和听力也受到了损伤。他入门较晚,在1906年进入美院前就已经学完了农业课程。1914年,他加入了水博士的队伍,一起流亡奥里萨巴。虽然奥罗斯科1915年在韦拉克鲁斯也画了一幅预示着他以后创作风格的壁画,但他为人所知却是由于他的那些尖锐的政治题材漫画和刊登在各种报刊上的年轻女孩和妓女画像。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不是很受欢迎,为此他去了美国,他带的一些画由于"伤风败俗"而被美国海关销毁。回到墨西哥后,他还是相对默默无闻,直到1923年巴斯孔塞洛斯邀请他和其他一些画家一起参加预备学校的壁画创作。1923－1924年奥罗斯科在预备学校工作期间,他的意图发生了变化,他改动甚至毁掉了自己的一些壁画。他的波提切利风格的壁画《母性》(*Maternity*)是从以大自然赠送给人类礼物为主题的系列寓意绘画的创作计划演变而来的。他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壁画则显示了他的漫画风格和对社会的阐释。譬如,其壁画《革命的"三位一体"》(*Revolutionary Trinity*)所描绘的是:中心的人物挎着一把来复枪,一顶雅各宾派的帽子遮着他的眼睛,其侧面的一个人正在为救助而祈祷,另一个人的双手已被切断。

还有一些青年画家也被邀请协助预备学校墙壁的装饰,其中有费尔南多·莱亚尔和让·沙里奥,后者是一位出生于法国但有部分墨西哥血统的画家,后来成了研究早期壁画运动史的历史学家。雷阿尔作

为原拉莫斯·马丁内斯露天画室的一个学生，用烧蜡画了一幅《在查尔马朝圣》(*Pilgrimage at Chalma*)，在该画中他希望表达在现代墨西哥的基督教大环境中对本土信仰的坚持。而沙里奥更喜欢画壁画，他把殖民征服中的一段历史——阿兹特克神庙中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作为自己的主题。

在里维拉的鼓动下，预备学校中的壁画家们于1922年末组成了技术工人、画家和雕塑家联合会。该组织忠于里维拉和西凯罗斯信奉的左派意识形态，虽然不抵制国际模式，但主张集体创作能帮助墨西哥群众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并能反映国家的本土传统。1924年，联合会创办了一份报纸《砍刀》(*El Machete*)，由哈维尔·格雷罗(Xavier Guerrero)任主编，此人曾协助过里维拉的壁画创作。根据报名的含义，镰刀不仅要砍甘蔗，而且还要去“羞辱邪恶的富人们的傲气”。该报登载了一些支持工人和农民事业的文章，但其出名主要还是因为刊载了格雷罗、西凯罗斯和奥罗斯科的木刻和绘画。该报第7期刊载了一份经常被联合会引用的宣言，联合会用它来谴责画架上的绘画，而赞扬“任何形式的纪念碑式的艺术，因为它们属于公共财产”。

553

当1924年联合会会员的壁画遭到预备学校学生毁坏时，联合会非常积极地捍卫其会员的壁画。艺术界的保守分子长期以来都对壁画持批评态度。1924年6月25日，学生们作出了反应：向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的壁画扔烂泥和石块，并且涂抹了它们。这些人还要求停止在墙壁上作画。巴斯孔塞洛斯由于自己也不是很热衷于壁画，因此很快就表示同意。联合会指责了学生的举动，同时还谴责了其他许多人：“反动的教师……富人及其走狗，他们阴谋反对所有来自人民并用之于人民的东西，……保护这些人的反动报纸，不承认自己缺乏对革命绘画的热爱的不可靠的革命者，这些恰恰揭示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十分猖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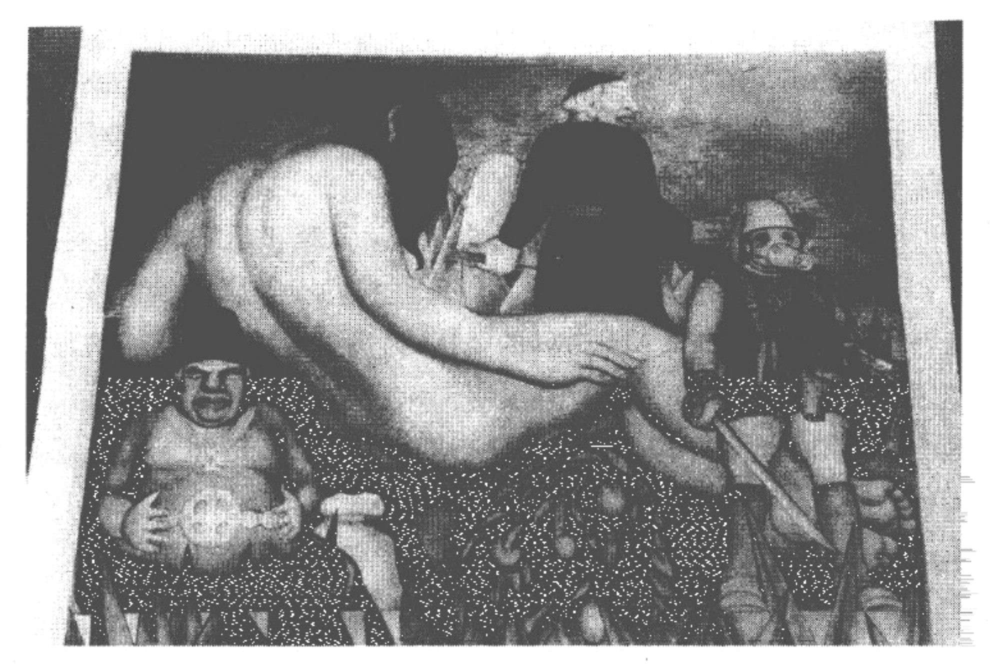
墨西哥学生联盟(Student Federation of Mexico)在答复联合会时说，预备学校是属于学生的，他们不仅有权批评壁画，而且还可以要求抹去这些壁画，并用与学校相称的绘画替代它们。一群生活在墨西哥

的外国人，如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新闻记者卡勒顿·比尔斯等，也因公开谴责损毁壁画而卷入了这场冲突。他们认为，虽然自己是外国人，但也有权利发表反对野蛮行径的讲话，因为壁画艺术"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并成为全世界的遗产……破坏国立预备学校里的壁画既是损害我们的财产，也是损害你们的财产"。

预备学校中工作的中止结束了壁画运动的第一阶段。艺术家们被解聘，联合会也随即被解散。《砍刀》后来成为墨西哥共产党的机关报，里维拉、西凯罗斯和格雷罗都是墨共的著名党员。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此时也离开了教育部长的位子。由于奥夫雷贡公然反对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继任总统，巴斯孔塞洛斯与他的关系也疏远了。损毁壁画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辞去了部长职位，回到家乡瓦哈卡州当了一阵不成功的州长。巴氏的继承者及后来的外交部长何塞·曼努埃尔·普伊赫·卡绍兰克(José Manuel Puig Casauranc)为教育部注入了更高的效率及更为官僚化的倾向，同时也引进了美国当时十分流行的教育理论。其继承者莫伊塞斯·萨恩斯(Moisés Sáenz)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曾是约翰·杜威的学生。

里维拉的创作没有因预备学校学生的骚乱和巴斯孔塞洛斯的离职而中断。1923年后，他又在新建的教育部大楼里画了一些壁画，尽管这些作品也引来了尖锐的批评，教育部长普伊赫还是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1928年，里维拉完成了在(教育部)三层建筑的两个天井的墙壁上的235幅作品，这是他壁画创作中的第一批伟大成就。这些作品既描绘了墨西哥的民间文化，也描绘了墨西哥革命激发出来的热望。第一个天井里的壁画主要描绘了墨西哥人劳动时贫瘠和阴暗的场景，而第二个天井中的许多壁画则显示了宗教和政治庆典中较为欢乐的场面。在第二天井的三楼，里维拉创作了许多描绘革命年代民谣或歌曲的组画。在第二天井里，满墙都是墨西哥人民的形象，里维拉似乎是在努力创作一幅民族的全景式图像。虽然所有的壁画都以墨西哥人的生活和传统为基础，但它们也都显示了很深的欧洲宗教绘画痕迹。因此，《矿井出口》(*Exit from the Mine*)中正在探寻什么的张开的矿工臂膀

554



这批壁画家有些作品并不太为人所知，就比如里维拉为查平戈的国立农业学校绘制的几幅。图中的这幅名为《群敌环伺的大地》，绘在这所学校的教堂的墙壁上。画中的人民之敌有神父、帝国主义侵略军和腐败的政治家，图中那位赤裸的女性则象征着大地。

使人联想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而《革命的葬礼》(*The Burial of the Revolutionary*)则令人回忆起埃尔格雷科(El Greco)1588年的名作《奥尔达斯伯爵的葬礼》(*Burial of Count Ordaz*)。

1924－1926年间，里维拉在墨西哥城附近的查平戈(Chapingo)一所新建的农业学校(现为查平戈自治大学)的墙壁上创作壁画，这些作品(尤其是小教堂中的作品)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他用类似于教育部壁画的风格，在小教堂的西壁上画了一系列描绘农民受剥削以及土地革命的壁画。在对面的东壁上，里维拉用女性裸体来表示使地球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以此与西壁上显示的革命力量交相辉映。他在小教堂祭坛的墙壁上画上了自己怀孕的妻子瓜达卢佩·马琳(Guadalupe Marín)，用该形象来代表“被解放的地球”，它成功地将自然力量(火、风和水)置于人的控制之下。

555

20年代末，里维拉的壁画正如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采取了一种

新的取向。尽管在1929年,革命的锐气已经消失,墨西哥政府也采取了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但里维拉依然享受着官方的庇护,并被委任到政府的所在地——国家宫去创作壁画。在那里,他用自己对墨西哥历史的诠释充填了国家宫中三面相邻的墙壁,描绘了前哥伦布社会的阶级冲突,追踪了墨西哥的历史轨迹:从殖民压迫,帝国主义,革命,直到马克思所憧憬的未来。同年,里维拉受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莫罗(Dwight Morrow)的委托,为另一幢重要建筑——位于莫雷洛斯州首府库埃纳瓦卡的埃尔南·科尔特斯宫制作一系列壁画。他在那里画了一段地区的历史,再次强调了西班牙人的残忍和剥削,并展示了它被莫雷洛斯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及其农民追随者解放的情形。这一年,里维拉还被墨西哥共产党开除,原因至今不明,或许与他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te)倾向有关。尽管他继续认为自己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在30年代初,他还是成为西凯罗斯与其他墨西哥和美国的斯大林分子攻击的对象,他们批评他接受了反动的墨西哥政府和莫罗这类资本家的委托。

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在被预备学校解雇后虽然还在画壁画,但他们在墨西哥获得委托的机会却相对较少。奥罗斯科在墨西哥城的桑伯恩酒店(Sanborn's Restaurant)和奥里萨巴工业学校相继完成了名为《全知》(*Omniscience*)与《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的壁画后,于1926年应国立大学校长阿方索·普鲁内达(Alfonso Pruneda)之邀,又回到了预备学校。在那里,他创作了表现墨西哥革命强大力量的壁画,如《战壕中》(*The Trench*);以及描绘西班牙征服的充满矛盾的场景,如《方济各会修士与印第安人》(*The Franciscan and the Indian*)中,一个身着长袍的修士在拥抱一个裸体印第安人时似乎是在掐他的脖子。1925年,西凯罗斯和阿马多·德拉奎瓦(Amado de la Cueva)在瓜达拉哈拉大学小教堂的墙壁上创作了壁画。此外,1925－1930年间,西凯罗斯主要代表墨共在工会中工作。

这三位大壁画家都去过美国,有关墨西哥艺术的文艺复兴的报道

早已先于他们在美国流传，而且评论界对他们三位在美国创作的壁画都褒贬不一。他们在美国的出现有时被指责为是对本土艺术家的一种公然冒犯，因为后者在经济艰难时刻都接不到画壁画的邀请。有些人对里维拉和西凯罗斯的政治理念以及将这些理念与他们的创作结合起来的做法进行谴责。奥罗斯科是第一个去美国的，他于1927年访问了纽约，当时他在墨西哥的前途看上去很黯淡。到美国之初，他的经历很艰难，没有受到重视；但最终他还是收到了三所学校请他画壁画的邀请。这三所学校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 1930)，纽约市的新学院(New School, 1931)和新罕布什尔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 1932－1934)。在达特茅斯学院，奥罗斯科用自己对新大陆发展的诠释装饰了贝克图书馆的墙壁。他把美索亚美利加文明之神——羽蛇神置于一面墙壁的中心位置，壁画显示出一种对过去和现实的悲观情绪。

556

里维拉于1930年到达旧金山，并在加州美术学院和证券交易所的墙壁上创作了壁画。以后几年，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其中包括画在特地为他准备的活动面板上的八幅壁画。在举办个人画展的五个星期内，共有5.6万人来参观，人数超过了刚刚在该博物馆举办的马蒂斯画展。

1932年，里维拉收到了为底特律美术学院画系列壁画的邀请。由于最终成品对科学和技术作了错综复杂的描绘，结果引起了一些争论，但被洛克菲勒中心的庆祝活动所淡化。后来他又受邀为美国电气公司大厦画了一幅壁画，标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Man at the Crossroads*)，里维拉利用壁画的这一标题来支持他的左派信仰，并把列宁放在壁画的中心地位。由于他拒绝去除列宁的形象，这幅几乎已近完成的壁画在1934年被损毁了。

西凯罗斯于1932年到洛杉矶的乔伊纳德美术学校(Chouinard School of Art)开设壁画课。他在学校里、奥尔维拉街广场美术中心(Olvera Street Plaza Art Center)的外墙以及电影导演达德利·墨菲(Dudley Murphy)的家中创作了壁画。位于洛杉矶市墨西哥人居住区

中心的广场艺术中心外墙上的壁画是三处作品中最有雄心的一幅。这幅名为《热带美洲》(*Tropical America*)的壁画因为象征性地描绘了美洲大陆土著居民所受的压迫,从而引起了争议,很快就被人用白色涂料涂盖掉了。

1932年11月,由于美国当局拒绝给西凯罗斯新的签证,他便离开美国前往阿根廷和乌拉圭。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报纸主编的一座乡间住宅的墙壁上创作了一幅名叫《可塑性练习》(*Plastic Exercise*)的壁画,该画在某些方面很值得注意。除了传统绘画颜料外,他使用了通常在工业中使用的硝基纤维素颜料,为此,他在作画时还使用了喷枪和钻子。此外,他还企图创造出一种"着色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整个房间将成为壁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36年,西凯罗斯作为参加美国艺术家大会的墨西哥官方代表团成员又来到纽约。他在那儿组建了一个短期实验工作室,和与他有相似思想的一些艺术家一起,力图通过为政治事件制作广告和彩车以达到为人民创作艺术的目的,并力图展现他曾在《可塑性练习》中使用的那些绘画技术和材料。他追求的是"一种为革命时代艺术所用的新的可塑性语言和一种新的、可无限丰富的绘画语汇"。

争议归争议,墨西哥的壁画家有时在美国还是相当引人瞩目的,在缺乏坚定方向和领军人物的时代,他们对北美的绘画具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他们的榜样促使美国掀起了一股壁画热潮,并得到了联邦艺术计划的支持。他们还影响了一些画家,如本·沙恩(Ben Shahn,他曾协助里维拉完成洛克菲勒中心的项目)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是西凯罗斯实验工作室的成员之一)。国外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三位壁画大师的声名,他们回到墨西哥后,又作为壁画家重新开始工作。

557

1934年,里维拉在墨西哥城的美术宫重新创作了在洛克菲勒中心被毁掉的那幅壁画。他再次表达了他在早期壁画中所持有的观念:赞美科学技术的进步,坚信资本主义的没落。在重新绘成的壁画中,列宁的形象依然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其周围是一位战士和黑、白工人们

的手。

1938－1939年，奥罗斯科在瓜达拉哈拉的卡瓦尼亚斯济贫院（现为卡瓦尼亚斯文化学院）的小教堂里创作了被认为是其名作的壁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奥罗斯科在该处创作了一幅调子阴暗却引人瞩目的人类肖像——他具有既善又恶的两幅面孔。他的有些壁画描绘了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社会和西班牙人征服期间的暴力，还有一些壁画的主题则是当今时代的独裁者和机器暴力。在教堂的天顶上，一个浑身是火的人代表了人类的创造力。

1939－1940年，西凯罗斯加入共和派军队在西班牙打了一年仗之后，回到了墨西哥，开始在墨西哥城电工协会的楼梯间创作一幅具有创新意义的壁画。他在该楼的立体墙面上画了一幅由许多连续画面组成的图画，他和他的助手选用资产阶级的形象作为壁画的主题，作画使用的又是一种工业颜料——硝酸纤维素。他把电力工业画在天花板上，而壁画的主体部分则把资本主义视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根源。

尽管画架画曾在20年代受到联合会的谴责，但里维拉、西凯罗斯和奥罗斯科在那时及后来都用油彩和其他颜料画过这类画。里维拉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一些帆布油画，如《磨玉米的女人》(*Woman Grinding Maize*, 1924)和《鲜花节》(*Flower Day*, 1925)，都描绘了土著人的生活场景，使人想起他在教育部大楼的那些壁画。西凯罗斯的《使用石臼的女人》(*Woman with Stone Mortar*, 1931)是用油彩和硝酸纤维素涂抹在粗麻布上的，它突出了其中心人物雕塑般的品质。该妇女是一个印第安人，但吸引观画者注意的是她显而易见的贫穷，而不是她的种族属性。即使在民间艺术色彩不重的《人种学》(*Ethnography*, 1939)中，一位当代印第安妇女的脸孔也被画成一个奥尔梅克的女神。西凯罗斯的《尖叫声的回声》(*Echo of a Scream*, 1937)是用釉彩画在木头上的，该画的灵感来自一幅反映当时中国战乱的照片。该画画的是一个在一堆现代物品废墟上哀嚎的孩子，这是对已经控制了世界的暴力的无声控诉。

和里维拉一样，奥罗斯科也画了许多使人回想起其壁画的帆布油画，如《路障》(*Barricade*, 1931)，该画模仿了他在预备学校里的壁画《在战壕中》。之后的 1928－1930 年，他又画了一系列关于纽约的绘画作品，代表了一种新主题的开始。在这些绘画中，如《第三大道高架》(*The Third Avenue Elevated*, 1928)，奥罗斯科运用阴暗的色调描绘了现代城市的反人性结构。

558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时，许多在国际上名气不如三位大师的画家，也创作出了一些杰出的作品。弗朗西斯科·戈伊蒂亚(Francisco Goitia, 1882－1960)，以画死亡的悲惨场景而闻名，这是以他在墨西哥革命期间担任潘乔·比利亚军队的随军艺术家时所见所闻为基础的。不过他的代表作品是《天父耶稣》(*Father Jesus*, 1926－1927)。该画所描绘的伏在一具看不见的尸体上的两个土著妇女，可以看作是墨西哥人民受苦受难的象征。安东尼奥·鲁伊斯(Antonio Ruiz, 1897－1964)以画小型油画而著名，这些画描绘了来自日常生活的细致详尽的场景，如《彩票》(*The Lottery Ticket*, 1932)和《游行队伍中的学校学生》(*School Children on Parade*, 1936)。他谜一般的作品《玛琳奇之梦》(*The Dream of Malinche*, 1932)则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带点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画的。该画描绘了科尔特斯和他的翻译兼情妇：他躺在她的身边已经入睡，在她的臀部靠着的山丘的顶上，有一座教堂俯视着一个被巨大的峡谷分割开的殖民小村。米格尔·科瓦鲁维亚斯(Miguel Covarrubias, 1904－1957)创作了一幅带有讽刺性但却充满关爱的外省学校教师肖像画《用功的学生》(*The Bone*, 1937)，但它最初是作为漫画闻名墨西哥和美国的。后来，他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收藏了一些前哥伦布时期的文物和民间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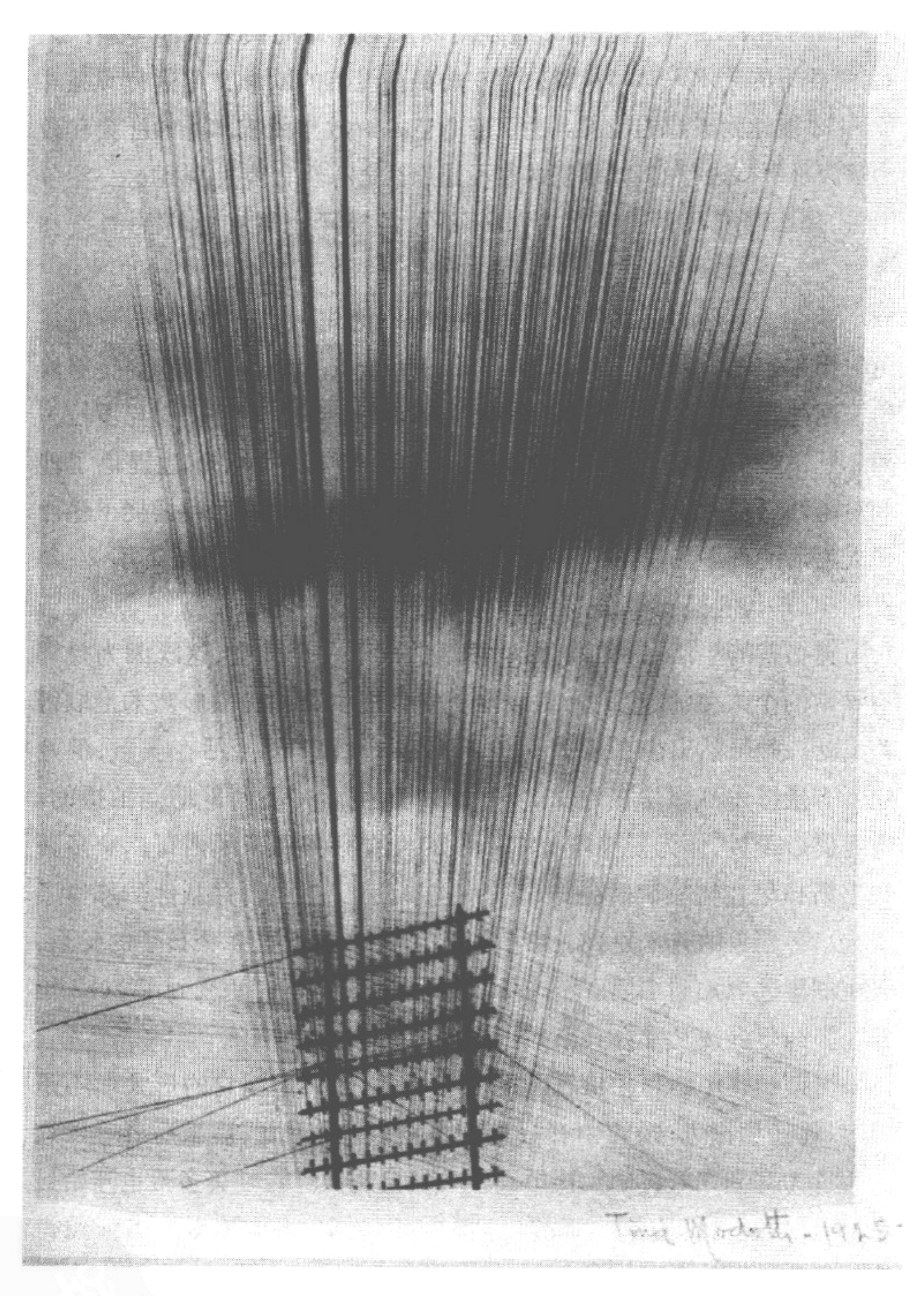
1940 年，上述这些画家、三位壁画大师以及本章中提到的所有其他画家在(墨西哥)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名为"二十个世纪的墨西哥艺术"(Twenty Centuries of Mexican Art)的大型展览。展览得到墨西哥政府的赞助，因为它将其视为可以使美国更好地理解墨西哥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科瓦鲁维亚斯描述了墨西哥近来艺

术输出的名录，强调了它的民族根基以及与革命的关系。他写道："因此，墨西哥的艺术只有与紧紧束缚它的正在没落的欧洲文化进行顽强斗争后，才能达到成熟的境界。墨西哥的艺术解放与民族本身的社会和政治解放是平行进行的，如果艺术家不是那么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这一斗争中去，那么现代墨西哥艺术就永远不可能显示出现在这样的清新和活力。"

就在墨西哥的画家忙着诠释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的时候，三位杰出的摄影家——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1896－1942）、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1902－　）与罗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Lola Alvarez Bravo，1907－1993）也提供了他们对墨西哥现实生活的视点。他们虚幻而简洁的黑白照片捕捉了墨西哥人生活的许多场景——从风景到无名的工人。他们还拍下了20年代和30年代的壁画佳作，并帮助在国外宣传这些杰作。

莫多蒂的生活在一部电影中被塑造成了一个传奇，这既因为她那不寻常的个人生活，也因为她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在摄影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她虽然出生在意大利并于1913－1923年生活在美国，但她的所有摄影作品都是在她1923－1930年生活在墨西哥期间拍摄的。她丧偶后不久，作为爱德华·韦斯顿的女友移居到了墨西哥。莫多蒂和韦斯顿早在洛杉矶时就结识了一些墨西哥流亡者，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墨西哥的艺术复兴。韦斯顿有家室，自己已是4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却想逃离加利福尼亚资产阶级生活的羁绊，同时也受到了1922年曾在墨西哥城成功举办其个人摄影展的鼓励。 560

韦斯顿在墨西哥拍摄该国的民间艺术，但只重视它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他还拍摄人像，其中有一张是迭戈·里比利亚，后来后者就以这张照片为基础在教育部大楼里画了一幅自画像。此时莫多蒂也开始显示自己的技艺，她的第一张有日期的照片是1924年拍摄的韦斯顿肖像。其他早期的摄影作品如《电报线》（*Telegraph Wires*，1925），形象地显示出她已倾向"夸张主义"了，这是一个为期不长的先锋派文艺运动，它夸大了正在墨西哥发展的现代工业生活的活力。



蒂娜·莫多蒂于1925年拍摄了这幅名为《电报线》的照片，并于1927年被一本关于夸张主义运动的历史书采用，1929年又发表在尤金·乔拉主编的现代派刊物《传统》上。

1926年，韦斯顿回到美国，而莫多蒂则摆脱了对他的依赖，继续留在墨西哥。这段时间，她已深深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于1927年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她新的情人也是共产党员，如哈维尔·格雷罗和年轻的古巴流亡者胡利奥·梅利亚(Julio A. Mella)，后者1929年和她一起走路时在她身边被杀害。她拍摄的最著名的照片都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一本左派杂志《新大众》(*New Masses*)上。其中有一幅1928年4月期刊登的集成照片，把一个工人放在一幅绅士服装广告的下面。1930年1月那期登载了她作为一名摄影家的信条："我渴望拍摄诚实的、不带虚伪和'艺术效果'或模仿其他绘画表达方式的照片。照相机是我们机械文明的产物。我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描写我们当前生活的最满意的手段而使用它。"她的摄影家生涯(期间共创作了250多幅作品)不多时就结束了。1930年，她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后来又与国内外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分歧。以后几年，她继续从事政治工作。西班牙内战期间，她主要在苏联和西班牙为共和派工作。她在共和派失败后又回到墨西哥，以后就一直在那儿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942年去世。

1927年，莫多蒂与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结为好友，后者被认为是墨西哥最伟大的摄影家。他生于墨西哥城，自学成为摄影工作者，1924年购买了他的第一台照相机。在莫多蒂的建议下，他向韦斯顿寄去了一份自己的作品全集，后者热情地回应了他。布拉沃的某些早期作品，如《木马》(*Wooden Horse*, 1925)，显示出韦斯顿对他的影响；其他一些照片则受到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Eugene Atget)的影响，此人竭力提倡不带任何自我表现的"文献式摄影"。然而，布拉沃的作品主要还是受墨西哥文化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艺术骚动的影响。他的摄影作品表面上展现了墨西哥日常生活的场景和事物，但它们传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特性使得这些作品雅俗共赏和无时间限制。在他30年代早期的三幅作品——《观望鸟的女孩》(*Girl Watching Birds*, 1931)、《舞者的女儿》(*The Dancer's Daughter*, 1933)和《蜷缩的人们》(*The Crouched Ones*, 1932－1934)中，所有人

物的脸都或是半遮，或是全遮，从而制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在另一幅杰作《被暗杀的罢工工人》(*Stricking Worker, Assassinated*, 1934)中，观者只能看到死者血淋淋的脸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作品的题目才提供了照片的环境。因此，虽然作品按说不是政治性的，但作品中的工人却可被看作工人阶级被虐待和杀害的一个象征。1924年，他与罗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结婚，1934年离婚。和莫多蒂一样，罗拉也是在其伴侣的身边开始摄影家生涯的，但她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她的许多摄影作品本质上是文献式的，尽管她也赋予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场景一种诗意特性，从而改变了这些平凡的被拍摄主体。她也试验制作集成照片，如《穷人的梦》(*Dream of the Poor*, 1935)，照片显示了一个明显穷困的青年睡在一架生产硬币的虚幻机器下面。最后，她成为天才的肖像摄影家，她拍摄的对象有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和玛丽亚·伊斯基耶多(María Izquierdo)，两者都是她的亲密朋友。

561

参加1921年百年庆典的一个常客是百年典型管弦乐团(Orquesta Típica del Centenario)，指挥为米格尔·莱尔多·德特哈达(Miguel Lerdo de Tejada, 1869－1941)，他是19世纪一位与其同名的墨西哥政治家的侄孙。正如其名字所示意的那样，这支乐团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向音乐领域的扩展。像美术界一样，20世纪墨西哥的音乐民族主义也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许多先行者。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音乐首先是紧紧追随欧洲模式的宗教音乐。然而，赞美诗是用纳瓦特尔语写成的，被称为"托克汀"(tocotín)的土著歌舞也被采纳而用作基督教的用途。以"比良西科(农夫谣)"(villancico)著称的西班牙音乐与诗歌形式在墨西哥获得了一种地方的风味，在17－18世纪期间大为流行，并成为宗教节日期间的一种欢庆歌曲。天才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写了许多"比良西科"歌词，其中一些歌词是用黑人方言或纳瓦特尔语写的。殖民地时期，墨西哥还诞生了大量传承西班牙传统的民间音乐和舞蹈。

19世纪，欧洲的主题和形式依然占主导地位，但梅莱西奥·莫拉雷

斯(Melesio Morales,1838－1908) 在 60 年代法国入侵期间尝试创作了一部独幕歌剧《阿妮塔》(*Anita*)。阿尼塞托·奥尔特加(Aniceto Ortega,1823－1875) 创作了爱国主义的赞美诗和进行曲,如纪念 1862 年 5 月 5 日成功抵抗法军的《萨拉戈萨进行曲》(*Marcha Zaragoza*),以及歌剧《瓜提莫钦》(*Guatimotzin*)。这部讲述阿兹特克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作品于 1871 年在墨西哥城首演,墨西哥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安赫拉·佩拉尔塔(Angela Peralta,1845－1883)饰演阿兹特克公主。这部作品代表了墨西哥将前哥伦布时期的音乐元素融合到流行的意大利歌剧风格中去的首次尝试。

1921 年参加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的"墨西哥之夜"的作曲家中有曼努埃尔· 庞塞(Manuel M. Ponce,1880－1948)。庞塞作为歌曲《小星星》(*Estrellita*, 1914)的曲作者而闻名于世,他是一位音乐民族主义的先锋,像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一样,运用起源于西班牙的墨西哥民间音乐作为创作浪漫主义风格的艺术音乐的基础。他在 1913 年这样说道:"我把这看作是每一个墨西哥作曲家的职责。我赋予它艺术的形式,给它穿上复调音乐的外衣,以此来爱护和保留民间音乐,因为它们是故乡灵魂的表现。"交响诗《查普尔特佩克》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后又加以修改,这是他最为著名的以民族乐语写成的管弦乐作品。 562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卡洛斯·查韦斯(Carlos Chavez,1899－1978)的声名比庞塞更盛。由于他将民间的和本土的素材与深受斯特拉文斯基和其他当代作曲家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融为一体,因此成了墨西哥音乐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查韦斯曾在墨西哥城师从庞塞等人学习钢琴与和声,他在十多岁时就表示赞同墨西哥音乐的民族主义方向。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传统与革命歌曲的改编,如《阿黛丽塔》(*Adelita*)和《库卡拉恰》(*La Cucaracha*, 1915)。1921 年,巴斯孔塞洛斯邀请他创作一部阿兹特克主题的芭蕾舞剧,由此形成的作品《新火焰》(*El fuego nuevo*)中便隐含他孩童时在特拉斯卡拉听到过的土著音乐。

20 世纪 20 年代,查韦斯周游了欧洲和美国,这使他深受现代主义音乐流派的影响,他也因此结识了另一个音乐民族主义者亚伦·科普

兰(Aaron Copland),他们后来成了好友。在以后 20 年的许多作品中,查韦斯都吸取了墨西哥元素。譬如,在 1932 年公演的芭蕾交响乐《蒸汽之马》(*Caballos de vapor*)中,他就运用了墨西哥民间舞蹈的音乐以烘托热带的色彩,并以此与北美的工业社会形成一种对比。单乐章的《印第安交响曲》(*Sinfonía India*, 1935 — 1936)的主题结构得自于索诺拉和纳亚里特的印第安旋律,并用土著鼓、搓板、拨浪鼓,以及一些更为传统的乐器来进行配乐。短曲《花王子》(*Xochipilli*, 1946)也运用了土著打击乐器来创造被他称为"一种想象的阿兹特克音乐"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查韦斯对墨西哥音乐的影响远不止是他的作品。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他组织了一系列音乐会,向墨西哥城的听众介绍了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及其他现代作曲家的作品。1928 年,他成为墨西哥交响乐团的指挥,他创作的一首合唱曲因其质量和技巧而赢得国内外的喝彩,从而使得新音乐可与一流作品媲美。他决心要创作适合于所有阶级的杰出音乐。为此,他先是在墨西哥城公园,后又在美术宫为工人举办了一系列免费的交响音乐会。他还重建了国立音乐学院(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并在 1928 — 1934 年间担任院长。最后,他启发和教育了赞同音乐民族主义的其他音乐家。这些音乐家中的佼佼者有西尔韦斯特雷·雷乌埃塔斯(Silvestre Revueltas, 1899 — 1940),他在 1928 — 1934 年间担任墨西哥交响乐团的指挥助理。雷乌埃塔斯在十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有一系列民族导向的作品,如交响音诗《七彩》(*Colorines*, 1932),该曲以对墨西哥民间音乐的和声与旋律模式进行了独特的改编而闻名。他还为一些墨西哥影片配乐,如《传说》(*Redes*, 1934)和《让我们与潘乔·比利亚一起走》(*Vámonos con Pancho Villa*, 1935)。

563 1920 年后,墨西哥文学也经历了一个复兴时代,不过没有像美术和音乐那样被一个单独的派别或运动所主导,而且获得的国际声誉也较小。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较少强调民族主义的主张,这是因为 19 世纪的作家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而它们即便不在形式上,也在对象和主题上完全墨西哥化了。19 世纪墨西哥文学的开篇之作为何

塞·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e Fernandez de Lizardi，1776－1827）的流浪体道德说教小说《癞皮鹦鹉》（*El periquillo Sarniento*，1816）。1942年凯瑟琳·安娜·波特将该书翻译成英语，改名为《贪心鹦鹉》（*The Itching Parrot*），该书被普遍认为是墨西哥的第一部小说。

1871年，自由主义活动家和作家伊格纳西奥·阿尔塔米拉诺（Ignacio M. Altamirano，1834－1893）向其同胞号召，宣告墨西哥在知识活动中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并要创作一种反映墨西哥语言和环境的民族主义文学。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遵循了这些主张，特别是在小说《山上的圣诞节》（*Navidad en las montañas*，1871，英译本于1961年出版），《蓝眼盗：1861－1863年墨西哥生活轶事》（*El Zarco: Episodio de la vida mexicana en 1861－63*，1901，英译本出版于1957年，改名为《蓝眼强盗》[*El Zarco: The Bandit*]）。其他小说家也跟着这么做了，其中费德里科·甘博亚（1864－1939）于1903年发表了《圣女》（*Santa*），这是一本描写妓女的自然主义小说，因其对墨西哥城生活场景的描写而闻名。他去世前不久，诗人拉蒙·洛佩斯·维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1888－1921）写出了《温柔的祖国》（*Suave patria*），该诗直到1932年才得以出版。维拉尔德在这首讴歌其故乡土地的抒情诗中没有提及不久前刚发生的革命，而是赞扬了故乡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传统与民间传说。

1920年后，夸张主义（Estridentismo）运动以及与《现代》（*Contemporáneos*）杂志有关的运动至少部分地从当代欧洲和北美洲的文学流派中寻找灵感。然而，20年代最有意义的文学发展还是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兴起，它力求纪实式地描述过去十年中的暴力和混乱。

夸张主义是律师和诗人曼努埃尔·马普勒斯·阿尔塞（Manuel Maples Arce，1900－1981）创立的，他企图按照欧洲先锋派的路线来复兴墨西哥的诗歌。1921年，他发表了宣言《当前第一》（Actual Número Uno），呼唤用一种新的文学来反映当前机器时代的特点，这种文学是从本土元素中诞生的。他后来成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小团体的核心，这些人出版了几期短命的杂志，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地平

线》(*Horizontes*, 1926－1927)。该杂志在韦拉克鲁斯州的哈拉帕市出版,并以拉蒙·阿尔瓦·德拉卡纳尔(Ramón Alva de la Canal)为它所作的画面设计以及刊印了一些韦斯顿和莫多蒂拍摄的照片而出名。马普勒斯·阿尔塞最有名的作品是《乌尔韦》(*Urbe*, 1924),这是一部长诗,宣扬了墨西哥城的活力和城内工人的斗争。1929年,此书被译成英文,改名为《大都市》(*Metropolis*),译者为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壁画家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墨西哥艺术界的主流力量。但此时,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探索新的与革命无关的主题。《当代》(*Contemporaneos*)就为写作和其他高雅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观点提供了一个表达声音的平台。

影响最为持久的"当代"集团,是与某些文学评论杂志——如《尤利西斯》(*Ulises*, 1927－1928)和《当代》(1928－1931)——联在一起的一个集团。这些杂志主要由墨西哥作家撰稿,但它们的许多版面也登载包括北美作家在内的外国作家的诗歌和散文。这个集团的成员也力图通过演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等现代戏剧家的舞台剧来振兴当时被西班牙剧团和剧目统治的墨西哥戏剧。该集团的大同主义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招来了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的批评,后者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同反革命,不关心

墨西哥的事物。该集团最有名的两个成员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Xavier Villaurrutia，1903 — 1950)和萨尔瓦多·诺沃(Salvador Novo，1904 — 1970)是知名的同性恋者，这更加重了这些批评。

比利亚乌鲁蒂亚写了许多舞台剧，但传世的主要还是他的抒情诗，尤其是诗集《怀念死亡》(*Nostalgia de la muerte*，1938)，并于 1993 年被译为英语。由于这些诗充满了他们对人类生存的忧伤和痛苦，因而证实了美国批评家弗兰克·道斯特(Frank Dauster)对他的评价："比利亚乌鲁蒂亚是'表达我们这个被撕裂的世纪中的人的根本性孤独的第一个墨西哥人'。"诺沃在其漫长的作家生涯中也写了许多诗歌和非小说散文，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戏剧方面：他既是制作人，也是导演，还是剧作家。他的作品有剧本《约卡斯塔或卡西》(*Yocasta，o casi*，1961)和小说《胖子们的战争》(*La guerra de las gordas*，1963)。后者是一部描写墨西哥革命的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始于 1910 年的革命巨变的长篇叙事散文。许多这类小说主要侧重描写 1910 年后数十年内的军事冲突，而另一些则侧重叙述平民，或以 1920 年后的年代为背景。这些作品往往作轶事性甚至是电影式的描述，因为它们的描述都是短场景，并缺少心理的深度。它们经常是自传式的，该集团一些最有名的作品实际上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个人经历的叙述。虽然所有这些作品的背景、主题和人物都是民族性的，完全是墨西哥式的，但它们对墨西哥革命及其成就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观点。这些作者好像是在批评或反省他们描写的人民和事件，其感情是既爱又恨的。

565

《底层的人们》(*Los de abajo*，1915，1929 年被译成英语，译名《受压迫者》[*The Underdogs*])是第一本革命小说，也是这类作品中公认的杰作。其作者马里亚诺·阿苏埃拉(Mariano Azuela，1873 — 1952)原本是内科医生，至 1910 年，他已发表了三部小说，并在潘乔·比利亚的军队中服役。1915 年，《底层的人们》在埃尔帕索市(美国)的西班牙语报纸上连载，1916 年出版成书。该书叙述了一支由德米特里奥·马西亚斯(Demetrio Macías)领导的农民革命军的发展，也表达了作者自

己的信念：斗争是无益的。小说中，马西亚斯第一次反抗的是韦尔塔的联邦部队，此后又无鲜明目的地反抗卡兰萨的部队。当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要斗争时，他的回应是向山沟里扔去了一粒小石子，并看着它滚落下去。书中的另一个人物阿尔韦托·索利斯(Alberto Solís)通常被看作是阿苏埃拉的代言人，他在回答相同的问题时把革命比作为飓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被风暴席卷的可怜枯叶。"路易斯·塞万提斯(Luis Cervantes)是书中唯一一个把革命说成是为自由与正义斗争的人物，但他却是个曾反对过马德罗并支持过韦尔塔的投机分子和叛徒。

阿苏埃拉还写了其他一些侧重于描写革命期间中上层市民的小说，如《酋长们》(*Los caciques*, 1917, 1956 年被译成英语出版[*The Bosses*])、《苍蝇》(*Las moscas*, 1918, 1956 年被译成英语)和《一个体面家庭的烦恼》(*Las tribulaciones de una familia decente*, 1919)，他批判了这些人的犬儒主义和贪污腐化，但也批判了更低阶层的愚蠢和粗野。他本人是这样写自己对革命的态度的："我的责难是指向人而不是思想的——因为人使所有的事物都腐败了。"

《鹰与蛇》(*El águila y serpiente*, 1928, 1930 年被译成英语)的作者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Martín Luis Guzmán, 1887－1976)，这是 1925－1936 年他生活在西班牙时写成的。此书是作者本人 1913 年起的个人经历的小说化回忆录，当时他因反对韦尔塔而逃亡美国；1915 年时又因古铁雷斯政府倒台而离开墨西哥。但这本书的主导人物是潘乔·比利亚，古斯曼对此人敬畏交加。后来，他在半虚构的《潘乔·比利亚回忆录》(*Memorias de Pancho Villa*, 1951, 1965 年被译成英语)中，又把这位北方的革命者描写成一位没有缺点的英雄。

古斯曼的另一部主要的文学作品《考迪罗的阴影》(*La sombra del caudillo*, 1929)直到 1938 年才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与大多数革命小说不同，它叙述的是 1920 年后一个虚构的总统竞选故事。故事中，没有姓名的考迪罗利用背叛和谋杀确保了他选中的候选人成为他的继承人。对于墨西哥读者来说，小说使人们想起了真实的事件，特别是

1928 年弗朗西斯科・塞拉诺(Francisco Serrano)将军和阿努弗・戈麦斯(Arnulfo Goméz)将军反对奥夫雷贡再次参选的未遂兵变。古斯曼在书中描写了独裁，但书中主角伊格纳西奥・阿吉雷(Ignacio Aguirre)将军及其支持者的缺点使作者的信念更为明确：墨西哥政治体制的缺陷不能仅仅只怪罪于"考迪罗"(caudillo)。

《克里奥尔人尤利西斯》(*Ulises criollo*, 1935)通常也被认为是一部经典革命小说，这是巴斯孔塞洛斯五卷本自传的第一部，描述了作者本人的生活，一直到马德罗被杀害，而作者也是马德罗的支持者。巴斯孔塞洛斯之所以选择"尤利西斯"为书名，是因为作者以及当代墨西哥人的经历就像尤利西斯长期航行在海上一样，漂泊不定；而作者又加上了一个"克里奥尔人"(欧洲人后裔)则是为了颂扬墨西哥的西班牙遗产。内利耶・坎波贝略(Nellie Campobello, 1900－　)的《炮弹壳》(*Cartucho*, 1931，1988 年被译成英语)是该集团中唯一一部女作家写的著作，它同样也是一部个人叙述。此书由 56 个短篇故事构成，声称是一个小女孩在讲述北方小城里的革命。作者简洁、朴实的文笔使得血腥和残暴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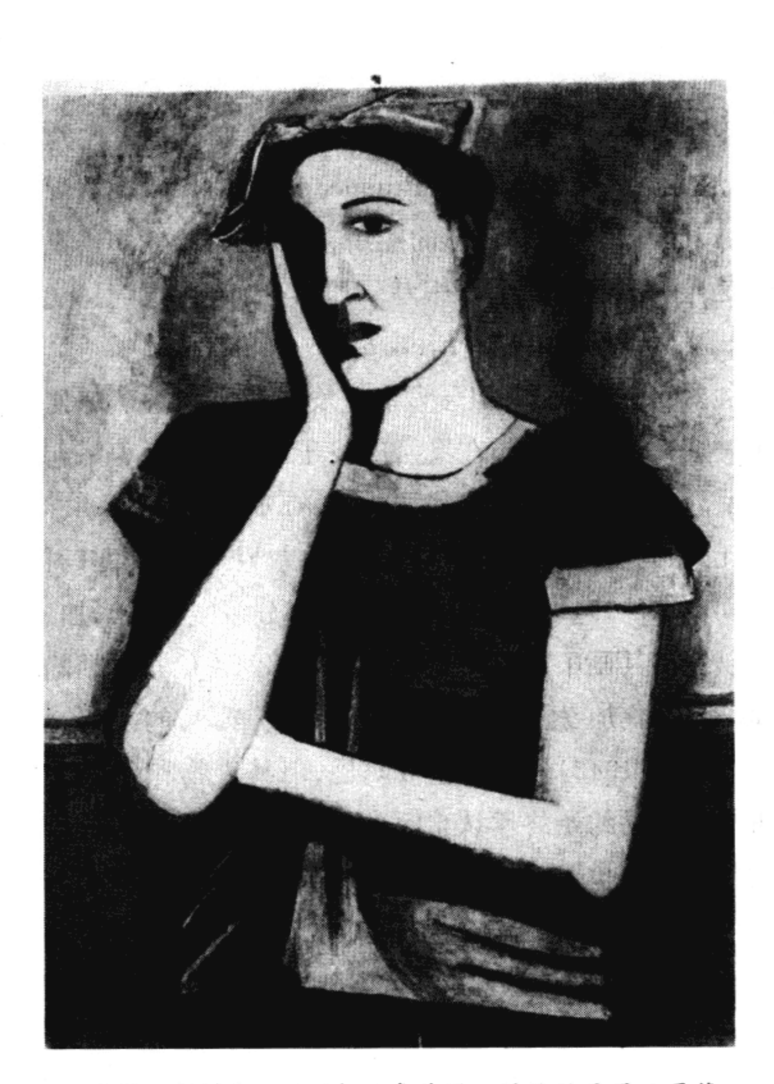
1934 年，正当拉萨罗・卡德纳斯(Cazáro Cárdenas)就任总统，并兴起了一个更为鲜明的本土主义(indigenismo，印第安人运动)的时候，几部以印第安人为主角的小说也出现了。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Gregorio López y Fuentes, 1897－1966)的《印第安人》(*El indio*, 1935，1937 年被译为英语)。作者本是个记者，已出版过三部小说：《军营》(*Campamento*, 1931)、《土地》(*Tierra*, 1932)和《我的将军》(*Mi general*，1934)。《印第安人》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级文学奖，它把民族学知识和叙述结合在一起，描写了一个无名的土著部落。该部落的成员是少言寡语的，他们不信任白人和混血种人，因为后者总是虐待和背叛他们。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土地，但其他东西则很少有变化。毛里西奥・马格达雷诺(Mauricio Magdaleno, 1906－1986)的《日光》(*Resplandor*, 1937，1944 年被译为英语)甚至更为阴暗地评价了革命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书中，贫困的印第安村庄希

望革命使他们得到邻近庄园未开垦的土地,但他们被一位地方领导人欺骗了,此人后来当上了州长。

对革命者进行政治改革的承诺的幻灭,同样也反映在墨西哥戏剧领军人物鲁道夫·乌西格里(Rodolfo Usigli, 1905－1979)的剧本《做手势》(*El gesticulador*)中。该剧本写于1938年,但直到1947年才上演。该剧是围绕被误认为几年前失踪了的传奇革命将军的一位不成功的大学教授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密谋揭示了当代政客的虚伪和他们空洞的花言巧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墨西哥画家远离壁画派特有的具有说教性和公开性的政治主题,创作出了另一些绘画,这些画一看就知是墨西哥的,并且充满了个人的或审美的关切。这一倾向在1938年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法国诗人和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到访后更为加剧,此人把超现实主义传到墨西哥。在流亡的俄国共产党人托洛茨基(他已在墨西哥寻求避难)的协助下,布勒东和里维拉起草了一份宣言,谴责苏联等国将各种限制强加于艺术家。他们认为,艺术家的想象力需要不受高压政治压制的自由,坚持艺术家有一种选择自己主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40年,布勒东还帮助组织了墨西哥第一届超现实主义国际展览会。这个展览中有毕加索、汉斯·阿尔普(Hans Arp)、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以及里维拉、安东尼奥·鲁伊斯(Antonio Ruiz)等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也展出了作品,他的照片《冬景》(*About Winter*)成为展览会目录册的封面装饰。由于布勒东的访问,墨西哥艺术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声望,以至激发了一些欧洲艺术家,如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雷梅多·瓦拉(Remedos Vara)、莱奥诺拉·卡琳顿(Leonora Carrington)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墨西哥。尽管对墨西哥人受到超现实主义影响的程度仍存在着争论,但这方面的发展也加深了墨西哥人对艺术新手法的知晓。

另一类艺术倾向的早期代表是鲁菲诺·塔马约(Rufino Tamayo, 1899－1991)。1917－1921年,他曾断断续续地在美术学院学习,后



在壁画家群体之后崛起的鲁菲诺·塔马约是墨西哥第一位赢得世界范围关注的艺术家。图为他的经典作品之一《一个女人的肖像》。

被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聘用，在那儿，他有了学习民间艺术和前哥伦布时期雕塑的机会。1926 年，他与卡洛斯·查韦斯一起前往纽约，他们俩共住在一间阁楼房间内。塔马约后来回忆说："查韦斯创作爵士乐曲，而我则不得不为多挣点晚饭钱而为一个餐厅的厨房作画。这是艰难的岁月，有时我整个星期只靠 7 个苹果生活。"1928 年，塔马约回到墨西哥；1936 年又去了纽约，在那儿待了整整十年，但定期会回墨西哥。在纽约，他第一次接触到欧洲艺术的最新潮流，并于 30 年代在那儿成

了名。

塔马约在墨西哥和美国都画过壁画,但人们首先记住的是他的那些画架画,这些画显示出布拉克(Braque)、毕加索和其他现代艺术家的影响。不过,这位艺术家对色彩的应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主题的选择还是显示出他的墨西哥根基。他十分有名的早期静物写生《曼陀铃与菠萝》(*Mandolins and Pineapples*, 1930)是一幅习作,虽然乐器反映出他对音乐的兴趣,但菠萝和一支孤零零的香蕉却使人联想到他的童年时期——当时他与在墨西哥城开水果店的姑妈一起生活。与这幅画相反,立体主义的《狮子和马》(*Lion and Horse*, 1942)没有外显的墨西哥元素,马看上去像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那匹同样的动物。《动物》(*Animals*, 1941)的灵感虽然有一部分可能源于毕加索的作品,但还是可以看出其画中的动物与墨西哥西部前哥伦布时期的犬类雕塑之间的联系。毕加索的影响在他的《纺羊毛的妇女》(*Woman Spinning Wool*, 1943)一画中也很明显,但其人物和色彩从根源上还是墨西哥的。塔马约始终承认自己的墨西哥根基,但他对壁画家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提出了批评。他晚年表示:“我之前的画家们——壁画家,企图创立墨西哥画派。但在我看来,那是冒牌的。艺术是全世界的,任何民族主义类型的艺术都意味着局限。显然,壁画家并不关心世界性。这是一种纯粹的沙文主义,我从一开始就反对。”

1929－1933年,玛丽亚·伊斯基耶多(1900－1955)是塔马约的伴侣,那一时期她的作品显示了与塔马约在主题方面的相似。她回避政治性的主题,在画面上注入墨西哥民间文化的外形和色彩。她画过马戏团的人物、寓言和肖像,主要是妇女肖像,如《我的侄女》(*My Nieces*, 1940),此画因其色彩华丽和卢梭式的花叶背景而著名。但她最受推崇的作品可能是静物写生画。其中有些画用明亮的色彩描绘了碗橱和家庭祭坛,如《祭奠悲伤圣母》(*Offering for Our Lady of Sorrows*, 1943)。她把她的一些画称为“活生生的静物写生画”,她描绘的水果、鱼和其他生物都被放在一个荒芜的背景中,以显示出这些物品的触感和质感。1945年,她应邀为墨西哥城市政府创作一幅壁画,

尽管有两位美国画家姊妹格蕾丝(Grace)和玛丽昂·格林伍德(Marion Greenwood)也曾在墨西哥画过壁画，但伊斯基耶多是第一个接受这类邀请的墨西哥妇女。由于三位壁画巨头质疑她的技巧和能力，她的合同被迫中断，她对此万分愤怒，公开抨击"三巨头垄断"。不久，她又受到一次阻挠她作画的打击。

569

弗里达·卡洛(1907－1954)的作品也是充满墨西哥特色的，尽管这些作品主要是她个人充满痛苦、失望和孤独的艰难生活的写照。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德国犹太摄影家，母亲则是墨西哥人，她自己是第一批到国立预备学校上学的女学生。1925年，她的学业在一次交通事故后不久就中断了，此次事故使她的骨盆、脊椎和右腿骨碎裂，并碾碎了她的右足。她在康复时期开始画画，并把她的作品拿给里维拉看，里维拉鼓励了她。1929年，她嫁给了里维拉，当时后者与瓜达卢佩·马琳的婚姻已经终结。弗里达的双亲听到人们这样形容她与里维拉的婚姻："这是大象与鸽子之间的婚姻。"男方无数次的不忠损害了他们的婚姻，也给她带来了痛苦，但她本人也有一些风流韵事。1939年，两人离婚。1940年，弗里达再次结婚。她不能怀孕生子据说也是她痛苦的一大原因。

弗里达与里维拉的关系是她绘画的中心主题，这可以从《弗里达与里维拉》(*Frida and Diego Rivera*，1931)中看出。该画带有一种朴素的19世纪风格，在画中，她把自己画得很矮小，穿着自从她遇到里维拉后就开始穿的那种墨西哥民间服装。她与里维拉一起的其他画像显得不怎么高兴。在《穿着特瓦纳人服饰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s a Tehuana*，1943)中，她戴着以美丽和独立著称的特万特佩克地峡妇女的头巾。她的额头上有一幅很小的，表情冷漠，显得无动于衷的里维拉的肖像。另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则是1925年的车祸给她造成的在整个成人生活中不得不忍受的肉体痛苦。《断裂的脊梁》(*The Broken Column*，1944)是她接受了多次手术后画的一幅自画像，当时她穿着一个钢制的背心以帮助她减轻脊椎上的痛苦。该画很有说服力地传达了她的痛苦，不过其中没有自我怜悯。

1938年，当布勒东看到弗里达的绘画时，他声称这些画显示出"纯

粹的超现实主义”,尽管作者事前并不知晓这一运动。无论哪个阶段,墨西哥特性都是她绘画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在《我的护士和我》(*My Nurse and I*, 1937)一画中特别引人瞩目地显示了出来:该画中,画家被描绘成一个具有成人面孔的婴儿,正在一位印第安妇女的胸前吃奶,而这位妇女无表情的粗糙面庞和结实的体形使人回想起前哥伦布时期的雕像。

1910－1920年间的事物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记忆,而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却持续困扰着墨西哥,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对整个革命进行质疑,认为它与迪亚斯时代并没有断然决裂,而是具有延续性。即使如此,革命依然还是作家和画家灵感的一个似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哪怕这些人运用了新的手法和主题。阿古斯丁·亚涅斯(Agustín Yáñez, 1904－1980)的《在水边》(*Al filo del agua*, 1947,1963年被译为英语)是一部典型的革新派小说,描写的是哈利斯科州(Jalisco)的一个小村庄在革命前数月的生活。该书强调村庄里的清教徒神父们所制造的愚昧的社会环境,以及因来自较大社会的人物偶然闯入而造成的紧张,作者减少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对革命产生的影响,而至少是部分地将革命视为一种对性压抑的反应。

570

对革命结果的幻灭依然是文学经常性的主题。阿苏埃拉的最后一部小说,在其去世后出版的《那些血》(*Esa Sangre*, 1956)中,又重塑了那位胆小的农场主胡利安·安德拉德(Julián Andrade),这是作者早期的小说《坏树叶》(*Mala yerba*, 1909,1932年被译成英语)中的一位人物。《坏树叶》是对大地主镇压农民的一个控诉,而到了《那些血》中,环境已经改变,但革命后的那代人在道德上并不比胡利安好多少。也许对革命及其所制造的社会的最好控诉是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1928－)的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 1962)。富恩特斯将内心独白与第三人称叙述合为一体,描写了一位革命老战士在临终前,回忆自己如何通过背叛和投机攫取权力和财富。

三位壁画大师一直活跃到生命的尽头,用自己对墨西哥及其革命基本肯定的观点涂抹着墙壁,没有表现出同时代文学所表现的那些苦

难。1942 年，里维拉又回到国家宫，开始在第二层楼上创作一系列壁画组画，这些画极为细致地描绘了一种理想化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历史场景。其中的一幅壁画《伟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城》(*The Great City of Tenochtitlán*, 1945)可与其 1951 年的作品《在韦拉克鲁斯登陆》(*Disembarkation at Veracruz*)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后者把科尔特斯画成一个丑陋的梅毒病人。里维拉后期壁画中值得注意的一幅作品是他于 1947－1948 年间在墨西哥城普拉多公园附近的普拉多饭店(Hotel del Prado)大堂里画的《阿拉梅达公园星期日午后之梦》(*A Dream of a Sunday Afternoon in Alameda Park*)。该画把里维拉画成迪亚斯时代的一名少年，他握着一只骷髅的手，而骷髅又握着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的手，后者因此被认为是里维拉的艺术导师。在挤满人群的场景中簇拥在里维拉周围的有来自他个人生活和墨西哥历史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物。

1947－1948 年，奥罗斯科在墨西哥城的国立师范学院露天剧场内创作了他最大的单幅壁画《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该画高 59 英尺，阔 72 英尺。画家使用了乙醛硅酸盐颜料以确保壁画不受天气的侵蚀。这是一幅抽象作品，它与建筑物本身极为辉宏地融为一体。然而他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国家历史博物馆里创作的壁画《华雷斯，教会与帝国主义者》(*Juárez, the Church and the Imperialists*, 1948)，则更像其早期作品。

西凯罗斯晚年在政治上依然很活跃。1960－1964 年，他因力图为政治犯代言和批评政府被捕入狱。但他主要的两幅壁画却是在晚年创作出来的。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他用丙烯酸颜料创作了全景式壁画《自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以来》(*From the Dictatorship of Porfirio Diáz*, 1957－1965)。迪亚斯时期的腐败社会与革命时期的起义人民在画中形成鲜明对照。有一幅描绘了诺加莱斯(Nogales)附近的边境小城在 1906 年发生的卡纳内亚矿工罢工的壁画，展示了一场为升降墨西哥旗帜的斗争；该画既显示了西凯罗斯相信美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现实，也可看作是他在诠释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571



戴维·阿尔法罗·西奎埃洛斯是壁画三巨头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是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这一角色最终导致他被捕入狱。1960 年 8 月，在墨西哥城发起了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游击战后，他被捕入狱。

莱奥纳德·福尔加拉伊特曾详细地叙述了 1967－1971 年间西凯罗斯为墨西哥城"多元论坛"(Polyforum)会堂创作的最后一幅大型壁画所引起的争论。西凯罗斯及其助手在 12 面厚重的外墙上以及椭圆形的内堂内画上了壁画。内堂的那幅壁画名为《人类的进军》(*The March of Humanity*)，覆盖了除地板外的整个内堂，因而把观画者完全包围起来。一些人把这幅画称为西凯罗斯最伟大的成就；另一些人在它抽象形式的漩涡中却看不出什么审美或政治的意义；还有一些人则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了批评："多元论坛"是私人所有的一个开发项目的一部分，而观看西凯罗斯的内堂壁画的人主要都是来自国外的付费旅游者。1971 年 12 月 15 日，时任总统的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和来自墨西哥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名人们出席了"多元论坛"的开幕庆典。他们称颂西凯罗斯的这幅作品是墨西哥 50 年的壁画运动最适合的纪念碑。

尽管1945年后壁画运动在墨西哥依然流行，但年轻的画家加入了塔马约的阵营，向里维拉、西凯罗斯及其追随者所代表的墨西哥民族画派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在1956年一篇名为《仙人掌幕帘》(*The Cactus Curtain*)的文章中，何塞·路易斯·奎瓦斯(José Luis Cuevas，1934－　)抨击了墨西哥画派继续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认为这扼制了创作自由，并隔离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发展。他写道："我希望我们国家的艺术走的是一条通往世界各地的通衢大道，而不是连结一个土村子与另一个土村子的羊肠小径。"此外，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其他地方也在重新评价墨西哥的壁画运动，特别是对里维拉作品曾经拥有的热情也有所改变。1974年，塔马约的传记作者埃米莉·格瑙尔(Emily Gennauer)注意到，壁画家的声名已经下降(奥罗斯科除外)，而塔马约这颗明星却已升起。"今天，他们这些壁画家被看作是一群非常有天才，但却被夸大其成就的、解说和说教式的画家，精神饱满但并不具有真正的创造性。"确实，在抽象的表现主义风行和冷战加剧的时代，里维拉或西凯罗斯说教性和高度政治化的壁画在国外是不会引起好感的。与此同时，随着1984年一部讲述弗里达生平的墨西哥电影《弗里达，活生生的大自然》(*Frida, naturaleza-viva*)上映，弗里达也变成了世界各地女权主义者和艺术爱好者的偶像。

572

两年后，作为里维拉诞辰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底特律美术学院举办了一个里维拉作品回顾展，并借此机会对里维拉的艺术重要性进行了更为积极的重新评价。1990年，洛杉矶的工人修复了西凯罗斯那幅已经被严重损害的壁画《热带美洲》，现在它已被许多人认为是一幅重要的艺术作品。因此，当20世纪接近末尾而墨西哥革命百年纪念日益临近的时候，墨西哥壁画家、作家和音乐家的作品不但作为一种艺术成就，而且也作为对文化民族主义(它是那场革命最为不朽的遗产之一)的一种令人难忘的记录，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

57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的人民和需求发生了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性改革并不能为大量增加的墨西哥人口提供生计，那些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城市化了。虽然执政当局将其官方政治组织的名称改为革命制度党（PRI，旧译“立宪革命党”），但它主要凭借革命的华丽辞藻解释其政策。在1968年学生暴乱之后，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些革命辞藻的空洞声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见证了文官统治的肇始、新的经济发展、城市的扩张，还有出口的繁荣，尤其是石油出口。然而，事实证明这些进步的代价巨大。文官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官僚腐败的终结和民主发展的开端。虽然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一些工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岗位和某种幸福感，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它们带来的只是失业、不充分就业，他们只能通过在政府监管和征税范围之外运行的地下经济（包括犯罪）勉强谋生。虽然工业确实在增长，但这种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只体现为一组统计指标的变化。与其说墨西哥政府在研究实实在在的工资、利润或福利，不如说它关心的是表现为百分数的平均增长。熟悉GDP（国内生产总值）这类缩略词的任何人都知道统计和实际量度之间存在的那种差距。

最终，墨西哥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出口急速增长的基础上，尤其是石油产品的出口。然而，由于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错误估计，墨西哥政府借入大量外债。因此，在70年代，墨西哥的外债规模在第三世界里最大，只有靠严格的紧缩计划才得以缩小其外债规模。

574 墨西哥在过去50年里的其他变化是辛勤工作的成果。虽然在向更具有代表性、更顺应民意的政府转变的道路上，墨西哥取得的进展只是微小的量变，而且遭遇了许多挫折，但到20世纪末，在地方层面上统治超过半数墨西哥人的政治家是反对党的党员。虽然直到近期，联邦议会不过是总统的橡皮

图章，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它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甚至偶尔会挑战执政党。

看似矛盾的是，虽然通过大众传媒、旅游和经济活动，如今墨西哥与美国关系密切，从而令其在文化上与美国趋同，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墨西哥拥有独特的文化。从与西班牙文化的伟大相遇到现在，贯穿其历史的不变因素是墨西哥人民的足智多谋和不屈不挠的特质。虽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墨西哥的发展历程堪称跌宕起伏，但其人民依然百折不挠。

第十八章　墨西哥"奇迹"及其破灭

约翰·谢尔曼(John W. Sherman)

575　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是20世纪德高望重的墨西哥知识分子之一。他在194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墨西哥的危机》(*Mexico's Crisis*),其中批评了新总统米格尔·阿莱曼的政府。根据科西奥·比列加斯的说法,仅仅在阿莱曼就任一年之后,所谓的革命政府就不得不放弃了革命。在动荡的转向过程中,它背离了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1940－1946年任总统)的中庸之道,开始吞噬在拉萨罗·卡德纳斯(1934－1940年任总统)任内所取得的进步成果。科西奥·比列加斯声称,除了这些实践上的退步之外,即将从墨西哥国民生活中被去除的正是那种革命的精神。随着阿莱曼及其同党重新确定墨西哥的方向,资本主义肆意发展,很可能会使终结外国的经济主宰并解决极其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本事业有烟消云散的危险。虽然《墨西哥的危机》一文并非没有缺陷,但它提供了对该政权的敏锐评价,而且准确预言了它的许多政策及其长期恶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富有感召力的年轻总统使墨西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线。那种寻求调整经济和政治的结构,从而改善"大众"境遇的革命热情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方法,它寻求的是招商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光辉成就,设想财富会自上而下使各阶层变得富足,社会和谐必然随之到来。总之,

墨西哥在寻找一个奇迹。

1946年12月,米格尔·阿莱曼成为墨西哥新一届政府的首脑。乍看之下,一些人会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墨西哥总统的继任者。他就任时才46岁,精力充沛,幸运地拥有迷人的外表。他带着某种花花公子的气质,似乎在战争岁月里经常出现在好莱坞的社交圈和夜总会。考虑到其家庭的政治背景,他坐上总统的宝座也是难以想象的:他的父亲在革命年代里与胜利的卡兰萨派一同战斗,只在20世纪20年代支持过一些输家,在1929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叛乱中死亡。但小米格尔充分利用了与一位地区性铁腕人物的友谊,那就是坎迪多·阿吉拉尔。米格尔在故乡韦拉克鲁斯州当上了州长(1936－1939年在任),在1940年成为阿维拉·卡马乔的竞选总管,而且在后者任总统时担任政府部长。就像他的许多继任者那样,他发现这个职位是通往总统宝座的天然途径。 576



图中,米格尔·阿莱曼正在为1946年的总统选举投票。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官,他赢得了这次选举,象征着国家议程的关注点从乡村转向城市。他后来被指控严重贪污。

可以说在20世纪的墨西哥历史上,阿莱曼是最重要的总统。通过使政府与富人利益集团结盟、吸引外国资本、加速工业化、取消或缓解卡德纳斯颁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他深远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路线。他是腐败的,实行史无前例的封官许愿,用以收买和控制对手,操纵相互争斗的政治派别,同时积聚起个人财富。1938年,在墨西哥革命党的支持下,拉萨罗·卡德纳斯建立了某种政治同盟,虽然社会科学家为此过多地关注了他,但现代墨西哥政治生活真正的天才是阿莱曼。卡德纳斯的政治同盟动摇了,其根基主要是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而阿莱曼主义(Alemanismo)依靠的新同盟是先前被排除在外的阶层,包括富裕的实业家和不断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阿莱曼的所作所为远非仅仅认可这个主要政党在1946年改变名称:先前叫"墨西哥革命党"的执政党在那年改名为革命制度党。他颠覆了墨西哥的政体。此外,与卡德纳斯不同,他的同盟存留下来,为墨西哥提供了一个相对意见一致的时代,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虽然他在1952年离职,但他的继任者轻易地保持着这个同盟,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那时政治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压力迫使他们进行了一些调整。

577

这个新同盟的最重要成员是蒙特雷和墨西哥城的强大的实业家。蒙特雷集团内部关系密切,而且极其保守,起初抵制阿莱曼政府的友好姿态,后来逐渐与之和解。相比之下,墨西哥城富裕的私营部门很快就在某种结盟关系中安顿下来,甚至在阿莱曼得到总统宝座之前就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在1945年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签订了一份行业-工人协议。这些雄心勃勃的资本家有时被墨西哥学者称为"40年代集团"(the forties faction),他们在阿莱曼治下得到了显赫地位,甚至在1945－1946年参加了后者的竞选。

但墨西哥城的情况并不仅仅是超级富豪打算在查普特佩克区建造奢华住宅那么简单。当地市中心的许多地方由中产阶级占据,这个阶级由小生意人、商店店主、律师、官僚和专业人员等企业家类型的人构成。在1940年充满舞弊行为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这些城市居民出于对前十年劳工骚乱和通货膨胀的愤恨,还有对卡德纳斯主义(Cardenismo)的

蔑视,将首都这个选区拱手交给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然而,凭借娴熟的政治手腕,阿莱曼依靠偏向保守的经济政策,迎合他们的政治期望,把他们拉入了他的新同盟。

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其他地方,中产阶级在"全国人民组织联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Popular Organizations,简称 CNOP)的支持下获得了政治势力。在新近重新组织起来的执政党中,该联盟是最重要的部分。革命制度党巩固了它在墨西哥城的结盟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位保守的联邦区市长取得的。这位市长就是埃内斯托·乌鲁丘尔图(Ernesto Uruchurtu,1952－1966 年在任),他是由总统任命的。通过补贴住房建设、发起城市美化计划、反对破坏社会稳定的闹市区开发项目、打击在该市市郊不断冒出来的各种棚户区(squatter settlements)——有时甚至手段野蛮,在国立预备学校(Escuela Nacional Preparatoria)时期与阿莱曼便是朋友的乌鲁丘尔图使中产阶级感到欣慰。他对法律与秩序的强调得益于他与卡洛斯·塞拉诺(Carlos Serrano)的亲密友谊。后者是日益老练的、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训练的"联邦安全局"(Federal Directorate of Security)的首长。乌鲁丘尔图的政策保守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在 1958 年试图招募他作为其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阿莱曼主义的特征是"向右转",从而瓦解反对派,形成新的全国共识。墨西哥革命先前的"敌人"(在卡德纳斯统治时期有许多这样的敌人)现在成了受益者,而到阿莱曼离职之时,"革命制度化"已只是徒有其名了。国家行动党对此尤为沮丧,因为它不得不看着革命制度党窃取其天然的政治基础。例如,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妇女一直集结在保守的反对派阵营,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对革命政权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和"无神论"感到愤怒。虽然在阿莱曼就任之初就修改了 1917 年宪法,赋予妇女在市级选举中的选举权,但绝大多数妇女依然把票投给对立的保守派。1948 年在蒙特雷,她们几乎使国家行动党翻盘:她们向市议会候选人何塞·瓜达卢佩·马丁内斯(José Guadalupe Martínez)提供了 70%的票数,因为这位挑战者得到了当地大主教的公开支持。十年后她们第一次参与总统选举之时,妇女不再

578

倾向于支持国家行动党或右翼。相反，革命制度党的民意政治[①]吸引了她们。

但这个执政党的帐篷并没有大到足以容纳每一个人。革命制度党虚构的"和睦"所涉及的镇压很可能远远大于学者迄今为止所认识到的程度。在阿莱曼当总统的时候，有组织劳工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是在卡德纳斯就任总统期间动员起来的庞大的工会组织，在阿维拉·卡马乔总统任期内缓慢地失去基础。1946 年，它的领导人比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与想当总统的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因个人恩怨而动怒，遂使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支持阿莱曼，帮助后者得到了总统提名。而阿莱曼却用向有组织劳工宣战来回报这种支持，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绝对错误的。阿莱曼在就职演讲中发出警告：未经批准就罢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石油工人在几个星期后试图停工 24 小时的时候，军队闯入并逮捕了工会领导人，其中许多人被监禁并遭到毒打。

在墨西哥城，卡德纳斯时期留下来的官僚要么受到新的物质激励措施的拉拢，要么被迫静悄悄地离职。妨碍或公开批评阿莱曼政府的那些人则会遭到排斥，甚至是安全局的监视，例如身为社会主义者的前任教育部长纳西索·巴索尔斯。虽然许多人指望卡德纳斯本人发挥领导作用，但这位不事张扬的前总统却避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到 1952 年，人们普遍认为他悄悄地支持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统候选人米格尔·恩里克斯·古斯曼(Miguel Henríquez Guzmán)：考虑到阿莱曼的拥趸在革命制度党内占据的优势，这种党内努力不可能赢得总统提名。

在墨西哥，镇压的性质总是取决于一个人的钱财和地位。安全部队监视而不是逮捕那些有名的批评者，例如首都著名的"恩里克斯派"(Henriquista，即恩里克斯·古斯曼的支持者)，因为逮捕他们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些身居高位的反对者默默接受了贿赂和收买，其人数

① consensus politics，一译"舆论政治"。——译者注

之多令人惊异，其中显然包括恩里克斯·古斯曼本人。对于政治资本略少的那些人来说，例如国立大学的学生，政府采取了形式更为具体的镇压。当1951年6月4 000名青年人发起反政府抗议时，乌鲁丘尔图市长动用了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和警棍导致150名示威者受伤，其中一些人住院。对于贫困的工人阶级，法律力量展现得最为明显。出租车司机试图在1950年1月罢工以抗议其悲惨的工作条件。于是警察对其工会总部进行了突然袭击，在一阵无节制的暴力活动中连连击打其领导人，导致两人死亡。1952年3月，当“恩里克斯派”在贫穷的印第安聚居区——瓦哈卡州——成功地策划了一场反对阿莱曼政府的总罢工时，军队开进该州，镇压了这次运动。瓦哈卡的和平示威中枪声不断，数不清的人被杀死，而这些牺牲的人早就被遗忘了。另一场小规模的屠杀发生在墨西哥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阿拉梅达公园。当恩里克斯派以“墨西哥人民党派联盟”(Federation of Parties of the Mexican People)的名义组织活动，并且拒绝屈从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时，它就成为非法组织。阿莱曼主义绝对无意让墨西哥行进在民主的道路上。

579

不过，尽管存在相当严重的镇压，在阿莱曼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收买”仍旧是墨西哥政治生活的标志。如果说联邦安全局或军队的野蛮绝对骇人听闻，那么革命制度党的机器在陷害和操纵其天然对手上所取得的成果同样相当惊人。就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领袖的比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来说吧，哪怕阿莱曼政府迫害石油工人、出租车司机和其他人从而使他们屈服，他都默默顺从指示，只是简单重复地宣扬官方党的路线。当他与阿莱曼的关系最终破裂，并创建了“反对党”人民党(Popular Party，简称PP)时，某些情况依然异乎寻常。人民党实际上起到了傀儡反对党的作用，它大谈特谈反对“美帝国主义”(Yankee imperialism)的陈词滥调，平淡乏味，而且不出所料地在任何实质问题上卑躬屈膝地支持阿莱曼政府。(它在20世纪60年代改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Popular Socialist Party]之后，言辞甚至变得更为空洞。)革命制度党以同样的方式拉拢了右翼。国家行动党扮演了忠实

反对党的角色，推举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1958)和何塞·冈萨雷斯·托雷斯(José González Torres，1964)这样的商人担任总统候选人，他们在竞选之旅中对共产主义的责骂和对革命制度党的一样多。对于革命制度党引导墨西哥行进的方向，被人嘲笑为“银行家俱乐部”的国家行动党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革命制度党支持甚至鼓励一大批小党派参与装点门面的选举竞争，主要是因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质封闭而僵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表面的合法性。像墨西哥民族党(Nationalist Party of Mexico)这样的团体实际上是在革命制度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像墨西哥国民党和名不副实的墨西哥真正革命党(Authentic Part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PARM)这样纯粹装样子的小型反对党的存在则顺应了执政党的某种政治文化的长期需求，以避免出现类似于被蔑视的波菲里奥·迪亚斯那种独裁制的表象。如果政府偶尔向这些装点门面的反对派提供资金，或者在充当橡皮图章的国会中给他们一些毫无意义的席位，就像它通常所做的那样，民主的外表就显得更为光鲜了。但革命制度党自己却走在相反方向的道路上。在1950年，它用更为公正的方法选择候选人，尽管这种方法绝对不民主——它将候选人名单全部公之于众，从而取代了原先分阶段选举候选人的做法。20年前，一位敏锐的墨西哥观察家创作了一句格言，真实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的现实，以及阿莱曼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之一：革命制度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革命制度党。

政治权力在墨西哥的集中使得遵循这种模式更为容易。政府的行政部门施加的巨大影响力遍及整个国家。虽然强有力的总统制先于阿莱曼主义出现，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得到强化。来自总统的立法倡议在国会得到迅速而且往往是意见一致的批准，而且从来不会在顺从而虚弱的司法部门那里受到挑战。即使最高法院偶尔会对某一措施作出裁决，它这么做也毫无例外地只是根据行政首长的要求，对某项措施宣布无效也只是装点门面，而不会付诸实施的。政府与司法部门、国会、各种机构和各州沟通的主要渠道是内政部。该部占据最

580

重要的内阁地位,其他部门无法望其项背。它执行总统的命令,作为州与国家官员之间的联络人,甚至可以召开内阁会议(虽然比较罕见,每年最多召开三四次会议)。于是,内政部长的职位成为通向总统宫的踏脚石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的权力就在那里,革命制度党的领导核心也在那里。虽然错综复杂的机构网络掩盖了革命制度党的等级关系,但由7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与总统关系密切却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它做出的。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它的控制如此有效,以至于从1946年到1973年,在所有的市长和国会选举中,它的赢面为98%,剩余的2%由受其控制的反对党赢得。来自左翼的潜在的合法挑战者受到迫害,以至于湮没。因革命制度党的保守方向,那些右翼的挑战者,即国家行动党的根基受到侵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这个执政党赢得了每一次州长选举,其中只有5次被认为真正具有竞争性,占这些选举的比例不到1%。虽然这个执政党的控制无所不在,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往往发生在偏远地区,地方政治的骚动有时几乎颠覆这种现状。这种现象在墨西哥内陆的显著例子是萨尔瓦多·纳瓦(Salvador Nava)医生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市(San Luis Potosí)的竞选。纳瓦是眼科医生,1958年在州首府大胆地参与市长竞选,并在这个长期以来憎恨执政党的保守地区里赢得了普遍的地方支持。当支持纳瓦的大学生以向革命制度党州长扔鸡蛋的方式庆祝革命纪念日的时候,军队介入并殴打他们。随后的大罢工迫使中央政府承认纳瓦当选。1961年,这位医生拒绝了加入革命制度党的邀请,在他的“波托西民主党”(Democratic Potosinan Party)的旗帜下竞选州长。虽然革命制度党投入的选举经费远远超过纳瓦,但依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舞弊才勉强使他没有当选。对执政党的这种公然挑战是不可能被容忍的,因而革命制度党“赢得”这次选举后就开始实施惩罚了。数以百计的纳瓦支持者被监禁起来,而且两年后安全部队逮捕了一度碰不得的纳瓦本人,用一连串酷刑对待他,直到他们确信他会彻底退出政坛为止。

虽然真正的反对派面对大棒的威胁,但大多数人,无论地位高低,

还是接受了胡萝卜的激励。纳瓦及其追随者鹤立鸡群，因为他们坚定地拒绝与中央政府做交易。一直有人主张，是革命制度党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拥有了某种良性的一党制，哪怕它是腐败的。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奖励等待着那些愿意在这种战后结构的内部奋斗的人。例如，雄心勃勃的青年组织者在动员某个穷人社区之后，如果他使其追随者与革命制度党保持一致的话，就可以期望得到某个政府小官职。很快，该社区的某些要求会得到满足，因为收买的进程涉及上上下下的谈判。虽然政府的确在付出，但它这么做是因为它接着也能得到好处。不应该把这种进程与民主社会的草根赋权(grassroots empowerment)混为一谈。奖赏的权力总是小于在真正开放的社会中所应赋予的权力，而恐怖的高压手段距离坚持不同政见的那些人从来不远。

581

这种体制既然向那些在更低等级的阶梯上讨价还价的人提供了激励，那么自然向高高在上的少数人提供了更大的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统治(甚至是其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腐败的水平声名远播。贿赂(mordida)的做法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王室在殖民地时代出售政治公职的历史传统。但在米格尔·阿莱曼就任总统时期，这种公开敛财的现象达到了惊人的新地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莱曼在其任期伊始宣布发起反腐运动，这种政治花招迅速演变为一种总统的传统。这种花言巧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人的犬儒主义。虽然他以“西班牙实业家曼努埃尔·苏亚雷斯(Manuel Suárez)”的假名管理其大部分非法的财富，但即使是在他任职期间，阿莱曼的敛财事迹仍众所周知。他聚积了令人震惊的个人财富，若按实际价值计算，只有其后很多年上任的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1988－1994年在任)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阿莱曼特别偏好房地产。他在北方新近得到灌溉的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鲸吞了肥沃的大块农田，在他的故乡韦拉克鲁斯州获得了沿海的农田。而阿莱曼的亲密朋友纷纷仿效他的做法。例如，

在卡德纳斯统治时期，前总统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在西北部的冒险经营活动中失去了巨额资产，但他在阿莱曼内阁任职期间通过管理国家的电话垄断企业，即墨西哥电话公司(Teléfonos de México)，捞回了他的财富。无论对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还是对地位卑微而野心勃勃的人来说，腐败和收买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从 1946 年开始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墨西哥的经济发展迅速。因此，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有资源为自己聚积起大量财富，即便同时在还需斥巨资收买他们的大多数对头和敌人。

虽然米格尔·阿莱曼就任总统时，在政治问题上与卡德纳斯主义的模式分道扬镳，但他在经济上继续执行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实施的政府指导的工业化计划。不过，阿莱曼极大地加快而且显著地调整了这个进程。虽然阿莱曼及其继任者的政府凭借对工业化的热情积极吸引外资，但他们也镇压有组织的劳工，而且在建造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上大肆花钱。至少在纸面上，他们的成就看起来是显著的。确实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奇迹"：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近 6%，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那是世界上最高的持续增长纪录之一。但不幸的是，统计上的经济增长并不总是转化为现实中的福祉和稳定。虽然墨西哥的经济馅饼在规模上肯定是扩大了，但穷人得到的部分越来越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得到该国收入的 5%，20 年后获得的不足 3%。大多数墨西哥农村人口在享有发展成果上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口，因为在 1940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10%的农业到 1973 年下降为 5%。人口的激增也减少了被大肆吹嘘的经济增长的积极成果。

582

在阿莱曼的统治下，墨西哥把它的经济希望寄托在迅速工业化的进程上。由于这一进程主要依靠美国资本融资，因而这种策略使得墨西哥必须与美国商业利益保持密切关系。因墨西哥革命，随后因卡德纳斯统治时期的极端主义，那些关系在 20 世纪早期受到了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恢复，在其后的岁月里再次蓬勃发展。虽然美国谨慎地避免了高调的政治和外交互动，但在两国的经济交往中，富裕的美

国人和墨西哥人团结的程度就像是在波菲里奥任职期间一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正如墨西哥政治学者洛伦索·梅耶(Lorenzo Meyer)所指出的,美国的经济控制达到了类似于在迪亚斯统治时期的程度,甚至可能更高。不过,差别是显著的。跨国的联合所有制和墨西哥政府的突出作用使得崛起中的国内商业阶级更为强大,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阿莱曼就任总统期间,美国和墨西哥的精英联手发展密切的伙伴关系。1944年的一部新法律规定,一家企业51%的股份必须由墨西哥人持有。一些法律漏洞使人们可以规避这些条文的要求,比如可以创建有名无实的"墨西哥人拥有"的子公司。当美国企业利用这些漏洞的时候,墨西哥政府视而不见。制订法律以及对其疏忽的主要原因都在于商业联盟的兴起。对墨西哥人拥有公司所有权的规定使富裕的墨西哥人得以吸引美国商人以形成有利可图的伙伴关系,而执法不力加强了这种联系。阿莱曼总统本人处于这个完整进程的核心。他的英语流利,就任总统之前在美国四处旅行,与该国一些最富裕的商人有着亲密关系。在就职后不久,他通过一次大张旗鼓的美国之旅增强了这些关系,在那次多站式旅行中,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历史学家斯蒂芬·尼勃洛(Stephen Niblo)已经证明,是数目相对较小的人群策划了这种新的结盟关系,并实施其重大的经济和投资决策。富裕的美国人和墨西哥银行家通过无数新生的国际机构就巨额贷款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与工业有关的公共建设工程项目,诸如水电站大坝等所需的美国贷款通过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获得批准,1947年以后,曾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的乔治·梅塞尔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墨西哥电力与照明公司的董事长)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施加其影响力。

583

与此同时,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政府通过其"第四点计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援助。通过中央集权的墨西哥银行和其他机构,阿莱曼调动国内资金向一种混合经济提供融资,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很大部分来自国内(可能约为三分之一)。公私部门之

间的界限因公司和政府委员会的组建而进一步混淆。像阿莱曼和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这样的墨西哥强势政治家帮助经营企业，而阿莱曼总统争取到了先前高傲的蒙特雷实业家的支持，并将后者安插进与其政府关系密切的重要位置。

但在能够吸引极其保守的蒙特雷集团或许多美国商人来支持工业化计划之前，墨西哥政府必须表明它在劳工关系上的立场。卡德纳斯任期内，在隆巴多·托莱达诺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庇护下，强大的工会兴起，令经理阶层深感恼火，因而可能造成资本外逃。为了安慰经理阶层，阿莱曼需要彻底重塑政府与劳工的结盟关系，使其从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变为保证其安定平和。他热切地开展这项工作。他在 1947 年 12 月对石油工人停工斗争的镇压，标志着劳工运动顺利发展的十年就此告终。次年，阿莱曼巧妙地利用有组织劳工内部的摩擦，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成功瓦解了缺乏政治敏感性的隆巴多·托莱达诺所领导和推行的反抗。最终，这位著名的劳工领袖和其他进步人士被逐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该会就此落入保守而顺从的“唐·菲德尔”贝拉斯克斯(“Don Fidel” Velázquez)的领导之下，直到后者于 1997 年去世，他一直作为墨西哥官方授权的劳工领袖而大显身手。

通过把顺从的新领导人强加给工会，阿莱曼和贝拉斯克斯分裂了劳工，这个进程被人们称为“骑手主义”(charrismo，取自西班牙文 charro，意为骑手或牛仔，因为这些新首领对待其普通会员的态度像牛仔般漫不经心)。随着工人工资在 1948 年创了新低，工人发现自己只能自生自灭。阿莱曼政府修改了 1931 年的劳动法，大幅度提高了对未经批准的罢工的惩罚力度。最高法院甚至一度裁定，当合同依然有效时，所有的罢工都是非法的，这个裁决有可能使劳工永无翻身之日。1948 年的这个决议多半是阿莱曼亲自批准的，但他后来还是不得不做出了让步。政府的仲裁也在 1948 年突然从相对中立的姿态变为一律偏向企业的模式。当一家蒙特雷企业草率地将工资削减 50%的时候，阿莱曼的劳动部支持其决策；当福特汽车公司在 1949 年无缘无故地解雇 400 名工人时，墨西哥政府再度无动于衷。由数百万绝望的工人签

584

名的请愿书源源不断涌向总统办公室，阿莱曼只是视而不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当独立的劳工派别依然有可能威胁某个行业时，新近安插的“骑手”领导人会为“他们”的工人“赢得”幅度不大的加薪。但一旦劳工骚动的切实威胁消失，得到的福利和让步也就到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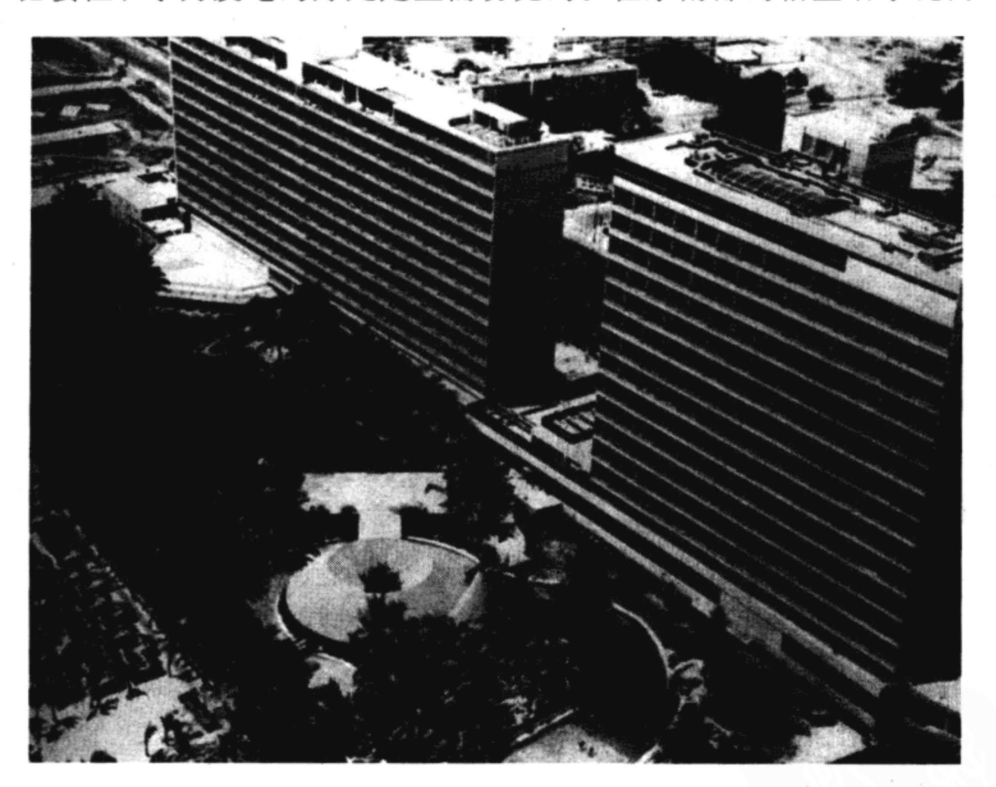
工人们自然抵制骑手做派，他们进行斗争以便重新控制他们的工会。但他们的许多领导人完全无法拒绝贿赂和向变节者提供的奖赏。而且，作为政府控制的工会的一部分已经够可怕了，独立工会的命运更为悲惨。在阿莱曼任职总统期间，劳工的自由结社面对无情而野蛮的迫害，阿莱曼政府以打击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名义，为这种迫害进行辩解。当贝拉斯克斯背叛其与隆巴多·托莱达诺的友谊并诽谤后者是苏联间谍时，即便后者如此声名卓著甚至一度如日中天，也依然遭到了蔑视，甚至受到驱逐的威胁。至于那些胆敢罢工但随后落入军队或安全局之手的无权无势的穷人，无需想象力便能预见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对阿莱曼来说，“骑手主义”与镇压的结合完成了其使命。直至1960年，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依然低于1940年的水平，而此时工人的生产率几乎翻了一番。就劳工成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向投资者提供了有利的商业氛围。

对于吸引国内外的私人资本来说，多多益善的政府激励也不可或缺。在创建和推动工业发展，甚至在为之提供资本方面，墨西哥政府插手很深。首先，它确保税制有利于企业。它为启动新兴产业而实施了高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从而确保它们占有国内市场，哪怕此时许多出口关税的收入在缓慢减少。古老的印花税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为政府发行的印花而支付的税费，其征收范围是从法律文件到执照。墨西哥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末分阶段取消了印花税。随后的20世纪50年代，企业税负减轻，而个人所得税稳步增长。一家名为“全国金融公司”(Nacional Financiera)的信贷机构与墨西哥银行相互协调，通过浮动的债券和经营公私基金推动了投资，包括为公共工程而发放了许多重大贷款。

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实际上为工业化提供了重大的激励。墨西

哥政府启动了各项计划，从而为以制造业为根基的社会提供其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在阿莱曼就任之时，这种挑战是巨大的。在波菲里奥时代开发的铁路把大城市联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多条开发带。但是，尽管墨西哥在革命以后取得了缓慢的进步，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由孤立的农业地区组成的国家。它的新工厂需要电力，它的新产品需要从墨西哥内陆延伸至美国的高速公路系统。

因此，受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成就的启发，阿莱曼政府启动了一项类似的计划，尽管动机不同。虽然在以干旱气候为主的墨西哥，水资源并不充沛，但对所有人来说，灌溉的必要性和水力发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东南部的格里哈尔瓦河 585



太平洋沿岸的海滩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阿莱曼的支持下迎来初步发展的，在此后的二十年间，随着航空事业的稳步发展而继续扩张。虽然富人和名人的到来为这个地方的氛围定下了基调，但大部分到这里来的游客都是处于中产阶级中上层的美国人，他们深深地被这里的沙滩、泛着碧浪的海水以及如画的悬崖峭壁所吸引。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新月形的潟湖沿岸几乎完全被希尔顿等高层酒店建筑包围。

(Grijalva)和帕帕洛阿潘河(Papaloapan)上树起了巨大的水坝(形成了以古代土著诗人国王内萨瓦尔科约特尔[Nezahualcóyotl]和米格尔·阿莱曼之名命名的巨大湖泊)。在西北部,大坝控制了锡那罗亚州(Sinaloa)、索诺拉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各州[1]的一些河流,有助于使那些地区转变为可从事农业的沙漠绿洲。

"全国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为新的道路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从美国的埃尔帕索穿越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延伸到危地马拉边境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泛美公路"(Christopher Columbus Pan-American Highway)。这条路在1950年开放,启动仪式是一场2 200英里的汽车比赛,4年后完成了从亚利桑那州边境上的诺加莱斯市(Nogales)到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后续道路。其他高速公路将墨西哥城与库埃纳瓦卡的普埃布拉和巴希奥地区(Bajío,意为"浅滩",墨西哥中西部高原)的一些较小的城市联系了起来。到1957年,墨西哥拥有了1.5万英里的铺设道路,既成为墨西哥政府致力于道路建设的成果,又成为从美国进口的新型铺路设备和技术的证据。客车和卡车很快在墨西哥全国穿梭,在某些地区的货运业,卡车迅速与铁路展开了竞争。

新的公路不仅方便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运输,而且极大地帮助了注定在20世纪末成为墨西哥三大盈利行业之一的旅游业。阿莱曼安排从墨西哥城向南建造一条四车道大路,通往太平洋沿岸靠近小渔镇阿卡普尔科的海滩飞地,那里风景如画。他自己对海滩前沿的房地产进行了大量投资,在他卸任后靠旅游部长继续推动这块旅游胜地发展。虽然这个村子已经修建了一些小型宾馆,用来接待乘游艇抵达的富裕客户,但阿莱曼治下新建的干道及其积极的推动使得阿卡普尔科在1960年演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度假胜地。沿着那片海岸,豪华的高层建筑林立,接待着世界级的富豪和名人,包括像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

586

① 原文为Baja states,当指北、南下加利福尼亚两州(Baja 即"下")。——译者注

和约翰·韦恩(John Wayne)这样的好莱坞风云人物。他们当中有些人在阿莱曼年轻时游荡在那个电影之都期间便结识了他。

阿卡普尔科的发展还应归功于另一个兴旺起来的交通行业：航空。1940年只有9万名旅客乘飞机抵达墨西哥，但到了1952年，每年旅客数达到100万人。20世纪50年代伊始修建的36个机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私人资本融资，许多资本来自航空公司本身。政府在那十年里提供资金帮助航空业发展。阿卡普尔科市东南郊在1953年开放了一个新机场，而瓜达拉哈拉机场则新增了两条2 000英尺的跑道，墨西哥城的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机场投资500万美元修建候机楼以改善服务。同年，墨西哥举办了首届“全国旅游大会”(National Tourism Congress)，生意人和广告商在那里汇集，协调行动，以便使墨西哥成为美国度假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诸如机场、高速公路、水坝建筑之类基地设施的改善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最终服务于工业化进程——墨西哥经济“奇迹”的核心。在阿莱曼驯服劳工、规避所有权法律、吸引美国资本以形成投资同盟之后，新工厂遍地开花，尤其是墨西哥城北部的工业园区。20世纪50年代，工业年产值平均增长7.3%，推动国内生产总值急剧而稳定地增长。这种增长导致数以万计的墨西哥农民涌入首都寻找工作。这些新工厂连同为配合它们而兴建的公共工程，在50年代赋予墨西哥“迅速工业化之国”的形象。然而，这么多变化如此显著，但其发展却极度不平衡。只有极少数的墨西哥人在工业部门找到工作，而现代化并未消除贫困。

那条横贯阿卡普尔科的沿海大道以米格尔·阿莱曼的名字命名，次要的大街则以其两位继任者的名字命名：阿道夫·鲁伊斯·科蒂内斯(Adolfo Ruiz Cortines，1952—1958年在任)和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 Mateos，1958—1964年在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引导墨西哥政治经济路线的是阿莱曼，而随后的两任总统都维持了他结成的联盟，遵循其政策的重大方针。完成阿莱曼开创的许多事业的重担落在鲁伊斯·科蒂内斯和洛佩斯·马特奥斯身上。例

如，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完成了连接墨西哥与美国的主干道，但在后十年里仍继续进行着铺设无数乡村道路的工作。小路切开了尤卡坦半岛的丛林，最终把那块遥远的半岛与人口众多的腹地联系了起来。虽然把国立大学搬到在墨西哥城市郊乱糟糟的新校园的是阿莱曼，但在其周围建造各种公寓和宿舍的任务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不过，虽然两位阿道夫是阿莱曼的政治继承人，但他们落实其政策的热情略低，而且比他们的耀眼导师显得多少更为中庸。他们也缓和了阿莱曼主义的过分之处，为不同政见创造了一些空间(尽管有限)，在使用压制力量时比阿莱曼略多了一些节制。

587



革命制度党(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PRI)自其从 1946 年脱胎自早期的官方政党诞生以来，就一直主宰着墨西哥的政治和联邦政府。该党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来鼓舞墨西哥人支持自己。

尽管如此，标志性的阿莱曼政策依旧延续：偏向资本、促进工业化、分裂劳工。鲁伊斯·科蒂内斯是阿莱曼的朋友，同为韦拉克鲁斯人，在阿莱曼当总统时曾任内政部长。他在 1952 年成为总统时所面临的是不安定的产业工人阶级。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工人没用多少时

间便认识到“骑手”领导人极少代表他们的权益。因此，部分由于这位新总统在镇压方面的宽厚，独立工会发展起来了。虽然不可能进行确切的计算，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有组织的工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属于独立工会。面对潜在的工人骚动，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遵循阿莱曼的榜样，试图挑动不同派别彼此争斗。在贝拉斯克斯的领导下，顺从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集团与墨西哥工农革命联盟(Revolutionary Confederation of Workers and Peasants，简称CROC)竞争，后者更为好斗，但依然被拉拢了。而真正无政府主义背景的工会通常是在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General Union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Mexico，简称UGOCM)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相对成功，将平稳的局面一直保持到鲁伊斯·科蒂内斯任期将满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接替他成为总统的是他的年轻的劳动部长。

588

1958年7月，洛佩斯·马特奥斯因传统的革命制度党一面倒的胜利而当选总统，他面对的劳工动荡是铁路工人罢工，而且其频率越来越高。长期处在劳工斗争第一线的铁路工会在8月选举直言不讳的德梅特里奥·巴列霍(Demetrio Vallejo)作为其领导人，他上任后为工人的实际工资多年持续下滑讨说法，并要求增加工资。与政府的摊牌在1959年3月达到高潮，那时该工会在“圣周”[①]前夕发动大罢工。当时几十万墨西哥人要靠乘火车外出旅行的。图谋报复的墨西哥政府作出反应，借口巴列霍及其同伙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有关，命令安全部队突袭了罢工总部，逮捕了劳工领袖，由军队占领了主要的铁道线。政府宣布这次罢工违法，对工人提起谋反的指控，而且判决包括巴列霍在内的许多人在监狱长期服刑。

虽然实施了这次对铁路罢工的卑鄙镇压，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洛佩斯·马特奥斯是一位用心良苦的改革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其任期以这种不祥事件开始之后，他在意识形态上似乎开始向左转。他

① 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之前一周为“圣周”，大致在三月底。——译者注

的政府监督一家政府控制的企业获取电力工程的情况,启动了让企业工人分享利润的温和计划,对破产的电影业实行国有化。他的任期凑巧与古巴革命的戏剧性展开同时进行,当时他拒绝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断绝关系,他的选择使墨美外交关系紧张。他与他的内阁部长经常到国外旅行,号召受困于超级大国对抗的国家选择不结盟。至于墨美关系方面,他通过谈判使美国将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一块长期争议的土地移交给墨西哥。在格兰德河(Rio Grande River)改道之后,被称为"查米萨尔"(Chamizal,涉及 600 英亩,即 2.4 平方公里)的那块土地从墨西哥人手中溜走。1963 年安排其回归的条约非常有利于墨西哥政府重唱民族主义的高调。

与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相比,洛佩斯·马特奥斯政府所处的氛围更为有利。虽然没人怀疑洛佩斯·马特奥斯比其更为拘谨的前任更善于使用民众主义的言辞,但在仔细分析所有情况之后,事实也许充分证明第一位阿道夫和其更为著名的继任者同样温和。确实,洛佩斯·马特奥斯的许多重要的计划实际上是在鲁伊斯·科蒂内斯任期内启动的。在阿莱曼大幅度削减教育经费之后,是后者开始加速向教育部提供资金。到 1963 年,教育成为国家预算中最大的单一项目,因为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学校的建设并分发免费的课本,当然,这些课本总是赞颂当前政府的。鲁伊斯·科蒂内斯启动了农村诊所和医院的建设,而且发起了某种社会保障制度——洛佩斯·马特奥斯对此计划加以扩充。甚至洛佩斯·马特奥斯独立的外交政策也应该归功于上一届政府,后者面对美国的侵略,投票决定保卫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改革政权,并在阿本斯被迫逃离危地马拉的时候让其避难。然而,尽管两位阿道夫进行了种种调和,在阿莱曼任期内就开始的广泛的发展格局仍然汹涌展开,不曾衰竭。虽然"奇迹"依旧,但即便进行了改革和增加社会开支,数目庞大的墨西哥人还是被抛在了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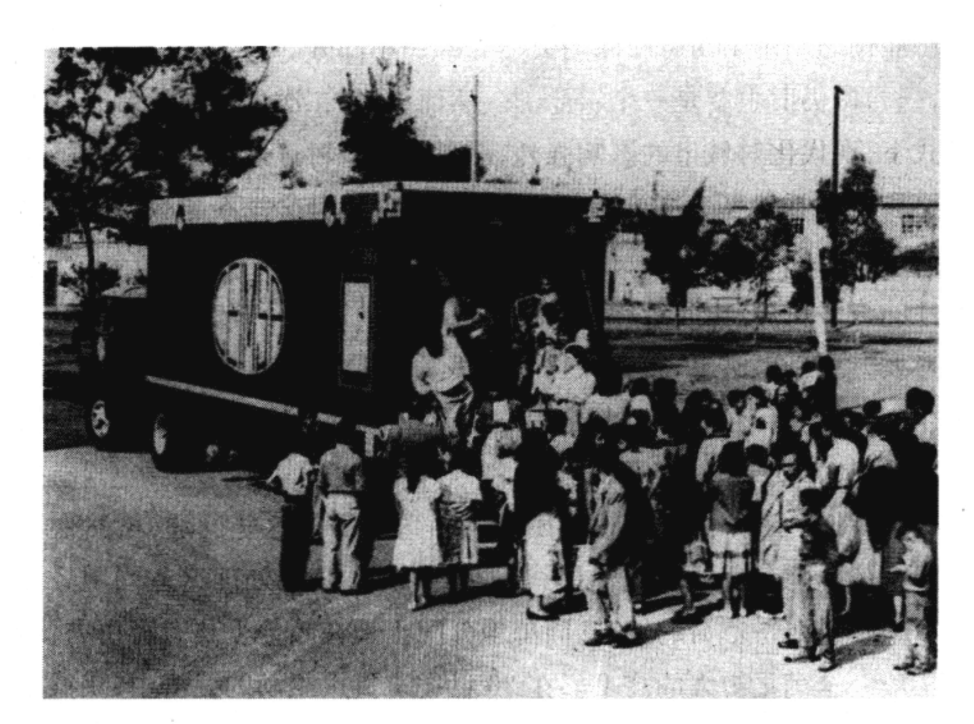
589

无论是鲁伊斯·科蒂内斯还是洛佩斯·马特奥斯,他们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都是农村地区的贫困。虽然国家把重点放在工业化上,但

工厂雇佣的只是墨西哥膨胀的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到20世纪60年代初，墨西哥仍旧主要是一个农业国。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模式下，现代化对城市的影响强烈，而孤立的乡村远远落在其后。虽然道路和电力抵达了大多数偏远地区，但事实证明这些不能替代良好的工作和充足的收入。免疫接种使现在的墨西哥儿童不再患上一度是致命性的许多疾病，由此造成的出生率上升而死亡率下降，更是使农村问题愈发严重。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出生率，平均接近3.5%，造成其人口在1940年到1964年翻了一番，达到约4 000万人。

鲁伊斯·科蒂内斯认识到困扰墨西哥农民的这些问题，虽然他不会严重偏离阿莱曼的工业化模式，但他下决心至少处理这些问题。虽然有鉴于墨西哥革命的遗产，简单地分配土地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但那不能完全满足穷人的需求。在20世纪末货币驱动的经济中，获得小块土地越来越无法保证实际的物质福祉。鲁伊斯·科蒂内斯反其道而行之，确定了提供廉价的基本食品的必要性。他大大扩充了墨西哥进出口公司(Mexican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Campany, CEIMSA，成立于1949年，但当时的目标相当不同)的职能，通过参与诸如牛奶、粗玉米粉、鸡蛋和谷物之类物品的商品贸易，它被用来控制主要粮食的价格。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的食品价格下跌，并引起了跨国农业企业的反对。

洛佩斯·马特奥斯充分利用鲁伊斯·科蒂内斯的倡议，在1961年用国营民生公司(the National Company of Popular Subsistence Foods，简称为CONASUPO)取代了墨西哥进出口公司。墨西哥进出口公司在此前启动了一项创新的计划，使用流动的厢式货车向偏远的贫困村庄运送基本的食物。国营民生公司积极扩充这个大受欢迎的计划，通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简政放权，进一步改善由流动单位和商店组成的网络，把食物送到数百万最迫切需要它们的墨西哥农民手上。对玉米、豆类、稻谷、小麦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确保了绝大多数墨西哥人能够正常进食，哪怕是最贫穷的人。墨西哥进出口公司及其后继者



“以合理的价格为全国民众提供基本食品”(The national program to provide basic foodstuffs at reasonable cost to the nation's people, CONASUPO)这一全国性的项目依靠图中这种移动超市为人们送货。这些卡车装载着一包包大米、大豆、面包、糖、面粉、咖啡和鱼干。这个项目还用小推车兜售牛奶。这些食品的价格一般为市场正常价格的一半。

590 国营民生公司从墨西哥农民那里为政府和革命制度党赢得了巨大的感激。

一些小农场主也享受到了政府干预的好处,因为国营民生公司购买他们的商品。然而,虽然国营民生公司的生产来源及项目种类众多,但它往往在消费点上而不是在生产点上操纵市场,即便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其前身墨西哥进出口公司就开始从海外进口廉价的粮食。因此,与西欧和美国用价格杠杆激励生产不同,墨西哥粮食价格稳步下跌,直至 60 年代中期,迫使数万名农民破产或改种其他作物。虽然玉米是最重要的粮食,处于农民膳食的核心,其种植面积在 1940 年占可耕地的三分之二,但在约 20 年之后下降到了原来的一半。

粮食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急剧提高,那可以归因于所谓的绿色革命。这种革命的影响是,哪怕现在用于耕种玉米的农田很

少，依然能够产出很多的收成。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美国慈善机构的慷慨融资而在墨西哥启动的绿色革命，包括使用化肥、杀虫剂和杂交育种，从而提高产量，用新技术和范围广泛的教育计划扩大这些资源，那些计划旨在指导农民运用栽培、播种和收割的新方法。毫无疑问，墨西哥通过绿色革命急剧提高了食物产量：单是玉米的产量就猛增了250%。在1950－1970年间，墨西哥的小麦作物产量从30万吨增长到260万吨，而豆类产量从53万吨增长到92.5万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源自每亩产量的增长，因为和玉米一样，用于小麦和豆类生产的土地数量实际上也在缩减。

591

因此，从技术和统计上看，绿色革命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但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净收益的看法不一。关于农业生产力急剧提高的负面影响，最简洁的批评是它最终导致数百万墨西哥农民失业。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一位农民（更准确地说，是大型商业农场里的一名工人）能够取代6名或者更多的农民。随着基本食物的价格全面下跌，生产者的数目也在缩减。虽然墨西哥的人口增长率飙升，但它在1970年拥有的农民少于20年之前。而随着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存量增加，日工资也在一路下滑。墨西哥现在拥有更多的食物，但工作岗位更少。农村地区不断扩大的失业阶层寻找出路的途径是移民到城市或美国，或者渗入被经济学家称为“非正规经济”的领域：在街上向路人出售手工艺品和消费品。数以万计的年轻女子变成家佣或是妓女，有时甚至两者兼做。

绿色革命的光明前景未能把墨西哥从其他长期的不良发展趋势中拯救出来。最终，在农民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在市场上的买方干预，粮食价格走势逆转。在1965年以后，墨西哥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食物价格的暴涨，于是再次求助于粮食进口。在1967－1976年间，随着廉价食品的黄金岁月消逝，人均卡路里的摄取量减少了1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期的农业出口趋势照旧。大型的商业企业种植了大量特色作物，提供给专为中产阶级服务的食品杂货店或北美人民：瓜纳华托的草莓、奇瓦瓦的李子、韦拉克鲁斯的菠萝。许多产品由垂直整合的巨型美资企业营销，如大陆谷物公司

(Continental Grain)、库克产业集团(Cook Industries)和拉尔斯顿-普里纳公司(Ralston-Purina)。与制造业和旅游业的情况一样,美国和墨西哥的资本联手经营墨西哥的农业资源。

当购物者购买食品时,他们所支付的钱款只有一小部分返回生产食品的农民手上。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农民”通常不再是依靠政府经营的集体农庄谋生的“集体农户”(ejidatario)或普通“农夫”(campesino)。处在食物生产核心的是大型商业庄园,通过享有获取资本的特权,为所需技术提供资金,它们能够廉价地生产大量粮食。相比之下,政府的集体农庄无论在生产力还是在利润上都远远落于其后。它们受制于缺乏资本、官僚腐败和经营不善,卡德纳斯统治时期建立的许多大种植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陷入破产和荒废的境地。虽然 1917 年的宪法不允许它们为偿还所承担的债务而转让,但许多集体农庄实际上还是被出租了。因此而失业的居民往往自愿离开,成为墨西哥其他地方或美国的工薪劳动力。同样,小型农场主无法与巨型的农业综合企业竞争,因为后者的盈利能力很强,到 1970 年就能够生产超过墨西哥上市粮食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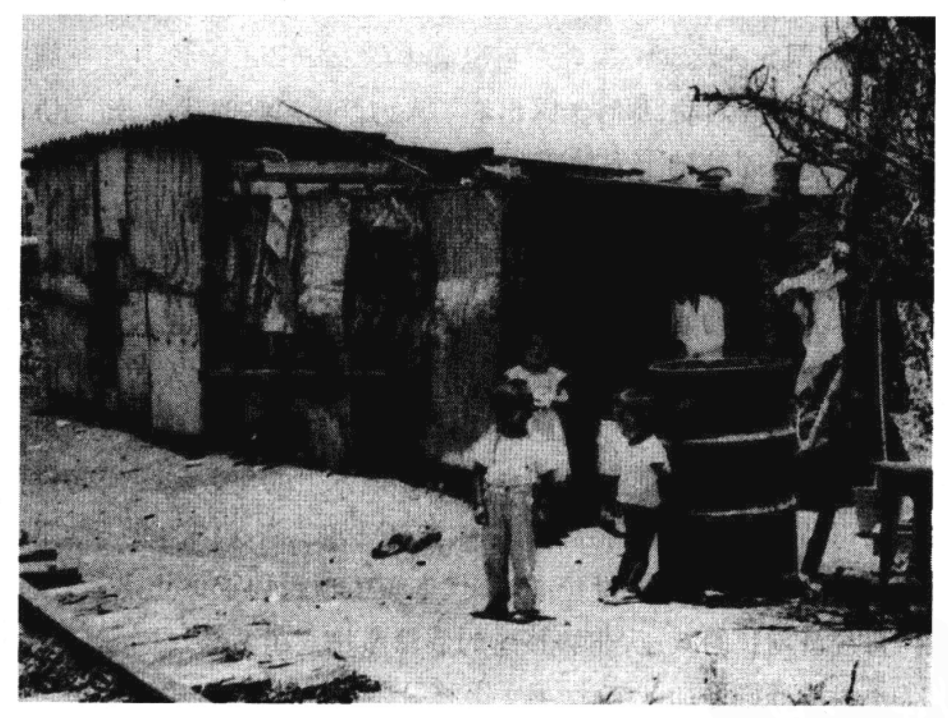
592

农业繁荣的局面只出现在一些资本充足的地区。数据表明,在 1970 年仅仅 3 个州——索诺拉州、锡那罗亚州和韦拉克鲁斯州——就拥有墨西哥近 40%的拖拉机,生产了墨西哥农业产出价值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地区,大型商业经营活动专门针对出口农业,因为那是最能够赚钱的途径。一车车西红柿、葡萄、冬季蔬菜和柑橘类水果被运往北方,一路上越过饥饿的墨西哥人,最后进入美国。在一个由金钱而不是需求决定的市场上,享有既得利益的农业综合企业会迎合富裕顾客的烹饪口味,而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墨西哥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经历了“第二次”绿色革命,体验了牛、猪和家禽产量的急剧增长,因为它们的生产者迎合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饮食口味。对肉类的需求反过来促使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农田转变为动物饲料场。例如,到 60 年代末,甜高粱(sorghum)的产量从几乎为零增长到 270 万吨。

为消费卡路里的动物生产饲料意味着主食生产增长的速度减慢。由于穷人负担不起以肉类为主的膳食，因此，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墨西哥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在基本粮食不得不依靠进口的情况下，牛肉出口量却在增加。到 1974 年，根据国家营养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的数据，1 840 万墨西哥人的营养严重不良，而 90％的农村人口遭受严重的食物短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每年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儿童超过 3.5 万名。内陆的许多州长期贫困，特拉斯卡拉州和普埃布拉州以东的大部分巴希奥地区几近绝望。以印第安人为主的南部饱受长期失业的重创。墨西哥南方一片萧条，只有太平洋沿岸的旅游胜地和在塔瓦斯科开发的油田是例外。在经济“奇迹”的那数十年里，格雷罗州、瓦哈卡州和恰帕斯州的内陆村庄的发展停滞不前。

59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人从乡村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尤其是迁往墨西哥城。因为各个城市的发展速度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因此，许多新来的居民只能在越来越庞大的贫民窟中度日。

这种对民生的忽视助长了绝望，不时引发革命的愤怒。随着革命制度党胁迫拒绝与其合作的人，并且消灭那些不能加以胁迫的人，在印

第安人为主的南部出现了基层镇压的模式。最著名的农民动乱事件是莫雷洛斯州的鲁文·哈拉米略(Rubén Jaramillo)及其追随者的起义。自1943年以来,这些新萨帕塔派(neo-Zapatistas)不断发动游击战,政府的花言巧语无法绥靖他们,他们的存在令政府无比尴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墨西哥革命的许多承诺已然落空。在洛佩斯·马特奥斯政府提出大赦后,哈拉米略放下了武器,安全部队乘机报复:他和他的家人不久便变成一具具尸体。洛佩斯·马特奥斯信誓旦旦地承诺在其任期内将重新进行土地改革,但他最终只分配了800万英亩的土地,而他此前郑重宣布待分配的土地超过2 800万英亩。少数贫穷的墨西哥人试图通过拿起武器来改变其境况,但更多人只是选择离乡背井来摆脱贫困。出走的一条途径是去美国。1964年之前,在"短工项目"(bracero program,指季节性批准墨西哥农业劳动力进入美国打工)的支持下,美国允许流动工人进入自己国内的农田打工。该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启动,那时美国出现了人力严重短缺的状况,短工协议在合同劳动制的基础上发放工作许可证。在它存在的22年历史中,460万墨西哥人参与了该项目,其中大多数人在收获季节去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帝王谷劳动,其工作和生活条件低于美国本土人肯接受的标准。尽管如此,有组织的美国劳工坚决反对该项目,理由是墨西哥人会抢走美国人的就业岗位。在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就任总统期间,他们最终赢得了终止该项目的战斗。不过,失望的墨西哥人只是少数。地方上的腐败和冷漠的官僚习气一再玷污这个合同制劳动计划。选择非法进入美国的劳工数是合法移居者的6倍。在20世纪60年代末短工项目协议终止之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的减速,非法移民的数量激增。虽然移民的性质使得人们不可能准确地加以统计,但美国移民归化局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作为非法移民而逮捕的外国人数量反映了这种人口急剧流入的情况:1965年被遣返的无证墨西哥人为5.5万名,1970年约为27.7万名,而1975年为令人震惊的68万名。

594

虽然对一些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但更多的墨西哥

人满足于大城市的诱惑,单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 300 万人移居城市地区。虽然与数不胜数的州府一样,像瓜达拉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二线城市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但最受大多数新移民欢迎的首选地却是墨西哥城。到 1990 年,该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把首都称为家乡。它的吸引力当然在于找到好工作的希望。跨出这一大步而进入墨西哥城的大多数移民是去投奔近亲或远亲的,因为极少有人会在没有一定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使自己陷入流离失所的危险。

不过,对于数百万人来说,这种经历最初会令人幻想破灭。城市的噪音、灯光、热闹和拥挤无所不在,而且即便在"奇迹"的黄金岁月里也难以找到薪资体面的稳定工作。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市中心很快就被声名狼藉的"贫困地带"(misery belts)所包围。这些新来的人口无法在市中心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只能采取非法侵入的手段居住在城市的外围——通常是在山坡、山谷,或者其他非宜居之地,如墨西哥城南部被称为佩德雷加尔(Pedregal)的熔岩流地带。为了避免交付租金,这些擅自占居者侵入的往往是私人所有的土地,有时是集体入侵,有时是逐渐占据。

虽然有关当局照例召集防暴警察、推土机,甚至是纵火分子来清除违章居留地,但人们坚持到底往往会如愿以偿。一旦地位开始变得牢靠,这些随意搭建的丑陋社区就成型了,用硬纸板和胶合板搭建的棚户缓慢升级为用空心砖和混凝土修建的小屋,木条的屋顶转变为马口铁皮的叶板,而土路最终得到平整和铺设。擅自占居者非法地利用附近的电线,在他们的头上形成"蛛网"(telaraña)。然而,即使是长期建立的定居点也经常缺乏自来水和下水道,疾病和早夭也往往跟随着一些居民。

对于大多数新来者而言,城市生活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艰难拼搏。对只了解农村宁静生活的那些人来说,墨西哥城这样繁华喧闹的大都市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经常催生焦虑和挫折感。尽管如此,他们自有其消遣之道。最流行的娱乐之一是由萨尔瓦多·卢特罗斯(Salvador Lutteroth)引进的,他是墨西哥革命时期的一名上校,曾在美国生活过,他在那里发现了职业摔跤这一独特行

当。卢特罗斯决定把这种多姿多彩的表演艺术引进他的祖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摔跤比赛主要是雇佣美国的二流运动员,他们从被弄得晕头转向的观众那里得到的评价好坏参半。但这位上校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年轻观众,他叫鲁道夫·古斯曼·韦尔塔(Rodolfo Guzmán Huerta),是个刚到首都的农村移民。

595



帕斯克尔兄弟创建了一个新的职业棒球联盟,从而挑战了美国的棒球大联盟。豪尔赫(左)是墨西哥棒球联盟的主席,他的兄弟贝尔纳多(右)则负责大举从美国的大联盟和黑人联盟招募球员到墨西哥打球。可是,美国各个棒球队的老板逐渐阻止了球员流到墨西哥去,并逐步瓦解了这个新兴的棒球联盟。

古斯曼·韦尔塔带着男孩般的热情参与职业摔跤活动,帮助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重大娱乐项目(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其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的总人数仅次于足球)。在战争岁月里,他先进入拳击圈,赢得一个有着银丝带的面具作为饰物,而且自称为"圣徒"①(El Santo)。他戴

① 全称是"银面具圣徒",Santo, el Enmascarado de Plata。——译者注

面具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美国表演者在十年前就戴面具，第一个人很没创意地自称为"面具一号"(El Enmascarado)。但古斯曼·韦尔塔与众不同。他是墨西哥人，了解移民穷人的艰难生活，因此他参与进行了一些创新，不仅使"自由格斗"(lucha libre，即职业摔跤)普遍流行，而且使其具有墨西哥特色。

"圣徒"从来不摘除他的面具，由此产生的神秘感有助于在流行文化中将其提升为一位传奇人物。他不仅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摔跤选手，而且成为类似于墨西哥超人的角色，他的崇拜者遍及拉丁美洲。无论是在比赛场上还是在有关他的12部电影中，"圣徒"都是一位悲剧性的高尚人物：这位诚实、勤劳的"小人物"与试图毁灭他的腐败力量的不公正行为进行斗争。在比赛场上，对手扮演干坏事的"野蛮人"(los rudos)，那群傲慢的恶霸为了赢得胜利，愿意背叛和欺骗。在高空摔技的"打斗"中，开始时的情况总是对"圣徒"及其盟友不利。但面对坏人，好人凭借勇气和决心最终转危为安。群众很吃这一套。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成群结队地来到墨西哥城简陋的混凝土竞技场，热情观赏这种表演。他们嘲笑丑陋、粗鲁的"野蛮人"，后者有时会穿上动物服饰，甚至是警察制服；他们为其温和、爱孩子的英雄而激动地欢呼，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徒"。 596

职业摔跤不是从美国引进的唯一的城市娱乐。棒球是由美国工人和游客在波菲里奥时期引入墨西哥的，它的流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达到了新的高度。1946年，墨西哥职业棒球联盟由8支球队组成，它在积极推动其发展的豪尔赫·帕斯克尔(Jorge Pasquel)的指导下一度风光无限。帕斯克尔是个商人，还是米格尔·阿莱曼的密友。他垄断着燃料的销售市场，而且根据美国大使馆的信息，他还涉足非法的毒品交易，因而积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财富。帕斯克尔拥有该联盟最成功的职业球队，即韦拉克鲁斯蓝队(Veracruz Azules)。他的俱乐部最强有力的对手在普埃布拉州，那里人才济济，其球队归通用汽车投资人卡斯托·蒙托托(Castor Montoto)和墨西哥城所有。包括首都的"红魔"(Diablos Rojos)在内，许多球队在20世纪40年代末靠招

募休战期的美国运动员来增强实力,那些球员既有来自大联盟的,也有来自黑人联盟的。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的接球手米奇·欧文(Mickey Owen)迁居南方,就像纽约巨人队的萨尔·马里耶(Sal Maglie)和圣路易红雀队的马克斯·拉尼尔(Max Lanier)那样。黑人联合会的明星,比如游击手雷·丹德里奇(Ray Dandridge)和投手利昂·戴(Leon Day),也加入了这一声名狼藉的"墨西哥跳豆"们的行列。光是在 1947 赛季,就有 26 位美国黑人在墨西哥的棒球内场效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墨西哥城的居民不仅可以享受像棒球这样的娱乐项目,而且还能够欣赏众多的新建民用地标。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看到了"改革大道"(Paseo de la Reforma)的复兴,那是首都宽敞的主干道,沿其两边修建了壮观的银行和宾馆,其环岛上则建造了装饰性的纪念碑:例如,在靠近查普特佩克公园的入口,有为石油公司(Los Petroleros)竖立的纪念碑,用以纪念拉萨罗·卡德纳斯及其对外国石油资产的国有化。这个公园内部有着令居民和游客成群结队来参观并为之惊叹不已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该馆是一幢现代派建筑,其中存放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无价之宝。这个建筑由著名的建筑师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Pedro Ramírez Vázquez)设计,在 1964 年完工。拉美塔(Latin American Tower)靠近墨西哥城的旧中心,耀眼夺目,在 1956 年开放时令所有其他建筑黯然失色。在潮湿多沙的地基上建造这样一幢建筑难度极高,因此它是工程学的一项成就。在次年中等强度的地震中,这栋 46 层的高楼没有遭受破坏。不过,首都最持久的象征——天使像在这次地震中倒塌,它曾屹立于墨西哥独立英雄纪念圆柱的顶端,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坏兆头。

也许墨西哥城最重要的进步出现在十年后,那时该市的领导批准修建创新型地下铁路系统的第一条线路。商业建筑的高楼大厦占据了市中心,不仅驱使中产阶级居民搬迁到市郊,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物流与交通问题。交通堵塞困住了上下班的工人,令旅客失意泄气,严重阻碍了开发旧城旅游潜力计划的落实。虽然在阿莱曼当总统时就讨论过建造地铁的想法,但不稳定的湖床地基含水量很高,吓倒了除最有远见的

597

支持者以外的所有人。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的现状及其失去殖民地时期的魅力普遍感到愤怒，忠于他们的埃内斯托·乌鲁丘尔图市长顽固地反对修建地铁。不过，强大的工程和建筑企业“土木工程师联合会”(Ingenieros Civiles Asociados, ICA)进入了这场辩论的核心。ICA 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垂直整合，在墨西哥城的房地产领域有大量投资。它认识到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得到暴利。ICA 有朋友身居高位：其董事会成员之一卡洛斯·阿维德洛·达维拉(Carlos Abedro Dávila)是商会的主席，而安赫尔博尔哈·德纳瓦雷特(Angel Borja de Navarette)和希尔韦托·博尔哈·德纳瓦雷特(Gilberto)都是其创始人。纳瓦雷特家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时任墨西哥总统的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

迪亚斯·奥达斯自然而然地成为墨西哥城地铁(Metro)最坦率的支持者之一。他显然在 1965 — 1966 年帮助组织了公共汽车司机的长期罢工，那次罢工极大地加剧了首都的压力，导致一直反对建地铁的乌鲁丘尔图下台。不出所料，在地铁项目被最终批准之后，ICA 赢得了承建的合同。虽然成本超标和进口昂贵的外国技术使得墨西哥城地铁的建设一波三折，但不能因此否认其实际成就。1968 年，墨西哥城拥有了一条当时最先进的地铁，在那年奥运会期间用它那流线型的列车将旅客送入或接出闹市区。

像气派的皇家大道酒店(Camino Real)那样的高档宾馆在同一年开张，款待宾客，因为首都与阿卡普尔科一样成为了旅游胜地。尽管如此，拥有汽车的本地人依然喜欢开车上班，哪怕驾驶越来越劳累。中产阶级的上班族从南面和西边像“卫星城”(Ciudad Satélite)那样的市郊理想世界出发，坐地铁在城中穿行。“卫星城”是由 ICA 建造的住宅区。不幸的是，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城(Ciudad Nezahualcóyotl)那样的东部贫民群居区的工人阶级穷人并没有完全受益于这条地铁。虽然因为有政府补贴，车费很低，但由于缺乏直达北部工业园区的地铁线路，往返于那些地区仍然很困难。总之，墨西哥城地铁是精英政治力量和金融机会主义的产物，是运用外国技术，为方便旅游而建造的，对大

多数城市居民来说是有缺陷的福祉。虽然它那干净的车站和法国建造的车辆传达着前程似锦的发展理念，但在启用的数月内，该地铁便因人流量过大而不堪重负，该系统被逼到了极限。

墨西哥城出现地铁和其他变化使得墨西哥经济"奇迹"最明显的受益者——中产阶级——的生活复杂起来。随着20世纪60年代临近尾声，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对当今政治表示不满。原因在于，虽然现代化将消费主义的舒适引入小商人、官僚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的家庭，但它并没有同时导致政治权力的增长。虽然作为废除卡德纳斯主义的阿莱曼同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直至6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依然未能进一步参与由该国既得利益精英把持的政治结构。正如政治学者洛伦索·梅耶所指出的，即使墨西哥官僚在政治体制内部逐渐崛起，总统最终还是不得不与国家的旧统治阶层加强联系，从而成功地进行统治（并在其任期临近结束时仍能享受该职位全部的福利）。这自然成为对革命制度党的"安定"的第一个重大挑战。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的减速，在政治上受挫的中产分子开始与执政党分道扬镳。

598

随着中产阶级增强了对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信心，而对改革的希望渐渐消逝，阿莱曼同盟的分裂逐步公开。在20世纪60年代初，权势阶层一度看起来开始理解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1964年，革命制度党提名年轻有为、具备改革思维的卡洛斯·马德拉索(Carlos Madrazo)出任党主席尤其令人憧憬。马德拉索提议，通过建立开放预选(open primary)，使候选人推举过程民主化。两年后，党和政府中大权在握的人物亲手将他免职，而到了1969年，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许多墨西哥人对这件事心存疑虑。1966年，马德拉索失势的同一年，在与总统的权力斗争中，革命制度党将保守的墨西哥城市长乌鲁丘尔图免职，那是对延续20年之久的与中产阶级结盟的又一次打击。到1967年，尤其是在北部各州，不满的人们开始脱离该党，转入反对派的阵营。与此同时，规模较小并且之前一直显得很顺从的国家行动党开始显露活力。它在埃莫西约(Hermosillo)赢得市长选举，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下加利福尼亚州，它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比如在年度选举中挤压革命制

度党,使之为了保持其对权力的垄断而公然作弊。

迄今为止,墨西哥中产阶级最大的聚居地正是墨西哥城,在那里,与专制政府的对抗最终发展成严重的暴力活动。是中产阶级的青年人发动了最终决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是经济发展最幸运的受益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那些孩子成批进入大学。在首都,大多数人在国立自治大学(UNAM)就读。该大学坐落于舒适的南部市郊边上,在多岩石、由火山造成的地形上构建。国立自治大学蔓生式的现代校园始建于阿莱曼时期,其规模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巅峰,因为它的学生总数从 1949 年的 2.3 万人激增到 1968 年的 8 万人。统计数据表明,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其学生差不多有 60%不仅生活在这个联邦行政区,而且出生在该区;将近 80%的学生从家里乘车去上课,大多数情况下乘坐公共汽车。仅次于国立自治大学的是国立理工大学(IPN,一译“国家技术学院”),它也是政府慷慨提供资金的产物,1968 年注册学生为 5.5 万人。事实证明,这两所大学并不特别注重政治,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偶尔发生的少数几次重大抗议而言,其原因几乎总是局部性的问题,比如说公共汽车车费或校园设施的质量。但 1968 年那些事件的性质是不同的。

与主张变革的学生领袖作对的是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斯。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其家族成员长期在政府中任职(他的祖父是瓦哈卡州州长)。在其朋友和导师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手下出任内政部长之后,迪亚斯・奥达斯在 1964 年得到了总统职位。与事后的常见观点不同,他在得到最高长官的职位时并没有与其前任脱节的异常保守的痕迹。在竞选征途上,他把土地改革和缓解农民贫困作为其主题(迪亚斯・奥达斯喜欢把自己比作潜水艇上的声纳设备,能够通过右派和左派批评者的声音得知他的航向是否正确)。在其 1963 年的提名演讲中,他宣称保护公民自由。一俟就位,他在很大程度上沿用其前任的政策。四位洛佩斯・马特奥斯的内阁成员在他手下任职,而小说家阿古斯丁・亚涅斯(Agustín Yáñez)执掌教育部,该部依然在联邦预算中得到惊人的经费。虽然迪亚斯・奥达斯确实缩减了土地改革,但

599

这显然是可分配土地短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目标。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暗示的,他会保留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正式外交关系,这令美国恼怒,而他的外交部带头推动了拉丁美洲成为无核区。

因此,迪亚斯·奥达斯并非一位与墨西哥政治体制脱节的异常总统,但他的总统任期却很不寻常地因一系列毁坏其名誉的事件而污迹斑斑。他所代表的势力强大的精英疑神疑鬼,与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青年的抱负发生了碰撞。

这些危机的起源简单得令人惊讶。1968 年 7 月,在帮派义气和校际对立的推动下,青少年几个月以来莽撞地犯下累累轻罪,两个闹市区预备学校的学生相互竞争,墨西哥城的防暴警察对他们的街头混战反应严重过度。这些部队被称为"防暴队员"(Granadero,棍棒),他们粗暴对待平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9 年阿莱曼创建该部队之时。在殴打多名青少年和旁观者之后,防暴队员本身成为抗议的根源。数万名愤怒的平民因此出人意料地走上街头。1968 年 7 月 26 日,在那次暴力执法发生 3 天之后,反对防暴队员的示威凑巧与规模较小的庆祝古巴革命的游行同时发生。大批警察的到场加剧了紧张气氛。在首都的中心,很快便爆发了骚乱,因为警察动用催泪瓦斯并试图疏散两批群众,造成了道路堵塞和全面暴动。

在这个节骨眼上,形势依然是可以基本控制的,但政府的决定再次触动了恐慌的神经。迪亚斯·奥达斯及其同伙充分认识到不久之后世界的眼睛会落在墨西哥身上,因为距离夏季奥运会在这个城市的召开仅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该政权部署武装部队,使用武力夺取了由桀骜不驯的学生占领的 4 所预备学校,逮捕了这些学生并将其送进监狱。愤怒在大学校园中蔓延,国立理工大学和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因义愤而团结起来,他们通常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不同的协调委员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大多数要求与释放被捕人员和取消防暴部队有关。许多学生及其同情者很快回到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8 月 1 日,约有 10 万人行进到闹市区。在整个月里,示威人数一直在增加,到 8 月 27

600

日增长至 4 倍，那时组织者宣布他们会安排数千名警戒人员连续不断地占领“中央广场”（索卡洛，又称“宪法广场”），而这个宽阔的广场就在国家宫前面。



图为在特拉特洛尔科大举屠杀学生后的第二晚，士兵们在索卡洛逮捕了抗议者。这次屠杀事件使墨西哥联邦政府和执政党均失信于民。军队大举屠杀抗议者的行为使墨西哥民众感到震惊，而此次事件至今仍是墨西哥历史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惨剧。

这次占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在当天午夜，中央广场的灯光熄灭，警察和军队攻击、殴打示威者，拘捕数百人。数日后，迪亚斯・奥达斯向国会发表讲话，断然宣称墨西哥没有政治犯，不会容忍持续的动乱。顺从的媒体大肆宣扬政府的论断：“共产主义者”和“外国渗透者”是最近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这种宣传伎俩很可能旨在防止反政府的动乱蔓延到保守的农村地区，至少部分目的如此。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有关当局利用这个喧嚣的时机再次迫害规模极小的墨西哥共产党，搜查其总部，并捣毁其出版机构的办公场所。对许多示威者来说，政府的警告和中央广场的夜间围捕就足以冷却其热情。虽然 9 月初仍有 25

万人参与了静默的游行，但抗议者的人数开始减少。

601 在这样的背景下，墨西哥的政治精英看到了惩罚被他们视为是这次骚乱首要挑唆分子的那些人的机会，并向可能敢于逼迫这种体制走得太远的那些人提出持久的警告。因此，在10月2日，当只有数千名主张变革的最强硬分子聚集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特拉特洛尔科广场(Tlatelolco Plaza，即“三文化广场”)上抗议时，政府迅速用安全部队和军队包围他们。在他们头上盘旋的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作为信号，军队推进并开火。机关枪声不断，士兵把平民打倒在地。其他人用小型武器和步枪开火，冲击人群，与此同时，外国记者在记录这次大屠杀，直到骚扰迫使他们退出为止。对在该群体中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不可能逃脱。安全人员围困、追击、逮捕了数千人。那些被屠杀的数百具尸体有许多被卡车运往“一号营地”，那是靠近查普特佩克公园的军事设施。在那里，焚尸灭迹的火光点亮了夜空。

这次大屠杀过后30年，在1998年，学者根据“信息自由法”最终得到了敏感的美国政府文件。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网络，完全知道墨西哥城在1968年间发生的事件。情报分析者向上级报告时说，墨西哥动荡的根源在国内，也就是说，虽然官方宣称有“共产党的颠覆”，但并不存在真实的左翼威胁。他

602 们报告了墨西哥政府的老练对策，其中包括创设经费充裕的“可靠学生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Authentic Student Body)，用以分裂反对派并破坏抗议运动。美国政府的高官在那个夏末得知墨西哥政府即将实施镇压，而依然部分保密的文件表明他们至少予以默许。

在无数警署和军事基地，拷打和酷刑持续了几个星期。一些最重要的学生组织者被绑架，然后再也没露过面。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的头昏眼花的受害者随后回忆说，他们游荡在这个大城市的其他地方，惊讶于生活仍在继续，就好像完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那样。确实，电视和电台继续播放节目，而次日，听话的印刷媒体则报道说，“交火”和“外国煽动者”造成一些“骚乱”，根据读者众多的《至上报》的统计，这些骚乱导致20人死亡。在数日之内，随着墨西哥开始接待全世界来客，镇

定的迪亚斯·奥达斯宣布夏季奥运会开幕。虽然那些特拉特洛尔科广场的血迹被静悄悄地用消防水带冲洗干净，但墨西哥的形象因那些血迹而严重污损。

迪亚斯·奥达斯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因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给全国造成的集体冲击而蒙上阴影，这种影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反政府的示威活动终止了，但紧张的政治气氛却显而易见。与这种压力同时到来的是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因为战后国内生产总值惊人的持续增长渐告终结。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在墨西哥经济机体中逐渐孕育，侵蚀了比索的力量。估值过高的比索(1954年以来确定为12.5比索兑换1美元)使得出口商品过于昂贵，助长了贸易逆差，而这又反过来造成墨西哥公私债务的增长，不过其规模依然不大。政治绝望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风暴要求国家之舟的航行掌握在一双稳定的手上。对墨西哥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迪亚斯·奥达斯选择的继承人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Luis Echeverría Alvarez)1970年就任总统。他的背景与统治墨西哥的政治精英大致相仿。他是律师、大学教授和革命制度党的官员，一路爬到高位，他在洛佩斯·马特奥斯当总统时就职于内政部，在迪亚斯·奥达斯手下成为该部部长。在公众的心目中，因为他的工作职责包括国内安全问题，所以人们把他与那次屠杀和镇压联系在一起。在48岁这个充满活力的年龄点上，埃切维里亚采取了自拉萨罗·卡德纳斯以后的历任总统候选人都不曾采用的竞选路径，或许是希望能借此重新塑造其形象。他的胜利当然是必然的，但投票人数明显下降，有58%的选民留在家中没有投票，因为他们认识到墨西哥民主实践的徒劳无益。

即使许多墨西哥人并不怎么信任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我们至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人相信他自己。一俟就任，他就展现了极大的干劲和自信，很快成为该国历史上活动最为积极的最高行政官员。他试图恢复公众对政治制度所失去的信心，积极致力于使病态经济复苏。他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创造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传统：与其前任分道

603

扬镳,把国家的苦难归罪于前任。令埃切维里亚懊丧的是,他自己的继任者在这一方面注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甚至在竞选期间,他都停留片刻,为特拉特洛尔科的死难者默哀,这激怒了迪亚斯·奥达斯。他显然打算走他自己的路。

为了恢复墨西哥的政治团结,这位年轻的总统用脚踏实地的措施向大失所望的民众继续施展其戏剧性的竞选花招。他尤其注重吸引该国知识阶层重返体制的怀抱。学者似乎尤其作好了被收买的准备。为了换取新的经费和向埃切维里亚提建议的机会(虽然那些建议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忽视),他们对他的"开明"领导大加赞誉,而且在他的许多世界之旅中与他一起乘坐总统专机。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此前一直对迪亚斯·奥达斯治下的镇压感到烦忧,现在却成了驻法国的大使。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是一位在20世纪60年代因其政治信仰而被监禁的共产主义壁画艺术家,他得到了新政府的民族主义赞誉。不过,对之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的归顺突然赐以荣誉的爱国辞藻也同样被用来使新的批评者缄默。比如,当美国学者肯尼思·约翰逊(Kenneth Johnson)为写作《墨西哥民主》(*Mexican Democracy*)一书而采访1968年镇压的幸存者时,埃切维里亚政府逮捕了他全家并迅速将其驱逐出境。

虽然埃切维里亚高调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但他恢复阿莱曼时代的稳定联盟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不满并未平息,它在政治上的失意曾经推动了墨西哥城的骚乱。它继续走出革命制度党掌心,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投入了高速发展的国家行动党的怀抱。一些部门的产业工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这个政治组织的掌控。埃切维里亚也未能赢得抨击政府的学生的支持,虽然在就职后不久,他支持新莱昂(Nuevo León)州立大学的罢课学生,迫使那里的革命制度党州长辞职。

但他的姿态很快因墨西哥城的新事态而消散。学生及其同情者决定检验政治开放的新局面是否只是表面文章,在1971年6月10日发动了游行。在群众完全集中起来之前,右翼的恶棍就出现了,他们由城

市公共汽车免费接送。在这些歹徒用刀子和轻武器残害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并杀死二三十人时，警察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毫无疑问，实施屠杀的命令来自高层。因此，虽然大学校园在埃切维里亚的任期内的大多时间里保持平静，但没有什么学生景仰他。当他最终在国立自治大学现身时，蒙面的学生向他投掷瓶子，有一个瓶子还打中了他。

在20世纪70年代初，极少数失望的学生及其同伙转向游击活动，希望引发反政府的武装起义。在墨西哥城，一个名为“革命行动运动”(Movement of Revolutionary Action)的城市秘密组织出现，而其衍生派别在其他城市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绑架活动，例如绑架美国驻瓜达拉哈拉的总领事泰伦斯·伦哈迪(Terrence Leonhardy)。在农村地区，贫穷的格雷罗州(Guerrero)出现了不相关联的游击运动，那里浓密的灌木丛和山岭地形似乎有利于进行持续斗争。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早期的游击队无法对抗政府统一组织的镇压。通过把他们定性为共产主义分子，外加驱逐一些低级别的苏联外交官，埃切维里亚政权凶猛地追逐这些土生土长的革命者。 604

1971年，在动用15%的军队封锁了格雷罗州部分地区之后，当局使用酷刑和法外杀戮以图消灭那里的起义者。为了在反对颠覆的战斗中找到同盟，埃切维里亚政府求助于极右翼。最重要的对立恐怖组织是泰科斯(Los Tecos)，那是在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UAG)的基层组建起来的新法西斯主义的秘密社团。在20世纪60年代初之前，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依然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次要高等教育机构，此后包括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美国慈善机构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注资使其转变为虔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的港湾。泰科斯极度仇视犹太人，散发为世界自由主义而责难犹太人的小册子，组建了无数阵线，包括墨西哥反共联盟，后者轻易地成为现状的辩护者。最恶劣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该联盟作为恐怖团体培养了旨在清除墨西哥“危险”的左翼分子的行刑队。

然而，就在埃切维里亚政府批准消灭该政权最坚定的反对者的同时，这位总统本人却越来越信奉“极端”的外交政策。埃切维里亚对于

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渴望,甚至超越了迪亚斯·奥达斯。他经常环游世界,在他任期将近结束的时候,他显然试图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并企图成为联合国秘书长。1972 年,他冒险前往智利,在那里与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Salvador Allende)磋商;次年前往亚洲,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了苏联。在其任期中,他也经常访问不结盟国家,通过与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这样的人物亲近,为新闻界提供数不胜数的拍照机会。他公开宣扬不结盟的政策并且经常批评美国。虽然他的许多旅行主要是为了推动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关系,但也可以看出他同样热衷于推销他自己。

但对在墨西哥国内的人来说,他们的总统在海外做什么或说什么无关紧要。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的状态。1971 年以后,墨西哥经济表现出紧张的迹象。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通货膨胀趋势急剧上行,同时疲软的比索一路下滑到 12.5 兑换 1 美元。通货膨胀助长了初期的资本外逃。周密设计的激励新投资的金融方案,加上慎重调整开支和货币供给,有可能使颠簸的经济之旅顺畅,但埃切维里亚不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他处理经济问题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干劲,就像他在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焦点或积极的成果。

605

埃切维里亚不是让比索相对美元自由浮动,从而找到其真正的价值,而是固执地拒绝让比索贬值,反倒允许出口锐减。于是,由于他不愿意对墨西哥人失去工作袖手旁观,所以总是让政府介入,将整个行业和无数破产的企业国有化。1971 年,国有化"拯救了"铜业,然后又在 1972 年援救了烟草业、国家电话垄断企业"墨西哥电话公司"和大部分银行部门。随着这种趋势的持续,公共债务激增。埃切维里亚政府不愿意通过对强大的私营企业大幅度加税来增加收入,而是选择让气体燃料和公用事业的价格暴涨,而这恰恰更刺激了通货膨胀。为了战胜通货膨胀,埃切维里亚政府对许多基本商品实施了物价管制。在 1973 年春季,出于对国家继续走在不切实际的非正统经济路线上的担忧,乌

戈·马加因(Hugo Margaín)向埃切维里亚提出建议,但他立即被革职并由顺从的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取代。后者继续采取破坏性的做法,通过印制钞票和大举外债弥补亏空。

埃切维里亚本人开始关注那些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由于对基本粮食产量缩减和继续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前景感到沮丧,他批准在农业上急剧增加开支。然而,可以轻易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寥寥无几。埃切维里亚政府认识到,阿莱曼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存在许多缺点,它强调现代化和商业化种植,忽视了小农和无地农民。墨西哥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期落后的中南部各州需要帮助。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最方便的解决之道,即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已不再可行,因为可以分配的土地已经微乎其微,哪怕是准可耕地。墨西哥许多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早已发展到以小农庄(minifundias,不能够养活其持有人的小块土地)为主的阶段,而埃切维里亚政府找到的可以分配的土地普遍质量低劣,以至于只能勉强当作牧场。因此,埃切维里亚政府求助于雄心勃勃的农业信贷、价格支持、市场经营和技术援助等计划。巨额资金注入使得国营民生公司成为墨西哥最大的官僚机构,而次要机构的新网络也着手复兴农业部门。

不幸的是,增加官僚和资金并不是持久的解决之道。许多匆忙构思出来的倡议往往因管理不善而受阻。地方性的和跨部门的机构中琐碎的争斗经常妨碍其行使职权,而养活这个扩大了的官僚机构所需要的费用则加深了全国的财政危机,伤及每一个人。通货膨胀在 1973 年加速,联邦赤字激增。新建和已存机构的资金注入都为腐败提供了新的机会。埃切维里亚的统治时期,腐败达到了墨西哥自阿莱曼以来的最高程度,因为过时的会计方法未能充分地监视现金流动。埃切维里亚总统本人离职时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一些人宣称其财富净值相当于 10 亿美元),而他对个人财富的嗜好似乎也启发了他身边的许多人。

606

在不断寻找新的治疗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过程中,埃切维里亚政府迅速开发边疆。北方的边境地区根据迪亚斯·奥达斯任总统时启

动的“边境工业化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转型。这项倡议的核心在于以沿边境组装商品的工厂命名的代加工业(maquiladora，特指墨西哥的返销型外资企业)。从美国工厂进口原材料，由墨西哥一方的低工资工人加以组装，然后作为成品免税回到美国。以这种充满希望的起点为基础，埃切维里亚政府积极推动其发展，通过削减官僚主义的繁琐手续和许多法律文书工作，加快了建立新工厂的速度。到1974年，超过7万名墨西哥人在返销型外资企业里辛勤劳作，其中大多数为年轻女性。这些工厂的条件是原始的，有着极不人道的安全与环境标准，还有腐败的男性工头，他们会自己找机会进行性剥削。极低的工资使这种返销型外资企业对扶贫帮困毫无助益。当埃切维里亚试图通过将最低工资翻一番来纠正这个问题时，无意中造成了冷却该行业增长的影响，直至1976年比索贬值才扭转了这种颓势。

墨西哥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再度注重返销型外资企业和边境开放，意料之外的后果是出现了新一轮向北移民的浪潮。边境城市的发展是惊人的。到1975年，埃尔帕索对面的华雷斯市的人口激增至70万人。大多数新移民是穷人。在西南部环绕该市的山坡上是破败的连片棚户区，居住在这种贫民区的人们希望在组装工厂找到工作，试图得到在美国工作的绿卡，更常见的期望是非法越境——美国移民与归化局逮捕的偷渡者从1970年的27.7万人上升到1975年的68万人。

在新的倡议改变了北方边境地区面貌的同时，埃切维里亚政府试图在墨西哥最东南的地区上马一个巨型项目。1967年，一群投资者和开发商在尤卡坦海岸原始丛林来回考察，试图为一个海滩度假村找到田园风光的场景。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旅游胜地坎昆(Cancún)才开始成形。L型的半岛有着晶莹雪白的沙滩和湛蓝的海水，形成了这一20世纪90年代成为墨西哥最大旅游亮点的完美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寻找工作的玛雅人涌入这个地区；1974年，第一批宾馆开张，大多数宾客是北美游客，他们从南方8英里之外的机场到

来。尽管建筑规范和海滩依然属于公共范畴，坎昆还是很快走上了充斥着"伪墨西哥"风味的旅游文化之城的道路，那里满是贩卖墨西哥阔边帽和其他"土著"手工艺品的礼物商店，而这些东西往往是在中国组装的。

607

即使在尤卡坦开发旅游业，在边境城市建组装工厂，但埃切维里亚恢复墨西哥"奇迹"的各种尝试全都以失败而告终。当他就任总统时，政府推动的资本主义已经穷尽其各种可能性，而到了 1973 年，他的总统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崩溃。之前 30 年经济增长的耀眼光彩已经消失。阿莱曼娴熟地利用收买和镇压而维持的政治稳定也滑出了埃切维里亚紧握的双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在一个大批群众失业的国家里实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在小农之国进行绿色革命和商品化种植，面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而表现出政治僵化。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些矛盾不可能再得到遏制。认识到尝试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是徒劳无益的，墨西哥人审慎地展望未来。也许经济上的新灵丹妙药和政治上的全新承诺能够解决笼罩在墨西哥追求现代性上的矛盾。

第十九章　技术官僚和革命解构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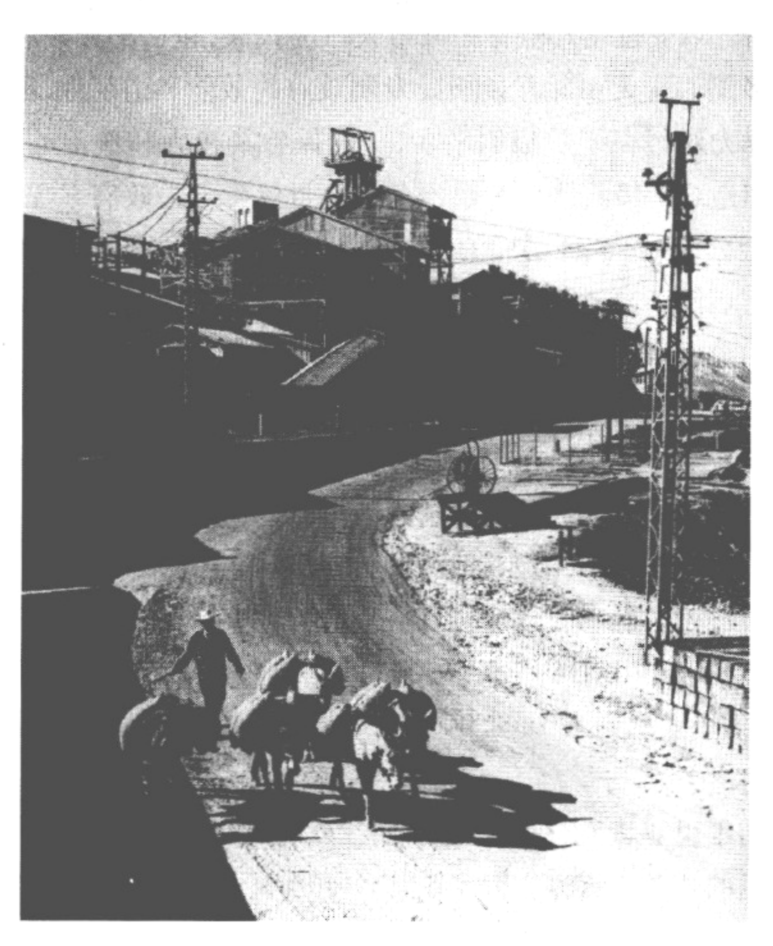
罗德里克·埃·坎普(Roderic Ai Camp)

609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墨西哥政治史的观察家都注意到这个国家的扩张,无论是在广泛的政治意义上,还是在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上。在这个国家的黄金岁月,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和连续性因所谓的经济奇迹而增强,后者的基础是进口替代业的宏观经济思想,在此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墨西哥人将这种增长归功于强有力的政府,它的合法性从中大为获益。

墨西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张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不能主要归因于墨西哥在那个时代的工业化。谈到政府作用的扩大,其解释涉及历史、文化、心理和政治的许多变量。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回想本土文化和西班牙殖民者的重要传统。在构造和应用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他们的制度是专制主义的,将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上。因此,无论在哥伦布之前,还是在殖民地和独立时期内,墨西哥一直都采用中央政府集权的做法。将政府权力集中在其行政机构限制了政治决策权力的分享程度,从而形成了以强大的行政分支、更为强势的总统职权和低竞争性的制度为表现特征的政治基础。

这个国家也有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结盟的悠久传统。比如,殖

民地时期教会与国家的共生关系，以及一开始发展疲弱但后来变得强势的私有部门，构建了文化依赖国家的条件。因此，就像其他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那样，墨西哥的大多数文化领袖在国家机构或国家支持的组织中工作。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从不批评国家，但它缓和了一些群体的批评，改变了其政治批评的内容和用途。 610



图为 1958 年时蒙特雷的美洲冶炼厂的情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在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增长创造了一波被称为"墨西哥奇迹"的经济发展浪潮。除了该国首都之外，北方的企业家们使蒙特雷成为了这次发展浪潮的主要受益城市。而这些企业家也逐步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经济和政治集团，被称为"蒙特雷集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标志性的衰落远在其经济势力消退之前就已出现。这个国家的政治衰败始于 1968 年，而它继续加强其对

经济的控制，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的控制，直至 1982 年，那时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1976－1982 年在任）将所有国内银行国有化，使政府对国民经济间接控制的程度提高到约 80％，堪称空前绝后。

1968 年 10 月 2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心理起点，那时墨西哥军队残暴地镇压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抗议政府干预学生事务的学生示威者。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为代表，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墨西哥人由此开始质疑专制政府的效能和道德性，因为后者需要用暴力对付中产阶级的学生，从而保持其权力和统治的合法性。这个起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虽然看上去政府幸免于难，但市民社会分裂，而各种层面的不同政见开始复兴，并以喧嚣的形式出现。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斯总统（1964－1970 年在任）是他那代人当中的最后一位执政者，而且是那类根源在地方、与执政党关系密切且具有政府机构以外的工作经验的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人。

611

当迪亚斯·奥达斯在 1969 年指定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作为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进而成为其继任者时，前者认为，埃切维里亚在内政部（墨西哥政府的首要情报与政治机构）工作多年，会成为自己的方法和思想的复制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朱迪丝·赫尔曼（Judith Hellman）在她对埃切维里亚政府的解读中所指出的，埃切维里亚感到了 1968 年事件所引发的潜流，采取了不同于其前任的应对之道。

埃切维里亚认为，在文化和经济上扩张的国家能够化解一些墨西哥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因此，他向知识分子和受 1968 年政府行为影响的那一代学生主动示好，试图通过让他们在其政府中担任要职来拉拢潜在的批评者。他培养了与库埃纳瓦卡主教塞尔吉奥·门德斯·阿尔塞奥（Bishop Sergio Méndez Arceo of Cuernavaca）的友谊，后者是天主教“穷人教会”（church of the poor）的首要代表人物，而且与梵蒂冈建立了很密切的非正式关系。在经济阵线上，他鼓励奥拉西奥·弗洛雷斯·德拉培尼亚（Horacio Flores de la Peña）提高私营企业和行业的国有化程度，后者曾任国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时任掌管政府资产的

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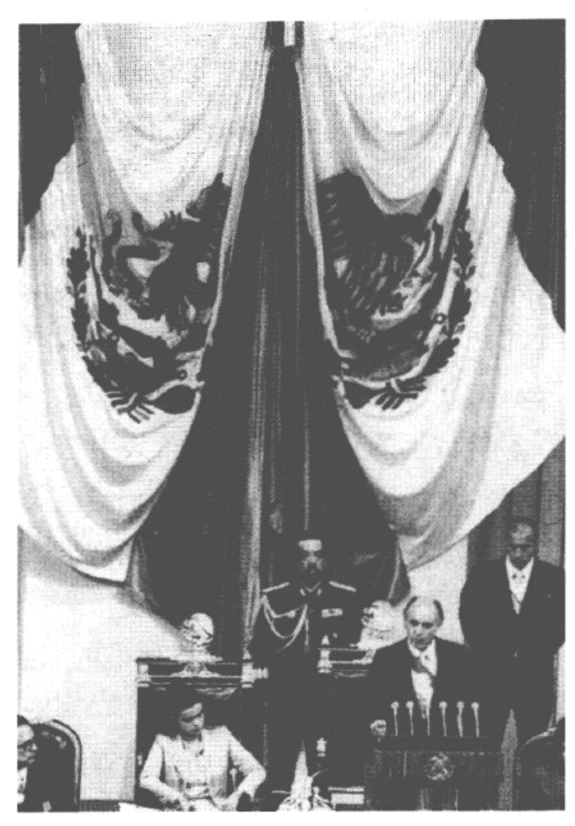
在政治上，埃切维里亚实行的是矛盾政策的组合，多少增强了墨西哥政治的互换性。一方面，他在与该政权有关的团体（例如有组织的劳工）当中重新分配政治势力，支持某一个团体压倒另一个。另一方面，他命令军队追杀卢西奥·卡瓦尼亚斯（Lucio Cabañas），并在1974年成功地消灭了他的运动。后者是农村游击队的指挥官，绑架了格雷罗州的州长。正是在埃切维里亚的统治下，墨西哥第一次看到了城市恐怖分子的增长以及有组织的政治左翼的兴起。

虽然埃切维里亚试图与国家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合作，其中包括商界、劳工和知识分子，但却未能明显改变他们彼此之间或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均衡。当他在最后关头决定将墨西哥西北部的农业地产国有化时，这位总统留给其政府一个烂摊子，使他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后一位这样做的总统。他这么做自然疏远了许多商人和支持他们的组织，使其后任政府很难再得到商界的支持。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就是那位继任者，他是埃切维里亚总统少年时代的朋友，随其在墨西哥城市郊一同成长。他是知识分子兼政治家，是公共生活的新面孔。起初，这位总统认为自己能够在墨西哥社会的冲突利益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虽然面对的是困难的政治形势，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利益一片狼藉，但洛佩斯·波蒂略是在原油价格达到峰值的年代就任总统的。他与其最密切的顾问都认为，这种政府控制的资源是墨西哥能够发展其经济和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法宝。 612

可以说，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的政府处在国家扩张的黄金时代。利用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销售作为财务担保，以那个时期所特有的非常高的利率，墨西哥政府开始从外国银行，尤其是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那里举债。随着资金涌入墨西哥，涌入基础设施和其他政府提供资金的项目，墨西哥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5%。

1977－1979年，洛佩斯·波蒂略暂时扭转了总统连同政府形象衰落的趋势。但当石油价格下跌、其政府任期将尽时，墨西哥人发现自己的国家拥有估值过高的比索，债务水平异常之高，利率飙升，而经济衰



1976—1982 年的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昭告全国,称他领导的政府将利用新近发现的油田来为一轮新的工业、社会福利和高产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这届政府对外借了大量高息贷款,可最终它发现新油田出产的原油质量很低。这个发展计划让墨西哥背上了世界上最沉重的外债负担。

613 退。看到自己大部分的积极政绩和声望开始破碎,这位总统以国有化国内私营银行部门作为应对,从而更为严重地疏远了私营部门,在商人和政府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洛佩斯·波蒂略的行动使政府在经济意义上更为强势,因为控制金融机构及其贷款业务就意味着控制了大部分国民经济。但政府的声誉在许多其他方面丧失殆尽。墨西哥人民开始大肆责难政府,认为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的财富缩水负有责任。

当洛佩斯·波蒂略在 1981 年指定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作为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明显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领导面貌及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德拉马德里曾是波蒂略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官至规划与预算部长。作为总统候选人,随后作为总统,德拉马德里在任时的政治形势明显比 1970 年和 1976 年总统交替时更为恶劣。洛佩斯·波蒂略成为人们近期记忆中最为痛恨的总

统。人们指责他进行了大量的欺诈，将他作为许多恶毒笑话的笑柄。因此，德拉马德里决定采取的策略是：把墨西哥人的期望值定在相当低的水平上，这样在实际操作中的任何差池都不会产生太大的挫折感。

德拉马德里是第一位拥有硕士学位并且是第一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墨西哥总统，他并不认为政府引导的经济战略会解决墨西哥的问题。他代表的是埃切维里亚和洛佩斯·波蒂略之后的年轻一代，那两位总统在 1938 年作为学生都见证了拉萨罗·卡德纳斯的石油业国有化，政府权力和国家主权达到象征性的高点。而德拉马德里出生于 1934 年。在他成长的年代里，世界大战爆发，紧接着又是战后 50 年代冷战最激烈的时期——这正是墨西哥当时更为积极地参予其中的国际局势。

1982 年，德拉马德里就任总统，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为 −0.6%，这个数字在他就职一年后，更是恶化到了 −4.2%。墨西哥正面临着自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不过，总统依然保留了此前的大多数权势，而德拉马德里成功地实现了某种控制物价的社会契约，走上了降低通货膨胀和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长期而艰难的道路。在政治上，德拉马德里最先开放了体制，接受来自反对党的有力竞争。他的公平选举的早期承诺很快导致反对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正如韦恩·科尼利厄斯（Wayne Cornelius）及其同事所声称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对反对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感到害怕，又退回了人们所熟知的那些更传统的政策策略。

一方面，德拉马德里成功地修复了与私营部门的关系，表明银行私有化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他实施了把其前两任国有化的许多企业卖还给私营部门的积极策略。尽管他致力于消除改善私营部门与政府关系的一些障碍，私营部门内部的团体仍增加了他们对墨西哥政府和德拉马德里内阁的公开批评。此外，私营部门的某些群体决定采取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的策略，在资金上支持反对党及其候选人，期望实现他们的政策偏好。　614

正当德拉马德里政府努力化解其经济紧缩策略的政治后果之时，

墨西哥城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即 1985 年 9 月 19 日发生的重大地震，它造成了程度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从公众的视角来看，这次地震表明德拉马德里总统冷淡、矜持，而且过于谨慎。德拉马德里总统及墨西哥城的首长不是允许军队执行商定的全国应急计划，而是依靠文职救济工作人员，事实证明后者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社区只能通过自救与协作，由居民自己领导拯救受灾者的行动，天主教会也在组织救济援助上起到一定作用。

被迫迁居的居民和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们对德拉马德里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感到不满，便组成了草根组织。一时间，平民行动和其他类型的利益团体大量涌现。流行人物有戴面具的“超级巴里奥”（Super Barrio，直译为“超级街区”），他是打扮成摔跤选手样子的社区英雄，对穷人来说是善的代表，在终结政府腐败和低效的行动中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这些团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成为更大的人权和平民行动团体的草根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以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1940－1946 年在任）在民众主义者拉萨罗·卡德纳斯（1934－1940 年在任）和倾向于商界的米格尔·阿莱曼（1946－1952 年在任）之间提供某种桥梁的方式相同，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成为一位过渡性的总统。德拉马德里缺乏策划重大经济变革的资源。在其政府任期告终时，人们看到雄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那些人为权力而激烈斗争。虽然人们可以认为他们的大部分争斗出于纯粹的个人野心，但意识形态变得同样重要，就像 1940 年总统更替时那样。

从政策的角度看，有两个问题在 1987－1988 年的总统更替中凸显出来：一个问题是要么实行更为传统的政府主导的赤字开支策略，要么实行经济自由化及相应的一切措施，加上政治自由化，这在墨西哥意味着在选举过程中以及在执政党即革命制度党内部提高民主化程度；另一个问题是继续保持政治现状。考虑到在之前墨西哥在任总统从其内阁中选拔接班人的情况，前总统卡德纳斯之子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Cuauhtémoc Cárdenas）不是总统提名的主要竞争者，但在墨西

哥领导层内部，他与曾是党主席和内阁成员的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Porfirio Muñoz Ledo)领导了一场名为“民主潮流”(Corriente Democrático)的改革运动。正如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在其著作中所说的，他们试图作为内部人士改革革命制度党并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最终被迫退党。

如果把1968年视为墨西哥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基准年份，我们可以把1988年视为更近的时间点，它处在从那时以来所发生事件的分界线上。在1988年，德拉马德里选择了他的规划和预算部长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作为他的总统候选人，和他自己出任总统候选人时的职官相同。在这个内阁层面的职位上，萨利纳斯最容易成为德拉马德里政府不受欢迎的经济策略的替罪羊，而且萨利纳斯在党内政治家当中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选择他作为候选人导致革命制度党内部进一步分裂。卡德纳斯决定作为独立的总统候选人对抗其先前的政党和同事。虽然他起初是作为一个小反对党即墨西哥真正革命党的候选人参选的，但在选举日之前另有3个党派选择他作为其候选人：国家重建党卡德纳斯阵线(PFCRN)、人民社会主义党(PPS)和墨西哥社会主义党(PMS)。

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的得票数异常之高，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相对萨利纳斯的50%，他赢得38%的选票。而在议会选举中，同情卡德纳斯的候选人赢得许多议会席位，尤其是在中心城市，甚至还有一些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公认的反对联邦政府的各州。一些观察家认为，只有大肆作弊才能阻止卡德纳斯赢得选举的胜利。

这么说或许是公正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在1988年当选为墨西哥总统标志着那个职位的低点，还有政府合法性的衰落。因此，萨利纳斯只用了5年时间就能够扭转乾坤，为他自己和总统职位赢得近几届政府无法企及的声望，同时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这种成就是非凡的。他在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惊人的政治决策，通过“全国团结纲领”(Pronasol)巩固了他的初步声望，从而实现了这一切。“全国团结纲领”是政府提供资金的基层发展机构。虽然正如许多研究结论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机构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扶贫减贫的作用，但事实证

明它也是赢得选举和民众支持的有效工具。在众多大胆的举措中，萨利纳斯使政府所有和经营的一系列公司私有化，包括由前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国有化的银行，在1992年显著改变了教会与政府的宪法关系，而且终止了政府的土地分配计划和集体农庄这一农业结构。

从表面上看，萨利纳斯总统治下的改革似乎减少了政府的影响力，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破坏了由来已久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指政府主导下的各阶级合作的理念，这种政府也被认为是极权的）框架，墨西哥政治模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构建于这种框架的基础之上。虽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程度确实下降了，但作为更加有效的政治手段，它的影响力依旧，甚至还得以增强。虽然萨利纳斯政府勉强进行了一些重大的选举改革，增强了反对党，提高了后者在选举中击败革命制度党的能力，但萨利纳斯同时在总统手上集中了更大的权力，利用它解决政治争端，包括革命制度党与反对党之间的争端。

616



图为1993年时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正在发表他的第五份国情咨文。萨利纳斯通过他的“团结”运动，启动了富有创新精神的草根阶层改革项目，但由于他那届政府和他的家族腐败和勒索现象猖獗，因此他的声誉大为受损。今天他自我放逐，生活在墨西哥之外。

在萨利纳斯治下，政府的重振和总统权势的增强稳定地持续到1994年1月1日，那时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地方游

击队在南方恰帕斯州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及其周边地区的活动使之大出风头。起初萨利纳斯总统的反应是用军队镇压,但国内外媒体立即开始报道侵犯人权和过度使用暴力的事件,使国内外舆论转而反对政府,迫使政府改变政策,负责此事的官员辞职。

在 1994 年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路易斯·多纳尔多·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在 3 月 23 日被暗杀,迫使萨利纳斯总统在选择替补对象时明显表现出总统的干预。革命制度党已经在其他问题出现了分裂,当萨利纳斯总统的选择公之于众时又加剧了这种分裂:萨利纳斯选择了科洛西奥的竞选经理、前内阁部长埃内斯托·塞迪略·庞塞·德莱昂(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ón)。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起初看待塞迪略就像看待在 1988 年成为总统候选人时的萨利纳斯那样:软弱,了无生气,技术官僚一个。塞迪略不受这些感觉的影响,开始在其竞选活动中强化一些主题,使之成为其总统任期的基础。其中之一是总统职权的分散,同时减弱政府的作用。在政治上,塞迪略对减少政府职能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政府与革命制度党分离,尤其是减少总统对该党的影响。塞迪略总统试图通过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过程中提高该党的自主权来实现这种分离。更为重要的是,他在 1995 年实施了造成长期结构影响的改革举措,增强了司法和立法部门的职权。 617

塞迪略的第一项改革赋予法律文化更大的影响力,那是这位总统喜好的主题之一,此举有助于提高个人对抗政府权力的能力。他的第二项改革加强了众议院的作用,那是唯一的反对党在其中取得相当多席位的全国性机构。不过,鉴于普通墨西哥公民将总统与国家紧密关联,塞迪略有意削弱总统职权的策略也造成了国家衰败的感觉。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极少有其他政治主题比增强技术官僚的作用及其对政府政策和领导层趋势的影响力这一主题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更能引发讨论。不过,与媒体给出的解释恰恰相反,技术官僚的兴起并非新生事物。它的先例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当前技术官僚的一些特征开始在那时的政治家当中显现。最容易用来辨别技术

官僚领导人兴起的特征是他们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早在米格尔·阿莱曼政府(1946－1952)时期,墨西哥的政治家就强调大学教育,尤其是在法律领域里。阿莱曼时期也是墨西哥的领导层从以军人为主向以文官为主转变的拐点。

对于技术官僚的得势,阿莱曼的同僚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代政治启蒙家,在国立自治大学的课堂上寻找弟子取代他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立自治大学是培养绝大多数成功的墨西哥政治家的场所。这一代人很重要,原因有三。首先,他们尊重高等教育与教学,他们将这些品性留传给后代。其次,虽然他们没人在经济学领域里接受过正规的训练,但他们知道它的重要性,促成了经济学教育的发展,该学科起初被放在法学教育中,随后成为国立自治大学的一个独立学院。第三,虽然他们大多在墨西哥接受教育,一些关键人物却拥有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尤其是经济学教育,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思想进行实验。其中最著名的是拉蒙·贝特塔(Ramón Beteta),他是得克萨斯大学培养出来的"出众青年",曾任阿莱曼的财政部长,他培养了一代影响力巨大的弟子,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侄子——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早期的导师,还有乌戈·马加因——一位财政部长。

早期的墨西哥技术官僚主要集中在与经济有关的机构中,尤其是工业和商业机构。卡洛斯·萨利纳斯自己的父亲劳尔·萨利纳斯·洛萨诺(Raúl Salinas Lozano)本人就在这种机构工作,他是贝特塔的弟子,拥有哈佛经济学硕士学位,在20世纪60年代引进了许多门徒。这方面的关键机构还有财政部。20世纪70年代乌戈·马加因就是在财政部招募了他的同事。此外还有墨西哥银行,它是推动经济学家走向墨西哥政治前线的核心机构。

618

虽然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是技术官僚型总统之前的最后一位总统,但他本人表现出来的两大特征迅速成为相续接替他的一代又一代年轻总统的主流特性。埃切维里亚是近代第一位在联邦区(即墨西哥城)出生并成长的墨西哥总统。他也是第一位先前没有经选举担任官职经历的总统。在墨西哥,技术型领导人的出现象征着地方主义的衰

落和首都的优势，还有选举经验（例如担任民选官员）的减少和官僚职业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埃切维里亚得益于他在执政党内的长期经验，曾拥有过无数行政职位，投身于许多政治竞选运动。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是埃切维里亚指定的接班人，是其孩提时期的朋友，他促进了技术官僚领导层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后续政府的特征。洛佩斯·波蒂略成为第一位拥有研究生学位（法学博士）的墨西哥总统，第一位在海外取得大学本科学位（智利的法学学位）的行政长官，最重要的是，他是墨西哥在革命之后从财政部长走向总统的第一人。鉴于墨西哥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总统的出身一直是该国政治招募模式结构中的基本变数。

洛佩斯·波蒂略的总统任期标志着政治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斯总统和埃切维里亚的出身）的重要性转向了经济机构。当继任的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成为总统时，他巩固了这些机构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墨西哥银行、墨西哥石油公司（Petróleos Mexicanos，缩写为 Pemex）、财政部、规划和预算部的财政职位上度过。同样重要的是，他成为第一位拥有外国大学研究生学位的总统，他从哈佛大学拿到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在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治下涌现的技术官僚型领导人出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他们都来自大城市（多为墨西哥城），缺乏选举经验和党内经验，他们在非传统的领域里接受教育（主要是经济学），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私立大学，而不是传统的公立大学，他们接受研究生层面的教育，在海外学习（不仅在欧洲或拉丁美洲，而且还在美国，尤其是在像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这样的著名高校），他们在国家机构之中往往供职于财政部、墨西哥银行、规划和预算部。卡洛斯·萨利纳斯和埃内斯托·塞迪略本人就是这些经历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数十名重要助手也是一样。1982 年以来在部级层面及以上担任联邦政府领导人的墨西哥人也拥有许多这类特征，从而降低了地方主义、传统教育学科、党务和选举经验的重要性。

619

在思想层面上，墨西哥的技术官僚型领导模式也意味着政策的影

响力日趋显著。这个团体根据他们在海外的求学经历，果断地相信进口替代战略（补贴国内行业以减少工业产品的进口）不再适用于墨西哥。他们还感到，提高外国资本投资、降低关税、扩大贸易、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组成经济集团等新自由主义方法会是墨西哥持续的经济问题的长期解决之道。他们更相信，弱化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的角色是必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理论上或实践中主张减少政府的势力，只不过是他们的经济管控不同于其前任而已。

在政治上，技术官僚型政治家是分化的，墨西哥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虽然人们普遍感觉真正的技术官僚偏好政治自由化，包括选举改革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许多辅佐萨利纳斯的技术官僚遵循这位总统的方针，即相对于现实的政治开放态度，更偏向决定性的经济策略。这些方法上的差异在随后的讨论中暴露得更为充分，导致了领导人之间的分裂。

反映技术官僚政治家和非技术官僚政治家之间分歧的最生动的事例出现在1996年秋季革命制度党大会的内部争论上。参加那次党代会的代表对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要求规定：只有先前经选举而任职的个人才能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是一名积极的党员，该党员在被指定之前必须曾在某个党内职位上服务。这对于技术官僚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当前趋势，以及在萨利纳斯和塞迪略统治下表现出来的领导人特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这种急剧的变革因下述情况而巩固：截至1999年中，没有技术官僚竞争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得到塞迪略本人支持的主要候选人是其政府部长，这标志着政治取向的内阁政府重获重要地位。

到20世纪末，革命制度党在竞争的政治环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选举改革所造成的。几十年来，虽然该党成功地策划了其候选人的选举，包括总统职位的选举，但它在提供政府领导人这方面无足轻重。刚才描述的建议改变了政府机构与该党的力量均衡，增强了该党的势力，保证它会在招募过程和其后的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民选官员的重视不仅提高了

620

该党的重要地位——那是在争斗激烈的竞选活动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而且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回政府的立法部门，这点更为重要。作为墨西哥政治领导人来源，官僚阶层的兴起对应于政府地位的提高，对应于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总统作为政策和人事决策的源泉，其职权的扩张。

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末反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的专制主义和权力集中的正统的自由主义和贝尼托·华雷斯的信徒，以及它在墨西哥革命后的复兴。这种政治模式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正式发展起来的，那时执政党在选举舞台上独领风骚，尽管 1939 年成立了国家行动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这种模式没有显著的变化。那时政府改革了议会选举，创设了少数党席位，根据这些党派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按比例分配席位给它们。尽管如此，从 1964 年这项法律首次生效以来，反对党从来没有占据 20%以上的席位，直到 1977 年。

1977 年，在洛佩斯·波蒂略的领导下，赫苏斯·雷耶斯·埃罗莱斯(Jesús Reyes Heroles)担任内政部长。后者对 20 世纪自由主义的贡献得到公认。他引入了名为“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联邦法”(LOPPE)的重大选举改革，那是此后进行的众多改革中的第一个，这些改革在塞迪略任总统期间推行。根据这部新法律，在众议院里，除了根据单一地区的竞选而选出的 300 个席位之外，另有 100 个席位保证给反对党，在全国选票总数的基础上加以分配。因此，这部法律保证反对党至少占有所有席位的 25%，此外，它们可以在逐个地区的竞选中赢得任何其余的席位。这种所谓的“多党提名代表制”(plurinominal deputy system，根据全国而不是地区选票总数确定席位)向反对党提供了核心集团的席位，不仅使其在众议院拥有发言权，而且为积极投身于政治的墨西哥人作为反对党候选人竞选议席提供了激励机制。尽管如此，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由来已久，媒体报道一贯偏向于它，而且它的资金资源占尽优势，因此，反对党在 1977 年这部法律实施后取得的发展微乎其微。

1982 年，当德拉马德里成为总统时，他对于政治自由化，尤其是选

举竞争，明显表现出态度的改变。在其执政的头两年里，州和地方选举基本上没有出现舞弊。然而不幸的是，一旦反对党可能在这些条件下击败革命制度党，执政党又重新采用了许多传统的作弊手段。

从历史的简明角度来看，德拉马德里政府对政治自由化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激活了在政治上处于休眠状态的天主教会，尽管它这么做是无心插柳。在他的任期内，最大的选举舞弊事件发生于1986年北方的奇瓦瓦州。这一次作弊的程度和性质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该州的主教感到有必要进行公开诉求。他们在墨西哥城的报纸《至上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呼吁德拉马德里政府拒绝接受那次选举的结果并举行新的选举。虽然这次吁求没有得到德拉马德里政府的响应，但这些主教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措施，威胁要停止奇瓦瓦州所有的弥撒活动。如果他们的威胁得以落实，就会迫使教会和政府对抗，哪怕规模较小，就像1926年基督派叛乱所激发的那次对抗一样，会导致政府对教会采取宪法上的严厉约束。最终，梵蒂冈代表进行干预，说服这些主教收回其威胁。

621

虽然这些北方的主教未能迫使德拉马德里政府推翻奇瓦瓦州的选举结果，但1986年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点，墨西哥全境的主教从此在向其教区忠实教徒散发的牧函中一再鼓吹公民责任和公正选举的重要性。蒙特雷的阿道夫·苏亚雷斯·里维拉(Adolfo Suárez Rivera)成为主教团的领袖，他的一封信件是这些牧函中影响力最大的——“关于信仰的政治方面的牧师指示”。对墨西哥主教团的采访表明，无论他们在教会的社会责任方面采取什么神学立场，他们此时都明确采取坚定的集体立场，代表世俗民众投诉选举舞弊和与舞弊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教会成为积极推动迅速开放选举的墨西哥公民和政治家的重要盟友。

虽然德拉马德里总统并没有兑现其干净选举的承诺，但他确实像其前任那样，凭借督促1986年选举法的通过，进一步推动了选举进程。这部法律通过将议会席位总数从400个增加到500个，根据复杂的数学公式将其中200个席位分配给多党提名的议员，从而扩大了议会选

举的多党提名基础。由于预计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会下降，这部法律也允许多数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革命制度党——第一次在多党提名的席位中取得一些席位。

具体说来，在革命制度党赢得数目最多的单一议员的地区席位（可能多达300个席位）的情况下，这部法律旨在保证该党会得到足够数目的多党提名席位，从而使其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虽然这部法律确实降低了单一议员的地区席位（革命制度党往往赢得这些席位）的重要性，提高了反对党控制的总席位的百分比，使之达到30%或以上，但正如选举专家西尔维亚·戈麦斯·塔格莱（Silvia Gómez Tagle）所揭示的，政府实际上只是赋予反对党更大的但有限的作用，而不是改变状况，以使少数党有机会与革命制度党公平竞争。

1988年的总统选举是根据新选举法进行的第一次选举，它出人意料地为未来的选举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在那次选举中，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不仅成功地使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得票率降低到空前的51%，而更重要的是革命制度党仅仅赢得50.4%的议会席位。它取得了233个多数席位和27个多党提名席位。革命制度党第一次不得不依靠多党提名席位才取得在众议院的多数：500个席位中的260席。 622

1988年反对党的成功显然预示着革命制度党不再一党独大，一党制也难以为继。它还表明，立法部门第一次在决策过程中有可能取得影响力更大的发言权。不幸的是，反对党无法巩固其初步的胜利。革命制度党成功地重新赢得了许多在1988年离开其阵营而投票给反对党的选民，在1991年赢得61.4%的投票，因此再度取得了它的多数党地位。从1988年开始，国家行动党保持了它的力量，使得民主革命党（PRD）成为最大的输家，该党是在1988年最初支持卡德纳斯的众多政党的联合体。后者的支持率从1988年几乎占选民的三分之一下降到1991年的8%。

一旦萨利纳斯总统在其任职的第一年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他就决定像前几任总统那样，采取放慢政治改革的谨慎策略。当被问到对政治改革的想法时，萨利纳斯清楚地表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经济自由化的偏好。作为东欧剧变的见证人，萨利纳斯认为快速的政治变革

会导致政治动荡,而且是实现持久的经济改革的障碍。因此,他认为相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政治改革是次要的。

政治改革的缓慢步伐成为萨利纳斯政府的特征,人们因此责难革命制度党内部抵制变革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自由化的问题上,政府和革命制度党领导人内部存在着两股政治力量,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当时的人认为,非技术官僚的传统政治家是抵制这种政治变革的唯一力量,墨西哥媒体也普遍认为他们是恐龙,而萨利纳斯总统身边的一群年轻的政府技术官僚则都热情鼓吹民主化,尤其是选举的民主化。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

萨利纳斯本人并未致力于鼓励改革。对其政治决策的评估表明,他的总统任期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并没有采取旨在为政治改革奠定坚实基础的行动。无论是不是技术官僚,墨西哥政府的领导人在是否支持政治改革方面都是意见不一的。无论是在联邦政府还是在革命制度党内,两群人当中都有改革者。

1988 年的选举和反对党的最初胜利增加了参与墨西哥政治的人数。其中最重要的新角色是民主革命党,它为先前无足轻重的左翼政党和对革命制度党不再满意的持不同政见的民众主义者提供了组织上的催化剂。鉴于其意识形态来源的千差万别,在政策问题甚至在选举改革上,这个政党并不倾向于与革命制度党妥协,因为它认为革命制度党的改革步伐之慢令人不堪忍受。1989 — 1993 年在州和地方层面的大量选举中,民主革命党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在某些地方,例如米却肯州和格雷罗州,这种竞争导致它与革命制度党的党羽发生暴力对抗。民主革命党危及革命制度党利益的程度可以根据该党在肉体上遭受政府官员和警察虐待和毒打的积极分子的人数加以衡量。

623

长期以来,国家行动党是在革命制度党以外唯一能够加以认真考虑的选择,但它从来不能在它的意识形态旗帜下吸引大量的选民,因为人们认为它是偏向企业家、天主教和中产阶级的政党。然而,由于竞争日益激烈的选举环境,它复兴了。它在北部、西部、墨西哥中西部的巴希奥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实力,它对变化的选举环境加以有效利用。自

从革命制度党控制墨西哥选举结果以来，政府在 1989 年第一次承认在地区层面的选举中失利，那就是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选举。该州很重要，靠近美墨边境。国家行动党有能力在其他地方再现它的胜利：1992 年赢得奇瓦瓦州；1991 年，在联邦政府宣布革命制度党有争议的胜利无效之后，国家行动党的一名党员被任命为瓜纳华托的州长。但是，尽管它在地方和州层面上取得了这些显著的胜利，但到 1993 年，继续控制大多数全国性职位和州长竞选的仍是革命制度党。

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同改变了 1994 年的力量均衡，明显重塑了政治面貌，导致萨利纳斯总统个人享有的巨大声望就此终结。1994 年 1 月 1 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州攻击了军队驻地，占领了一些社区。1993 年 12 月，它在自己印制的刊物《墨西哥人觉醒报》(*El despertador mexicano*)上发表声明，把自己的运动描述成旨在纠正地方官员和地主针对印第安农民所犯罪错的土生土长的运动。它寻求实现的目标有：从州和联邦政府争取自治，加大在教育和卫生项目上的社会开支，重新分配农田。他们攻击之日恰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之日，正如汤姆·巴里(Tom Barry)在《萨帕塔的复仇》(*Zapata's Revenge*)一书中所指出的，虽然那是象征性的，但确是对该协议可能给墨西哥小农的命运造成的影响的实实在在的抗议。

墨西哥南部出现的游击运动分散了人们对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的注意力，尽管游击队与军队的对抗迅速从暴力冲突转变为天主教会调停的政府与游击队领导人之间的谈判。

正当两个对头继续谈判之际，同样急剧的事件转折使公众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总统竞选活动上。1994 年 3 月 23 日，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多纳尔多·科洛西奥在下加利福尼亚州的蒂华纳市(Tijuana)展开竞选活动时被暗杀。半个多世纪来，在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总统候选人被谋杀闻所未闻，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反响。除了找人取代该党的这位候选人这一迫切问题之外，结合恰帕斯州的起义和 1993 年 5 月在瓜达拉哈拉市对红衣主教胡安·赫苏斯·波萨达斯·奥坎波(Juan Jesús Posadas Ocampo)的暗杀，科洛西奥之死向许多墨

624



1994年1月1日，恰帕斯当地一支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武装公然反叛墨西哥政府。图中身着制服，脸上围着头巾或手帕的叛军士兵封锁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与奥科辛格之间的公路。士兵们正在酌情向游客征收"战争税"。

西哥人和外部世界表明，墨西哥正面临真正的政治动荡时期。1994年初进行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种评价，69%的受访城市居民认为墨西哥的政治形势"严峻"或"非常严峻"。

选择埃内斯托·塞迪略取代科洛西奥给反对党增添了运气。选择塞迪略加剧了革命制度党内派系之间的分歧，令人回想起1928年和1988年总统更替时的内部斗争。在这些群体当中，有一个强大的党派认同革命制度党主席费尔南多·奥尔蒂斯·阿兰纳(Fernando Ortiz Arana)和曼努埃尔·卡马乔(Manuel Camacho)，后者曾任联邦区部的首长①，在竞争总统上失利，他弥补了政治上的技术官僚与传统的党务干部之间的分歧。此外，政治家、媒体和公众认为塞迪略是一个僵化的、知名度相对低的、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竞选者。

① 即主管墨西哥市所在地区事务的部长。——译者注

民主革命党再次派出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作为其竞选人，他是该党的共同创始人和最初的旗手。国家行动党选择了迭戈·费尔南德斯·德塞瓦略斯(Diego Fernández de Cevallos)，他是魅力十足的演讲者和议员。在竞选活动的头几个月里，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继续保持领先，随后是卡德纳斯和费尔南德斯·德塞瓦略斯。但在1994年5月12日之后，各党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时墨西哥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总统竞选辩论。利用其迷人的个性和咄咄逼人的批判策略，费尔南德斯·德塞瓦略斯压倒了更有政治家风范的塞迪略，而且出奇制胜，通过攻击卡德纳斯曾在其家乡任州长的记录，彻底战胜卡德纳斯。在大约3 000万墨西哥人的观看下，费尔南德斯·德塞瓦略斯突然俘虏了投票者，在民意调查中迅速上升到首位，略微领先于塞迪略。卡德纳斯陡降至第三位，从此一蹶不振。

625

最终，那些暗杀事件和游击队引发的动荡促成革命制度党和埃内斯托·塞迪略在投票中取得胜利。费尔南德斯·德塞瓦略斯未能充分利用其声望，在剩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莫名其妙地降低了竞选活动的强度。在选举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选举法再次被修改。1994年的选举改革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取消了保证获胜党在众议院里占据简单多数的权利，规定任何政党赢得的议席不能超过500个议席当中的315个，组建了"联邦选举委员会"(IFE)以监督选举本身，其11名成员中有6人是独立的公民，从而保持力量均衡。

在1994年8月21日，塞迪略得到了与其前任相同的得票率：大约为50%。从1988年至1994年，最大的变化是国家行动党取代民主革命党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政党，赢得了26%的选票。民主革命党落到第三位，只得到17%的选票，与其1988年占第二位时相比，降幅巨大。1994年的选举也是最公正的选举之一，吸引了众多登记在册的选民，实现了最高的投票率：78%。

选举改革和两大反对党从1989年至1994年的表现对提高政治自由化程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政党的进步和选举实践的结构性改革是不利的政治事件和反对党要求的结果，萨利纳斯总统

并不愿意发起这些变革。1994 年,墨西哥选民基本上倾向于渐进式改革,而且希望由传统的领导者即革命制度党推行这些变革。与某些预言恰恰相反,大量参与投票的新选民把选票投给执政党,而不是反对党。

1994 年的总统选举明显地推动了政治自由化的进程。这种动力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与萨利纳斯不同,当选总统塞迪略对治理和政治发展持有不同的观念。虽然在实施宏观经济策略的大纲上,他与萨利纳斯的想法相似,尽管他更加有意地强调收入的公正分配,但在政治上,塞迪略乐于提出此前历任总统不曾公开承诺的改革。他提出减少总统的职权,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提出(就政治自由化而言)党政分离,更确切地说,总统职位与革命制度党分离,授权该党在各个层面上形成其自身的候选人推举程序。

626



1986 年,国家行动党(PAN)的成员、支持者及同情者共数千人在奇瓦瓦州的首府集结,抗议当年执政党革命制度党获胜的州选举不公正。教会领袖威胁说要中止做弥撒以支持抗议者。这次行动推动了首次改革政治体系的微小举措,尤其是在地方和州政府一级。

虽然他在就任之初遭遇的金融危机远比德拉马德里或萨利纳斯曾面对的那些危机严重,但塞迪略依然固执地坚持削减总统的权力。媒体和公众普遍诋毁他,说他是缺乏权威的总统。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

是他自己造成了这种感觉，他自己放弃了传统上归于或人们期望属于一位墨西哥总统的权力。

三大政党谈判数月之后，最终在 1996 年就新的选举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以求进一步塑造公平竞争的政治环境，鼓励更大的多元化。这一对政治自由化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中包括联邦区的选举地位的改革。该地区将在 1997 年第一次选举它自己的市长，而不是指定一位内阁成员担任这个职位。第二个重大改革是使"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独立于任何政党，而且不再归属内政部。

对各种反对党的命运和提高多元化的进程来说，这一联邦区的选举尤其重要。因为国家行动党几十年来在联邦行政区拥有草根力量，民主革命党的选举在首都相比墨西哥的其他任何地方更为干净，并受到更好的监督。而更为重要的是，墨西哥人口几乎有五分之一居住在这个联邦区。

627



1999 年 9 月 16 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第一夫人尼尔达·帕特里西娅·贝拉斯科·德塞迪略与国防部长恩里克·塞万提斯在独立日庆典上检阅在墨西哥城游行的军队。

塞迪略总统批准了这些改革措施，并在 1996 年秋季将其送到议会审议。由革命制度党占据多数并加以控制的众议院并没有接受总统批

准的方案,而是提出了大打折扣的版本。塞迪略没有否决修改后的文本,而是加以批准。他从此成为媒体严厉批评的目标,因为他没有坚持更为有力的改革。不过,他允许立法机关修改重大法律,这一点却具有长期的意义,因为这在墨西哥基本是闻所未闻的,它对行政-议会决策和多元化造成了重大的结构性影响。在选举政治中,反对党在全国取得成功的最大机会在议会,加强立法机关的决策影响力有利于长期的政治自由化,哪怕议会处在革命制度党的控制之下。

需要牢记的是,正如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和其他人所提出的,虽然竞争性选举的增加确实在萨利纳斯和塞迪略治下发生了,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足以自然导致民主化,而且我们对选举的竞争性与多元化的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

这次总统选举之后,是政治事件而不是议会起到了改变选举场景的作用,我们看到历史又重演了。1994 年剩余的时间里,政治舞台依然不稳定。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谢乌(José Francisco Ruiz Massieu)是革命制度党的总书记(实际上是该党的副主席),曾是萨利纳斯总统的内兄。1994 年 9 月,就在萨利纳斯离职前不久,他被暗杀了。萨利纳斯的亲兄弟劳尔·萨利纳斯(Raúl Salinas)被捕,因为他涉嫌参与那次谋杀,也因为传说他洗毒资数百万,并最终根据第一项指控被判有罪。而对即将走马上任的总统来说,情况甚至更为糟糕:就在 1994 年 12 月 1 日塞迪略就职后几天内,他的政府遭遇对比索的严重挤兑,这导致国内国外的大量资本外逃,因此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于需要请求美国和世界银行联手干预以稳定墨西哥的货币。

628

1995 年,革命制度党在哈利斯科州(Jalisco)击败国家行动党,在奇瓦瓦州收复失地,大有再现在总统选举中风光无限的态势;但该党在瓜纳华托州、哈利斯科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失败,它此前曾在下加利福尼亚州失利过一次。到 1995 年中,两大反对党在州和地方层面上统治着近三分之一的墨西哥人口。随着联邦政府继续实施其严厉的经济紧缩计划,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造成严重问题,无论是国家行动党还是民主革命党都继续保持其在 1996 年的胜利,尤其是在影响力

巨大的墨西哥州。

1995年开始的选举模式持续到1997年，那时，反对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期选举里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60%的选票)。此外，民主革命党的两度总统候选人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以势不可挡的胜利当选为联邦区的市长，那是墨西哥首都的所在地。到1999年，反对党控制了10个州长职位(包括联邦行政区在内)，而它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上经选举获得的职位代表了超过60%的墨西哥人口。

正当墨西哥人为2000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时，多元化的影响力依旧发展。革命制度党宣布了选举其总统候选人的全国性初选程序，允许任何党派的注册选民参与，而在1999年之前一直使用党代表当中的民主提名程序的国家行动党，也将投票向全体党员开放。

在墨西哥走过的政治道路上，美国始终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观察家认为这具有讽刺意味：一个与美国接壤的国家依然处在民主化进程之中，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却能够推动更为迅速的自由化和选举改革。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美国的三股力量明显涉足墨西哥的政治演变：国会、媒体和金融界。

在1988年之后，这三股力量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当萨利纳斯总统与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就自由贸易协定认真谈判时，以参议员耶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为首的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开始严肃地质疑与一个他们认为是专制、妥协而腐败的政府形成伙伴关系的意义。萨利纳斯意识到这些议员的支持者可能在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尤其是这事关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便试图回应他们对选举舞弊和侵犯人权的批评。

629

美国媒体施加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例如，军队对萨帕塔主义叛乱者的暴虐镇压导致无数侵犯人权的事件，在媒体和因特网上立即造成反响。墨西哥理工自治学院(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教授丹尼丝·德雷瑟(Denise Dresser)记录了这些事件，大大促成萨利纳斯政府的政策逆转。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投资者获取资本的决策使得萨利纳斯和塞迪略政府都很容易受到这个群体的动

态的影响。12月29日,也就是危机开始后数日,就职不到一个月的塞迪略解除了他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海梅·塞拉·普切(Jaime Serra Puche)的职务。其原因就是华尔街失去了对塞拉·普切的信心。

当埃切维里亚总统在1970年12月1日就职时,墨西哥经济以农业部门为主。那时农业部门占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的39%,比第二大经济部门即制造业的规模大两倍有余。1996年,在塞迪略政府的中期,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自1970年以来几乎增长了3倍。但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在那25年的时间里,农业人口仅仅增长了64%,而制造业增长了263%,服务业增长了473%,交通运输业增长了355%。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农业人口的比例几乎下降一半,仅为23%,在规模上比服务业略大,贸易部门紧随其后。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不仅墨西哥的经济变化是急剧的,而且外国投资的影响力的增量同样急剧,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发展和墨西哥领导层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想法的演变。埃切维里亚总统是1970年以来民族主义色彩最浓、最偏向国有化的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外国投资的总额仅为16亿美元。在其接班人洛佩斯·波蒂略的领导下,外国投资翻一番还有余,达到55亿美元。如果我们综合考察德拉马德里、萨利纳斯和塞迪略统治时期的宏观经济战略,在那段时间里,墨西哥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盛行,1997年的外国投资总额估计为910亿美元,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增长16倍。

正是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引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国际经济合作(1986年墨西哥决定加入关贸总协定就是例证);严重依赖外国投资;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通货膨胀、物价、债务偿还和经济增长的指导方针;私有化,即将政府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再度出售,其中许多企业就是被其之前两任总统国有化的。到1988年底德拉马德里离任时,他从政府那里剥离了706家公司,占非石油制造业价值的25%,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0%。

630

由于选择萨利纳斯作为其接班人,德拉马德里确保了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延续,因为萨利纳斯在任其规划和预算部长期间,一直最为直言



政治家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谢乌的遇刺，在暴力与腐败政治中又添上了一笔，这种政治形态被认为是萨利纳斯执政带来的后遗症。鲁伊斯·马谢乌于 1994 年 9 月 28 日在卡萨布兰卡饭店被谋杀，这一事件导致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审判，最终前总统萨利纳斯的兄弟劳尔·萨利纳斯·德戈塔里被判定为刺杀事件的主谋。1999 年 1 月 21 日，萨利纳斯被判五十年监禁。

不讳地在经济内阁中支持这种政策战略。因此，在德拉马德里的第一位民粹主义财政部长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Jesús Silva Herzog)在 1986 年 7 月辞职之后，萨利纳斯使自己成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人物。

作为总统，萨利纳斯使墨西哥更为彻底地遵循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由于重新出售洛佩斯·波蒂略在 1982 年国有化的银行，他把德拉马德里的私有化计划推向高潮。此外，他开始出售多年来一直被视为政府垄断象征的一些大公司，其中包括墨西哥电话公司——墨西哥唯一一家电话公司。

通过培养与乔治·布什总统的个人友谊，试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与美国形成长期的经济关系，萨利纳斯巩固了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是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

间创建一个经济集团。无论是具体而言还是在象征意义上，该协定成为萨利纳斯宏观经济战略的核心，尽管媒体、学术界和民主革命党领导人都竭力反对，他还是成功地把这种观念推销给了墨西哥公众。

萨利纳斯可以用其任期内的各项经济指标作为其新自由主义战略实施成功的证据。他声称，公共部门的开支在 6 年里减少了 25%，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9%，国有企业减少了 67%。但萨利纳斯的政策并没有使墨西哥人民平等地受益。如果我们审视 1984 — 1992 年，即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到萨利纳斯政府的那段时间的家庭收入情况，可以发现低收入家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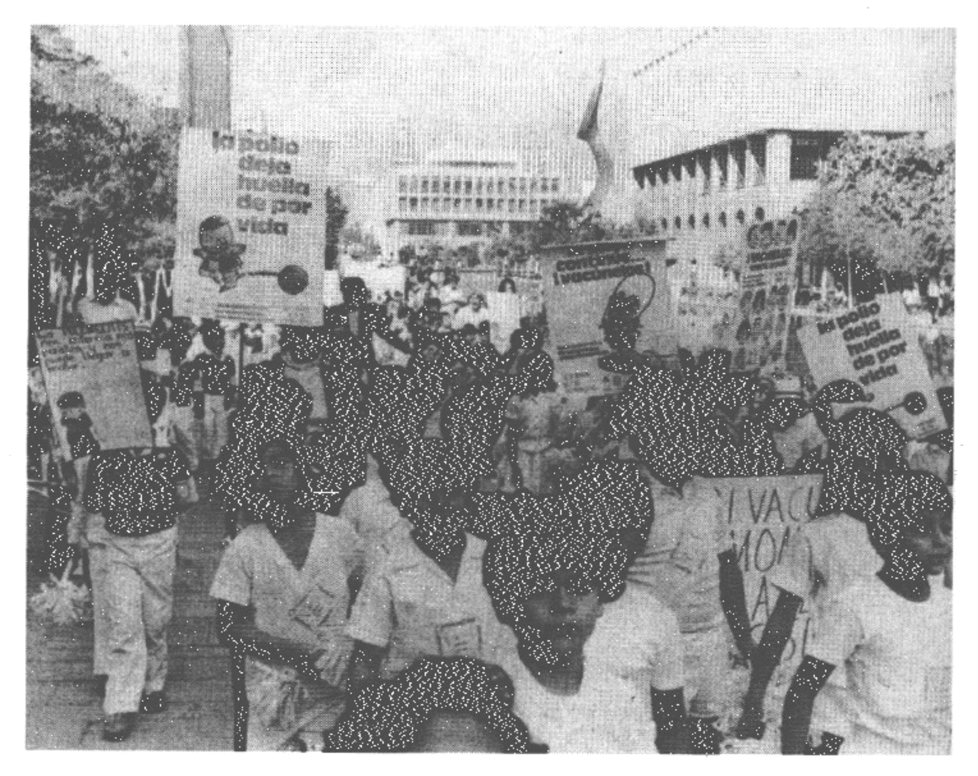
事实上，如果把那个时期的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等距分为 10 个收入群体，那么这 10 个群体中的 9 个在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 8 年里实际收入在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中低收入群体。唯一从经济自由主义中获益的群体是墨西哥最富裕的家庭，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增长了 16%。这些数据往往支持批评者的指责：许多个体资本家是重新私有化计划的直接受益者，使私营部门获益的政府政策令富人阶层获益最多。

如果利用墨西哥国家银行编制的“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该指数包括从卫生、食物消费到收入各方面的 19 个参数，在更为宽泛的条件下衡量生活的质量)，那么 1980 — 1995 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幸福指数”平均增长不足 1%，相比之下，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初的年增长率为 2%至 3%。

根据其就职前不久概述的计划，塞迪略总统打算既提高经济增长率又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萨利纳斯及其顾问在其政府最后几个月里实施的经济政策允许比索估价过高，导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在 1994 年 12 月中旬对比索的挤兑，迫使塞迪略政府使比索相对美元贬值。比尔·克林顿总统动用其行政职权，制订了金额高达 500 亿美元的紧急救援方案，用以稳定墨西哥的比索。华尔街和其他地方的投资者以及墨西哥的资本家撤走了几十亿美元，使墨西哥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到 1995 年底,埃内斯托·塞迪略及其经济顾问在就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不得不面对诸多问题:负数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激增到 50%(自德拉马德里时期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水平),就业岗位流失数十万个,银行贷款的利率大幅度提高,虚弱的银行系统背负不良贷款的水平之高极其危险,还有无数企业破产。正如德拉马德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严重衰退岁月里的所作所为,塞迪略实施了严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紧缩策略。到 1998 年底,塞迪略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恢复了比索的稳定,加强了各银行的实力,并且在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之后,到 1996 年中期甚至实现了预测的 3%—4%的增长率。

632



图为墨西哥城的儿童在进行免疫日的游行。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可以说是墨西哥革命创建的那届政府最主要的贡献之一。饮用水水质得到改善、基本医疗保健状况改善,以及广泛接种常见疾病的疫苗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预期寿命并提高了墨西哥人的生活质量。接种沙克疫苗基本上在墨西哥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

此外,塞迪略继续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的其他措施。塞迪略政府仿效一些南美国家,建立了私营的养老金制度,旨在巩固退休计划

并增加国内储蓄。该政府也向私人投资开放了天然气部门。更为重要的是,塞迪略推动了对石化部门的重新分类,把它移出了传统上由政府经营的、他人不可染指的石油业。虽然打算将石化业私有化,但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层拒绝了拟议中的这项改革。在1996年秋季,能源部长小赫苏斯·雷耶斯·埃罗莱斯放弃了完全私有化。

在写作本文之际,塞迪略总统显然已经使墨西哥经济从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逆转。但他完成这项任务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包括其自身的公众形象——起初他的形象得分是自从设立民意调查以来历任总统当中最低的,以及其党派自身的内部分裂,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层与负责经济政策的政治-技术官僚的领导层之间的分裂。反对党在选举中的成功多半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塞迪略政府在就业、收入和未来机遇上的紧缩计划所致。

此外,恰帕斯州反叛以后,游击队组织开始兴起,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96年夏天成名的"人民革命军"(ERP),表明绝望的普遍程度和传统政治渠道合法性的不充分。我们尚不清楚塞迪略是否有充足的政治空间和必要的技巧以便在其任期的剩余时间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落实旨在加强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的政府政策,充分改变公民的观感以便将其转化为2000年总统选举时的政治选票。

633

正当墨西哥进入21世纪之际,它肩负着沉重的遗产。墨西哥人面对的是变化中的政治和经济景象。许多民意调查表明,墨西哥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希望实现的是两大目标:经济增长和增加收入,还有政治自由化程度提高。相比民主,墨西哥人更希望经济稳定和提高生活标准。当让他们选择时,他们强烈关切的是惯常的面包与黄油的问题,例如就业、家庭收入、通货膨胀、信贷、利率和经济增长。在1995—1996年,所有墨西哥人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认为,经济问题是墨西哥面对的重大问题,不足十分之一的人提到政治关切。

虽然经济与政治自由化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时代重大的智力问题,但我们并不清楚普通的墨西哥人怎样看待这种关系。原因在于,考虑到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垄断和历届政府的滥用权力,墨西哥人普遍认为

政府毫无信誉，尤其是革命制度党，而且所有政党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虽然在选择时，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转向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它们诚实正直，或者拥有良好的执政能力。

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墨西哥人质疑塞迪略的信誉和统治的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他的政府受毒品贩子污染的程度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他们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极其悲观，对人身安全也无法乐观，他们认为那与城市犯罪激增息息相关。1999年，许多墨西哥人认为腐败和犯罪是实现民主的严重障碍。

墨西哥人普遍认为他们的政府在两条阵线上严重失职。在经济上，一半墨西哥人认为其政府的表现糟糕。在政治上，对软弱无力、大打折扣的选举改革或政府事务的日常管理的批评并不太多，但对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努力批评强烈。这种看法因许多不曾侦破的政治暗杀事件而得到强化，其中一些事件据说与毒资有关，而备受关注的是劳尔·萨利纳斯一案，他是总统的亲兄弟，他的不明来源的资产总额超过1亿美元。美国政府估计，1989年进入美国的可卡因有30%通过墨西哥入境。仅仅6年之后的1995年，墨西哥在那些毒品中所占的比例就上升到80%，成为南美各国毒品走私的重要中转站。

我们不清楚墨西哥人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其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们的策略似乎是不断地改变政治和经济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在经济方面，大多数墨西哥人认为美国的势力过大。他们虽然认为1995年以来墨西哥经济危机的大部分责任在于萨利纳斯总统的无所作为，但美国投资者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革命制度党拒绝把石化业重新纳入可私有化的行业，这显示了墨西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遭遇的严重阻力，尤其是在影响到其民族主义感情的象征性问题上。

634

墨西哥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直至1996年，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高而不是降低了这种不公平的程度。当1995年5月，“拉丁晴雨表”(Latin Barometer)民意调查在询问墨西哥人时，78%的人认为财富的分配是不公正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墨西哥人表现出对萨帕塔派的目标和计划的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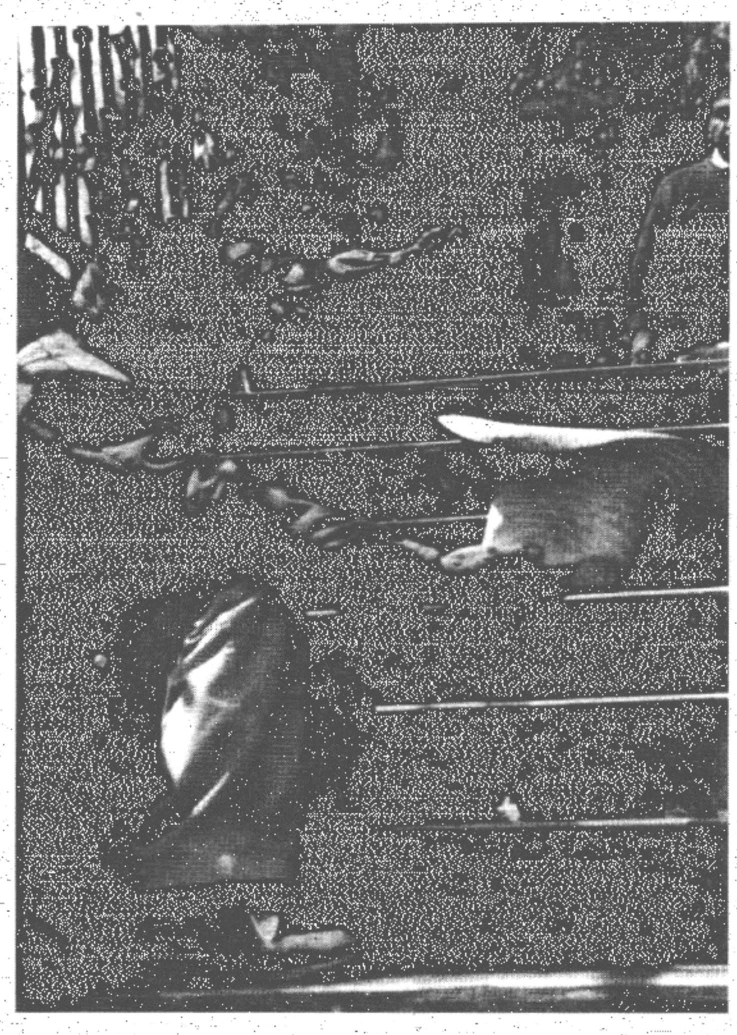
同情,虽然他们也许并不认同其手段。

关于墨西哥人的感觉,考虑到他们对提高多元化程度的愿望,令人印象最深刻且叫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对更为可取的政治模式的看法。在1999年的调查中,只有50%的墨西哥人认为民主是更可取的政府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变政治模式后,受益最大的墨西哥人理论上应该是收入最少的那些人,而他们对民主模式的支持率最低。尽管墨西哥人不出所料地在民主模式上对国家行动党的支持率高于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分别为62%和57%),但支持民主革命党的那些人的反应不如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公民那么热情。

对墨西哥人在民主上的态度的进一步考察表明,绝大多数人对现行体制的表现非常不满。在1999年,只有41%的墨西哥人声称对其没有任何不满。为什么情况会这样?1995年民意调查的其他问题表明,受访者并不相信民主能够有效解决墨西哥的问题。尽管在1994年参与了被说成是墨西哥最正大光明的选举,那次投票的人数之多在墨西哥史无前例,但78%的墨西哥人认为选举总是不诚实的。1999年,尽管反对党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依然有61%的人认为选举是不诚实的。此外,他们对投票程序的效能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只有一半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投票会影响未来的政策。

这些回应引发了两个有关墨西哥未来的严肃问题。首先,墨西哥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程序?他们的态度不断变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当前模式不合理,而且他们认为,即使形式更为民主也不意味着他们能获得真正的政治民主。因此,墨西哥人对革新的其他手段并不非常排斥,其中最重要且不可预测的手段是暴力。虽然大多数墨西哥人依然反对政治暴力,但各种游击团体日益频繁地运用暴力。由于公民同情这些团体的诉求,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的合理性。几十年来第一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墨西哥人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支持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

635 这些回应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墨西哥人会依靠什么样的组织实现他们的要求?当请墨西哥人根据尊敬和信任程度给墨西哥各组织评



图为墨西哥城中央广场一带的老年乞丐。美国政府最终同意救济墨西哥的经济，但坚持要墨西哥实行紧缩政策，包括高利率和高物价，以使比索重新升值。但这些措施加剧了本已高企的贫困率，并引发了一股席卷该城的犯罪浪潮，这次浪潮很久才消退。

级时，天主教会远远领先于所有其他组织，而大型公司、军队、企业家组织、新闻界和电视台则紧挨着在阶梯的中部向上排列。包括政党和议会在内的严格的政治组织排在清单的底部，尽管组建它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虽然如此，现在大多数墨西哥人认为行政部门应该与议会分享权力，原因很可能在于反对党自1997年以来控制了立法部门。

636

如今墨西哥人面对的是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完全不清楚该选择怎样的民主道路来解决其政治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只有31%的人表示对民主感到满意，这表明民主模式在公民当中无足轻重。大多数墨西哥人期望从民主那里得到的是公平和经济进步，而不是自由或公正选举。更多的墨西哥人有可能在新千年里学不会把民主与经济福祉联系起来，除非塞迪略之后的政府能够证明政府的政策、表现与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关联。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同时立法部门提高了发起立法的能力，而反对党也增加了它们的代表性，甚至达到赢得行政机构掌控权的程度，那么墨西哥人在心中重新界定民主的弊病与优势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增加。

第二十章　后革命时期的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

安妮·鲁宾斯坦(Anne Rubenstein)

1940年,墨西哥的后革命政府确定了其体制形式,并在之后的55年中一直沿用该体制。墨西哥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型由此开始:1940年,大部分墨西哥人仍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他们是文盲,认为自己是小社区的成员,缺乏公民意识。然而50年后,大多数墨西哥人已是城市居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富有,且有很强的公民意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各地区形成统一国家意识的提升,以及消费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进步都与革命本身一样具有相当大的革命性。 63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大部分墨西哥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将这些时而痛苦、时而兴奋的过渡时代生动地描绘并记录下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一起参与了对这些时代特征的创造。媒体和其他已有的礼仪和表达形式一起,为墨西哥人了解新时代的新情况提供了途径和方法。有时,墨西哥老百姓可以利用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在墨西哥社会各阶层之间或墨西哥与世界之间)建立相关联盟,并使其合法化;而有时,大众媒体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将墨西哥人带入充满新技术、新方式和新行为的国际文化领

域。文化,成了后革命时代中政治斗争最重要的舞台。

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他1962年的小说《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描述了革命后国家政治和日常生活的转变。该小说讲述了主角阿特米奥·克鲁斯由一个革命军人转变为腐败而富有的商人以及政治家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克鲁斯临终时躺在床上,思考着那些普通的墨西哥人的日常生活:“永远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等待着公共汽车,……在某个商店或办公室工作,不停地打字,……为了能分期付款买一辆汽车而每天省钱,蜡烛的灯光永远照向圣母马利亚,……为自己没有一个冰箱而叹息,……周六的时候坐在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常常吃花生,……不由得大声呼喊墨西哥是这个世界上最给人以生存感的地方,不由得为那些华丽的宽大毛披肩、马戏、流浪音乐、调味酱而感到自豪。”[①]

这就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墨西哥:新的消费商品(或其广告),近期的历史,天主教,改良后的民间传说和民俗相关的大众媒体催化了新的民族意识的诞生。富恩特斯则借阿特米奥·克鲁斯轻蔑地讽刺了那些享受此种新形式,并安于此类经济上温饱的人群。小说以深刻的笔触抗议了为了所谓的和平、物质享受和经济发展而背叛革命之根本的行为。

北美民族志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他极负盛名的研究——《桑切斯的儿童》(*The Children of Sánchez*)中,对墨西哥城市贫民的物质文化和休闲活动做了相关描述,他的结论与富恩斯特的描述非常相似。刘易斯对富恩斯特所描述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同时期的墨西哥最穷苦的居民调查发现,穷人的生活相当贫乏:他们常会偷偷溜进电影院或偷偷挤上公共汽车;他们的伴舞音乐常常是几个家庭共有的一台收音机;他们还很多人一起传阅漫画书。这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在研究中表达了自己对城市工人阶层不谈政治和沉湎物质生活的厌

① Fuentes, *The Death of Artemio Cruz*, trans. Alfred McAdam, New York, 1991 [1962], pp. 79–80.

恶，他认为，墨西哥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一种毫无远见、耽于享乐且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的“贫穷文化”。

在这一时期，居住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圈外的大部分土著居民仍无法享受到这些革命后的繁荣。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变革也改变着墨西哥本土文化。人类学家吉列尔莫·邦菲尔·巴塔利亚(Guillermo Bonfil Batalla)和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Nestor García Canclini)指出，墨西哥政府和国际旅游业使企业家脱离了传统工艺和传统仪式，为适应全球市场对商品和纪念品的特殊要求，他们学会了将墨西哥长期以来的传统积淀进行精巧包装，使之变成世界人眼中的“墨西哥产品”或“本土产品”。与此同时，随着大多数本土居民开始向城市地区或美国迁徙，大众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和漫画——也伸开了他们的触角，走进了墨西哥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媒体的介入使各种商品、意识以及图像的传播范围大大扩大。这在给本土居民带来新事物的同时，也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文化冲突、文化垄断和民族关系误读等问题。在那个时代，常常会听到人类学家和游客对墨西哥的混乱现象进行激情愤慨的报道：当墨西哥城的混血儿大肆吹嘘自己创作的代表墨西哥的“本土”舞蹈时，玛雅妇女居然向修女兜售瓶装可乐，还把直升机的图像编织进自己的纺织品中。传统和本土文化的缺失，在后革命时期长期遭到墨西哥大众文化批判。

639

另外，研究那个时代的电影、流行音乐、小报、宗教运动、小说、诗歌、漫画书、衣食时尚、广播电视、滑稽戏曲、民间文学艺术、体育、美术、舞蹈、手工艺产品，以及当时各种其他形式的媒体和文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现代化对墨西哥社会以及对个人的过度影响。墨西哥人试图用所有这些文化形式(连同对文化的争论)来争取权力或生存的权利，定义自身和他人，抵制种族分类。但这些文化形式中的其他东西则在极力提醒我们：后革命时代也是一个民族自信心加速增长、国家日益繁荣、机会日渐增多的时代。该时代最后以墨西哥奇迹的崩溃而告终，但同时也使自信、乐观、快乐的墨西哥民族及其文化渐渐浮出水面。

大部分用于墨西哥文化转型的物质和法律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期已经成型。之后成为墨西哥媒体巨鳄的家族企业在当时也已初具规模。一些可以为未来50年的大众媒体提供叙事和取景模式的故事、主题、手段和流派也在当时慢慢发展起来。一些全新的大众媒体形式，比如电视，是在1940年以后才出现的。但也正是在1940年以后，墨西哥的文化转型才达到了高潮，在大部分地区实现了长期发展。

在所有的大众媒体中，墨西哥过去的印刷业有着最为深厚的基础。图片机械复制很早就被传入墨西哥：在法国和德国推出达格雷照相法短短几年之后，它便于1840年第一次在墨西哥展出。不久以后，平版印刷术也在墨西哥的报纸和杂志中频繁运用。到了19世纪90年代，尽管墨西哥的识字率仍非常低，但这并不影响图文并茂的印刷业的发展。在这些主要面向上层和中产阶级的报刊杂志上，人们预言着大革命的到来，解释着与革命相关的事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墨西哥的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这些充斥着所有政治派别的各种观点的日报和周刊的推动下渐渐变为现实的。当然，也有少数报纸是面向城镇职工的，其中包括几十种廉价的政治讽刺周刊。很多报刊杂志，比如著名的《阿威索特之子》(*El Hijo de Ahuizote*)杂志，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波菲里奥政权，但他们一般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政府；他们惯用的武器是模仿、讽刺漫画和辛辣的双关语。这份廉价小报曾借鉴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的著名木版画，将骷髅和骷髅头(calaveras)的形象广泛传播，并以此形象映射当时的生活状况。

图文并茂地讲述故事并不是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1930年以后，义务公共教育和强制扫盲运动使墨西哥的大部分人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民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30年，墨西哥全国6岁以上的文盲占67%，但到了1950年，该数字减少到了44%。经济的不断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墨西哥人可以买得起杂志和报纸。利用新的、廉价的印刷和发行技术，出版商开始用各种期刊杂志对这一新的阅读群体展开了攻势。到1940年，在墨西哥每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市镇都设有报亭，而在墨西哥的城市，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报摊。女性杂志、纪实犯罪小说、歌词画集、电影杂志、体育专刊，还有漫画选集，各种出版

640

物都开始与日报一起占据着报亭的一席之地。

潜在读者的增加首先带来的影响便是日报发行量的增长。在1920－1940年之间，报纸在版面数量和种类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虽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与政府完全保持一致，但是几乎没有报纸对政治做全面、精准或批评性的报道。1940年，墨西哥政府通过一种无形而有力的手段确保维持出版业的政治沉默局面。墨西哥政府创办了一家国有企业——纸张制造与进口公司(S.A.或PIPSA)，该公司主要为出版商提供廉价的新闻纸。纸张的供应在墨西哥的出版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纸张乃是出版业的最大开销，而墨西哥自身只生产少量的纸张，出版业的大量纸张都依靠从加拿大、美国进口，也有少量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口。和许多国际基本商品一样，纸张的价格随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以及运输成本的波动而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纸张变得尤为稀缺和昂贵。因此，墨西哥政府通过向出版商提供价格稳定(低)的纸张来保证一些边缘杂志的持续发行。但是，政府也有权取消某一出版社从纸张制造与进口公司进购纸张的权利，而这一情况的发生通常是在暗示该出版社需加强对本社记者言行的管理。在1940－1976年之间，独立于纸张制造与进口公司之外的报刊没有一家能持续经营一年以上。

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和政府对报纸行业的支持，墨西哥的广告业出人意料地发展了起来。1930年以后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广告图片的不断增加，各类产品的宣传层出不穷，广告形式也推陈出新。1930年以前的广告通常语言干涩，信息单调。小贩们吆喝的内容甚至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但这仍是他们兜售商品的重要手段。波菲里奥后期的百货商店和卷烟制造商尽管只是将少量的商品出售给少量的顾客，但他们通过向精英消费群体展示其商品和包装，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营销技术和手段的发展。所有这些都随着简单、廉价的图像机械复制时代以及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到来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相对于之前单一吹捧某一产品的具体功效，广告开始强调商品的整体利益，如家电、汽车、新型娱乐形式等。当这些广告第一次出现时，几乎没有墨西

哥人有能力购买这些广告商品,它们旨在吸引少数的有钱人,但是广告还是创造了一种消费者文化,它使那些只买得起冰镇苏打水的庞大的消费群体有了购买冰箱的欲望。到了20世纪40年代,曾运用于大型家电广告的各类修辞和图片技术开始逐步应用到竞争日益激烈的小型工业产品市场中,例如卷烟、加工食品和衣物,等等。

641

后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广告可以分为互相重叠的三大类,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革命思潮。第一类广告与革命民族主义产品有关。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份报纸上的电灯广告曾告诫父母必须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照明,这样他们的孩子才能出色完成新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他们整个家庭才能参与墨西哥的革命转型。第二类广告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现代化,这类广告常常通过图像和语言展示某些进步技术,比如飞机和埃菲尔铁塔。广告者通常将宣传的商品与现代化城市中女性的新角色加以联系,比如口红、高跟鞋、巴黎时装等,但同时也会宣传各类进口家电和汽车等。第三类广告与人种问题和地区自豪有关,特别是和"印第安"土著人思想有关。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印第安人"和一些民俗图像一直不恰当地出现在诸如汽车轮胎或矿泉水的广告中,并在墨西哥旅游业针对国内和欧美市场的广告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60年代,墨西哥才慢慢以一系列城市印象取代了上述本土图像,并以此代表(至少是外国人心中的)墨西哥形象。

到20世纪30年代,印刷广告——各类招牌、广告牌和期刊中的广告,覆盖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并对农村地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广告是那个时代墨西哥最为普遍的图像。另外,其他印刷类产品也在墨西哥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同时也从另一方面体现着墨西哥的现代化。其中,连环画书在表达读者愿望和想象力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1940年,半数以上的墨西哥人阅读连环画。连环画书是由报纸衍生出来的。由于当时各大报纸无法从调查报告或政治评论上进行比较和竞争,于是便竞相推出新型的娱乐专栏:体育专栏、周日增刊、八卦专栏、日渐耸人听闻的头条,以及更多引人注目的广告

等。各大报纸的周日增刊常常找来现成的美国连环漫画，进行简单翻译后贴上报纸。曾占领《环球报》(*El Universal*)每周彩色连环漫画版头版近40年的“泰山”(Tarzan)系列漫画就是一个典型，而这段时间，《环球报》也成了墨西哥最为畅销的报纸。也有一些报纸曾雇佣墨西哥当地的漫画家作画并宣扬自身的爱国热情，但漫画家却发现自己最好完全退出周日增刊，而在报纸出版商的资助下投身于另一个行业——漫画书。

1934年，墨西哥第一本成功的连环漫画书《小子》(*Chamaco*)问世。不久，另两本连环漫画《丕平》(*Pepin*)和《帕基》(*Paquin*)也相继出版。到了1940年，这三种期刊(和其他三四种发行量较小的连环漫画书一起)成为墨西哥最为重要的媒体形式，只有广播可以与之相抗衡。因此，不久以后，这三种连环漫画书相继出版了日刊。1940年以后，《丕平》一周发行8期，包括两份星期日版。这些连环漫画书的影响力就如它们的名字一般普遍而深远：尽管第一种连环漫画书在50年代中期就停止出版，但直到今天，墨西哥人谈论起连环漫画书时，还是会提到《丕平》和《帕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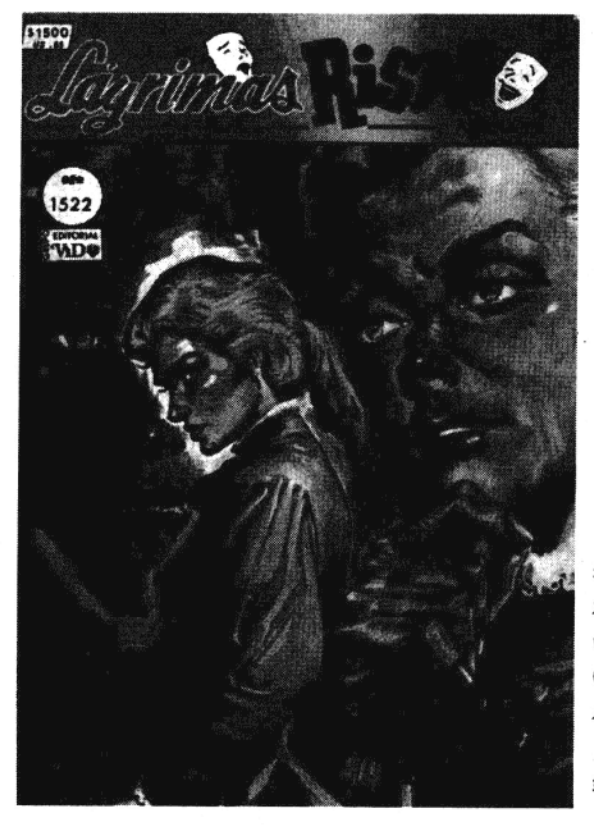
642

墨西哥的连环漫画书并不类似于同时期在美国司空见惯的喜剧。也许另一个西班牙语名词“historietas”(“小故事”)更能揭示出墨西哥连环漫画的形式：这些连环漫画更像是周日漫画增刊的加长版。每一期连环漫画都包括8－12篇不同的漫画连载。这些连载有些是喜剧，并有可能无限延长，例如连环漫画《布隆一家的故事》(*La Familia Burrón*)就原载于大约50年前的《小子》，直到1997年才作为漫画册单独发行。很多时候，《丕平》和其他连环漫画书都会用6－18个月的日刊讲述一些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以及各种比赛要闻、广告和没有插图的小说章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每一期漫画会给不同的读者带来新鲜和愉悦。和其他英语的连环漫画本不同，墨西哥连环漫画书并没有在发行前就界定读者的年龄和性别，墨西哥的连环漫画出版者更多地是把自己的读者设定为任何一位能读懂一点西班牙语的人。

此外，几乎任何人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买得起这些连环漫画书。

除了 64 页的加长版以外,《丕平》的版本通常都体积小,重量轻,同时出版者也常常选用最便宜的纸张。除了封面是彩色的,这些连环漫画书通常是单色本,采用褐色墨水,并在印刷时尽量减少开支,因此《丕平》非常便宜,其价格不到当时电影票的一半,同时这些连环画又极其耐用: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共享;理发店中可以找到;学生们能互相交换;这个国家的每个市场里也总能找到至少一个二手连环画书摊。

连环画情节曲折的故事有的是基于革命或 20 世纪的民谣(如"阿德利塔"[Adelita]或"旋转的丘乔"[Chucho el Roto]),也有的是基于历史(如古装戏中的马克西米利安与卡洛塔的故事)。但即使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较为远久的年代,故事的情节也很少忠于史实或原著,而是沿用现代模式,而且这些情节无论如何发展,其基调始终牵涉到家族命运问题。这个家庭可能遭受威胁或正处于危机,而灾难的来源常常是经济拮据,或家庭中某个成员的自私或贪婪,或势力强大的外人的性侵



连环画仍然是墨西哥最受欢迎的读物。尽管约兰达·巴尔加斯·杜尔切不再为广受欢迎的连环画《眼泪、欢笑与爱》(*Lagrimas, risas y amor*)撰写脚本,但她和丈夫仍然拥有出这个系列的出版社,并交给一个儿子经营。

犯。通常情况下,故事的情节是从一个或更多家庭成员的离家出走而慢慢展开的。如果故事中有一对恋人的话,那么多数情况下这对恋人在开篇已经结婚,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他们或是分离或是感情愈加坚固。在故事的结尾,一些家庭成员可能会死去,但整个家庭又会重回和睦安宁。而圆满的结局通常需要一个强有力或富裕的人物加以协助,这样的角色通常会是仁慈的老板、英明的市长、牧师或者修女。但有些故事也会让某个回家的成员承担这种关键角色,这个人通常凭借自己的才干、勤奋、美德或是运气而变得相当富有。 643

一些连环画书和摄影小说(photo-novel)一再强调其采用的故事的真实性,并指出他们只是对读者提供的"真人真事"做了轻微的虚构,故事的真实气氛甚至要强于那些廉价的纪实犯罪小报。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出现的诸如《警报》(*¡Alarma!*)之类的情感日刊就常借用普通报纸上的照片(或事实),虚构出一个个惊世骇俗的故事。谋杀案——尤其是那些激情犯罪,成了这些小报中最常见的主题。另外,这些小报还选择一些令人心碎的故事,比如无辜姑娘被迫卖淫,家人因移民而被迫分离,美满家庭因毒品、酒精或单纯的经济原因而走入不幸,等等。这些故事和连环画中的故事情节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故事很少有圆满的大结局。

这样的故事常常能引起墨西哥读者的强烈共鸣,因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充斥着后革命时期的困难、危险和乐趣。不管是去墨西哥蓬勃发展的城市还是去美国,那些地方在提供令人兴奋的机会的同时,也都考验着家族的团结。革命思潮和消费者文化的延续,以及日益高涨的天主教会思想都为墨西哥的男性和女性创造了更为广泛的角色任务,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迷茫。当人们的工作从农业转向工业时,很多人的工作速度和节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给许多墨西哥人带来一定程度的繁荣的"经济奇迹",也让很多人迷失了方向,甚至感到恐惧。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到 1940 年时,人们对大众媒体情节剧,无论是来自报刊、电台还是电影,都有着永无止境的需求。 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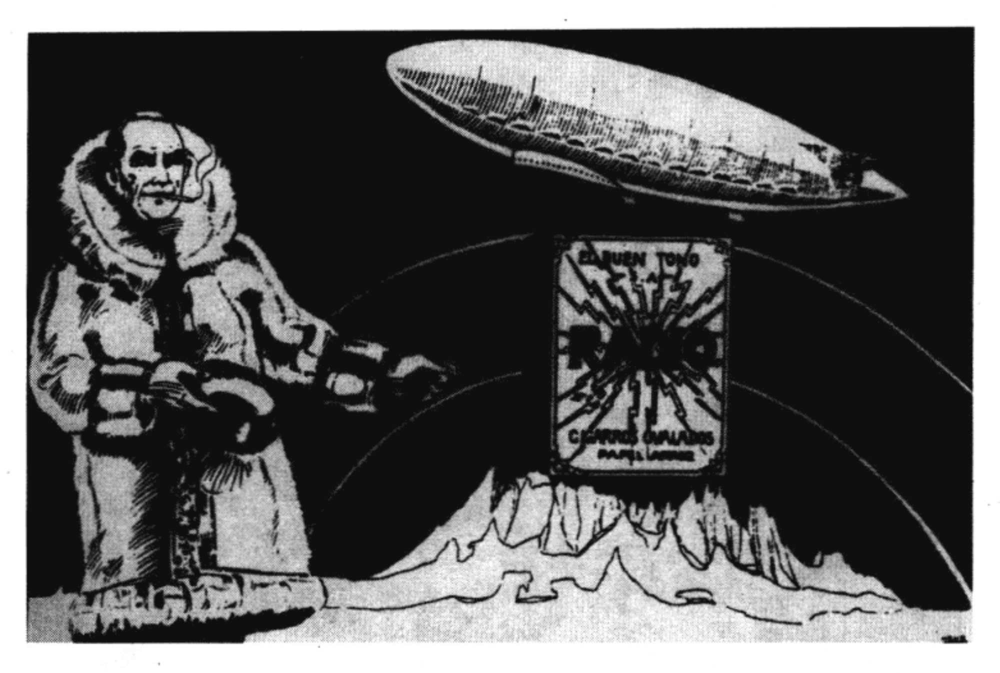
漫画书和小报的故事常常和小说连播(或广播剧)的内容极其相

似。同一个作家往往会同时供职于两个不同的媒体平台。例如,著名的漫画多产作家约兰达·巴尔加斯·杜尔切(Yolanda Vargas Dulché)因她的作品《野凤梨记》(*Memin Pinguin*)和《眼泪、欢笑与爱》(*Lá grimas, risas y amor*)而名利双收,这两部漫画在20世纪70年代曾创下一周内狂销100多万册的记录,在之后的几十年仍然畅销,甚至在1995年仍再版。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她成为漫画作家之前,她曾供职于一家报社并负责撰写短篇小说,曾在一家古巴的夜总会当过短暂的歌手,还曾在她的漫画出版初期写了大量的广播肥皂剧和电影剧本。另外,她为《小子》编写的许多故事或自己书中的情节大多能从广播、电影和电视中找到蛛丝马迹。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有用的情节或人物往往在漫画故事、广播剧、电影和电视剧之中反复出现。古巴广播剧《权利即将诞生》(*El derecho de nacer*)于1951年被墨西哥演员重新制作并搬上了广播,之后该故事便有了漫画版本,几年后又由另一批墨西哥演员完成了它的电影版,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部广播剧在墨西哥播出后的十年内。这之后,该剧又被重新改编成漫画,再次作为另两部电视剧和电影的故事基础,同时还出现了摄影小说版本。

广播剧不能像情节杂志一般迅速传播,因为在墨西哥,印刷品的出版速度和发行范围要远远超过广播。在1935年漫画书开始流行的阶段,墨西哥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 000万,但却仅有60万台收音机和80个广播电台。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开始为国家广播系统建立基础的法律、经济和物质结构体系,公众对新媒体的兴趣日益高涨。

墨西哥人第一次接触声音的机械复制是在1893年,当时墨西哥购入了第一台留声机。1923年,墨西哥进行了第一次实验广播,播送了总统奥夫雷贡和候任总统卡列斯的演讲。从那时起,广播在墨西哥就如同它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变成了政治的辅助工具。1923年,路易斯(Luis Azcárraga)和劳尔·阿斯卡拉加(Raúl)兄弟说服墨西哥城的《环球报》投资建立一个商业广播电台,这也是今天多媒体商业帝国巨人特莱维萨(Televisa)的前身。该商业电台的重要赞助商之一为桑伯恩斯(Sanborns)百货公司老板,该赞助商借此推出了一款“电台”牌

645



这幅20世纪20年代布恩·托诺烟草公司生产的“电台”牌香烟的广告画提到了航空旅行、极地探险和无线电联络方式，以表明这种香烟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苏打水。为了不被淘汰，卷烟制造商布恩·托诺(El Buen Tono)公司也投资建造了自己的电台，并开始销售“电台”牌卷烟。到1926年，墨西哥已经建成了13个广播电台。1930年，随着200千瓦的XEW广播电台开始投入使用，墨西哥迎来了其广播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该电台为埃米利奥·阿斯卡拉加·比道雷塔(Emilio Azcárraga Vidaurreta)所有，其规模为西半球之最；即使是在遥远的哈瓦那，听众也能收到该电台。尽管XEW隶属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但由于同步传输技术尚未成熟，该电台很少转播外国节目，而是集中播放西班牙语歌曲。因此，该电台很快成为墨西哥最受欢迎的广播电台。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埃米利奥至1938年再次建立了一个包括15个广播电台的无线广播网络并投入使用。

1928年，广播的政治意义越发明显，广播将奥夫雷贡遭到暗杀的消息比报纸更早地传到了墨西哥各地。精明的政客也常常利用这类新媒体来宣扬自身的优势，如美国的罗斯福和卡德纳斯在利用广播接近

民众方面都极有天赋。后者在墨西哥的声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竞选演讲和集会广播，他利用广播宣布石油国有化，取得了墨西哥人对这一运动的强烈支持。

646



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的任期全面代表了墨西哥革命的完成。他在1934年12月11日的总统就职典礼是这类典礼首次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各取所需，政府与新媒体大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政见的不一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阻碍，有消息称，尽管埃米利奥·阿斯卡拉加平时为人相当保守，1941年他还是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其原因是他们怀疑埃米利奥·阿斯卡拉加支持纳粹。)1932年和1936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以广播电台享有50年的广播频段权为条件，要求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至少四分之一以上应是“典型的墨西哥”歌曲，禁播与政治相关的广告，每天要播送一定量的政府要闻等。1936年以后，政府要闻的容量扩大到每天半个小时，外加十分钟的每日健康提示；到了1938年，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全国各个广播电台必须开设每周全国要闻栏目。该栏目是政府

为了增强公民国家意识而进行的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但其中对墨西哥各地民俗的介绍却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新兴旅游业的发展。

广播开播曲，特别是法定要求的“典型的墨西哥”音乐，为新的歌曲开拓了大量的市场和需求。有时新歌在录制之后进行播放，但通常情况下只是被作为现场播音的一部分进行简单的演唱。很多歌手和歌曲作者也因此声名远播，特别像古蒂·卡德纳斯(Guty Cárdenas)和卢恰·雷耶斯(Lucha Reyes)这些英年早逝的音乐人。但阿古斯丁·拉腊(Agustín Lara, 1897－1970)却是墨西哥史上毫无争议的新歌王。拉腊一生写了诸多优美的歌曲，其创作高峰出现在1926－1968年之间，期间他一共发表了大约200首歌曲。他的华尔兹、探戈、进行曲和舞曲的主题往往表达对韦拉克鲁斯城的深爱，对他四个妻子中的某一个或其他缪斯女神的仰慕，而他最为人熟知的民谣——发表于1947年的《漂亮的玛丽亚》(*María bonita*)，就是为了庆祝他自己与电影女星玛丽亚·费利克斯(María Félix)的婚姻。

647

但拉腊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即悲伤的墨西哥博雷罗(bolero)，这与当时在其他媒体中相当流行的情节剧有着密切的联系。拉腊的第一首波利乐出自其1928年的专辑《不可能》(*Imposible*)，这种全新曲风的歌曲起源于古巴的同名歌曲体裁，但却巧妙地将一组小型的合唱替代了原有的吉他独奏。因此，与古巴波利乐将歌手的声音与哀伤的词曲全部呈现给观众不同，拉腊的悲伤波利乐可以让听众选择，是随之舞动，还是为之哭泣。这些歌曲的背景常常设在拉腊第一次演奏的地下妓院和舞厅中，歌曲表达的也常常是一个年轻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妓女，或者一个妓女对自由的渴望，而这些也正是广播剧最悲惨片段的音乐表现。这些哀伤的曲调和跌宕的情节使拉腊的音乐自然地与所有的广播剧联系在了一起。1929年的9月，XEW给了拉腊一档名为“亲密一小时”(La hora íntima)的栏目，专门帮助拉腊宣传和展示他自己的音乐。

与此同时，拉腊的音乐还与电影的插曲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联系。1931年，拉腊为电影《圣诞老人》(*Santa*)写了插曲，之后不久，拉腊便

开始参与拍摄电影，总数将近 30 部，其中包括 1959 年他的自传体影片《拉腊的一生》(*La vida de Agustín Lana*)。他的电影常属于酒吧故事的流行体裁，讲述无邪的年轻女孩只身来到大城市迫于生计沦为舞女、劳工甚至妓女的故事。而电影中的拉腊则常扮演与自己身份相似的城市下层音乐人的角色，在电影或音乐中警告那些年轻的移民需对自己的生活抱有正确的期待，同时告诉观众和听众，女主角尽管有罪孽，却仍不失可爱，并要求观众和听众一起哀悼她的命运。身兼作曲家、音乐家和电影明星数职，拉腊已然是墨西哥妇孺皆知的明星。

墨西哥的电影业，在阿古斯丁·拉腊加盟之后，开始慢慢进入其黄金时期。1931 年，拉腊的第一部电影《圣诞老人》也是墨西哥的第一部音乐电影和最早的有声电影之一。《圣诞老人》的公映预示着墨西哥电影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即电影制作人有能力为他们的作品筹集到足够的赞助，并采用最新的技术(如有声电影以及 1942 年以后的彩色电影)来拍摄电影，同时也自信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合适的观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制作电影更像是参与了一场赌博，因为全国各影院的设备实在糟糕，电影观众的数量增长极其缓慢。到了 1938 年，整个墨西哥只有不到 500 家电影院，而电影业的发展似乎比其观众数量的发展更为缓慢。

在波菲里奥执政后期，墨西哥的第一批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通常是对当时的实证主义哲学充满同情心的工程师。墨西哥的电影业(与几十年后的广播业相似)从一开始就与墨西哥这个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批墨西哥电影做工原始粗糙，大量的照片和短时间的黑白静默片段杂陈。其中一部影片记录了波菲里奥·迪亚斯于 1906 年参观尤卡坦半岛的情景，另一部则记录了他会见美国总统塔夫脱的情形。革命的纷争使电影很难跳出新闻影片这一单一的表现形式。很多人相信，电影终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盈利的媒体产业。对这一产业充满希望的人于 1916 年在墨西哥开办了第一所电影学校。马德罗执政期间，政府已经设立了电影院检查制度。当 1913 年该政权垮台时，政府正在讨论电影检查问题。可是，墨西哥的电影业几乎没有太大发展，直到

648

1930年,墨西哥的电影产量还是维持在一年两部大型电影。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便是缺少国家支持。1927年,时任墨西哥教育部长的评论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指出,电影是"典型的北美"产物。因此,革命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公民提供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壁画等很少有文化污染的艺术。可想而知,革命政府也不会帮助本土的电影产业与国外的电影业进行竞争。

墨西哥本土电影的发展常不幸地遭到来自邻近的好莱坞的巨大挑战。早在无声电影时期,好莱坞的电影人就钟爱"风景如画"且价廉物美的墨西哥北部地区,并以此作为拍摄场地。好莱坞早期成功的大型英语纪录片就记录了潘乔·比利亚运动。当好莱坞制片人开始意识到电影出口的潜力时,墨西哥便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二级市场。好莱坞盛情邀请墨西哥演员,如卢佩·贝莱斯(Lupe Vélez)和多洛雷斯·德尔里奥(Delores del Río)参演(常常是与拉丁民族的刻板形象相适应的配角)他们的影片,以此来扩大好莱坞影片在西班牙语地区的观众群。1927－1932年间,好莱坞电影公司为占领拉丁美洲市场,甚至每年会制作好几部西班牙语电影。在墨西哥销售的第一本电影杂志《电影世界》(*Cine Mundial*),就是从纽约挺进墨西哥市场的。诸如此类的市场战略,连同好莱坞极高的产品质量和业界声望,使好莱坞电影在墨西哥的发展一帆风顺。在1930－1939年间,尽管墨西哥本土电影已经复苏,墨西哥城的电影市场仍有76%的电影来自美国(还有17%来自其他国家)。当时绝大多数的墨西哥人,一生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要远远多于其他电影,而在当今的墨西哥仍然如此。

在墨西哥,如果观众要看电影,不仅要进电影院,而且还必须懂得观影的礼仪。墨西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杂技剧场,名为卡帕(Carpa),在这类剧场中,人们无视那些性别规范和社会准则,嘲弄一切形式的礼仪行为和所有政治言论的陈词滥调。(例如,墨西哥著名的喜剧演员汀坦[Tin-Tan]和坎廷弗拉斯[Cantinflas]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演艺生涯。)这类剧场是以在公共场所进行一些非法演出而闻名的,因此,正派的妇女一般很少会踏入此类场所。在墨西哥电影上映的初期,这类剧

院有时又会被用来放映电影，因此总带有这类剧院特有的男性冒险和违禁的气氛。早期影片放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墨西哥早期的电影类型之一是色情剧。墨西哥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色情作品的发行商是最早得益于新通讯技术的群体之一。1940年，为挽救其他影院及其赞助商的声誉，墨西哥政府高调打击色情电影，大量墨西哥城的非法影院被迫关闭。1941年，墨西哥政府还颁布了电影审查标准。但总体来说，影片的内容以及观影者的行为对这个国家而言不是问题，政府更关注的是电影的制作人和他们的赞助商。

649

普通电影院想方设法将自己与滑稽剧场和播放色情电影的场所区别开来。在20世纪30年代，某些电影院放映妇女专场，但更多的电影院则在剧院中安排了引座员，帮助监督剧场内的不良举止。另外，所有的剧院都沿用斗牛场和角斗场的惯例，小心地通过不同的票价将影院按照等级进行区分。但即使是在装饰高雅、名称优美的一等电影院内，观众仍被要求注意自己举止的文明。有些电影院装有厚厚的红色天鹅绒窗帘和精心雕刻的阳台，还有“皇宫名邸”之类的名称，暗示着观众的高贵身份；还有一些电影院装有精简的构架和铬合金配件，还有诸如“摩登时代”的名字，意味着这里的观众应像工人那样遵守纪律。但是观众们却不领这个情。到了30年代中期，大部分电影院都如之前的杂技剧场一般存在着各种不文明行为。在日渐拥挤的城市中，电影院成了少数几个爱侣们可以保有隐私的地方之一。逃过验票者，偷偷溜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了城市贫穷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时，成群结队的少年会占领某个电影院的阳台作为他们的领地。电影院渐渐成了其他边缘活动的重要平台。例如，1959年一部猫王的电影放映期间，青少年摇滚粉丝的骚乱曾经震动了整个墨西哥。

墨西哥人渐渐发现了电影院的诸多用途，也正因为如此，墨西哥的电影业在1930－1950年期间发展尤其迅速。和与日俱增的观众人数同步，墨西哥每年的电影产量从1930年的5部增长到了1950年的125部。（相比之下，1940年以前拉丁美洲电影产业最为活跃的阿根廷在1950年只制作了不到30部故事片。）1950年，墨西哥国内的电影院

数量达到了1 070座，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初具规模的城镇都至少有一座电影院。这些电影院大部分时间都在放好莱坞电影，但墨西哥的本土电影也在全国上映，有时甚至也会大放异彩。

1936年公映的电影《在大牧场上》(*Allá en Rancho Grande*)是第一部墨西哥本土制造的热门电影。这个农场喜剧电影为之后的此类电影设定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比如，墨西哥最早的彩色电影之一《哈利斯科爱情》(*Así se quiere en Jalisco*, 1942)就沿用了这个模式，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大牧场上》主要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刚回到小镇的善良的农场主、他的忠诚且有些自傲的年轻管家和一个美丽无邪的少女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的导火线是女孩爱管闲事的教母。这个故事融合了打斗、误解、大量的戏剧性场面，中间还穿插了许多舞蹈和歌曲，以及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在大牧场上》是一部正面的歌舞电影：它涉及女性的纯真以及城市移民的返乡，同时故事中没有任何死亡。

650

该时代风靡一时的喜剧作品坚决拒绝采用当时的流行歌曲、广播剧和连环漫画。比如《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日子里》(*En tiempos de don Porfrio*, 1939)和《西蒙先生这样的日子》(*¡Ay, qué tiempas señor don Simón!*, 1941)，均给观众提供了革命前那仁慈的岁月，让观众想象自己属于为数不多的精英人士。另一方面，《就是这一点》(*Abí está el detalle*, 1941)是喜剧演员坎廷弗拉斯扮演诚实流浪汉的系列电影中的最后一部。它通过复杂的剧情(英雄爱上仆人之女，坎廷弗拉斯被诬告谋杀，却通过充满智慧的自辩取得胜利)嘲笑国家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所有这些电影都让观众暂时脱离社会与经济烦恼。

20世纪40年代，从《就是这一点》开始，一些影片加入了墨西哥电影中的经典元素，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很多电影属于情节剧，多是将广播连续剧或漫画的故事进行压缩改编而成，而主演这些电影的也正是墨西哥电影界的巨人：玛丽亚·费利克斯、多洛雷斯·德尔里奥、佩德罗·阿蒙达里斯(Pedro Armendáriz)、佩德罗·因方特(Pedro Infante)和豪尔赫·内格雷特(Jorge Negrete)等。1943年是墨西哥电影界的

多产年——出现了四部可以为之后的作品界定审美和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戏剧作品。由多洛雷斯·德尔里奥主演的《玛丽亚的画像》(*María Candelaria*)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大革命前夕,女演员扮演的印第安女孩遭到了大城市腐败的不公正的指控。这电影最终以悲剧结尾,但 1943 年的其他著名作品的结局则较为模棱两可。另一部历史电影《堂娜·芭芭拉》(*Doña Bárbara*)将电影背景设在委内瑞拉,玛利亚·费利克斯主演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从不屈服于男性权威的女农场主,在故事的最后她决定消失于这片平原之中,以成全自己女儿和附近农场主的婚事。《野花》(*Flor silvestre*)是一个与革命有关的故事,影片中由佩德罗·阿蒙达里斯主演的英雄去世了,但他的妻子(多洛雷斯·德尔里奥饰演)、儿女和他对于平等的信念都留了下来。《另一个黎明》(*Distinto amanecer*)和坎廷弗拉斯的电影作品一样,批判了后革命时代的物质主义,并在影片的最后做了乐观的预测:佩德罗·阿蒙达里斯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一个被暗杀的劳工领袖,但这也使腐败政客的罪行浮出水面。

1943 年制作了大量的优秀电影,整个 40 年代标志着墨西哥电影业的黄金时代。电影业的遍地开花并不是偶然,现象的背后是金融、技术和法律体系对整个电影业的支持。除了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技术的引进,大量电影院的建造,墨西哥最大、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墨西哥城中大批新的电影制片厂的建立。正如在广播业、出版业和音乐等其他领域作出的贡献一样,埃米利奥·阿斯卡拉加对这个文化产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44 年,另一个媒体巨头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伊格莱西亚斯(Manuel Espinosa Iglesias)说服好莱坞发行商停止向阿斯卡拉加的电影院出售电影拷贝,阿斯卡拉加被迫出售旗下的连锁影院,但其仍旧在电影业保持着相当活跃的姿态。1944 年,他利用好莱坞雷电华电影公司的融资,成功建立了丘鲁武斯科电影制片厂(Churubusco Studio),为墨西哥引进了最为先进的电影设施;6 年后,丘鲁武斯科电影制片厂兼并了当时最先进的阿兹特克电影制片厂,为众多墨西哥电影和电视作品建造了摄影棚。

651

此外，各类新组织的建立也使墨西哥本土电影的制作、发行和上映变得更为容易和安全。1936年以后，墨西哥建立了一个电影制作人和分销商组织。1945年，一群演员和导演（包括豪尔赫·内格雷特和坎廷弗拉斯在内）与该组织发生冲突后，脱离了该组织。他们抱怨该组织无法了解其艺术需求。劳工冲突使所有的生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都陷于停顿。最后墨西哥政府决定，由政府出面建立第二个联盟——电影生产工作者联盟（Union of Cinema Production Workers），主要负责故事片的生产，而原来的电影工业工作者联盟（Union of Cinema Industry Workers）则负责新闻电影的生产以及所有墨西哥本土电影的发行和上映。为了鼓励电影业的发展，新创立的墨西哥电影摄影艺术与科学学院（Mexican Academy of Cinematographic Arts and Sciences）还于1946年设置了类似于美国好莱坞奥斯卡奖的年度大奖。所有这些组织都推动了墨西哥的电影人与好莱坞展开最为有效的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好莱坞的竞争力略微减弱。随着欧洲市场的关闭，拉美市场对于好莱坞变得尤为重要。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拉丁美洲会与日本和德国结盟，而努力建立和维护联盟关系也包括文化层面的联合，因此他们尤其担心某一天拉丁美洲世界会观看法西斯西班牙或中立的阿根廷拍摄的影片。根据美国雇佣的墨西哥顾问的建议，美国文化外交官下令迪斯尼公司生产一系列西班牙语动画片以配合扫盲运动。更重要的是，美国还为墨西哥的电影制片人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他们向墨西哥本土电影开放了之前由好莱坞主导的拉丁美洲电影发行网络；鼓励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与墨西哥的电影制片人进行合作。墨西哥的电影产业由于这次非比寻常的政治开放而又一次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支持墨西哥电影业在20世纪40年代的迅速发展。1934年以后，墨西哥政府尝试着对电影业做了不同形式的援助。拉萨罗·卡德纳斯认为电影和广播一样有着政治方面的作用。因此，他在执政初期就利用政府资金成功挽救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全新的电影制片厂"拉美电影"（该电影制片厂曾经是

墨西哥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的电影制片厂)，重新起步的"拉美电影"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制作政府投资的史诗巨片《与潘乔·比利亚一同前行!》(*¡Vámonos con Pancho Villa!*)的工作中。该片耗资100万比索(20万美元)，堪称当时最昂贵的墨西哥电影。据说，卡德纳斯也参与了最后的编辑审查，并抱怨最后一幕太过血腥。尽管该电影在现在受到多方好评，但它在上映期间却票房惨败。也正因为如此，卡德纳斯政府减少了对合作电影制片商的鼓励，以及对新闻片和纪录片的资助。而阿维拉·卡马乔政府对用电影表达其思想立场的兴趣甚低，但在控制电影内容以及支持当地工业方面却有着坚定的立场。因此，该政府通过立法规范了电影剧本审查的授权，同时也设立了银行电影贷款。1942年初，这一关键机构为电影制作人提供了低息贷款，帮助解决了当时电影业界遇到的最大难题——如何获得资金。1945年后，阿维拉·卡马乔又为本土电影的发展加了一个助力器：豁免了本土电影的所得税。

652

电影业的发展开始明显又微妙地依赖于国家。除了国家提供关键的财政支持以外，从剧本内容到电影院的清洁度，政府掌握着调控该产业任何方面的权利。这种管理模式不管是对电影本身，还是对电影院都相对有效，甚至带有爱国情怀，因此也更吸引观众。电影制作人则很少花精力去思考此类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支持帮助自身成长的政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经典电影都讴歌了以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和米格尔·阿莱曼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民族主义。米格尔·阿莱曼总统在1947年出席电影《暗河》(*Río escondido*)的首映礼时发表言论，认为农村的学校教师所面临的无知、疾病和贫穷的危险，也正是整个民族所面临的危险。这个时代的情景剧和喜剧，甚至是其中最好的作品，都不免对农村的压迫和城市的贫穷表示伤感。这些电影描述或创造了奇异的地区传统。而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描述了强有力的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警察、教会、富裕阶层和父权家庭——这些角色常常好得无可指责。

文化创新，例如廉价的期刊、广播和电影在革命后的墨西哥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其间也不乏批评者，而且大众文化与当时的政治现状结合

得越紧密,它遭受的批评也就越多。抗议媒体和抗议公共义务教育一样,对于保守派来讲是一种表达不同意见的较为安全的方式。此外,新媒体常常会(用理想化或夸张的形式)叙述经济政治变化、新技术的革新和城市化,以及性别角色的转移对墨西哥人生活的影响;因此,表达对新媒体的不满也是表达了对现代化生活本身的不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大众传媒和消费者文化表现出最为强烈和持久的不满的是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即现代化最大的受益者。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墨西哥几座最大的城市:蒙特雷,瓜达拉哈拉,普埃布拉和墨西哥城。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抗议者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参与抗议的人们有时是由政客领导的,尤其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到 40 年代中期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最近的国家行动党。其他很多时候人们则会跟随教会领袖。但这些反对者并不轻易跟随某个政党的路线,因此大部分反对者表达的是无党派墨西哥人的关注焦点。

653

性别问题尤为紧迫。保守派认为大众媒体往往借女性纯洁为名大做文章,描述那些堕落的女性,他们认为这反而会导致其他女性自我堕落。歌舞类电影和拉腊的博雷罗音乐中的妓女和舞厅女孩极具诱惑性。1936 年,卡德纳斯政府公共教育部长甚至提议政府取消拉腊作品在墨西哥公立学校的播放权。这一举动在执政党内部几乎没有引起争议。保守派对性道德的关注与之前的革命党有相似之处,后者曾一直致力于控制赌博、卖淫和一些社会焦点问题。而卡德纳斯政府的公共教育部门在这一点上也倾向于与自己的政敌保持一致。该政府于 1933 — 1934 年尝试在公立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却遭到反对;1936 年企图实施宪法第三条搞"社会主义教育",也遭到强烈反对。卡德纳斯政府早已从一系列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性教育并不是保守抗议者在两性问题方面反对大众媒体的唯一话题。广播连续剧、漫画故事和电影中的女性更多地是以工作者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身份出现这一现象也激怒了某些保守的听众。此外,情节剧还将女性的工作场所描写得极为脆弱危险,好像随时都会受到性侵害。当然,情节剧的作者也不会为参加工作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抗议

者认为,女性参加工作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对家庭稳固和民族道德观的一种挑衅,因此这些情节不该再出现在媒体上。

其他诸如"谁才是墨西哥理想女性的代表"之类的问题也随之出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新媒体和文化冲击给墨西哥女性提供了大量女性生活典型。各种小报记者的强大采访能力使各种名流的生活曝光于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之中。因此,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玛利亚·费利克斯在她的新片中饰演了一位纯洁的英雄女教师,但观众们想了解的却是日常生活中与费利克斯相关的性爱丑闻以及她的多次离婚史。其他一些反传统的艺术家,比如弗里达·卡洛与蒂娜·莫多蒂等也是小报八卦专栏中的主角,尽管大部分读者对卡洛的绘画作品或莫多蒂的摄影作品一无所知。虚构的人物也在时刻暗示墨西哥民众,成功的墨西哥女性不一定只有一个模式。在1935－1950年间,连环漫画书和广播连续剧常常致力于塑造一些"现代女孩"的形象,这些女孩往往执着地要为爱而不是为家庭责任而结婚;她们想要在结婚前争取自己的人生;她们常穿着性感而时髦的服装;她们还敢于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她们只是漫画或小说中的人物,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把这种虚构人物发挥到极致的是畅销漫画《阿黛利塔和游击队》(*Adelita and the Guerrillas*)。这部漫画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女侦探,而漫画书名改编自流行民谣"阿黛利塔",这首歌描述了典型的女革命战士情感,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虚构人物是墨西哥民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654

保守派尤其反对墨西哥革命妇女(soldadera,女战士)这一形象,甚至强烈反对与此相关的任何歌曲以及以她的名义设置的节日。另一方面,他们还尝试了很多抗议以外的手段试图重新塑造符合他们标准的墨西哥"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建议墨西哥政府借鉴美国的做法,设立母亲节(墨西哥的确在1920年以后就开始非正式地庆祝母亲节)。1945年,天主教会响应教皇的号召,将瓜达卢佩圣母形象作为美洲的女王形象,并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庆典重申了圣母在墨西哥的重要地位。10年后,教会选中了演员兼歌手佩德罗·因方特这一墨西哥公众

偶像，通过墨西哥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为圣母教堂的重建募集资金。此外，通过专门针对女性的出版物和组织，教会一直致力于保持女性忠贞并帮助其塑造女性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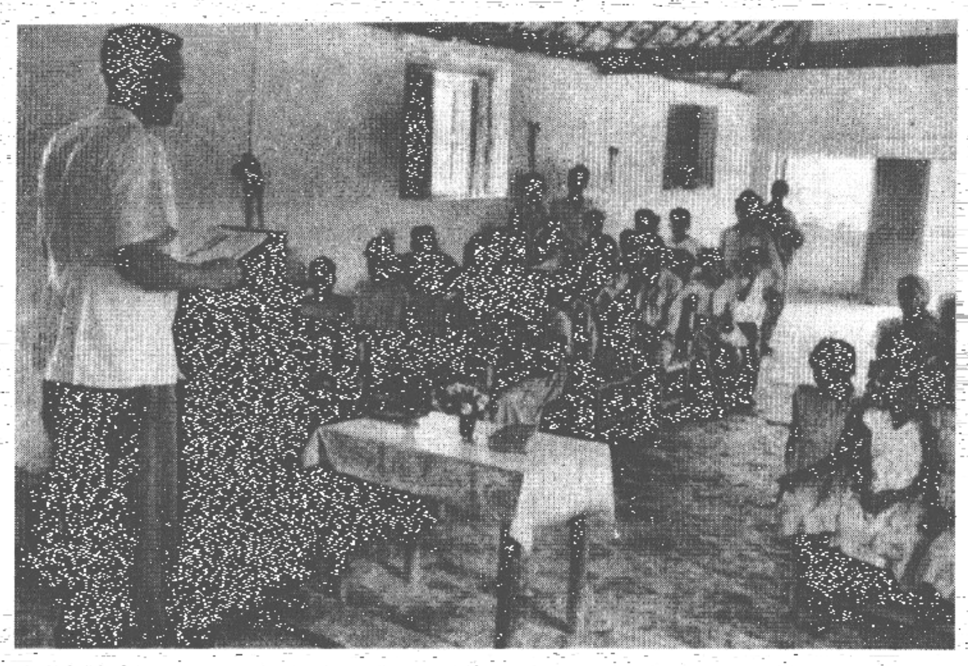
保守派对各种媒体和流行文化始终保持密切关注，并随时准备抗议。而漫画书和电影似乎更容易得罪人。其实，墨西哥的城市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几十年来，墨西哥人一直在为何种图像的海报和广告牌可以在公共场所展示而争论不休。例如：1996 年一则内衣平面广告令墨西哥举国哗然，这则广告上展示的是个带着胸罩的女性，广告商在广告牌上写道："你喜欢我吗？"在遭到各种非议后，广告商撤下了该广告，却挂上了另一幅几乎相同的图片，唯一的不同是，广告中的胸罩被衬衫替代，新的标语是："现在你喜欢我吗？"关于公共行为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比如怎样为舞蹈划清道德底线，公共汽车、火车之类的公共场合中，男性是否可以控制住自己不靠近陌生女性等，而所有这些争论的最终结果往往会归结到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力度上。因此，1940 年以后，舞厅和电影院的审查制度日渐严格，而 1967 年后开始建造的墨西哥地铁在交通高峰期也为女性设置了专用车厢。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争论常常掩盖了对墨西哥国家合法性的争议。当天主教徒对迭戈·里维拉壁画中的亵渎性图像而进行抗议时，当 1948 年暴乱者砍下了墨西哥城阿拉梅达公园的贝尼托·华雷斯雕像的头时，这些抗议者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政府操纵这些由公共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万神殿英雄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一定是激烈而明显的。有一些人通过拒绝使用革命政府赋予街道和广场的新名称来默默地进行抵抗，1945 年，阿维拉·卡马乔政府迫于现实，重新将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教堂附近的地区改为原来的名字：圣母镇。 655

对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抵抗方法也因抗议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对媒体的抗议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公开展示和集体抵制。例如天主教会发现教区的教民们不可能主动放弃看电影的机会，因此他们用一种极为温和的方法引导教民去看那些"最没有危害"的电影：他们在每个星期天的集会上散发一些每周电影导读，并在导读中将每个教区即将放

映的电影按照电影类型和影片限制级别进行分类整理(这一行为从193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0年)。还有一些教区组织了对那些放映“不道德”电影院的集体抵制。在20世纪40年代,首都附近的一个市郊地区——科约阿坎专门另设了一个社区电影院放映“干净”的电影。与此同时,很多墨西哥人也想方设法要为儿童杂志找到一片纯净的天空,并与《丕平》以及其他一些畅销漫画书抗衡。第一批为此付出努力的人得到了卡德纳斯的支持,但最终没有太大的成果。另外一些人从教会得到了财政支持,因此持续的时间要略微长久一些。20世纪50年代有一本名为《宝藏》的儿童杂志,其编辑非常圆滑,因为这本儿童杂志和其他漫画杂志唯一的不同点就是这本书上常常会刊登本书编辑与国家政要以及社会名流握手的照片。1980年,墨西哥政府再一次出资投资了一部漫画《趣话墨西哥》(*Episodios mexicanos*),该漫画取材于一系列墨西哥的历史故事,(在某种程度上)由历史学家撰写,并由专业的漫画家配图和出版。墨西哥政府认为,墨西哥城外的报摊经营者不能承担起销售此系列书的重任,因此将此书的运输和销售通通交给了当时极受欢迎的白面包制造商潘·宾博(Pan Bimbo)。这个相对成功的计划最后于1982年随着洛佩斯·波蒂略政府的告终而结束。

公众对“道德性”娱乐需求的增长也为一些文化产业提供了盈利的机遇。1934年,一家收音机生产商在一则报纸广告中建议每一位家长应该为家庭着想,为自己的孩子买一台收音机,因为那些一放学便跑回家听广播连续剧的孩子接触外部“坏同伴”和“坏思想”的几率就要小很多。XEX广播电台一直在阿斯卡拉加统治的无线电王国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1947年,该电台的负责人决定以“干净”的音乐代替流行音乐作为自身的招牌。该电台列出的歌曲列表马上在全国各地“芳名远播”,并屡次重印。在该电台的“淫秽”歌曲黑名单中,有包括拉腊的《女人》(*Mujer*)在内的墨西哥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尽管如此,该举措还是为该电台打下了良好的市场。无独有偶,漫画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出版美国翻译版漫画,如迪斯尼漫画的出版商,也常常将自己的商品标榜为“干净”、“有益”、“健康”和“具有教育意义”的产品。



在革命政府试图使墨西哥人民远离天主教的同时，新教的传教士则在努力争取让墨西哥人皈依新教。但虽然像图中这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这样的传教士都在努力布道，但墨西哥文化从根本上讲仍然与天主教息息相关。

类似的商业努力使保守派无法对所有的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进行一刀切的反对。有时，教会出版部门也会认可很多电影，尤其是迪斯尼的电影。消费品的现代化似乎对教会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危害，相反，教会还能从中受益。因此，1949 年，墨西哥城的大主教开办了墨西哥有史以来第一家西尔斯商店(Sears store)，并为该商店送上了特别的祝福。对进口商品和进口文化的喜好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标志着人们对墨西哥政府长期以来的抵制，以及为建立民族文化和民族主题所做的努力。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墨西哥的天主教会迎来了比大众媒体更为强大的对手。尽管新教徒的数量在墨西哥仍是少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其他各种教会组织的到来，新教徒的数量开始上升。到了 80 年代，墨西哥各地的很多家庭在门口贴上了“天主教家庭”的标识以阻止传教。1970 年左右的墨西哥南部，尤其是在恰帕斯一带，由于许多家庭的宗教日历、家

庭成员和经济周期都与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紧密相连，因此宗教信仰的转变在当地的村庄内以及各村庄之间引发了大量的冲突。

墨西哥的天主教会在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比起转变为新教徒的那部分人，大部分墨西哥人承认并坚持自己是天主教徒。在1900年，80%以上的人口称自己为天主教徒。但是，正如殖民地时期的土著居民一样，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生活中还吸收了其他的理念。他们认为，如果教会亵渎神明，那教会只能被称为迷信，比如与潘乔·比利亚的灵魂进行对话，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封为圣人，（最近）在墨西哥北部对特哈纳（Tejana）歌手赛琳娜（Selena）的崇拜，以及将治疗技术和占卜方法归结为前西班牙文化或笼统地称为亚洲智慧，等等。与此同时，经历了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梵二会议）和古巴1959年革命以后，天主教在整个拉丁美洲几乎分崩离析。“解放神学”关于鼓吹“上帝会优先选择穷人”的新教义开始大行其道。在墨西哥，这一思想的分歧最终分裂了贫穷地区的教会，尤其是莫雷洛斯州和恰帕斯州，以及墨西哥城较为传统的部分和墨西哥北部地区。1968年，在库埃纳瓦卡，新的实验精神促使一位修道院院长将所有的修道院僧侣送往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家处，并将此事告诉了相关的新闻媒体。其他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活动包括大力支持社会运动或社会武装运动。例如：1994年恰帕斯的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为萨帕塔游击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持，而当地的主教在该事件中一直充当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媒体的抗议活动时至今日仍然时有发生。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墨西哥政府在文化问题上开始与保守派达成某些共识。例如，1944年，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就漫画书表达了其相当强烈的反感，他还为此创立了插图出版物分类委员会，之后更名为出版物与插图杂志分类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出版物中宣传迷信，犯罪，侮辱墨西哥政府，鄙视墨西哥人民和宣传乱性暴力等内容的出版商进行罚款。然而，这个新的机构并没有太多执行权，因此也没有对漫画书、插图小说或其他墨西哥期刊杂志的内容产生多大的影

响。(其实,墨西哥政府可以对那些他们认为带有政治威胁的期刊小说进行审查,但是它却选择了分类委员会这种非法律机构处理类似的事件,所以才效果甚微。)颁布这项法令后每隔几年,总会有新的保守派跳出来指责愈发大胆的杂志业。但该法令也正如那些管理广播业和电影业的条例一般,时刻提醒反对者,政府其实也站在他们这一边。从阿维拉·卡马乔政府开始,政府就开始着手推行一个方案,力图减少保守派的抗议,并说服墨西哥的民众,政府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较为负面的现象也无能为力,这些事情的解决仍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看来,这个项目经营得很成功。

1940 年以后,尽管墨西哥政府仍然坚称自己是革命政府,但却表现出越来越专注于自我保护和朝资本主义经济方向发展的趋势。伴随着卡德纳斯的离职,建立单一的官方文化已经成为泡影。早期的意识形态、自由,以及波菲里奥政策和革命运动都影响着政府在教育、艺术、城市规划、农村发展、运输和媒体方面的政策。此外,迅速成长的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也通过影响墨西哥公民的经验和想象力,开始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

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就曾特意用公开的态度摒弃了前任政府的文化政策。他在任期间,除了大力推行扫盲运动以外,他将民族神话的创造留给萌芽中的文化产业和教会去进行。相对于直接参与文化生产过程,他更关注于掌控产业的产出部分。

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就任总统既是墨西哥政治也是墨西哥文化的分水岭——一些历史学家还将其视为革命的结束,但是新的总统也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和心得。像卡德纳斯一样,他机敏地通过媒体展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他答应在选举后放弃使用武力反对教权:这位当选总统通过简单地告诉一名采访者他是"一名信徒"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这位新总统和他的家人也分别很好地阐释了当时大众媒体(和媒体的保守派批评家们)鼓吹的家庭角色形象。阿维拉·卡马乔的妻子索莱达德(Soledad),可能是在总统的鼓励下,扮演着绝对正统的完美家庭主妇:在那些广为宣传的事件中,她首先坚

持认为女猎神狄安娜(Diana the Huntress)的裸体雕像要从墨西哥城的中央大道上移除;接着,她又抵制了玛丽亚·伊斯基耶多的一幅画,因为那幅画中也包含了一个裸体女人的形象。而与此同时,总统的兄弟马克西米诺(Maximino)则是那种豪尔赫·内格雷特般粗暴、有力并且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农场主形象。他的奇闻轶事,比如说与西班牙弗拉门戈舞蹈家和女斗牛士之间的故事,常常是通过谣言,而不是丑闻小报进入人们的视野的;但他的 11 个孩子(不全都是他两次婚姻的婚生子)倒是一个公开的记录;还有他在枪口下接管通信部门的故事,他那镶满珠宝的手枪以及他的脾气等。而总统自己的公众形象——一位天主教家长,坚定、冷静并且审慎——是千万部广播连续剧和漫画情节剧中好父亲的典型形象。1940 年以后,政治也开始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娱乐性质的情节剧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媒体曝光的都是些笑话、谣言、八卦、访谈和公开表态。

历届政府都试图给自己定位,并通过建设一些标志性工程在墨西哥的文化青史上留名,而这些工程大多体现了墨西哥现代化的各方面内容。米格尔·阿莱曼总统在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和机场方面有着极大的热情,而他的行政领导班子的成员和他的家庭成员在把阿卡普尔科发展成国际旅游度假胜地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为了表达对国家与教育、教育与进步之间的联系——当时这种联系几乎成为人们的一种条件反射——的重视,阿莱曼政府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大规模的新学校项目上。1951 年,阿莱曼总统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建立了新的校区。

659

大学城,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加入了墨西哥城南扩的行列当中,将大批的学生从首都的中心地带转移到了广阔的郊外新校园,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大学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美术馆和巨大的体育场。这些大学新校园的建筑摒弃了浓墨重彩、结构紧凑且装饰繁复的旧殖民主义色彩,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利落、功能齐全、现代感十足且饰有巨幅绘画和马赛克的大楼,其中一些巨幅绘画是墨西哥公共场合中最后的壁画作品,它们象征着大学取得的进步。此外,校园的设计也充分体现了

民族自豪感：校园的风景通常尽可能地接近自然，而很多大楼里也使用了当地的黑色火山石。总统阿莱曼的大型雕像伫立在大学城的中心位置，所有人都知道那个雕像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1954 年建成开馆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是为了纪念阿道夫·鲁伊斯·科蒂内斯总统。该博物馆陈列着相当数量的前西班牙时期的物品和当代印第安土著的工艺品和服装，以此来暗示过去与现在（20 世纪 20 年代）的印第安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筑设计上，两层楼的博物馆主体坐落于一个巨大的庭院中，暗示回归殖民主义时期建筑的辉煌时代。该博物馆还是墨西哥最为重要的产业——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指南用尽溢美之词叙述了参观该馆陈列品的奇妙感受，而该馆也成了每一个外国游客的必访之地。为了与博物馆 20 世纪的功能相一致，博物馆的设计使用了现代主义视觉性和象征性的建筑语言：简化和简约，如广阔的大厅采用了较低的天花板，还有大量的平板玻璃和浇注混凝土。

旅游业和其他文化产业一样，与国家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旅游业是一块吸金石，它不断地诱惑着那些政治家采取行动。总统们常常选择自己的好友或亲戚来执掌管理该产业的政府部门。旅游业需要政府通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大量的对外宣传进行支持，墨西哥政府的重要举措包括：1940 年和 1990 年举办的墨西哥艺术世界巡回展，1970 年和 1986 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以及 1968 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所有这些盛事都和其他的活动一起将墨西哥推向了世界。因此，在 1968 年的奥运会开幕前夕，墨西哥政府对当地的学生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因为在这些政府高官的眼里，公众抗议将会让墨西哥失去通过奥运会向世界推销自己的绝佳机会。

体育盛事是墨西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同样也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来源。1946 年，棒球经理人豪尔赫·帕斯克尔花重金从美国的职业棒球联盟挖来球员填补自己的球队，与球员签订合同，承诺如果这些球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能归队，他将付给他们比原来的球队更高的报酬。当时整个墨西哥都把这当成一个笑话。但到了 20

660



在墨西哥超有人气的职业摔跤(lucha libre)运动制造了不少像"蓝魔"和"黑影"这样的名人,但真正赢得公众声望的摔跤手是"圣徒"。

世纪50年代,学生们举行示威只为支持自己的校队,而随着大学城的建立,大型的运动场有了用武之地。(在墨西哥其他地区很少看到的美式足球[即橄榄球]在该地区极受欢迎。)此时,人们才开始渐渐理解体育的意义。在所有的团队运动中,足球最受墨西哥人欢迎。在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举行之际,所有墨西哥人似乎都会停止手上的工作,并带着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盛事。墨西哥是世界杯决赛圈的常客,但却一直与冠军奖杯无缘。

足球和棒球在当今的墨西哥仍然相当受欢迎。但是由于这些运动

要求有开放的场地空间，因此球员和观众都大多喜欢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而墨西哥另一项非常重要的运动是发源于北部地区的骑术表演(rodeo)。骑术表演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农场电影，该运动是高度规则化的男性实力竞争。(1989年开始出现女子骑术表演，但是她们的比赛与男子比赛有着精细的区分，前者更强调优雅、魅力和外观。由此可见，墨西哥的骑术表演仍旧深受其形成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比赛中，穿着华丽的男性运动员(或男骑手)尽情展示着他们驾驭马匹的高超技术，手拿长绳，在不施加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征服这些动物。与美国的骑术表演注重力量和暴力不同，墨西哥的骑术比赛更强调技巧和外在的视觉美。此外，和深受前革命时期文化影响的其他形式的个人体育比赛(特别是拳击和摔跤)一样，观看运动的公众和运动的形式本身都与观众通过广播和书本所熟悉的情节剧中的盛事有着联系。

城市化使其他一些适合拥挤城市地区的体育运动开始普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来自西班牙的回力球员(包括女性球员)在很多墨西哥主要城市进行比赛，并在很多时候与当地的精英一起为赛马比赛欢呼加油。在40年代，当墨西哥最轻量级拳击手和次重量级拳击手在美国的拳击锦标赛中取胜时，拳击开始吸引工人阶层的注意，无数广播剧和漫画书情节剧中努力奋斗的年轻拳击手成了他们的英雄主角，成为一种在国外寻找财富的超级移民的象征。而之后，拳击的地位与日俱增，以至当“老鼠”马西亚斯(El Ratón Macías)在1957年失去世界最轻量级拳王的头衔时，该消息在墨西哥引起了暴动。关于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在国际竞技场上(尤其是英语国家)取得成功的渴望的结合，最为著名和成功的拳击手就是“阿兹特克小子”(El Kid Azteca)。

不过，职业摔跤——自由格斗——一种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其受欢迎程度更是超越了拳击。1933年第一次制定规则后短短几年间，摔跤场地便遍布全国。自由格斗同时也是电影有力的竞争对手。和电影一样，这是一种廉价的娱乐活动，伴随着这种运动的进行，还有大量和故事情节有关的旁白，因此并不是仅仅只有输赢那么简单。每一个摔跤

手都属于粗鲁型和技术型中的一类或两类兼有。技术型属于好人，他们在比赛中从不欺骗，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对手，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比赛中常常会输；而粗鲁型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角色，他们歪曲规则，从不按常理进行比赛：他们有时会买通裁判，使用非法手段或用卑鄙的伎俩把对手打败。技术型要打败粗鲁型的唯一方法便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技术型在当晚的比赛中用粗鲁型的伎俩最终打败对手(有时也包括裁判)时，观众们便会集体为这种场面欢呼雀跃。粗鲁型和技术型都会在表演时穿着华丽服装，如同骑术表演的运动员，并且在最后一场关键性的比赛中不戴面具上阵——尽管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662

自由格斗的精髓与大众所理解的墨西哥政治制度非常相像。在摔跤场上互为敌人的摔跤手在场外可能串通一气。尽管一些观众和许多参赛者坚持认为这纯属巧合，但比赛的结局常常是既定的。比赛规则很清楚，但明显对某一方有偏袒，而官方的代表——裁判——完全可以被贿赂。强大的粗鲁型摔跤手拥有将不公正的体系倾向自己的力量，因此拥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自由格斗也有女选手，但并不与男性选手享受同样的权利(墨西哥城在 1950 － 1980 年就禁止女子摔跤手比赛)。在比赛中，遵守规则的选手常常会输，除非他们从朋友那儿得到协助或不再服从规则。有时局面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参赛者将会受重伤，或被活活打死。

电视和自由格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扶持的。自由格斗给传媒事业提供了不间断的比赛，从而为电视台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与此同时，自由格斗华丽的扮相、有限的场地、庞大的粉丝群和短时间内爆发的暴力都成了电视台高收视率的保障。而另一方面，电视台也为自由格斗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观众群，给了摔跤手在赛场外成为名人的机会。当时最受欢迎的摔跤手是“圣徒”，他在 30 年的时间内出演了近 50 部电影，每周，甚至每天都出现在墨西哥当时最畅销的摄影小说连环画中。因此，摔跤是墨西哥最早播放的电视体育节目之一。尽管 1956 － 1990 年期间，自由格斗被禁播，但电视版的自由格斗已经相当成功，以致当它回归电视时几乎影响了该运动的正常发展。到了 1995

年，大多数观众都愿意待在家里欣赏摔跤节目，从而导致遍布全国的摔跤场开始面临倒闭危机。

墨西哥电视产业的发展轨迹和广播业的发展如出一辙。和广播一样，电视的处女秀给了音乐节目和政治新闻。电视的第一次商业节目始于1950年，随总统阿莱曼的讲话首次与观众见面。和广播业一样，电视产业很快就落到了那些原本就主导其他媒体产业的家族企业手中(大部分属于奥法里尔[O'Farrills]家族和阿斯卡拉加家族)。此外，电视产业也是先从墨西哥城开始发展起来，再传播到全国各地的。但是电视业的发展比广播业要快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快速增长的经济，它使投资人很容易就获得了大批潜在客户。1950年，墨西哥城建立了第一座电视台；1954年，普埃布拉和诺加莱斯的电视台也相继建成；1958年，墨西哥20个州都至少拥有一座电视台；到了1963年，超过100万的墨西哥人看起了电视；而1966年，彩色电视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广播和电视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在肥皂剧(即电视剧)方面。墨西哥电视台在1952年开始尝试播放电视连续剧，包括一些删节的莎士比亚与贝克特作品的现场表演。这些连续剧常常由集戏剧家、专栏作家、诗人和舞台监制于一身的萨尔瓦多·诺沃(Salvador Novo)制作和导演。在电视产业出现的初期，电视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的场所。1957年，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每日长篇电视连续剧播出。广播连续剧和电视连续剧有着相同的基础结构：这些故事常常是家庭情节剧，和美国的肥皂剧不同，墨西哥的肥皂剧在长达几个月或几年的播出后，常常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结局。因为电视剧观众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墨西哥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至少在电视产业的初期是这种情形)，因此电视连续剧中的角色通常比其他大众媒体中的要稍微富有一些。而最近，电视剧中的角色类型更趋于广泛，观众也开始关注更多其他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比如关于女佣和女继承人的故事。墨西哥的观众很喜欢本土的产品，但是进口的电视连续剧，尤其是那些原汁原味的委内瑞拉和巴西连续剧在墨西哥也很有人气。

663

1960 年前后，墨西哥电视产业的发展史开始偏离电台和其他所有的媒体行业的成长轨迹。与其说是不得不与外国的电视媒体竞争国内市场，倒不如说墨西哥电视产业不但在自己的国内稳稳地守住了江山，而且以飞快的速度将自己的影响传播到了其他国度。1961 年，阿斯卡拉加家族买下了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家电视台，该电视台的开播标志着西班牙语美国电视网络(Univisión)的成立。不管是在法律还是行政目的方面，这一电视网和特莱维萨都在西班牙语市场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墨西哥的电视节目也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1986 年，特莱维萨公司将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国内相当受欢迎的肥皂剧《富人也悲伤》(*Los ricos también lloran*)出口至欧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到了 1990 年，这部片子成了俄罗斯最受欢迎的节目，第二年，越南的观众也开始为此着迷。没有人可以解释这部肥皂剧为何能产生如此轰动的效果，但是肥皂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让该剧的女主角韦罗妮卡·卡斯特罗(Veronica Castro，她后来成为一名广播台记者)在国外因为身边全是她的影迷而举步维艰。

肥皂剧的魅力还体现在墨西哥政府试图利用肥皂剧来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特莱维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来维持其在商业广播中的垄断地位(该垄断地位于 1993 年被由几家私有制的教育电台组成的阿兹特克电视网络打破)，因此该公司与政府进行了合作。比如：1970 年，作家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提议对 1917 年宪法做一次大规模的修改，而作为回应，墨西哥政府将宪法本身列入了革命英雄的民族万神殿中，同时还花费巨大财力，邀请当时广受欢迎的女明星玛利亚·费利克斯参演，制作了一部名为《宪法》(*La constitución*)的肥皂剧。此外，1975 年，公共教育部门为鼓励学生待在学校而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跟我来》(*Ven conmigo*)，1977 年为了推行计划生育，该部门又推出了另一部肥皂剧《相伴》(*Acompáñame*)。

电视剧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要感谢墨西哥电影业的衰落。到了 1950 年，本土电影业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部分是因为电影业的资源开始渐渐向电视业转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移还包含了一种审美

要求。举个例子，天才导演胡利奥·布拉乔(Julio Bracho)1960 年制作的电影《考迪罗的阴影》(*La sombra del caudillo*)将前革命时期政治势力之间的丑恶斗争稍加虚构搬上了银幕，该电影立刻受到审查，并被雪藏了 30 年。考虑到自己已无望通过电影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于 1962 年开始执导第一部肥皂剧。更多情况下，导致电影业资源向电视业转移是因为电视产业不会与好莱坞产生直接的竞争，因此该产业的利润率相较电影业要高得多。比如，圣安赫尔酒店制片厂(San Angel Inn Studios)原来是一家拥有墨西哥最好的电影设备的制造厂，却在 1968 年开始转战电视领域；另一家在墨西哥城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制片厂——丘鲁武斯科，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出租给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者(例如大卫·林奇在那里拍摄了《沙丘》[*Dune*])，才在各种残酷的竞争中存活了下来。

664

奥克塔维奥·帕斯是墨西哥最有名的文学家，他因沉思墨西哥国民性的《孤独的迷宫》一书而声名鹊起。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是这个国家的文学良心。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肯定。图为 1995 年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正在签售自己的最后一本书《印度札记》(*Bislumbres en la India*)。

1950 年后，墨西哥仍旧制作了大量的电影，并在 1958 年以 138 部

电影作品的记录达到了生产高峰。但是即使在电影业最为低迷的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中期,墨西哥电影界生产的电影数量还是在拉丁美洲的电影业中占据头把交椅。问题是,随着电影制作者试图在激烈的竞争中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他们制作的电影的质量开始下滑。垄断电影院的公司特别喜欢播放好莱坞电影,墨西哥本土电影为了建立自己的观众群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电影。即便如此,连锁影院的老板们还要求本土电影必须面向最为广泛的电影观众。电影贷款银行和其他机构使墨西哥的电影业举步维艰,但电影业所作出的努力只是为了保护那些早已通过电影业而腰缠万贯的少数富人,而不是为了提高墨西哥电影的质量。从 1960 年到现在,有些导演——比如著名的海梅·温贝托·埃莫西略(Jaime Humberto Hermosillo)、阿方索·阿鲁亚(Alfonso Arua)和玛丽亚·诺瓦罗(María Novaro)——尝试制作严肃题材的电影,并获得了国际赞誉。但是他们只是特例,而他们大部分的作品很少在墨西哥地区放映。

665

观众们开始把很多墨西哥的本土电影比作 1950 年的墨西哥油条(Churros),并将他们与很多在城市角落贩卖的机器制作的油煎食品作比较:像墨西哥油条一样,墨西哥的电影很有趣但是没有营养,制作速度很快,每一个都很相像,很便宜,但是看过就忘(墨西哥油条并不雅观的外形也同样可用于此类比)。墨西哥油条帮助推销了其他大众媒体。随着阿斯卡拉加家族的影响力在媒体业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电影起用了来自其他媒体行业的肥皂剧演员和通俗歌手。仅在 1954 年,就有 30 多部影片取材于当时一种新式的舞蹈:恰恰恰舞[1]。墨西哥本土电影具有大众性,其风格不仅包括好莱坞熟悉的恐怖题材和科幻题材,还有关于卡车司机和自由格斗的电影。例如: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热门系列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名叫萝拉的女司机的成功史;而更近的系列

① 恰恰恰(cha-cha-cha 音译)是曼波最原始的衍生舞蹈,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最流行的拉丁社会舞蹈。许多音乐家、歌曲家和迪斯科的音乐家都喜欢采用这种舞蹈的流行节奏。——译者注

喜剧则记录了一位农村女性的遭遇，这位名叫玛丽亚的聪明天真的印第安女性让城市里的骗子得到其应有的下场；但是最为著名的系列电影是由摔跤手“圣徒”主演的电影。有时墨西哥本土电影非常受欢迎，但是即使演员自己也承认电影的质量低劣：“圣徒”就曾经表示，他觉得他的影迷选择观看他的电影完全是出于同情心。

1940年以后，随着提供给墨西哥人的国产媒体总量成倍增加，墨西哥人用于物质享受的消费也越来越多。广播、电视、电影和书报杂志都试图告诉他们的读者或观众一个他们已经知晓的道理：虽然墨西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它有着辉煌的过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墨西哥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首先是在艺术领域，然后渐渐扩大到了大众媒体。这种异议从多方面批评官方民族主义，并试图借当代欧美哲学和文化强调自己的观点。其中的某些运动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并成为墨西哥官方文化的一部分。最近，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开始致力于重塑现已过了时的民族认同，努力使其成为改造墨西哥社会和政治现状的文化方法。

1954年，一群年轻的画家发表宣言，谴责壁画运动其实是一种妥协，带有感伤意味，并且缺乏审美标准。他们针对墨西哥革命时期官方文化的言论在当时震动了整个文化界。1957年，其中的一名画家何塞·路易斯·奎瓦斯，在一篇名为《仙人掌幕帘》的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迭戈·里维拉在1953年绘制了他的最后一幅壁画，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通过这些文章，墨西哥新一代的艺术家，如同法国和纽约的著名艺术家一样，宣布自己将致力于抽象艺术和自我表达。

666

更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50年，一位年轻的诗人兼外交官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发表了一篇名为《孤独的迷宫》(*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的优秀论文。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尤其是萨特和加缪，对帕斯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帕斯也正是采用了他们的理论来寻找墨西哥民族性格的历史根源。帕斯对墨西哥民族性格的根源——暴力、孤独和仇视女性提出了质疑。这位作者最终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男性的羞耻心。他指出，墨西哥民族性格的源头是玛琳奇的背叛，如果没有这位印

第安土著妇女，科尔特斯是绝不可能征服墨西哥的。按照帕斯的理论，所有的墨西哥(男)人都会认为自己是"被强奸的妇女的儿子"，而墨西哥革命则作为这种孤独的男性羞耻感以暴力的形式突然爆发得到最佳解释。因此，普通的墨西哥历史与特别的革命史都在帕斯的论文中被男性化和非政治化。尽管帕斯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在外交使团中度过的，同时也参加了1968年的政治反对派(他用辞去印度大使职位的方式来抗议政府的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但他通常不大参与政府的行为，既不左倾也不右倾，但同那些反壁画运动的画家一样，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史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

1959年以后，随着杂志《羽毛之角》(*El Corno Emplumado*)翻译，存在主义在墨西哥的知识分子阶层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同年，墨西哥城的第一家巴黎式"存在主义餐厅"开张营业。与此同时，其他国外的哲学思潮，特别是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和古巴的革命，也开始影响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存在主义餐厅从北美的披头士和拉丁美洲革命思潮中的"新歌"(new song)运动中吸取灵感，马上开始与民族音乐餐厅争夺客源。更具影响的是，该时代的革命运动促使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同时也是外交官)通过一系列描写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如何逐渐背离其初衷的小说，重新审视了墨西哥革命及其带来的影响。富恩特斯的意见刚好与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观点相左，他支持国外的古巴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以及国内的民主改革派。他们两人的敌对状态在墨西哥国内形成了两大不同的支持阵营，也催生了两本独立的文学杂志。争斗随着1998年帕斯的去世而接近尾声，但作为纪念，杂志被保留了下来。

美国也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影响。1964年，随着政府资助的文化经济基金会出版社(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翻译出版了奥斯卡·刘易斯有关墨西哥城一个家庭的民族志《桑切斯的儿童》，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开始影响墨西哥。由于墨西哥政府认为该书的内容是对整个墨西哥民族的侮辱，便在停止该书发行的同时，撤去了备受尊敬的出版社社长阿纳尔多·奥尔菲拉·雷纳尔(Arnaldo Orfila

Reynal)的职务。一石激起千层浪,奥尔菲拉·雷纳尔找到了由著名墨西哥作家资助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Siglo XXI)。1966年,最高法院裁定另一个出版商华金·莫尔蒂斯出版社(Editoral Joaquín Mortiz)重新出版刘易斯的著作。种种曲折使该书的重印版成为该出版社有史以来最为畅销的读物。与此同时,作家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开始模仿刘易斯民族志的风格,用她的描写对象(通常是穷人或文盲)的录音来记录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刘易斯用他的方法来加强自己论述的科学客观性,但波尼亚托夫斯卡却用这种方法为那些弱势群体找到了一种陈述自己社会和政治观点的方法。后者的小说混合了她的采访资料和她本人对女战士(在《直到我看不见你,我的耶稣》[*Hasta no verte Jesús mío*]中)和艺术家(在《我最亲爱的蒂娜》[*Tinísima*]中)生活的想象;她的长篇采访文章(记录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和记录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记录了很多人的不同观点,包括来自政府官员的讽刺言论和幸存者的感言,所有这些都试图较为真实地展现这些事件本身。

但美国更为重要的影响是透过大众媒体渗透到墨西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少年反叛电影(像《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和《监狱摇滚》[*Jail house Rock*])都使大量墨西哥年轻观众疯狂着迷,这些电影的叙述方式以及张力都和墨西哥电影、广播、电视和出版读物中的家庭情节剧有着极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与当时国内对舞蹈的狂热气味相投的摇滚音乐也渐渐进入了墨西哥人的视野。在墨西哥人的心中,这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国外引进的曼波舞[①]、伦巴舞和恰恰恰没有太大区别。第一张墨西哥摇滚唱片诞生于1959年,名为《回锅的玉米煎饼》(*refritos*),因为这是由墨西哥当地乐队(顶级少年和滚石反叛者)仔细地将来自美国的经典摇滚乐用西班牙语重新填

① 大多数人认为,曼波舞的名字是来自海地对巫师祭司的称谓,"曼波"所形容的是人们陷入催眠后的狂热状态。曼波舞有非常多姿多彩的历史,而且舞蹈风格也多种多样,是非洲和中南美洲文化的混合产物。——译者注

词、演唱并灌制而成的。墨西哥的电视迅速同这种看似与其他流行音乐舞蹈并无多大不同的新潮流接轨，开始播放一些摇滚节目，即便有些乐队拒绝使用改编模板而坚持演唱自己的作品，比如“不停开掘”(Los Dug Dugs)和“我心中的三个灵魂”(Three Souls in My Mind)，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就像 20 世纪 50 年代加勒比地区的流行组合一样。

随着拉昂达(La onda，浪潮)运动的出现，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该文化运动开始于 1965 年前后，与法国的新浪潮运动和美国的反文化运动有着相似之处。拉昂达运动的小说家，例如何塞·阿古斯丁(José Agustín)等人，无视本地的舞蹈音乐，将披头士和滚石乐队音乐中的反叛歌词写进了自己的文章中。拉昂达导演亚历杭德罗·霍多罗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制作了梦幻般的神秘电影和戏剧作品，其感觉很像受毒品影响后的幻觉。作家卡洛斯·蒙西瓦伊斯(Carlos Monsiváis)和何塞·华金·布兰科(José Joaquín Blanco)创办了《拉昂达》杂志(*La onda*)，并以此为载体引入摇滚音乐，对官方文化进行了尽情的嘲讽。拉昂达潮流要求男女都留长发，这震惊了那些传统的已经接受摇滚音乐的人群。在当时甚至还出版了拉昂达漫画读物，里乌斯(Rius，爱德华多·德尔里奥)在创作出版的“超雄性”系列(Los supermachos)遭到审查之后，又创作了“蹲伏”系列(Los agachados)，两者都是诙谐、新颖、有教育意义的喜剧作品，但都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

拉昂达的参与者都很关注传到墨西哥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及其表现形式。但通常在墨西哥大部分人接触到这些文化之前，墨西哥政府就已经出面阻止了这些文化继续传播。例如政府停止了 1969 年“大门乐队”(the Doors)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一系列音乐会。同样，在 1969 年，由于剧中演员将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引入脚本，音乐剧《头发》(*Hair*)在阿卡普尔科被迫停演。本土的活动也面临着审查危机：埃切维里亚政府停止了 1971 年的阿班达罗(Avandaro)摇滚音乐节，原因是该音乐节试图创办墨西哥版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拉昂达的参与者对政府的言论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并表达了对墨西哥感伤的商业文化的厌恶。

他们开始求助于与这些言论和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外的艺术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中墨西哥民俗的、"真正的"形象却成为时尚。)

到了20世纪70年代,拉昂达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大多数的学生抗议被镇压。与该运动相关的艺术家和作家或突破了这种思想(如蒙西瓦伊斯),或离开了墨西哥(如霍多罗夫斯基),或停止了工作。而该运动的地理中心——墨西哥城的玫瑰区(Zona Rosa),成了一个昂贵的旅游陷阱。里乌斯放弃了漫画产业,开始为更小众的读者出版独特的《自由信息》(*info-libros*),第一批中有一本的英文版书名为《初识马克思》。该时代最好的乐队"我心中的三个灵魂",直到90年代仍在演出,该乐队的知名度甚至与日俱增,但其成就都是在更名为"三"(El TRI)后取得的。拉昂达运动对墨西哥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这类词开始出现在墨西哥的政坛中,可以说,这也体现了这类运动的最终胜利。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本人就是拉昂达运动反叛者的同代人,尽管没有人建议他接受他们的观点,这位总统本人也愿意突破几十年来所谓的"墨西哥式文化",并通过强调外来文化来实现他自己的想法。

不论其起源如何,萨利纳斯执政期间的私有化和开放浪潮对墨西哥的大众媒体以及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所获资助的减少,电影业陷入危机并几乎走向绝境。私有化没有威胁到媒体大亨的统治地位,相反,这些集团还是1991年革命制度党有力的财力支持者。随着大部分公共广播的停播和有线电视的开通,政府从美国引入了更多电视节目,同时也允许开办了第二家稍有批评倾向的电视台——阿兹特克电视台。尽管当地人在理解剧情时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与美国的本土观众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美国的连续剧,诸如《瘪四与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很快在墨西哥有了自己的观众群。1992年,墨西哥的城市地区到处都有销售巴特·辛普森(Bart Simpsons)的纪念品但上面没有巴特在剧中常说的讽刺语句,而是用诸如"你只有一个母亲"这样的经典谚语代替。 669

与此同时，通过关闭政府纸张供应商纸张制造与进口公司(PIPSA)，萨利纳斯政府还大幅放宽了对印刷出版业的控制。这一举动可能是政府方面认为相对广播媒体而言出版业的地位已大不如前的结果。1976年《普罗塞索周刊》(*Proceso*)开办后就开始通过独立的调查撰写新闻稿。但是在墨西哥，新闻业仍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职业——很多人权组织经常抱怨说，很多记者受到威胁，被殴打、绑架、折磨甚至谋杀——而贿赂更是相当普遍，不过这倒是补贴工资低廉的新闻业记者的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方法。以墨西哥城日报《这一天》(*La Jornada*)为例，该报纸通常一字不差地刊登政府的新闻稿，但所有的政府稿件的标题都是斜体，这样读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阅读了。20世纪90年代，首都和其他一些城市终于开始出现了一批有可信度的报纸。

最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开始峰回路转。延续了几十年的电视剧和漫画书中常见的情节剧开始大量萎缩，但是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画家和演员拒绝直接套用外国模式，因此他们开始从过去的语文、神话和图像中挖掘题材，评论(常常带有讽刺意味)今日事。高档的酒店开始撤下法国大餐的招牌，并以精致的本土菜代替。卡洛斯·蒙西瓦伊斯也通过诙谐地模仿官僚的口吻开始创作一档受欢迎的报纸专栏。先锋摇滚乐队塔库瓦咖啡馆(Cafe Tacuba，根据墨西哥城一个变成旅游胜地的历史地点命名)用自己的音乐向漫画女恶棍拉罗通加(Raratonga)致敬，并重新改造了墨西哥流浪乐队的风格用于制作自己的音乐。更受欢迎的“Maldita Vecinda”乐队从外表上看很像英国朋克乐队，但他们的音乐将墨西哥的民族乐器融合到电子吉他和贝斯的演奏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女明星格洛丽亚·特雷维(Starlet Gloria Trevi)醉心于丑闻(比如拍摄了诸多裸体日历)，但她同时也煞有介事地宣布，她打算有一天能当上总统，巧妙地冲击着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一部名为《再见，我的偶像》(*Adiós, adiós, idolo mío*)的电影将墨西哥电影史上的摔跤明星“圣徒”描绘成一个又老又胖并且拒绝退休的人；同时，一个自称超级巴里奥，并一直

以自由格斗的装束出现的社团组织者，由于巧妙地将摔跤中的政治喻意公开表现出来而成为墨西哥1985年地震后的重要人物。

最终将墨西哥文化推向后现代的是1994年元旦在恰帕斯州出现的萨帕塔游击队员。比起直接向墨西哥政府和跨国公司申诉自己的委屈，这些萨帕塔派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有趣的书面声明，用一种好玩的比喻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名字——甚至他们的武装叛乱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怀念，他们很快就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宣称自己的现代性。(至于游击队员是否真的将太阳能笔记本电脑与卫星相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萨帕塔派也经常戴着面具，穿着像超级巴里奥的装备，表达自己对自由格斗运动的喜爱，同时又隐含着他们不会被国家所指派和利用的承诺。1999年，这群起义者(戴着其标志性的雪橇面具)和一支专业的足球队进行了一次足球对抗赛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凸显了这场反叛运动的趣味性和墨西哥性。

670

伴随着超级巴里奥、萨帕塔派，以及墨西哥政治形式中不太公开的后现代性，大众文化有了重要的飞跃。表演者和观众(至少暂时地)使用例如模仿、混合和引用等方法从国家和媒体手中夺取了对集体记忆的控制。但他们是否可以继续创造条件，使过去和未来都可以被讨论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参考书目

Aiton, Arthur S. *Antonio de Mendoza: First Viceroy of New Spai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27.

Altman, Ida. *Emigrants and Society: Extremadura and Spanish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nna, Timothy E. *Forging of Mexico, 1821 –183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 *The Mexican Empire of lturbid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Bailey, David C *¡Viva Cristo Rey! The Cristero Rebellion and the Church-State Conflict i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4.

Baudot, Georges. *Utopia and History in Mexico: The First Chronicles of Mexican Civilization 1520 – 1569*.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5.

Bedini, Silvio A.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Encycloped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Beezley, William H. *Insurgent Governor: Abraham González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in Chihuahu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I973.

Berdan, Frances F., et. al., eds. *Aztec Imperial Strategies*.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3.

Booth, George C. *Mexico's School-Mad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Bosques, Gilberto.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of Mexico and the Six-Year Plan*. Mexico City: Bureau of Foreign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1937.

Boyer, Richard. *Lives of the Bigamists: Marriage,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Colonial Mexico*.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5.

Brading, David. *Miners and Merchants in Bourbon Mexico, 1763 – 18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Brenner, Anita. *The Wind that Swept Mexico*.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3.

Bricker, Victoria Reifler. *The Indian Christ, the Indian King: The Historical Substrate of Maya Myth and Ritua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Burkhart, Louise M. *The Slippery Earth: Nahua-Christian Moral Dialogue in Sixteenth-Century Mexico*.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

Campbell, Randolph B. *An Empire for Slavery: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in Texa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amp, Roderick Ai. *Crossing Swor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xic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olitics in Mexico: Democratizing Authoritarianis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arr, Barry. *Marxism and Commu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Mexico*.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Centeno, Miguel A. *Democracy Within Reason: Technocratic Revolution in Mexico*.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ervantes, Fernando. *The Devil in the New World: The Impact of Diabolism in New Spa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mberlain, Robert S. *The Conquest and Colonization of Yucatan, 1517 – 155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e, 1948.

Charlot, Jean. *The Mexican Mural Renaissance, 1920 – 192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ristian, William A. Jr. *Local Religion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Clark, Marjorie Ruth. *Organized Labor in Mexic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4.

Coe, Sophie D. *America's First Cuisin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Columbus, Christopher. *The Book of Priveleges Issued to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King Fernando and Queen Isabel 1492 – 150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elen Nader.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Cook, Maria Lorena, Kevin J. Middlebrook, and Juan Molinar Horcasitas,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Regime Change in Mexico*. La Jolla: U. S.-Mexico Studies Center, 1994.

Cook, Sherburne F. *Soil Erosion and Population in Central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Cope, Douglas R. *The Limits of Racial Domination: Plebeian Society in Colonial Mexico City, 1660 – 17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Cornelius, Wayne. *Politics and the Migrant Poor in Mexico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ornelius, Wayne, Judith Gentleman, and Peter H. Smith, eds. *Mexico's Alternative Political Futures*. La Jolla: U. S.-Mexico Studies Center, 1989.

Cortés, Hernando. *Letters from Mexico*.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osteloe, Michael P. *The Central Republic in Mexico, 1835 – 1846: Hombres de Bien in the Age of Santa An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hurch and State in Independent Mexico: A Study of the Patronage Debate, 1821 – 1857*.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78.

Cronon, Edmund David. *Josephus Daniels in Mexico*.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0.

Crosby, Alfred.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 – 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bbs, Jack Autrey. *The French Army in Mexico, 1861 – 1867*. The Hague: Mouton, 1963.

Dauster, Frank. *Xavier Villaurrutia*. New York: Twayne, 1971.

DePalo, William A. *The Mexican National Army, 1822 – 1852*.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Díaz del Castillo, Bernal. Genaro Garcia, ed. A. P. Maudslay, trans.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 1517 – 152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0.

Drexler, Robert W. *Guilty of Making Peace: A Biography of Nicholas Tris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1.

Dulles, John W. F. *Yesterday in Mexico: A Chronicle of the Revolution, 1919 – 1936*.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1.

Eisenhower, John S. D. *So Far from God: The United States War Mexic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Erfani, Julie A. *The Paradox of the Mexican State: Rereading Sovereignty from Independence to NAFTA*.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Farriss, Nancy M. *Maya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Collective Enterprise of Surviv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Before Columbus: Exploration and Colonisation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Atlantic*.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U. K.: Macmillan Education, 1987.

Folgarait, Leonard. *So Far From Heaven: David Alfaro Siqueiros's The March of Humanity and Mexican Revolutionary Politics*.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Forbes, Jack D. *Apache, Navajo, and Spaniar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0.

Fowler Salamini, Heather. *Agrarian Radicalism in Veracruz, 1920 –1938*.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7.

Friede, Juan and Benjamin Keen, ed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n Histor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 and his Work*.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Garcia, Canclini, Nestor. *Transforming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i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Genauer, Emily. *Rufino Tamayo*.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74.

Gerhard, Peter. *A Guide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New Spain*. Rev. e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 *The North Frontier of New Spain*. Rev. e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 *The Southeast Frontier of New Spain*. Rev. e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Gibson, Charles. *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 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Valley of Mexico, 1519 – 181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Giles, Mary, ed. *Women in the Inquisitio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Gosner, Kevin. *Soldiers of the Virgin: The Moral Economy of a Colonial Maya Rebellio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2.

Green, Stanley C. *The Mexican Republic: The First Decade, 1823 – 1832*.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7.

Greenleaf, Richard E. *The Mexican Inquisi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9.

Gruening, Ernest. *Mexico and Its Heritage*.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1928.

Gruzinski, Serge. *The Conquest of Mexico: The Incorporation of Indian Societies into the Western, 16th – 18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93.

Guardino, Peter F. *Peasants,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Mexico's National State: Guerrero, 1800 – 18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Hale, Charles. *Mexican Liberalism of the Age of Mora.*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is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ll, Linda. *Alvaro Obregón: Power and Revolution in Mexico, 1911 – 1920.* College Station,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1.

——. *Oil, Banks an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 1917 – 192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5.

Hamilton, Nora. *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Hamnett, Brian. *Juarez.* London: Longman, 1994.

Hansen, Roger D. *The Politics of Mexican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Hart, John Mason. *Revolutionary Mexico: The Coming and Process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Anarchism and the Mexican Working Class, 1860 – 193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8.

Hellman, Judith Adler. *Mexico in Crisi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3.

Harvey, Neil. *The Chiapas Rebellion: The Struggle for Land and Democrac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Herman, Donald L. *The Comintern in Mexico.* Washington, D. C. : Public Affairs Press, 1974.

Herrera, Hayden. Frida: *A Biography ofFrida Kahlo.*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Hewitt de Alcantara, Cynthia. *Modernizing Mexican Agricultur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1940 – 1970.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76.

Hinds Jr., Harold E. and Charles M. Tatum. *Not Just for Children: The Mexican Comic Book in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2.

Hofstadter, Dan, ed. *Mexico: 1946 – 1973*.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74.

Hooks, Margaret. *Tina Modotti: Photographer and Revolutionary*.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3.

Hu-DeHart, Evelyn. *Missionaries, Miners, and Indians: Spanish Contact with the Yaqui Nation of Northwestern New Spain, 1533 –1820*.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1.

Huppert, George. *After the Black Death: A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Hurlburt, Laurance P. *The Mexican Mur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9.

Izquierdo, María. *The True Poetry: The Art of María Izquierdo*. New York: Americas Society Art Gallery, 1997.

Johnson, Lyman L. and Sonya Lipsett-Rivera, eds. *The Faces of Honor: Sex, Shame and Violence 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8.

Jones, Grant D. *The Conquest of the Last Maya Kingdo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ones, Oakah. *Nueva Vizcaya: Heartland of the Spanish Frontier*.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8.

Joseph, G. and D. Nugent, eds. *Everyday Forms of State 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Rule in Modern*

Mexico.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seph, G. M. *Revolution from Without: Yucatá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 - 19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Josephus, Daniels. *Shirt Sleeve Diploma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Katz, Friedrich. *The Secret War in Mexic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Kicza, John E., ed. *The Indian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Resistance, Resilience, and Acculturation*. Wilmington, Del. : Scholarly Resources, 1993.

Kirk, Betty. *Covering the Mexican Front: The Battle of Europe versus America*.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42.

Knaut, Andrew L. *The Pueblo Revolt of 1680: Conquest and Resista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Mexic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Knight, Alan. *The Mexican Revolution*.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U. S. -Mexican Relations 1910 - 1940: An Interpretation*. San Diego: Center for U. S. -Mexican Studies, 1987.

Krismaric, Susan. *Manuel Alvarez Bravo*.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7.

Lavrin, Asuncion, ed. *Latin American Wome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78.

Léon-Portilla, Miguel. *Aztec Thought and Cultur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0.

Lewis, Oscar.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Levy, Daniel. *Mexico: Paradoxes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1987.

Lipsett-Rivera, Sonya. *To Defend Our Water With the Blood of Our Veins: The Struggles for Resources in Colonial Puebl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9.

Lockhart, James. *The Nahuas After the Conquest: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Central Mexico, Sixteenth Through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cLachlan, Colin M. and Jaime E. Rodríguez O. *The Forging of the Cosmic Race: A Re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Mallon, Florencia E. *Peasant and Nation: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Mexico and Per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exico: Splendors of Thirty Centuri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0.

Meyer, Lorenzo.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Oil Controversy, 1917 - 1942*.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Meyer, Michael C. *Huerta: A Political Portrai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2.

——. *Mexican Rebel: Pascual Orozco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1910 - 191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7.

Meyer, Michael C., William I. Sherman, and Susan M. Deeds.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 6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ra, Carl. *Mexican Cinema: Reflections of a Society 1896 - 1988*, 2nd. rev.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Monsivais, Carlos. *Mexican Postcards*. New York: Verso, 1997.

Monter, William. *Frontiers of Heresy: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from the Basque Lands to Sic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orris, Stephen D. Political *Reformism in Mexico: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Mexican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1995.

Nader, Helen. *Liberty in Absolutist Spain: The Habsburg Sale of Towns, 1516 – 17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Nalle, Sara. *God in La Manch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Newell, Roberto, and Luis Rubio. *Mexico's Dilemma: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Economic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1984.

Niblo, Stephen R. *Mexico in the 1940s*.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98.

——. *War,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938 – 1954*.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95.

Nutini, Hugo G. *Todos Santos in Rural Tlaxcala: A Syncretic, Expressive and Symbolic Analysis of the Cult of the Dea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Orozco, José Clemente. *An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Robert C. Stephens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2.

Palmer, Colin A. *Slaves of the White God: Blacks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ranagua, Paulo Antonio, ed. *Mexican Cinema*.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5.

Parker, Robert L. *Carlos Chávez: Mexico's Modern-Day Orpheus*. Boston: Twayne, 1983.

Patch, Robert W. *Maya and Spaniard in Yucatan, 1648 – 18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z Salinas, María Emilia. *Strategy, Security, and Spies: Mexico and the U.S. a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erry, Mary Elizabeth and Anne J. Cruz, eds. *Cultural Encounters: The Impact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hilip, George. *The Presidency in Mexic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Phillips, William D., Jr. and Carla R. Phillips. *The World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ike, Frederic B. *Hispanismo*.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1.

Pike, Ruth.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The Genoese in Sevil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ew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letcher, David. *The Diplomacy of Annexation: Texas, Oregon, and the Mexic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oole, Stafford. *Our Lady of Guadalupe: The Origins and Sources of a Mexican National Symbol 1531 – 1797*.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5.

Poniatowska, Elena. *Massacre in Mexico*.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5.

Raat, W. Dirk. *Revoltosos: Mexico's Reb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3 – 1923*.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1.

Radding, Cynthia. *Wandering Peoples: Colonialism, Ethnic*

Spaces, and Ecological Frontiers in Northwest Mexico, 1700 - 185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estall, Matthew. *The Maya World: Yucatec Culture and Society, 1550 - 18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icard, Robert. *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Mexico: An Essay on the Evangelizing Methods of the Mendicant Orders, 1523 - 157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Richmond, Douglas. *Venustiano Carranza's Nationalist Struggle, 1893 - 192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Rippy, J. F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New York: AMS Press, 1931.

Rivera, Diego. *Diego Rivera: A Retrospective*. New York: Founders Society,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in Association with W. W. Norton, 1986.

Rochfort, Desmond. *Mexican Muralists: Orozco, Rivera, Siqueiros*. New York: Universe, 1993.

Rodriguez, Jaime O., ed. *Patterns of Contention in Mexican History*.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92.

Roeder, Ralph. *Juárez and His Mexico: A Biographical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7.

Roett, Riordan,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Mexico: At a Critical Juncture?*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Roth, Norman. *Jews, Visigoths, and Muslims in Medieval Spai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Leiden: E. J. Brill, 1994.

Rubenstein, Anne. *Bad Language, Naked Ladies, and Other Threats to the Na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Comic Books in Mexic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uiz, Ramón Eduardo. *The Great Rebellion, Mexico 1905 - 1924*. New York: Norton, 1980.

Russell, Jeffrey Burton. *Inventing the Flat Earth: Columbus and Modern Historians*. New York: Praeger, 1991.

Ryan, James W. *Camerone: The French Foreign Legion's Greatest Battle* Westport, Conn. : Praeger, 1996.

Sahagán, Bernardino De. *Florentine Codex: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12 vols. Salt Lake City and Santa F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School for American Research, 1950 – 82.

Schele, Linda, and David Freidel. *A Forest of King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ncient May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0.

Schele, Linda, and Mary Ellen Miller. *The Blood of Kings: Dynasty and Ritual in Maya Art*. New York and Fort Worth: George Braziller, Inc. , and Kimbell Art Museum, 1986.

Schmidt. Samuel.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exican Presidency: The Years of Luis Echeverrí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1.

Schoonover, Thomas D.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1860 –191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hroeder, Susan, gen. ed. *Codex Chimalpahin*. 6 vol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

Schroeder, Susan, ed. *Native Resistance and the Pax Colonial in New Spai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Schroeder, Susan, Stephanie Wood, and Robert Haskett, eds. *Indian Women of Early Mexic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Schuler, Friedrich E. *Mexico Between Hitler and Roosevelt: Mex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Age of Lázaro Cárdenas, 1934 – 1940*.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8.

Seed, Patricia. *To Love, Honor and Obey in Colonial Mexico: Conflicts over Marriage Choice, 1574 – 182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rrano, Mónica and Victor Bulmer-Thomas, eds. *Rebuilding the State: Mexico after Salinas*. Londo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6.

Sharer, Robert J. *The Ancient Maya*. 5th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impson, Eyler N. *The Ejido: Mexico's Way Ou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7.

Singletary, Otis. *The Mexican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Sinkin, Richard N. *The Mexican Reform, 1855 – 1876: A Study in Liberal Nation-Building*. Austi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79.

Smith, Lois Elwyn. *Mexico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Spicer, Edward H. *Cycles of Conquest: The Impact of Spa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Indians of the Southwest, 1533 – 1960*.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2.

Spores, Ronald. *The Mixtec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4.

Stein, Philip. *Siqueiros: His Life an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4.

Stern, Steve J. *The Secret History of Gender: Women, Men, and Power in Late Colonial Mexico*.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Tannenbaum, Frank. *Peace by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Mexic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3.

Taylor, William B. *Drinking, Homicide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Mexican Vill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agistrates of the Sacred: Priests and Parishion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Mexic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ylor, William B and Franklin Pease, eds. *Violence,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Americas: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Legacy of Conques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4.

Tedlock, Dennis. *Popul Vu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Teichman, Judith A. *Policymaking in Mexico: From Boom to Crisi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8.

Tennenbaum, Barbara. *The Politics of Penury: Debts and Taxes in Mexico, 1821–1856*.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6.

Thomas, Hugh. *Conquest: Cortés, Montezuma, and the Fall of Old Mexic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Tutino, John. *From Insurrection to Revolution in Mexico: Social Bases of Agrarian Violence, 1750–194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Twinam, Ann. *Public Lives, Private Secrets: Gender, Honor, Sexuality and Illegitimacy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Vanderwood, Paul J. *Disorder and Progress: Bandits, Police, and Mexican Development*.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92.

Vassberg, David E. *The Village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Golden Age Castile: 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Everyday Rur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aughan, Mary Kay. *Cultural Politics in Revolution: Teachers,*

Peasants, and Schools in Mexico, 1930 – 1940.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 *The State,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Mexico, 1880 – 1928*.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Vázquez, Josefina Z. and Lorenzo Mey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Vigneras, Louis-André. *The Discovery of South America and the Andalusian Voyages*. Chicago: Published 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Walker, Geoffrey J. *Kinship, Business, and Politics: The Martínez del Rio Family in Mexico, 1824 – 1867*.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Weyl, Nathaniel and Sylvia. *The Reconquest of Mexico: The Years of Lázaro Cárden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Winegardner, Mark. *Veracruz Blues*. New York: Viking, 1996.

Womack, John.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69.

Wright, Angus, *The Death of Ramon Gonzalez: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ilemm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Zolov, Eric. *Refried Elv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作者名录

CHRISTON I. ARCHE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OMAS BENJAMIN, Professor of History,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ROBERT M. BUFFINGTON, Professor of History,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MARK A. BURKHOLDE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 Louis
RODERIC AI CAMP, Professor of History, Claremont College
LINDA A. CURIO-NAGY,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evada
HELEN DELPA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labama
WILLIAM E. FREN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IRGINIA GUDEA, Professor of History, Centr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Universidad nacional, Professor of History Autónoma de México
JOHN MASON HART,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uston
ROSS HASSIG,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Oklahama
ASUNCIÓN LAVRIN, Professor of Histor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LINOR G. K. MELVILLE, Professor of Histor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HELEN NADE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rizona
ROBERT W. PATCH,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NNE RUBENSTEIN, Professor of History, Allegheny College
SUSAN SCHROEDER, Professor of History, Tulane University
JOHN W. SHERMAN, Professor of History,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FRIEDRICH E. SHULER, Professor of History,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AUL VANDERWOOD,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JOSEFINA ZORAIDA VAZQUEZ, Professor of History, El Colegio de Mexico

图片版权

AP/Wide World Photos: 600, 601, 612, 616, 624, 626, 627, 630, 635, 664; Archivo de Notarias de Mexico: 260; 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ón: 160, 249; 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ón, Centro de Información Gráfica, Archivo Hermanos Mayo: 501; The Baltimore Museum of Art: Purchased with exchange funds from the Edward Gallagher II Memorial Collection, and partial gift of George H. Dalsheimer, Baltimore. BMA 1988.474: 559; Courtesy Thomas Benjamin: 468, 493; Biblioteca Nacional: 270; From Codex Osuna, courtesy Biblioteca Nacional: 154; From Durán Codex, courtesy Biblioteca Nacional: 38, 94, 103;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Arch. Selden A 1, fol. 61r: 66; © British Museum: 58; Rafael Doniz, courtesy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y Estudios Superiores en Antropología Social: 209; Laura Gilpin,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02939: 59; Reproduccion Autorizada por 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ia e Historia: 298, 299, 323 (bottom), 329;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at Brown University: 69; Latin Focus: 214; J. Laurent,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08697: 30;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G&M 1224: 139;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228;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19, 148, 205, 231, 248, 364, 398, 405, 422, 430, 431, 438, 441, 451, 452, 480, 495, 499, 525, 528, 532, 536, 548, 567, 571, 587, 590, 593, 595;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H5–2847: 483;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H5–4362: 551;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H5–4698: 550;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H5–4808: 554;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H5–6075: 544;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B2–2665–7: 44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B2–2834–14: 448;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B2–3014–15: 449;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BH82–5294: 365;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1–1611: 297 (top);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00536: 163;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00553: 381;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07577: 461;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21395: 420;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33: 36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22174: 392;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31890: 511;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35251: 360;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4220: 343;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43534: 74;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44545: 393;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44677: 288;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48471: 278;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61327: 323 (top);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66216: 19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725: 353;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75001: 473;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75002: 51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79781: 272;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80581: 439;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9–162: 124;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9–344–1: 190; From America by Theodor de Bry, Frankfurt 1595,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186; From Atlas Pintoresco é Histórico de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by Antonio García Cubas, Mexico City 1885,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283; From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by Georg Braun, Basel 1965,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24; From Das Trachtenbuch by Christoph Weiditz, Berlin 1927,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78; From Diserta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Republica Mejicana by Lucas Alaman, Mexico City 1849,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279; From El Libro de Mis Recuerdos by Antonio Garcia Cubas, Mexico City 1905,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335; From Escudo de Armas de Mexico by Cayetano de Cabrera, Mexico City 1746,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167; From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January 10, 1862,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380; From Historia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ña by Bernardino Sahagun, Madrid 1905–7,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82, 108, 224, 234; From Homenaje á Cristóbal Colón, Mexico City 1892,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89, 93, 96, 100, 126; From La Arquitectura Naval Española by Gervasio de Artiñano, Barcelona 1920,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 148; From Life in Mexico by Fanny Calderón de la Barca, Garden City 1966,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331; From L'Illustration,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384; From Los Conventos Suprimidos en Mexico by Manuel Ramirez, 1862,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171; From Los Hombres Prominentes de Mexico by Ireneo Paz, Mexico City 1888,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404, 408 (top); From Mexican Illustrations by Mark Beaufoy, London 1828,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197; From 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 by Vicente Riva Palacio, Mexico City 1887,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297 (bottom), 291, 307, 312, 315, 331, 373, 408 (bottom); From Mexico Illustrated by John Phillips, London 1848,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358; From Mexico Ilustrado by J.R. Southworth, Liverpool 1903: 417; From Mexico: Its Peasants and Its Priests by Robert Wilson, New York 1856,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181, 320; From Oeuvres de Champlain by Samuel de Champlain, Quebec 1870,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185, 229; From Praeclara Ferdinandi Cortesii de Nova Maris Hyspania Narratio, Nuremberg 1524,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217; From Protest of Some Free Men, States and Presses against the Texas Rebellion, Albany 1844,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344; From Recopilacio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Madrid 1681,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Law Library: 116; From The Adventures of Marco Polo by Marco Polo, New York 1902,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13; From The Herball by John Gerarde, London 1597,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137; From The Tlaxcalan Actas, edited by James Lockhart et al., Salt Lake City 1986,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43; From Travels over the Table Lands and Cordilleras of Mexico by Albert Gilliam, Philadelphia 1846,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357; Map by René Millon: 62; Museo de America: 246; Museo Franz Mayer: 249;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Given Anonymously: 441; Courtesy Helen Nader: 41; National Archives, 306–NT–1174–9: 576; National Archives, 306–NT–1174A–11: 490; National Archives, 306–NT–1175–2: 523; National Archives, 306–NT–1175–MM–4: 520; National Archives, 306–NT–1175–Q–1: 484; National Archives, 306–NT–1175–S–1: 646; National Archives, 306–PS–D–58–8752: 610; National Archives, 306–PS–D–70–911: 585;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645, 660; Courtesy Anne Rubenstein, 643; Watercolor copy by Antonio Tejeda, courtesy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54; UNICEF/Liba Taylor: 632; Robert Vose, courtes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L9–58–7791–FF, #22: 656; Jeffrey A. Wolin, courtesy Helen Nader: 20.

Photo Essay: Latin Focus/ Lorenzo A.: 3, 4, 5, 9, (bottom), 11, 12, 13 (bottom), 14, 16; Latin Focus/ Mariana Dellacamp: 1; Latin Focus/ Jimmy Dorantes: 2, 8 (top), 15; Latin Focus/ Oscar Necoechea: 6, 7, 8 (bottom), 9 (top), 10 (top), 13 (top).

索 引

（外文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B

I

J

O

Q

R

T

W

译 后 记

经过多个"复旦人"近两年的努力，这本剑桥版的《墨西哥史》终于付梓与读者见面了。这本译著，完全可以说是复旦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努力、齐心合作的结果。译者之中，有60年代毕业于复旦的70多岁资深教授，有正在复旦教研岗位上作中流砥柱之力的中年学者，也有结束学业时间不久的青年学术才俊。但不论他们个人的差异如何，他们都为这部学术译著的早日出版尽了自己的应有之力。

在拉丁美洲诸国中，有关墨西哥历史的译著相对来说还是不算太少的，从20世纪的60年代起，就相继有各种译著问世了：其中有美国学者写的，有前苏联学者写的，也有墨西哥学者自己写的。这些著作对帮助中国人了解、认识和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是做出贡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看这些译著，却是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了：或是资料陈旧、相对不足，或是观点过时、教条，或是内容涉及面较为狭窄，等等。而目前的这本剑桥版《墨西哥史》正好弥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

如同剑桥版的其他国别史一样，这部译著也是由一两位本领域中的领军学者挂帅，组织一批在各自研究领域里声名卓著、成果丰硕的专家，合作写就而成书的。如第二章撰稿人苏珊·施罗德教授和第三章撰稿人罗斯·哈希格教授都是纳瓦语专家，而纳瓦语则是阿兹特克帝

国以及中部墨西哥印第安人的通用语言。写作历史时利用这样的语言，显然为解读征服前的墨西哥历史提供了更为有力和实在的工具，大大增强了历史真实感。因此，可以说，本书秉承了剑桥版国别史的传统优点和长处。

这些年，特别是10年至15年来，有关墨西哥历史的知识和史料激增，尤其是在社会史领域中(例如有关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史料)；原先无法接触到的一些档案资料现在可以与研究者见面了；美国和墨西哥学者也加强了合作和共同研究，这些都对墨西哥历史中的许多传统问题发出了挑战，改变了对墨西哥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理解，改写甚至重写了墨西哥历史中的许多细节，重新评价了墨西哥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等等。除了许多新史料外，本书突破以往一些墨西哥史的地方是，它将墨西哥史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充到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之外，增加了许多新的领域，如有关宗教信仰、社会道德、民俗民生、妇女问题、民族和国家生成、生态环境、现代化等，这些领域显然都是国际学界近年来比较注重研究的东西。

本书中由那些专家撰写的各章节，基本上也都反映了以上所说的那些变化，而且以前都未曾公开出版过，因此具有很强的创新之意。实事求是地说，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本具有最新学术成果的墨西哥历史著作。

本书各人所担负的翻译章节如下(以章节前后为序)：

朱鸿博：第1、2、3、4章

张家哲：第5、8、13、17章

王德华、季露璐等：第6、7、12、20章

韩　莹：第9、10、11章

牛海彬：第14、15、16章

万　瑜：导言，第18、19章

庄　蓉：索引

此外，我们全体译者都想衷心地感谢东方出版中心，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都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帮助和谅解，如果没有这些，

本书的问世也将是困难重重的。

最后，我不得不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在此写上一笔：本书翻译的最初发起者和组织者朱鸿博老师于2011年7月5日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不幸英年早逝，给大家留下了极为痛惜的遗憾。因此，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对朱鸿博老师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

张家哲 2011年7月10日写于上海